



RIBENDIGUO DE XINGWANG RIBEN

要不要
从一段可怖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能不能
从一段可怖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主编 汤重南 汪 森
强国 韩文娟

日本帝国的兴亡

中

世界知识出版社

日本帝国的兴亡

第四编

强 国 之 梦

第 16 章

天佑良机

战后经营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节节取胜，然而，普通国民并不清楚战争能力是由军事力量和财力决定的。在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国民以忍受高价商品、增税甚至兄弟父辈血洒疆场为代价，支持了战争。他们不知道在决定陆战胜负的奉天会战中，日本军队的弹药几乎耗尽，俄国军队若再能坚持一下，其战局将难以估计。以《马关条约》的经验来看，他们认为战败的俄国应向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偿金，便以一种急切盼望的心情等待从朴茨茅斯传出如愿以偿的好消息。著名的主战7博士之一水户宽人，甚至提出了赔偿30亿元，全部领有桦太（库页岛）、堪察加、沿海州，接管东清铁道和接管新加坡以南全部俄国军舰的方案。期望值之高，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当日俄双方议定的条约内容泄出时，国民宛如一下于掉进了冰窟窿之中，热情瞬间灰飞烟灭。

“让我们的兄弟和儿子抛尸满洲旷野，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支付了重税、作出了这样的牺牲，到底为了谁？”

民众对藩阀政府的不满情绪急速地扩展开来。当年气候不顺，农村劳力又因忙于战争而严重不足，造成稻米歉收，米价上涨，更助长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商人抱怨店铺门可罗雀，几乎难有顾客上门购物。工人们本来期望聚在一起喝酒庆贺胜利，但眼见不能分羹一杯，只得叹息苦不堪言。

这种情绪，因传出元老大臣仍旧喝醉了酒同艺妓戏耍的消息而变得激烈起来。8月22日夜，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在东京一个叫“瓢屋”的酒屋同艺妓嘻饮喧闹，而遭到《万朝报》痛斥：“此等人胸中无国无民，旁若无人。如果国家大事有必要利用酒色，为何又不将鲜鱼和美女送给战场的军人？”《大阪朝日新闻》等报亦群起而抨击之。《报知新闻》更是认为“全国人民和军队都被桂太郎首相和小村寿太郎全权代表出卖了”。

于是，反对媾和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敢于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向藩阀政府表达自己心声的勇气，但由于全然不反省由于战争是将他国（中国）疆土作战场来打的，因而对不是战争双方的第三国（中国）而言又是一种彻底的侵略行为，反而却为赔偿得不够而愤懑不已，因此渗透着一种极为自私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大阪的纺织界资产者首先发难。因为他们认为“屈辱”媾和的结果，会造成输往中国和朝鲜棉制品数量减退。8月30日晚，以这些人主持的媾和问题晚餐会为导火索，在新兴资产阶级领导下，大阪中之岛公会堂召开了有5000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同日在栃木、名古屋、吴，翌日在山形、神奈川、三重、堺、高松等地，都召开了市民（或县民）大会。各地大会最后都发出了废除和约的呼声。由一村而一乡，由一町而一市，废除和约的吼叫响彻全日本上空。

东京。日比谷公园的中心广场，这里矗立着巨大的喷水池，沿喷水池四周的草地，有一群群鸽子在觅食。看上去如此安恬舒适的环境，1905年9月5日却是日比谷暴动的发源地。最先来到此地的，是黑龙会系右翼头目头山满和自由民权的战士、宪政本党领袖之一的河野广中。

“来呀，来呀，来吧！媾和问题全国同志大会，特在本日召集大会。有血有泪的来吧！有骨气有志向的来吧！知义晓耻的请都来吧！圣明的天皇一定谅解赤子之至情吧！”当日，当朴茨茅斯市所有教堂鸣起钟声庆贺谈判成功如期签字之时，聚集在日比谷公园内的数万群众喊起号子，冲破了警察的警戒。他们把所有的不满和愤怒，都集中在袭击首相官邸、内相官邸和政府系报社、警察派出所的一拳一脚、一砖一石上。东京市80%的派出所被焚烧或捣毁，有2000多人因此而被捕。

积十年而一发。甲午战争之后，迫于俄、法、德三国的压力，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了中国。当时明治天皇立誓卧薪尝胆，10年后，果然由“黄种人的立宪国”打败了“白种人的野蛮国”。为了打胜这场战争，动员了几乎所有的人民群众。在他们做出各种牺牲的同时，也催发了他们认识自身力量和价值的能力，政治上的觉醒也一并培养起来。“日俄战争的苦痛使国民觉悟到有实行普选的必要”，然而，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想，也在日本人能够打败任何妨碍日本国家利益的敌人的认识中，逐渐滋生出来。这种民族优越感与功利观结合起来，在国家发展和海外扩张两个方面，一正一反地发挥着长期的作用。

然而，桂太郎内阁之所以不向俄国索取战费赔偿金而接受《朴茨茅斯条约》，则是因为不仅看到了日本作战能力的界限和俄方作战力量的潜力，洞察了世界及远东各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而且也正确地估价了由于战胜俄国从而获得的向朝鲜，满洲扩张势力的主动态势。根据条约，日本取代俄国成了朝鲜的保护国，接管了长春至大连间南满铁路所属权利，并获得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这些从沙俄那里夺得的侵略权益，就成了日本进一步扩张侵略的立足点。1890年山县有朋在国会施政演说中提出的“利益线”，到了1905年时终于赢得付诸实现的基本前提。

1906年，当时在参谋本部任参谋的田中义一中佐，向陆军元帅山县有朋提交了一份长篇意见书，题目为《随感杂录》。该意见书以其在日俄战争中所感知的经验与教训，论述了日俄战后应采用的国防政策。山县熟读之后，赞许不已，下令田中义一草拟国防方针案。田中将拟出的草案呈山县审阅，又经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传阅，两位军界巨头表示一致赞成这后来被俗称为《田中私案》的国防方针草案。在充分参考《田中私案》的基础上，10月，山县提出了自己的帝国国防方针案，俗称《山县私案》。《山县私案》于同年12月经元帅府审议后，翌年2月经西园寺首相审阅上奏天皇，4月4日天皇裁可。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国防方针》。

国防方针由三个文件组成，即《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和《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其基本内容是：依次确定俄国、美国、德国、法国为假想敌国；在俄国或美国对亚洲采取攻击的可能情况下，陆军需要25个常设师团，海军需要战舰2万吨共8艘、装甲巡洋舰1.8万吨共8艘（通称八·八舰队）；只有如此，才能在有事之秋，海军可歼灭海上来敌，

而陆军则可制敌于先，集中兵力占取战略要地，展开机动态势。

根据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经验，弱肉固然可以强食，但在旁边窥测时机以图争食的狼豹实不在少数。所以，从《方针》的基本内容看，作战的主要敌人是欧美诸强，但要吞食的对象却唯在满、朝而已。《方针》的第一项再次强调：“根据开国进取之国是，图谋国权之扩张，致力于增进国利民福。”为此，“虽可面向世界八方经营，然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之战役（日俄战争）中，抛几万生灵与巨万财货，当然为了扶植在满洲及韩国之利益，再向亚细亚之南方及太平洋之彼岸伸张，以拥护民力之发展”。

在该国防方针制定审议的过程中，陆军和海军的意见并不一致，海军认为俄军的海上力量已经在日本海海战中被歼灭，应将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而陆军则对俄国的陆上战斗力以高度评价，坚持以俄国为第一假想敌国。这种分歧虽然还谈不上就是后来南进论与北进论之争的雏形，在主要体现了陆军意见的国防方针上也将向南方甚至太平洋彼岸作为政策目标，但要真正实现之，事实上有很大困难。天皇本人亦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便向西园寺首相咨询可能性，西园寺答道：“赞成国防方针，也要强调外交努力。”因为所需兵力从“财政上也不允许立即全部完成”，只好“结合国力，斟酌缓急”。

西园寺的回答是合乎当时日本国力的。事实上，日本能够有所“作为”的，是趁俄国战败无奈退出满、韩角逐而其他列强尚无借口乘隙介入之机，按条约内容迅速地在朝鲜和中国扩张势力，占领俄国留下的空白。日本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

没有像甲午战争后那样的巨额赔款，缺少资金注入，日本经济一时疲软。但仅过一年，社会投资猛地一下热烈起来。新的刺激正是从战利品满洲那里传来的。1906年初，西园寺首相秘密视察了满洲，回国后立即召集了“满洲问题协议会”。会议议定即时撤消军政，将刚成立3个月的关东总督府改为一般性的行政机构。9月1日设立关东都督府以取代关东总督府，负责关东租借地行政，管理南满铁路业务。这意味着对南满地区的正式经营已经步入轨道。在此同时，一个半官办半民办的大型株式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所谓“满铁”，宣告成立。满铁号称有2亿资本金，其中1亿由政府以实物出资，取得了一半股票，还有1亿在民间募集。

9月，满铁成立，发股募集资金的消息在日本传开后，一个巨大的争购满铁股票的投资热潮在全国各主要城市掀起。虽然每股达200日元，但由于实缴资本仅是股票票面额的1/10，并向股民承诺15年内每年红利高达6厘，所以股民极欲购得，实际认购股数竟达到计划募集数的1077倍。这样的股票风潮，极大地刺激了投资者的信心，民间的设备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满铁成立而造成的连续刺激。

如果说本世纪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么这时候的大连则应谓之掠夺者的天堂。仅以运费而言，铁岭以北运往营口和大连的货物，因满铁本社在大连，所以尽管大连运距遥远，但两地运价却相等。大连因此而迅速繁荣，而因辽河水系发达起来的富饶商港营口却一下子凋零了。

[日]伊藤隆监修、百濑孝：《昭和战前期的日本——制度与实态》，吉川弘文馆1990年版，第276页。

[日]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第12页。

[日]防卫厅战史室，《战史丛书》之一《大本营陆军部》，1965年版，第132—151页。

要把朝鲜变成殖民地的计划，即使在日俄刚刚开战尚未有结果时，便开始实施了。1904年2月23日，日驻韩公使林权助收买了韩外务大臣李址谿，并施以武力恫吓，逼迫朝鲜同日本签订了《日韩议定书》。根据此议定书，韩国承认日本是保护国，向日本军队提供军事行动上的便利及基地，并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违反本议定书趣旨的协约。

击败俄国后，许多日本人欢欣鼓舞，但山县有朋警告说，俄国有可能卷土重来。而伊藤博文则认为朝鲜本来也许通过谈判就可以得到，现在用武力取得，就不要将其完全合并，使其成为日本所需要的缓冲地带，接受日本保护便足矣。由此，他力排众议，亲自担任特命全权大使，开始了一系列使朝鲜成为日本保护国的工作。

伊藤的策略是：充分利用战胜俄国而产生的威慑效应，并辅之于荷枪实弹的宪兵威吓，收买并利用贪生怕死的韩国内奸，尤其是以李完用为首的“乙巳五贼”，使其成为内应或代言人；扶植亲日势力如“一进会”，排斥乃至镇压反日派：全面控制韩国的内政外交大权。

从1905年11月到1910年8月吞并朝鲜为止，日韩之间一共签订了三次“协议”。1905年11月17日签订的《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日韩保护条约》，规定韩国外交被置于日本外务省的“监理指挥”之下；没有日本为中介，韩国不得与其他国家缔结任何条约和协定，在韩国皇帝之下设日本统监，在地方设日本理事官。伊藤博文本人由此而成了第一任统监。由于发生了“海牙密使事件”，伊藤认为，“改变局面采取行动的好机会”来了。1907年7月19日，伊藤逼李熙让位，扶皇太子李拓登基，随即便与韩国签署了《第三次日韩协约》，又称《日韩新约》。条约规定韩国内政须由统监指导，制定法制、任免高级官员均须得到统监认可。该条约的绝密备忘录还规定解散韩国军队（仅可保留一个大队守护皇宫），任命日本人为各部次官、内务警务局长等。这样，日本便全面控制了韩国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切实权。1909年7月，第二次组阁的桂太郎首相、小村寿太郎外相同伊藤商议最后吞并朝鲜。伊藤表示，“既然政府方针已经决定”，便不想反对。同年10月，伊藤辞却统监回国第四次担当枢密院院长，后为调整日俄关系亲赴哈尔滨同俄财政大臣科科弗采夫会晤，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志士安重根枪击致死。伊藤博文的被刺，就成了日本吞并朝鲜最方便的藉口。1910年8月22日，由寺内正毅统监同李完用首相之间秘密签署了《第四次日韩协约》，即《吞并韩国条约》，所有政治团体（包括一进会）全部解散；废除韩国警察；日驻韩宪兵司令明石元二郎兼任统监府警务总长。社会治安由2000名日本宪兵和4000名韩国宪兵后备队担任。韩国国王和王室成员，按日本皇室典范惯例，拨150万元经费供一年开支，其中有侯爵6人、伯爵3人、子爵22人、男爵45人，共76人享受日本华族的尊号及待遇。旧官吏3345人得到日本政府恩赐金共679万元，官吏集团中的孝子、节妇和遗孀也得到了赏赐。惟独普通人民，丧失了自己的祖国，开始了长达数十年屈辱而痛苦的殖民地奴隶生涯。

当1905年11月签署《第二次日韩协约》之际，在韩国王宫召集大臣会议。伊藤博文端坐中央，两侧是战战兢兢的韩国朝臣。突然，伊藤拿出日韩

当1907年6月第2届世界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时，持有皇帝李熙全权委任状的韩国特使突然出现在会场，要求各国否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

[日]犬丸义一、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史》，第2卷，新日出版社版，第172页。

协议书问道：“想听听列位对此案是赞成还是反对啊？明白他说！”这时，从王宫外传来了日本宪兵枪刺碰撞的声音和吼叫声。然而，仍然有人起而拼死反对，韩总理韩圭尚⁴猛然离席，大呼“绝死反对”后，便向皇帝李熙的房间奔去，以求蔽护。不想过于惊恐，一下子跑到王妃的房间去了。这时，林权助大使在一旁冷笑道：“最好用冷水从头浇下去让他清醒清醒！”

著名日本作家石川啄木听说吞并已成事实，无奈地写道：“地图之上，着墨重写朝鲜国，耳边却闻秋风骤。”

由于保护条约的签署，由统监一变而为第一代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在日记中写道：“小早川、加藤、小西 若在世，可见得今宵之月明乎？”

然而，在满洲（中国东北）的经营却不比朝鲜，尚未达到只凭武装蛮力便可成就好梦的程度。1905年12月22日，小村寿太郎在北京同情政府签署的《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即《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得以继承原俄国在南满的全部权利，但由于清政府的抵抗，留下许多悬案。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道虽已攫夺手中，但南满洲地区的基本主权却仍然握在清朝手中。1907年6月，清朝新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并耐人寻味地任命美国那鲁大学毕业的唐绍仪为奉天抚巡，明显地具有对抗日本的意味。东北地区的人民和社团亦不甘轻易就范。因此，对日本在南满的经营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综合抵抗姿态。1907年初，山县有朋在一份意见书中谈到：“对我在满洲之经营，所到之处皆试图反对或妨碍，须经彼我两国协议之事业几近停滞，其弊将不堪忍受，乃今日之实况也。”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俄国虽败退北撤却仍占据北部满洲，仍有力量南下，且其背后有欲拉其入伙一起对付德国的法、英两国存在。而美国在调停日俄签约后，一直想在“满洲”问题上验证日本对其“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是否怀有诚意。显而易见，在经营满洲权益方面，比与清朝达成协议更为重要的是，同诸列强摆平关系。否则，日本的满洲权益便会失去各列强的“默契”，必将带来棘手的问题。

日本的对策是，仍然以《日英同盟》为依托，首先调整同法、俄的关系。1907年6月、7月和8月，日法、日俄和英俄之间相继缔结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同《俄法同盟》、《日英同盟》和《英法协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德国际联合。于是，“满洲”问题成了列强间讨价还价时使用的筹码。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日俄协约》的内容：主张中国独立、领土完整、机会均等；日俄相互尊重两国的领土和权利。以哈尔滨和长春间通过的第二松花江为界，规定两国权利范围；俄国不妨碍日本对韩国“保护”关系的发展；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权益。《日俄协约》的签署，为日本经营南满扫清了一大障碍。

然而，要调整同美国的关系却绝非如此容易。众所周知，日俄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不同于甲午战争后争夺势力范围，重点在于争夺铁路投资。从1906年起，美国国务院远东部就注意到日本排他性经营满洲的倾向，对日本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批判。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觉得日本经营满洲以后，可能会减轻对美移民压力，判断不干涉日本经营满洲是美国利益所在，抑制了国务院的意图。事实上，外相小村寿太郎就主张集

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皆为丰臣秀吉1592年发动侵朝战争时的武将。

[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305页。

中向满韩移民，认为这样既可以改善日美关系，又可以强化满韩权益，因此，当 1907 年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的好友，美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引进美国资本、建设从新民到法库铁路的计划，因日本抗议和美国金融危机而搁浅后，没有再提上议事日程。

同时，日美双方颇有克制地解决了移民问题引起的外交争端，并于 1908 年 7 月签订《高平—卢特协定》，相互承认太平洋现状，支持中国独立完整和机会均等。1909 年 3 月，塔夫脱（1905 年 7 月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任陆军部长时，曾同桂太郎首相会谈，签订桂—塔夫脱秘密协定。日本承认美对菲律宾的权力，美承认日本拥有不经日本同意其他国不得与韩国缔约的宗主权）取代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后，接受了国务院远东部的意见，认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应具备实质性的意义。在同国务卿诺克斯商议后，塔夫脱提出，为了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当使用除军事手段外的所有一切手段。具体他说，就是以资本为武器，开展美元外交。这一政策的核心，即由美英投资建设锦州—瓊瑋的铁路，并向中国提供贷款，使之将“满洲”铁路赎回，由国际共管，即所谓满洲铁道中立化计划。毫无疑问，这一揽子计划改变了罗斯福时代美国对日外交政策，采取了进攻态势。

日本政府的对策是：以铺设连通锦州各铁路和满铁的铁道为代价，有条件地赞成铺设锦齐线；坚决反对满洲铁道中立化计划。由于俄国坚决反对中立化计划，英国以该项计划有引发国际争端之虞为由表示不赞成，法国认为计划必须以日俄两国的赞成为首要条件。所以，虽有德国支持，美国的这项计划最后付诸东流。

由于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同时损害了日俄两国在满洲的利益，反而促进了日俄之间第二次密约签订。双方约定南北“满洲”为日俄各自特殊利益地区，为维护特殊利益，两国要共同采取行动。

就在日本与各列强就满洲问题展开一系列外交折冲的同时，日本与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它们是：1909 年 8 月签署的《关于安奉铁道备忘录》，9 月的《关于间岛之日清协约》和《关于满洲五案件之日清协约》。这些条约使《朴茨茅斯条约》和《北京条约》具体化、实质化，也意味着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基本上得到了国际承认。

然而，又有谁曾预料到，日本的满洲权益在“法律”意义上的确定，实质上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完成的——即 1904—1905 年交战的日俄双方在整整 5 年的外交回合中成了互相提携的盟友，而促成交战双方和平停战的美国，却被严拒于“满洲”大门之外。日英同盟支持了日本，而中国的主权则完全成了列强角逐的猎物。不过，当日本满载“猎物”欢呼而归时，不要忘记自己并没有付出代价。日美之间加深的对立静卧在今后国际政治和日美关系的底部，并且不断地积累起来；英国因此而加强了对日本的警觉，英属自治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相继发生了排日移民活动。而且，在 1911 年 7 月签订的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中，加进了这样一个说明：即缔约国一方同第三国缔结条约时，对该国不适用此同盟条约。根据英国要求加进的这一说明，表明英美正在接近。日英同盟变得单纯为了对付德国的需要而继续存在，它对日本的支持程度明显减弱了。日本的确成了东洋强国，它的发言甚至影响到了国际政局。明治以来的强国理想正在成为现实。然而，由于日本的强国化，尤其是在满洲的权益扩大化倾向，使列强提高了对日本的戒备心，本世纪初盛行一时的“黄祸论”的矛头首先是针对日本的。

“ 多样化时代 ”

从日俄战争结束到明治末年数年间，日本在对外掠夺殖民地和利权方面收获颇丰，但在国内的经济政治方面，却是头绪众多，其历史特点难以简单地一言以蔽之。

在民间民主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民众在政治上觉醒的时代。大正时代著名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在 1914 年 4 月号《中央公论》上发表的《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中说：

若思考这种现象到底始于何时，由于国民对《朴茨茅斯条约》极为不满，明治 38（1905）年 9 月在日比谷召开大集会可视为初具端倪。民众在政治上作为一大势力而行动这一倾向开始流行，则应视作在 38 年 9 月以后。

吉野作造以其民本主义者的特殊立场，认为大正民主主义的思潮始于日比谷骚动。这正好反映了他认为日俄战争之后的历史是大众开始参与政治的时代的观点。

第四编强国之梦与之相对，另一位著名的社会评论家德富苏峰在他自己的名著《大正政局史论》中谈到：

从明治 36（1903）年到明治 45（1912）年，约十年间，若桂成立内阁，西园寺则率政友会在众议院支持之；若西园寺成立内阁，桂则率可谓之他的与党的贵族院多数派帮助之。桂与西园寺之间何时起达成默契尚不明确。然举天下反对朴茨茅斯条约之际，西园寺却公开发表意见以示赞成，两人之间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则不必再疑。

德富苏峰是桂太郎的侧近，在他后期许多著作论文的字里行间，每每若隐若现地透露出政府的看法。他的这段话，反映了他接近“主流”政治的立场，称这个时代为“桂（太郎）园（西园寺）时代”。

显而易见，这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却都力图以自己的政治观点，给这个时代贴上标签。但值得指出的是，政治的变化是否能代表社会的所有变化？

从明治维新以来，有许多事实表明，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被卷入由政府倡导的“富国强兵”潮流中。随着天皇形象的确立，《教育敕语》的颁布，天皇制国家机器的建立，许许多多的国民都为富强独立的理想而奉献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努力。即使作为藩阀政府对立面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参加者们，亦莫不如此。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人们将自己的冀求和希望都寄于国家富强的实现和独立的完成上。然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上述理想基本达成，普通的民众开始认真考虑自我生活状态时，不由得产生出一种自我失落感。日比谷暴动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日比谷暴动以后，新的社会思潮首先在都市出现。在城市居住的知识分子或大学生们，不是重视国家而是注重个人，不是期望国富而是追逐己富，不是以家族为中心而是唯自由恋爱主义。这些变化，其核心是个人主义，构成了日俄战后时代变迁的重要内容，标志着与以集团主义、国家主义为特征的明治初、中期相区别，一个多样化时代正在由思想领域内的变化为始点而揭开了帷幕。

首先要举出的例子，是1903年高中生藤村操跳入著名风景地日光的华严瀑布自杀身亡。事件的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但人们对自杀动机的讨论却颇耐人寻味。一般人认为，动机是“烦闷”，并将导致年轻一代“烦闷”的原因归咎于时代的局限性。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讨论中，人们行动的目的早已超出了事件本来的意义，欲与一切唯国家至上的观念决裂的、以个人好恶和欲望为事物判断标准的观念，在日俄战争后都市人口对政府普遍不满的情绪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

站在这场思想运动最前列的，是文学界的浪漫主义思潮。自由民权运动的少年战士这时已长大成人，北村透谷创办的杂志《文学界》，为浪漫作家们提供了讲坛。最先引人注目的是，岛崎藤村在日俄战争中写就、于1906年发表的小说《破戒》，讲述了一个出身未解放部落的青年教师如何破弃父亲的教戒，向人们坦白自己的“下贱”的出身，为追求新生活渡美求学的故事。国木田独步则以看透尘世的近似佛学的精神，讲述了自己愿意在野山丛林自由生存的心情。高山樗牛则以独特的“本能论”来讨论何为“美的生活”，提出“道德与知识不过是为满足吾人之本能的必须条件”，与谢野晶子则主张“官能之解放”。

紧接着浪漫主义之后而来的是自然主义的出现。它的登场，背景复杂。认为国家的富强必将实现自己的一部分理想的期待，在日俄战争以后的现实中被无情地击碎了。既然战胜了世界中的一大帝国，也没有看得见光明的未来，那还有什么可以冀盼的呢？为了偿还战争时期欠下的庞大的外债，政府加强了税收，普通民众依然继续过着贫困的生活。为了让广大国民顺从这种状态，政府加强了对国民思想和言论的控制。因此，明治末年不仅对社会主义者，对广大试图改变一下自己生活状况的市民和农民来说，都是一个漫长的严冬。

在政治上欲诉不能的情形下，自然主义就成了批判封建道德的宣泄。岛崎藤村的《破戒》就表现出了典型的自然主义的倾向，而田山花袋的《浦团》，则更以前所未有的勇气，鼓吹“露骨的描写”，向着传统的“醇风美俗”而在田山看来是天皇制道德的伪善性发出了一支投枪。自然主义在当时成为集中批判的对象，被斥之为“败坏风俗”。但今天人们回味历史时，却清晰地看到了在自然主义者对恋情和肉体刻画的笔触之下，充满着向既存道德决裂的果敢勇气，和对个性解放的渴求。

虽然同样主张个人主义立场，但其表现的形式却有别于或对立自然主义的思想代表，是永井荷风和夏目漱石。永井批判当时的日本人每每惧怕世间的批评，动辄便低下头来反省自己，从来也不敢向他人坦率地表白自己。他向往“西洋人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判断”的精神，而且特别赞许西方人只想把自己活动的范围从国家可能控制的领域中脱离出来，独立自由地生存，并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准则。夏目漱石在小说、手记和日记中，表明了应该十分重视个人主义在社会文明开化中的地位的观点。他在著名的《现代日本的开化》和《我的个人主义》两篇讲演中，批判了西洋的开化是内发的、日本的开化是外发的这种明治以来已成定论的观点，并且以切身的体验证实正是个人主义才是日本的开化的基础。漱石和荷风告诫人们，随着日本的“大国化”，一种日本已经成为一流强国的幻觉正在麻醉人心。这种思想认识必须予以彻底粉碎，理想的社会不应当是大国，而是个人的自立和自由。

在这股倡导以个人主义抵抗国家主义的思潮中，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的观点也值得注意。身为中学教员的内村曾在《教育敕语》的宣读仪式上，因担心违背“基督的良心”而拒绝向天皇的署名施礼，因而被攻击为“不敬”遭致非难。在甲午战争时，内村先曾持“义战”主张，认为“促支那人警醒”乃日本人的“天职”。但因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一变“义战”论而为“海贼之战争”论，并为之深感愧疚。他反对日俄开战，“与其向外扩张，不如国内开发”，主张日本宜像瑞士、丹麦那样，当一个“理想的小国”。他发表在《万朝报》上的一篇题为《国家、家庭与个人》的短文，常常为研究他的人们所重视。其中所表达出的果敢与同国家主义和家族主义针锋相对的勇气以及精辟的论述，是日俄战后个人主义思潮中别具风格的又一种类型。他写道：有善的政治却未必有善的社会，然有善的社会却有善的政治；有善的社会未必有善的家庭，然有善的家庭必有善的社会；有善的家庭未必有善的个人，然有善的个人则必有善的家庭。内村将完善的个人作为善的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向着明治政府专制统治下的思想、言论控制政策，发出了极为深刻的批判，在社会上博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共鸣。

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潮，对青年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众多的青年之中，对国家的“忠诚心”减退了，对战争表现得冷淡甚至漠不关心。在个人主义宣传中催生出来的“自我”意识，导致出两种倾向。或使得他们在现实中更关心成功的致富之道，沉湎于享乐和放纵。在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中，由于陷入茫然而不断地滋长出怀疑和烦闷的情绪；或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家”、“村落”、“国家”的羁绊，在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由“维新的少年”而逐步成长为“新日本的青年”。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社会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以及自己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是日俄战后众多政治杂志的读者和撰稿人，并且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正是由于这部分人的存在及其政治意识的升华，才开拓了大正时期日本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

远在个人主义的思潮酝酿生成的前 10 年，一种与之截然对立的思潮，即国家主义的思潮，就在发展着。追根溯源，国家主义的思想，在幕末时期就已经相当成熟了，在它的影响下，许多封建武士变成为维新志士，其中少数人进入明治政府，成为专制国家的指导者。每当外来危机或外交摩擦迫临时，这种思潮便应时而起，在思想舆论界泛滥横流，对现实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甲午战争之前，它起到了从右的方面限制不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的作用，其代表力量是由头山满等为首的社会右翼势力。甲午战争之后，许多日本人认为不平等条约已经修改，自己的国家已经由被压迫国一变而为压迫国，但却又受到三国的“干涉”，心中愤懑不平。在政府对俄报复、进而乘势侵入大陆的宣传诱导下，相当部分的日本国民在承受加倍租税的剥削下，竟然偏离自己生活的现实，转而沉湎于内容空泛、充满非理性的感情色彩的民族自我赞美之中。于是，国家主义一方面便以日本主义的姿态表现出来，如高山樗牛在 1897 年发表的题目即为《日本主义》的论文，其中写道：“日本主义本非今日我辈之创造，无非是国民在 3000 年历史中培养的坚实的自觉心最明了的表露。其由来深深地根植于国民的特性之中，久远地渊源于建国之精神而牢不可拔……日本主义表白了大和民族的抱负及理想。”另一方面则以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来阐述“天下之大势”，如山路爱山在《余之所谓帝国主义》一文中说：“日本国民惟须奋起勇猛之心利用此大势，不致成

为与时势不相适应的劣者、败者。”因为所谓“时势”便是“适者生存，是天赋之荣光，是在社会进化之间发生淘汰，以宗教者之言则曰：乃天之审判，因果报应也”。庸俗进化论在当时日本为许多年轻人所接受，因为它不仅是国家主义的一种形态，而且又深深地扎根于自明治维新以来社会功利主义的思潮之中。德富苏峰和高山樗牛等人，都是这种理论的主导者。一大批没有经历过自由民主运动的年轻人，都真心诚意地追随这种理论。在国家主义者踌躇自得的鼓噪声中，夏目漱石等人所身体力行的个人主义，难免显得曲高和寡了。

将国家主义思想发展到最高峰的，是德富苏峰。曾主张“生产主义”代替“侵略主义”、因而被称为平民主义者的德富苏峰，在甲午战争前后，一变而为主张“大日本膨胀论”的帝国主义论者。他将甲午战争视作“三百年收缩的日本，以一大飞跃成为膨胀的日本的最好机会”，进而展开了他的帝国主义的理论。

德富苏峰认为，日本要成为帝国主义，日本国民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以“大国民”自居，为此，就必须将世界各国对日本的印象，诸如“风景明丽、气候温和”、“不讲一个不字，轻松温情地同你相伴”、“是个美人国，或者直接他说，是个卖淫国”等等，改变过来。为此，就必须以“绝伦的爱国心和刚健的资质”，倡导进步、进取和开放，取代保守、退缩和封闭，以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来促进日本的膨胀。

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就一定要在同帝国主义诸强的角逐中，通过竞争而获得商业的权利，“在与武备机关的扩充的同时，亦要使生产机关的发达并行并进”，只有这样，才能守卫独立的日本。兵商两要素的结合与增强，是20世纪的强国特征。

德富认为，帝国主义所负有的使命，将对“顽迷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将“文明之恩威，注射到野蛮社会的内部”。为了传播文明，战争、征服都是正当的和神圣的，“吾人对东洋诸国的天职，岂不同罗马人在地中海沿岸一样乎！”

德富苏峰主办的《国民之友》杂志，是这一时期最畅销的杂志。他同其他文人墨客的区别在于，面对社会，面向青年，对政府政策作出合乎政府意志的解释，通过《国民之友》向全社会传播。日俄战争之后，面对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青年们追逐自我利益而对社会对政府表示厌倦的现象，焦虑不安的他在《国民之友》的评论中写道：“吾人岂敢向明治的青年而苛求圣人乎？但要紧的是：要想富裕则应当同国家一道富裕，要想快乐则应与国家一道快乐。”表明了他用国家主义来压制个人主义的政治伦理观点。他规劝青年人：“作为国民，与其称雄于市井，莫若作为日本国民而称雄于世界，以国内为本部，以朝鲜为别部，以国家为爱妻，此岂非人生之极乐乎？吾人不是绝对的恋爱主义者，但惟热心地祈愿在日本恋爱国家与国家通婚，如小彼得一般的人物辈出不穷！”

比起以小说家的个人活动为主体推动的、与政府对抗的个人主义思潮来，以政论家的集团主义活动为主体推动的、与政府合作的国家主义思潮，不仅声势大，影响深，而且得到了政府有意识的支持，为政府所利用。在政府有关政策的刺激和助长下，日俄战争前后，国家主义思潮发展到了高峰。

威廉·彼得（1750—1806年），24岁任英国首相，政绩卓然。

其表现是，日本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从这一时期开始明显地向国家主义化的方向倾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882年以后必定被列入教科书内容的王午兵变被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纪元节的诠释；有关客观地讲述日本文化的历史的章节被明显压缩，而宣传名君、忠臣、义士等忠君报国思想的内容却显著地增加了。1903年起，国定教科书检查制度适用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公、私立小学，1908年，《普通小学日本历史》的执笔者喜田贞吉因将南北朝并列记叙，被非难为颠倒顺逆正邪，而被革职，同年10月颁布天皇诏书，重申加强小学历史教科书检查制度。1912年，神道、佛教和基督教代表集中东京，根据政府旨意、决议“扶翼皇运，谋求振兴国民道德”，实现了所谓“三教合同”。其目的是，要在思想教育的领域内，为培养“新国民的”四大特性，即“气质勇敢”、“身体强壮”、“苦习洋学”、“品行方正”，首先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完成思想的统一。

国家主义思潮的高涨，对大多数国民的思考方式客观上起到了引导作用，要像服侍家长那样服侍天皇，像忠于家族那样忠诚于皇室，即家族国家观，在国家主义的攻势面前，慢慢地向人们的思想深处渗透。在农村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国家主义的思想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尤其是农村的青年，在饱受信奉个人主义的都市的人们的歧视的情况下，为了取得同都市青年学生同样的自尊，便毫不犹豫地将国家主义作为最理想的思想武器，将国家主义以更加激烈和典型的形态表现出来。而国家主义支配下的社会行为，也变得更加激进。

德富苏峰的弟弟德富芦花，是与其兄经营的民友社和《国民之友》为据点从事文学活动的。在苏峰不遗余力地鼓吹国家主义思想的同时，芦花却在从事通俗小说的创作活动。1898年出版了小说《不如归》之后，芦花的专业作家资格终获文坛承认。小说《不如归》批判了家族制度下的姑嫂和夫妇关系现状，其销售之畅使得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庞大的与小说有着共鸣的读者阶层的存在。民友社内部有一个不肯与苏峰现实主义、国家主义路线共处的左派，而芦花莫如说是倾向这一派的。最后，随着小说《黑潮》的发行而确立了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的芦花同情从民友社退出的左派，也退出民友社，毅然同其横戾的家兄苏峰诀别了。

1903年，芦花在给苏峰的信中说：“余置身于文学，不得不亲身倡导文学独立之途径，追逐美而彷徨于真善之境地。关于经世之手段，君注重国力之膨胀而执帝国主义，余却愿受雨果、托尔斯泰、左拉诸先哲之海导，执人道之大义，执自家之社会主义。”这封信与其说表白了与自己兄长诀别的理由，不如说将自己思想之节操、真善之感受、人道之准则告白于天下。在向往崇高理念的正直性的另一面，却是追逐单纯理念的幼稚性，同时也清楚地反映了基督教对他的影响。

这种书生式的自我境界同社会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自从同兄长分手之后，芦花一直在挫折和孤独的遭遇中抗争。自己创办的黑潮社，几乎不能开展任何有作为的活动，《黑潮》杂志出版两期后也停刊了。无奈之中，只得退居武藏野安谧的农舍，谢绝文坛交往，避开嘈杂的社会，在孤独之中提炼自己对现实的批判精神。1906年，芦花发表了《胜利的悲哀》一文，大声疾呼：“日本国民，悔改吧！……向世界万国谢读武之罪吧！”1911年，在幸德秋水等人被处刑之后，他在第一高等学校发表《谋叛论》一文，直言是政府谋杀了幸德等12人。在政府及包括自己的兄长所罗织的思想统制的巨网

中，他从良心深处发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呐喊声。然而，能勇敢地站出来响应的，不过是河上丈太郎、矢内原忠雄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日俄战争后孤独的民主主义战士，犹如划破星空的流星，固然能发出炽热的光芒，却只能保持几秒钟的精彩，便消失在无垠的宇宙之中。德富芦花的命运，或许就是战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命运的象征。

国家主义思潮、个人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想，及由于篇幅所限不及细叙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构成了日俄战争后 10 年间思想领域内复杂多绪、相互限制却又相互影响的状态。它们因为握有自信，而不肯轻易地放弃信仰屈从他人，它们在相互之间的斗争中运动着，变化着。每一种运动变化的思想，又必定孕育着一种区别于他人的社会运动产生出来的可能性。多种的思想必定产生出多样性的社会运动。从明治前期到明治后期，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各阶层亦在成熟之中。成熟中的社会阶层，在完成了自我思想体系后，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思考，力图对社会的进一步变化打上一些印记。

1911 年中国辛亥革命废黜皇帝成功的消息传到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并给予孙中山以许多帮助的日本人，如福本日南等，感到欢欣鼓舞。1912 年 2 月号《大国民》杂志登载了这样一篇评论：

支那之共和累及我皇室之关系乃是，250 年前由满洲南侵之爱新觉罗，与建国之前以来连绵相续之我皇位，一并被视作谬误也。（中略）若共和成立，对所谓官僚者的影响亦是明了的……。

这段评论大胆地对天皇制及桂园体制提出了异议，一种渴求变化的企盼透纸而生。当年 3 月 25 日第 28 届议会闭会，已公告自 5 月 15 日起举行第 11 届总选举。在野党国民党的右派领袖大石正已和左派领袖大养毅，依然对即将到来的选举不敢抱任何期望。而桂太郎系统的官僚们则在预测西园寺内阁倒台的时间。正在此时，7 月 14 日传来了天皇生病的消息。第二天，在枢密院会议上，又传达了天皇诉胃疼，“睡姿不稳，且时时假睡”，枢密官们忐忑不安。7 月 20 日，东京帝大医学博士青山胤通、三浦谨之助检查了天皇病情，诊断是尿毒症。诊断结果第二天在各报纸上刊出，公告全国。

由于明治维新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神格化的天皇形象灌输给国民，国民对天皇居然会生病感到大惑不解。连天皇本人也渐渐习惯于自己就是现人神，半夜起来常侧耳静听，又自言自语道：“是伊势呀。”幻觉自己能同伊势神宫遥遥对话。洗澡的时候，只将下半身泡在浴盆里，上半身用热水洗，似乎相信上半身有神附体，生怕弄脏了似的。因此，当天皇病重的消息传开之后，人们简直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惟有股市作出反应，股价从 7 月 21 日起大暴跌。

据生方敏郎在《明治大正见闻录》中记载：

皇宫前的草地上，祈愿天皇陛下康复的人群，从早至晚越聚越多。他们席地而坐，跪神拜佛，或捶胸，或鞠躬，还有许多人在哭泣。这些人近似发狂。其实不仅是这些人，市内所到之处，悲痛欲狂的人们随处可见。

7 月 30 日，发布了天皇于零点 43 分去世的讣告。但据当时在皇居西溜间的海军次官财部彪的日记，天皇实际上在 29 日晚 10 点 43 分就已经死去，之所以将天皇去世时间推迟 2 小时，是因为阁僚和元老们要商议改元和践祚

等大事。明治一生共生有皇子皇女 5 男 10 女，其中 10 人早亡。没有一人是皇后所出，皆为侧近宫女所生。三皇子为明宫嘉仁，乃柳原爱子所出，是侍奉明治的宫女之一。日本皇室一夫一妻制，是自嘉仁登基之后的事。嘉仁小时生过脑膜炎，1912 年 7 月 30 日，时年 34 岁的他完成登基大礼。从此，近代日本正式进入大正时代。许多外国报纸大量地报道了明治的去世及葬仪情况。“远东伟大的君主”，“日本英雄时代的代表”，“世界史和近代史值得记忆的帝王”，悼词大都充溢褒扬之意，惟有伦敦的一家报纸写道：“日本从此要走上下坡路了吧！”

紧接着发生了乃木希典夫妇的殉死事件。他在遗书中写道：“此度自己随陛下之后而自杀，实诚惶诚恐，罪孽深重。然明治 10 年之役（指西南战争）丢失军旗，此后便欲死得其所，却未得机会。厚浴皇威，以致愧受过分优遇，不觉老矣，去日无多。值此大变，诚惶诚恐，现已决断如此。”

乃木夫妇的殉死对社会的冲击很大。一般国民却将这种封建道德视作淳美的古风，纷纷去青山斋场参加葬仪。此时还是中学生，后任日本内阁外相的市原喜重郎，在给报社的投稿中写道：“举行乃木大将葬仪当日，电车十分拥挤，都是去青山斋场的。其中有一个乘客问邻座的老太太是不是去青山，老太太看着年幼的孙子说：‘我老了，这是我死去儿子的孩子，我让他带上父亲的名片，供奉在青山，否则心里不踏实。’”社会反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甚至连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钦佩乃木的节操。在 1911 年完成了著名的《善的研究》的西田凡多郎，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乃木已经将理义履行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森鸥外则在历史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中，假托弥五右卫门对乃木的殉死进行了解释和称赞。但年轻人，对乃木的自杀却采取了根本不赞成的态度。白桦派的领袖志贺直哉在 9 月 14 日的日记中记道：“从英子那里听到乃木自杀时，觉得这家伙有些发傻。”武者小路实笃说：“军人不懂得人的价值。”芥川龙之介则说：“我对将军自杀的事，好像有一些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把他的照片挂出来呢？真的是他死后的照片，哪个店家都用来当装饰物一样挂着。”

夏目漱石对明治天皇的死和乃木希典的殉死，以及对社会赞成和反对两种思想的想法，是通过自己的小说《心》，借其中一个主人公的口来表述的。

于是，在盛夏酷暑中，明治天皇驾崩了。其时，我似乎感到明治的精神可谓始于天皇、亦终于天皇。最深刻地接受了明治影响的我们这一代人，此后虽然还要继续活下去，但一种毕竟落后于时代的感觉，强烈地冲击着胸怀。我把这种感觉对妻子说，妻笑着，却未置可否，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调侃地对我说，那么殉死又怎么样呢？

夏目漱石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虽然采取了隐晦幽曲的方式，但毕竟是真实的。天皇的死是正常的，乃木的殉死没有必要去赞成或反对。重要的是：天皇的死意味着一大批从他 16 岁起就捧他做天皇的政治家们快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确实确实代表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或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趁火打劫

新时代果然是在不平常的政治气氛中拉开帷幕的。因陆军方面要求强行增加2个师团的扩军方案被西园寺内阁断然拒绝而引发的政治危机，最终发展为“大正政变”。政友会的原敬和尾崎行雄，国民党的犬养毅等在政争中脱颖而出，意味着政党力量方面新一代领袖人物的成熟。尤其是尾崎和大养毅，竟然公开表示不能服从天皇调解双方冲突的敕命，并率众继续推进使桂太郎第三次内阁倒台的护宪运动，亦是前所未闻的举动。政变后产生的山本权兵卫内阁，是陆军和政党斗争的折衷的产物。山本内阁以海军为基础，以政党的支持为背景，在内相原敬的配合下，在其施政的许多方面，都一定程度地满足了推翻了第三次桂内阁的政党方面的许多要求。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扩大到退役武官制；修改了文官任用令，使没有官吏资历的政党人士可以通过特别任用进入各省（部）级行政机构；进而在没有同山县有朋和寺内正毅磋商的情况下，起草了文官也可以任殖民地长官的改革方案。然而，比起政治改革来，山本内阁的施政却并不顺利。首先，1913年中国发生“二次革命”，国民党势力企图打倒袁世凯。日本政府暗中支持国民党，军部更是从中干涉。但袁世凯依仗武力镇压了革命，日本无奈于同年10月承认了袁世凯政府。其次，山本内阁的施政重点在于扩充海军，提出扩建战舰6艘、驱逐舰16艘和潜艇6艘，共计1.54亿日元的海军扩充计划，而政党不管是在朝在野都提出了废税减税的要求。再次，正当海军扩军计划与政党废税减税运动对峙之时，“西门子”丑闻被揭发出来。德国西门子公司向日本海军高级官员行贿、以换取日本海军向西门子订货的丑闻一见诸报端，全国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工商业联合会、普通民众和在野党立宪同志会自发集合起来，包围了议会。贵族院的山县派议员也提出了非议。在这种形势下，执政党政友会等只得缄口不言，而陷入苦境的山本内阁只好选择了辞职一条道。

继之上台的是大隈重信内阁。大隈一向与三菱交谊甚笃；加藤高明是三菱岩崎弥太郎的女婿，出任内阁副总理兼外相，因此，人称这届内阁为“三菱内阁”。大隈内阁的政治目标是打击政友会。为此，为了取得元老和军部的支持，就要增加军备，扩充师团；而为取得民众和政党方面的支持，就必须作出废税减税的姿态。这样，大隈内阁就处于元老们期待扩充军备和民众期望废税减税的夹击之中。把大隈内阁从这种困境中拯救出来的是上台3个半月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为了巩固和扩大在朝鲜、尤其是在满洲的权益，同俄国和美国不断地调整关系。同英国也续签了同盟条约。与此同时，日本一直在注视着中国政局的变化，以寻找扩大在华利益的机会。日本欲独占中国东北的意图，已经被英、美、俄诸国察觉，清朝政府也时刻警惕着日本越出南满铁道利权范围，扩大对满洲的侵略。因此，可以说，日本虽然取得了南满铁路、关东总督府等对满洲的特殊利益，而且将朝鲜变成了附属国，但由于同美国等国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也付出了代价。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西园寺召集内阁会议，作出了“对清政策问题”的决议。其内容为：1. 永远维持满洲现状；2. 等待时机并稳操胜算之场合，根本解决满洲问题；3. 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并确立在中国内地的优势地位。在此之前，1898年清政府向日本承诺福建不得割让列国，日本与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而成的汉冶萍公司有矿石购买

合同、投资贷款关系。辛亥革命发生时，日本政府一方面认为乘隙向中国内地伸展势力的机会可能来了，一方面又对革命冲击汉冶萍感到担忧，海军甚至决定向武汉增派军舰、陆军则认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来到。于是，由寺内正毅，后藤新平和满铁总裁中村是公运动革命派王国柱等人潜入满洲策划暴动，企图乱中寻隙。接着，山县有朋又策划出兵南满，此事因德、美阻挠未果。最后是川岛浪速等策动第一次满蒙独立，此举因接到英国警告，被西园寺内阁抑制而未付诸行动。在这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交涉中，可以看出，由于各帝国主义的利益和政策相互制约，日本想一厢情愿地扩大对华权益并不那么容易。“大正政变”发生后，日本朝野暂时无暇在对华问题上作出更大的动作。

此外，经济上的困难也在发展着。日俄战争以后，产业固然有了一些发展，垄断性组织也相继出现，但恼人的外债却年甚一年地压迫着财政。1913年末对外债务额达到20.7亿日元，扣去8.46亿日元对外投资额，尚欠12.24亿日元外债。相对于1913年财政总收入的7.2亿日元来说，外债的重压是可以想像的。在债台高筑的同时，对外贸易也处于连年入超的状态中。1912年为1.2亿日元，1913年为1.4亿日元，而政府硬通货的保有量仅为4940万日元。1913年半官半民的日本兴业银行靠政府救济才幸免破产，1914年大阪的大型银行北滨银行出现了挤兑风潮，所有这些都突出地表明了经济不振的严重性。

因此，无论是摆脱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困境，还是在外交上、主要是在对华侵略上有所突破，都需要有一个可以得心应手地加以利用的“契机”。

1914年6月1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于7月28日爆发。消息传到日本，朝野几乎同时提出了“举国一致”的口号。政争中止了，民众的注意力也从免税减税转移到国际时局上。8月8日，根据1904年敕令而晋入元老行列的、已经78岁高龄的、在休养地静冈县兴津静养脑溢血的井上馨，口述了一份意见书，转呈青年时代以来的挚友、首相大隈重信，和同为长州出身的山县有朋，建议利用“欧洲的大祸乱”，来推动日本的再一次“大发展”。这份意见书在8日的元老会议上宣读，其主要内容为：

1. 今天欧洲的大祸乱，是日本国运发展的大正新时代之天佑，日本国应立即实现举国一致的团结。以充分享受此天佑。
2. 为了实现此天佑，在内须中止历年争嚷不休的废税减税等党议，巩固财政的基础，排除一切党争，引导舆论注意世界之大势，从而确立外交之方针。
3. 随着战局之发展，英、法、俄三国的团结一致将更为坚固，日本应团结以上三国，以此确立日本在东洋的利权。

8月3日，英国通过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战斗波及到远东，香港及威海卫遭到攻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予以援助。”7日，英国要求日本海军击沉以胶州湾为根据地威胁英商船的德国巡洋舰。8月8日晚，在大隈私邸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外相加藤高明力主参战。内阁接受了加藤的提议，决定参战，并将参战决议上奏天皇，提交元老会议。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大山岩等元老同意参战阁议，并着手办理参战手续。

自大战开战以来一直在寻找机会根据日英同盟参战的外相加藤高明，以最快的速度在8月9日通知英国政府，日本决定参战，并照会英国政府，一

旦日本参战，“则日本之行动即不能仅限于击沉敌国之伪装巡洋舰”，为了彻底肃清德国在东亚的势力，“必须采取一切可能采取之手段和方法”，表达了反对限定参战的态度。

英国对日本的回答感到踌躇，欲收回希望日本配合作战的要求，担心日本全面参战则必乘机向中国内地和南洋群岛扩张势力，进而威胁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担心会因此而影响英美关系。中国在得知日本参战的消息后，向美国进行工作，希望美国出面阻止在中国领土上的战斗行动。德国则希望中国暂时收回胶州湾，使东亚从欧洲大战中脱离。

日本根本不考虑有关诸国的想法，在没有得到英国谅解其全面参战的情况下，于8月15日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舰艇立即从日本和中国海面撤走，将胶州湾无条件转交日本，以便将来由日本归还中国，德国未予理睬。这正是日本所期待的，8月23日，日本宣布向德国宣战。据说在宣战诏书发布当时，天皇正在日光休养地避暑疗养，因而根本没有出席任何有关参战的会议，只是形式上出席过最后的御前会议。

面对东西两条战线的进攻，德国在西部战场同英法军队展开了呈胶着状态的堑壕战，在东部战场则击溃了由波兰进入德国本土的俄军后，并不能给俄军以彻底打击，相反打起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因此，德国不可能给远离主战场的驻守胶州半岛的5000名德军再运去一兵一卒。日军以第18师团为主力的5.1万余名军队在第2舰队掩护下，于9月2日完成龙口登陆作战。龙口位于山东半岛北岸，与位于山东半岛南岸的青岛即德军主力集结地整整隔着一个山东半岛，故龙口登陆作为日本军队整个军事攻击的突破口，表明日本欲整个地将山东半岛揽入怀中的计划。登陆以后，日军并不急于马上进攻青岛，而是首先向德军守备的山东铁路进攻。25日占领潍县，然后转向西进，10月6日占领济南，完成了海上陆地合击青岛的战略态势。10月底，日军开始向青岛进攻，德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海上作战中甚至击沉了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和日俄日本海海战中表现活跃的日本军舰“高千穗”号，但终因救援无望，战斗力差距悬殊，于11月7日投降。

与山东作战相呼应，海军开始进攻德属南太平洋诸岛。至10月中旬止，先后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继之与英国舰队配合，在阿根廷附近洋面击毁了德国东洋舰队残部。

乘“欧洲的大祸乱”，日本抢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和南洋的全部利权。与战果相比，日本负担的军事义务是十分轻松的。在如此巨大的战果对照下，日本付出的代价就更加微不足道：一艘自1894年以来就服役的老舰和271名士兵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来说，自始至终是以“欧洲的大战”换来了“亚洲的战果”的趁火打劫式的、或者说是“天佑”庇护下的打捞财宝战。

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后，即将山东铁路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要求中国政府撤去警备铁路的中国官宪。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侵犯中国的行为，并据此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日本置之不理，并继续在交战区外采取军事行动。1915年1月7日，鉴于山东境内战事已平，再无使用大部队之必要，中国政府向日驻华公使日置益要求废止交战区，日本军全数撤回的要求。翌日，日本的答复是断然拒绝，并于18日由日置益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一份照

会，称意在“澄清局势”。这份照会及其附件的内容，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就像是一个强盗去火灾场救火，而救火的目的是乘机打劫。这份照会非常直接地阐明了日本想要索取的东西，它分成五款共 21 条。

第一款，关于山东共 4 条，主要内容为将根据日本与德国达成的协议，由日本全盘处理山东的德国权益，日本拥有连接烟台、龙口和胶济铁路的铁路敷设权；

第二款，关于南满和东蒙共 7 条，主要内容是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的租借权一律延长到 99 年，日本国民在南满和东蒙有土地租借权、所有权、自由居住往来权、业务活动权和矿山采掘权；

第三款，关于汉冶萍公司共 2 条，内容为改汉冶萍公司为中日合办，邻近的矿山的采掘权由公司保有；

第四款，关于中国海岸的港湾和岛屿，不得让渡或租借给他国；

第五款，共 7 条，内容为：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有必要的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或雇用日本人警察，接受日本人武器供给，或由中日合办兵工厂；日本人有传教权；日本有南方各铁路敷设权；福建省外资导入日本优先权；等等。

日置益还特别关照袁世凯要保守秘密，尤其是第五款的内容。袁世凯却将内容全部透露给美国驻北京的大使，期望英美干涉。于是，全世界的外交界都谴责了日本。加藤高明的回答是，前四个部分是日本的要求，没有第五部分。同时告诉袁世凯，日本将再派 3 万军队增援驻山东的日军。中日之间从 2 月 2 日到 5 月，一共进行了 21 次交涉，但没有任何结果。这期间，日本第 6 师团向满洲进发，第 10 师团和第 1 舰队也接到了准备出动的命令。5 月 1 日，日本政府拒绝了中国政府提出的最后修正案。5 月 7 日日本接受英国劝告，同意将第五款保留以后再议，最后通牒袁世凯，必须在 48 小时内作出答复。5 月 9 日，袁世凯接受了 21 条前四款的要求。5 月 25 日，双方在北京换文，除第五款外，日本的要求基本实现。

1947 年秋，在东京大学历史学研究会举办的日本历史讲座上，羽仁五郎先生在讲演中谈到：

所谓日中事变即日本对中华民国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诸君在小学校的教科书中中学的，在中学的教科书中中学的，在大学也学的那样，是中华民国对日本的排日侮日运动。当时，我在自由学园教书，曾向一个中国女学生问中日事变的原因是什么。那个女学生一听，立即斩钉截铁地大声回答：中日事变的根本原因是“21 条”。日本学生听到之后十分奇怪，问“21 条”是怎么回事。

“21 条”对中国的冲击之大，可以从当时遍及全中国的排斥日货运动中反映出来。在汉口发生了捣毁日本商店的运动，要求拒绝接受“21 条”的群众性请愿活动更是此起彼伏。5 月 9 日，被中国群众自发地定为“国耻纪念日”。

国际上对日本的行径的批评，也非常激烈。自日俄战争以来一直对日本持有反感的美国，5 月 11 日对中日两国同对声明，美国以为“21 条”违反“门户开放”原则，因而不承认该条约有效性。“21 条”确实刺激了对中国和东亚怀有同等兴趣的美国。围绕争夺东亚霸权的斗争，日美间的对立明确起来，亦是 26 年后太平洋战争的“最初原因”吧。

“21条”第五款的内容，连元老山县有朋和井上馨都对这种直言不讳的提出方式似有顾虑。然而，社会上许多人士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甚至民本主义的旗手吉野作造在1915年发表的《日支交涉论》中也表示：“今度对华的要求，表面上看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或者损害了中国的脸面，但从帝国的立场上看，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中略）第五款的削除，是非常遗憾的……是外交上的失误。”

实现强国梦

“欧洲的大祸乱”给日本带来了诸多“天佑”。日本不仅借此扩大了在中国和东亚的利权，而且迎来了使自己的经济跃进的绝好机会。

本想在6—8星期内结束战争的协约和同盟双方，不意却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潭，只好将坚持了100多年的亚洲市场的开拓暂时放下来。从欧洲诸国输往中国和亚洲的工业品完全停顿下来，相反，军需品的订货单却如雪片般纷至沓来。这种综合作用所产生的利益，全部被日本独吞。日本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发展起来。

钢铁生产从战前平均年产量35.5万吨（世界第13位）增长到1917年的79.3万吨（世界第9位）。

造船由战前5.8万吨，跃进到42万吨，居然增长了7倍以上。船只保有总吨位也由1914年的170万吨（世界第6位）上升到1919年的230万吨（世界第4位）。

化学工业的产值，由1914年的1.758亿日元，扩大4.4倍，1919年时为7.769亿日元。

轻工业的发展更为显著，其中纺织工业的生产额，从1914年的6.2亿日元，激增5倍以上，1919年达到32.959亿日元。工业总产值由1914年的13.716亿日元，扩大5倍，1919年时为67.376亿日元。

随着电力事业的急速发展，到1917年时工业用动力中电力使用率从此超过了蒸气动力。

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国，正式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

对外贸易的长期入超状态，也发生了逆转。1915—1918年的4年间，出超达到14.8亿日元，其中仅1917年一年就达到5.67亿日元。在对外输出的商品中，生丝依然是最为重要的。1914年和1918年的生丝输出量，分别为1.74亿日元和5.28亿日元，增长3倍以上。其结果是，至1919年末统计，日本外债额为18.22亿日元，对外投资额为31.93亿日元，一变长期负债国而为债权国，对外投资中，最主要的是纺织业对中国的进军。

由此，所谓“大战景气”就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给一心想成为强国的日本带来了种种好运。在景气的刺激下，新设企业如雨后春笋，股市亦呈现活跃。全国各大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从1914年的11.1%猛增至1917年的125.2%。这样的利润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金融的活跃，市场需求的扩大，就业机会的增多，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数量的增加，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产业人口的增多。随着工业的发展，1914年有工业人口109万人，1919年达到178万人。其中男性劳动者的占有率由45%上升到49%，与女性工人数几近持平，工业劳动力来源于农村，全

国产业人口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1914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13.1%、16.7%、15.5%；1919年，上述产业的比例分别为53.8%、22.3%、18.3%。

由于工业的急速发展，对劳动的需求量也增加了。熟练工人的不足，使企业间展开了职工争夺。为了吸引熟练工人，企业方面只好改善劳动待遇，提高工资。一个男性工人平均月工资额，从1914年65钱提高到1919年的1.44日元。

工厂的发展，必然使城市人口增加，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数与人口数，由1913年11个城市594万人，增加到1918年的14个城市729万人。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对农村产品的要求量骤然加大。在都市化运动推进的同时，农产品市场也扩大了。由于豆饼和化肥普及，脱谷机等农机具广泛使用，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1919年时大米总产量首次超过6000万石。

1915年11月，大正天皇在京都举行登基仪式，日本全国充满欢庆气氛。大隈重信被授予侯爵，各大臣、军人、官吏、议员甚至宫中女官，都得到论功行赏的犒劳。日本对大战以来的好运气表现出少有的满足感。

由于袁世凯企图称帝引发了中国南方“第三次革命”，中国政局再一次陷入混沌之中。大隈内阁认为，推进干涉中国政策的大好时机又来了。阁议决定：因为袁世凯已经成了日本在中国扩张势力的障碍，所以有必要将他搞掉，默许民间浪人策划排袁。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陆军大佐土井市之进、少佐小矶国昭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川岛浪速则直接在满清宗社党和蒙古巴布扎布那里策动叛乱。但驻沈阳和安东的领事矢田七太郎和吉田茂认为，这种策动并没有成算，不如支持自日俄战争以来一直同日本配合的奉天军阀张作霖，通过张来搞满蒙独立更为实际。官方和军部不得不从“第二次满蒙独立”阴谋中撤走，惟剩下川岛等浪人仍不肯罢休，企图继续制造混乱，并演出了刺杀张作霖未遂事件。自此，“第二次满蒙独立”，变成了说服拉拢张作霖秉承日本意图搞满蒙独立，或杀死张作霖继续推进原计划。川岛的阴谋，最后以张作霖一举击灭巴布扎布叛军而告终。

实际上，日本对满蒙支配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是由于亲眼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参战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国家总体战。确保能承受住莫大战争消耗的资源，是未来日本性命攸关的大事。1917年8月，小矶国昭向参谋本部上呈一份私人意见书，该意见书的题目为《帝国国防资源》，主张为了确保获得大陆资源，应尽快修建对马海峡海底隧道。由于估计耗资大、工时长，陆军和政府没有采纳小矶的意见。日本投降后，小矶在巢鸭监狱写回忆录《葛山鸿爪》时，不无感慨地谈到，如果采纳自己的意见修凿了这条隧道，恐怕就不会打日美太平洋战争了。

正当日本因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而陷入自身政策混乱时，德国在同俄军的僵持中一举突破成功，占领了罗马尼亚。俄国战线崩溃，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二月革命”后，俄国内部两个政权并存，得到广大工农群众支持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打倒战争的口号，整个俄国已成了德军可以轻松越过的真空带。日本人开始担忧，生怕不知在哪一天，德皇威廉会突然叩开日本的大门，索取山东和南洋的赔偿。幸好这时美国宣布对德作战，日本政府才松了一口气，于是回过头来商讨对策：沙俄在人民革命中倒台对日本来说是福是祸？日俄本是密约国，相互之间对远东势力范围相互

承认，并相互承担义务。沙俄一垮台，顿使日本外交失去可以凭恃的依靠，但随着苏维埃政府成立，和平布告的宣布，北满甚至西伯利亚都成了日本嘴边的肥肉。因此，日本政府内部就分成了不管其他诸强的态度如何日本主动出兵的所谓“自主出兵派”（田中义一和外相本野一郎等）和应该同美英协调之后再出兵的所谓“协调出兵派”（山县有朋、原敬和前外相牧野伸显等）。

踌躇犹豫之中，1918年1月12日，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巡洋舰“朝日”和“石见”号驶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4月4日，以3名日本商人被杀为由，日本陆战队同美国陆战队一起在海参崴登陆。5月，代替大隈内阁的寺内正毅内阁，同段祺瑞政府达成秘密协定，为支持谢苗诺夫集团在北满进攻苏维埃，进而为出兵北满铺平道路。最终使大规模出兵与否的僵局出现转机的是，捷克兵团同布尔什维克军队发生冲突，武装干涉终于找到了“理由”。在同美、英、法协调后，日本于8月2日正式宣布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8月3日，驻守小仓的第12师团第一梯队从门司、宇品两港出发。8月12日，主力部队在司令官六谷喜久藏大将统领下，从东京车站出发。14日，另一部分军队从宇品出发。出兵人数为1.2万人。

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布“14点计划”，是在1918年1月8日。“14点计划”不仅是针对苏俄的“和平宣言”提出来的，而且也是向一次大战之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秘密外交、秘密条约所导致的国际不安定状态提出来的。是美国继提出“门罗主义”、“门户开放”口号之后攫取世界事务主导权的又一重大步骤。主要内容有：

1. 废止秘密条约、秘密协定。公开缔结媾和条约；
2. 航海绝对自由；
3. 废除经济壁垒，确立平等贸易；
4. 缩小军备；
5. 自由地、不带偏见地、绝对公正地处理殖民地的要求；
14. 建立国际联盟。

第6点至第13点是关于俄国和波兰诸问题的具体处理原则。

“14点计划”的提出，意味着批评帝国主义旧外交的自由主义新外交的诞生。如果不绝对地从主观上去分析提出者的某些动机，则应当肯定它的客观进步性。就在“14点计划”提出后1年，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请和问题的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召开。

和会以大国为中心来进行，由美、英、法、日、意5国各派2名全权代表组成的10人最高会议，是和会的核心。日本方面的代表是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采取了侧重于要求各国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德属南洋各岛，其他则顺应大势的策略。

由于和会主要讨论的是德国及欧洲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亚洲和太平洋的势力范围问题，况且日本和英国之间尚有秘约关系，所以抵抗住了美国的攻势，以放弃在山东占领的地盘为条件，保住了青岛租借地，并成为德属南洋群岛的委任统治国。

1910年1月，最受人欢迎的杂志《太阳》在其临时增刊号上特别刊载了一个以“一等国”为名的专集。编辑者从各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交通、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入手，分析了主要国家的国情，举出英、美、法、德、意、奥、俄为7大一等国。这个专集没有提到日本，也没有将日本的情况与上述7国作比较，大约这时候日本还称不上“一等国”吧。1919年作为

5 大国之一的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成为主要发言人之一，并不完全因为其战胜国的地位。自 1914 年以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的飞跃发展，其经济实力已经列入世界前 5 位行列。海外领有殖民地和保护国的面积，已经超过了其本身的国土面积。国内产业化、都市化的进行，产业结构、人口构成、社会公共事业，民众的社会意识也发生着巨大的变迁。日本在许多方面已经完成脱亚入欧，成为亚洲的欧美国。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强国梦，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日本已经可以把自己列入“一等国”的行列了。

第 17 章

政党政治

民本主义

支持政党政治成立并促其发展的，无疑是从 1912 年以“大正政变”为发端开展起来的大正民主运动。在社会思潮上，《东洋经济新报》和《白桦》派向人们展开全面宣传，给初期的大正民主运动以指导。但最终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理论基础的还是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论。

《东洋经济新报》是一份经济杂志，在町田忠志任社长兼编辑的领导下，于 1895 年 11 月 15 日创刊。1897 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天野为之继任主编后，为了促进甲午战争后产业资本的发展而大力主张市场经济论。后来，植松考昭、三浦铁太郎、石桥湛山继任主编。在整个大正时代，该报主张实施普选法，鼓吹个人主义，确保言论自由，一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

日俄战争前后，该报的主要立场是“在内实行立宪主义，在外实行帝国主义”。即主张国内实行英国式的两大政党并立的立宪政治，对外赞同日本参加出兵镇压义和团、占领朝鲜、实施“大陆政策”。但以植松考昭、三浦铁太郎为首的第三代主编上任后，开始全面展开对元老政治和帝国主义的批判。而且，在论述宪政的同时提倡普选。植松认为宪政的理想在于政党政治，他否认藩阀官僚和政党的两大势力对立是政界的基本矛盾。他尖锐地指出，二者都是作为宪政之敌的元老政治的支柱；他认为，元老政治是从专制政治向立宪政治过渡的现象，立宪政治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他看来，桂园体制及此后三届内阁仍然是屈服元老政治的资本家阶级的专制统治，而并非理想中的“平民政治”。因此，他把打破元老政治进而实现“平民政治”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在《新报》上勇敢地主张立即采用普选制度。这种普选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普选是国民的正当权利；普选是打破元老政治的强有力的手段；普选会带来工人阶级的政治介入；普选的实现依靠民众的奋起；彻底取消纳税资格制度。这当然是一种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普选理论。

《新报》的姊妹刊物《东洋时论》，以社会思想评论为中心，也举起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大旗。植松、三浦、石桥等都参加了该刊的创刊。该刊主张市民自由和立宪政治密不可分，因而鼓吹个人主义的发展在政治世界与宪政的确立是相互促进的。但从根本上讲，个人解放是宪政的基本前提。因此，植松在该刊上撰文认为：和宪政发展同样，个人主义的发展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时论》批判了阻碍国民个人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切旧道德——忠君爱国主义和维护天皇制支柱的家族主义道德。石桥则发表了《代议政治原理》一文，认为：“无论在哪个国家，‘最高统治权’在于人民，只有代议政治才是国家主权得以发挥的最佳方式。”石桥的国民主权论思想具有鲜明的向专制政治宣战的战斗性。

同一时期《白桦》派的出现，打破了日本文坛的沉闷局面。《白桦》派是由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柳宗悦、有岛武郎等学习院出身的华族子弟因于 1910 年创刊《白桦》杂志而得名。在直至 1923 年关东大地震停刊止 13 年间，他们在宣传和介绍欧美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过程中，表达了以追求人类和生命意义为宗旨的理念。这些明治时代的社会上层子弟，不但不以父辈的

荣光为自豪，反以一种自我创业的精神来发泄对父辈们的反抗和轻视。他们尊敬内村鉴三、德富芦花等人的“良心”，信奉凭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理想的个人奋斗主义精神。在他们对“世界”和生命意义的理解中，旧的忠节观念不仅荒谬可笑，而且对社会的进步有害。《白桦》拥有广泛的读者层，在大正民主时代，它通过宣传尊重个人主义来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影响是巨大的。

除了上述《新报》、《白桦》派思潮外，《大阪朝日新闻》、《中央公论》等刊物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大正时代是反对思想封闭寻找精神解放的时代，因此必然形成各种思潮的全面开花。在思想认识上，敏锐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一下子便找到了问题的要害。曾围绕着对天皇的重新认识，在大学的教授之间展开了有关“天皇机关说”和“天皇主权说”的论争，主要代表人物是美浓部达吉和上杉慎吉。

从本质上来讲，美浓部达吉提倡的、广大民本主义者所赞同的天皇机关说，为修正明治国家体制提出了法律意义的根据。这种理论认为统治权力的主体不是天皇，而是国家。天皇则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分，用美浓部达吉的话来说只是一个“机关”。在美浓部超过 100 本的著作中，填密的论述，广博的引证，都是为了证实他在明治末年就提出的这一学说。美浓部认为，帝国宪法的精神是要确立君主主权主义，尽管可以标榜君权主义，但因为从法理上讲国家的所有权力不能不可分地专属君主一身，统治权只能属于国家，所以，强调君主主权，即等于强调君主是国家的最高机关而已。同时，立宪政治是必须尊重国民意志的政治，但日本法律制度的现状是：众议院是第一院，贵族院是第二院，枢密院是第三院。这种体制怎么能保证尊重民众的意志呢？

同是东京帝大法科教授的上杉慎吉反对美浓部的理论。他曾留学德国，在出国前也曾提倡天皇机关说，但同美浓部的主张大相径庭。他认为，正因为天皇是国家的最高机关，所以天皇具有绝对权力。既然国家只是一种概念，不能在现实中表明自己的意志，那么，作为国家最高机关的天皇的绝对权力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种说法，实际上和主张天皇主权绝对性的天皇主权说同属一类。因此，上杉回国后迅速地转向主张天皇主权至高无上、无限制绝对的天皇主权说是不难理解的。上杉认为，如果对皇位主权也要妄加评论的话，国家就要混乱了。

这场辩论的结果，是以美浓部的胜利而告终的。在整个大正时期，天皇机关说作为国家公认的宪法学说，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双重承认。在整个大正民主运动中，人们对贵族院、枢密院和元老政治发动的进攻，甚至对天皇制本身的怀疑或批判，都在这一学说中寻找到了法理根据。美浓部的这一学说在 1935 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前，才被军部法西斯主义强制性地取缔了。

为大正民主运动提供政治理论的，是吉野作造主倡的“民本主义”。所谓的“民本主义”，吉野自己是这样说的：“我主张近代政治的理想在于保证最高、最完善的政治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因为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重视民众的意向，所以我赋予其民本主义的名称。”他开始登上论坛是 1914 年成为东京帝大法科教授以后。但他一跃成为新闻界瞩目的中心却是他在

1916年1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的《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径》这篇论文。他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论述了作为宪政精神基础的民本主义，以及议会政治等问题。

吉野作造首先论述了宪法与民本主义的关系。他说，宪法的存在与否，是区分立宪政治与其他政治的标准。因此，除了赋予宪法根本大法的性质之外，其内容必须包括人民权利的保障、三权分立主义、民选议会制度。但是，仅有内容上的规定，还是远远不够的。“单纯颁布宪法，单纯开设议会，也不能完全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我等的生活也不能得到十二分的幸福。”他认为，为了完成宪政“最终完美之形态”，还需要国民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和奋斗。

按吉野作造的解，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将其民主的意义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国家法理上属于人民”；其二，“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属于人民”。

关于第一种含义，吉野把它解释为民主主义。并分析其含有两层意思：“第一，民主主义对于一个国家的国体来说，其主权真正的持有者是一般人民。”吉野把它命名为“绝对的或哲学的民主主义”；“第二，民主主义在某一特定的国家，其国宪法解释上的主权在于人民”。吉野把它命名为“相对的或解释上的民主主义”。吉野认为，民主主义的这两层含义，在君主国体的日本是难以通行的。但是，不论在民主国体抑或是君主国体，民本主义都可以成为其共通的精神。在称谓上它与民主主义很相近，但是由于绕过了民主主义与君权主义在法理上的冲突，因而在客观上缓冲了两种政治派别的对立，为改革专制主义提供了可能。

关于第二种含义，吉野把它解释为民本主义。所谓民本主义，是不问法理上主权属于何人，只是在主权运用时主权者必须以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及其意向为方针的主义。这样，民本主义和君主制可以并立了。吉野又进一步阐述了民本主义的两个含义：政权运用的目的即“政治目的”在于一般民众的福利；政权运用的方针即“政策的决定”，要根据一般民众的意向。吉野把这两点称为“民本主义要求的两大政纲”。

基于民本主义的这种要求，当然需要人民进行直接参政。所以，吉野认为需要完善代议政治，以达到使人们能够监督议员、议会能监督政府的政治效果。他在论述代议政治的作用时指出：“我认为，最完善的政治就是以民众政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只有贵族政治而没有民众政治是不行的，我国今天的弊端就在于此。国民受一个伟大的精神指导而行动，政治最大限度地体现其精神，即能够接受国民监督而运行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

使代议政治能够付诸实际行动的惟有政党。而为了让政党真正地担负起责任，就必须做到：彻底地纯洁选举道德，并实现思想、言论自由和普选；实现基于责任内阁主义而建立的政党内阁；对抑制下院和政党内阁活动的上院和元老的种种超法律权力要予以限制；对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非立宪主义势力介入政治要尽可能减少，尽可能使之局限在最小限度内。

于是，吉野在不冲撞天皇国体论和明治宪法根本要旨的前提下，提出达成宪政至善至美的途径——即他关于代议政治和政党内阁制的构想。所以，他的民本论主张自然就成了这一时期民众运动的理论指导。它反映了时代精

神，起到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彻头彻尾地代表了社会中间阶层的要求。吉野作造民本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城市广大中间阶层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表现，在客观上也给政友会和宪政党对专制势力的讨价还价以积极的支持。

吉野作造提倡的民本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的主张在以其活动的舞台《中央公论》的大力宣传下向社会各方面渗透。长谷川如是闲主办的《我等》、岛居素川任主编的《大阪朝日新闻》等也对民本主义者发表议论提供了发言的良好阵地。在1918年1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吉野发表了《再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径》一文。这次，他站在更加实际的立场对其民本论进行了再阐述。1919年2月、4月号的《中央公论》，分别发表了吉野的《扩张选举权问题》、《普通选举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推进了民本主义论，并且给当时正处于高涨的普选运动以更有效的指导。

1919年，普选的热望已经成为全国的舆论。各地的演说会和示威运动此起彼伏，工会和学生也都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正值2月11日宪法颁布30周年纪念日之际，以东京各大学的辩论会、学生同盟会、早大普选促进会、东大的新人会等为中心的3000余名学生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大会，向社会宣告：“看，德漠克拉西是世界大势所趋，民本主义已成为时代潮流。必须彻底实施君民同治。”要求普选的青年们向众议院进发，举行了以要求普选为目标的示威游行。

1920年，是普选运动继续高涨的又一年。2月10日，日本劳动党、日本交通、劳动工会、小石川劳动会等20个团体组成的全国劳动团体联盟主办的普选演说会、示威运动在芝公园举行大会。大会一致决议：实施无限制横向联合法，撤废治安警法第17条，立即实行普选。2月11日，在上野公园“普选期成同盟会”主办的普选促进大会和立宪劳动党主办的获取参政权民众大会召开，宪政会代议士大竹贯一、小泉又次郎、三木武吉等也赶来声援，群情高涨。大会又一致决议：实施普选和废除治安警法第17条。

在白热化的舆论支持下，在野的国民党率先在第42届议会上提出普选法案。宪政会的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也热心地主张普选。普选要求日益为广大中间阶层所拥护，表明大正民主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高峰，而吉野作造用心良苦地提倡民本主义的本意，也充分地实现了。在不反对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日本国体即天皇制专制体制的前提下，实现民众的普选权，是一种对天皇制国家机器中军部官僚势力实行渐进改良的、特殊的战前日本民主主义运动。它的发展，使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继续得到加强，越来越成为官僚和军部难以对付的独立政治力量。

在大正民主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所谓“白虹贯日”笔祸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说明了进步知识分子要求迅速实行普选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专制势力处心积虑地欲对民主运动进行镇压的狠毒。

1918年8月25日，正是出兵西伯利亚后“米骚动”在全国各地相继发展的关键时刻。位于大阪中之岛的大阪饭店，来了许多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原来，各地报纸相继报道了“米骚动”的消息后，寺内内阁气急败坏地欲对各报加以取缔，从而激怒了各地的记者。这一天，来自东海、北陆、近畿、山阴、山阳、九州各地86家报纸的166名记者在这里集会，声讨寺内内阁的反动政策。在会场热闹的掌声中，通过对寺内内阁的弹劾宣言。

《大阪朝日新闻》是会议的发起者。社长村山龙平、主编岛居素川、社

会部长长谷川如是闲、论说委员大山郁夫和丸山于治（著名政治学者丸山真男的父亲）、京都帝大教授河上肇等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表达了迫使寺内内阁总辞职的要求。

在当日《大阪朝日新闻》的晚报第二版，详细报道了会议的经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引出了一场惊动全日本的司法官司。

坐在饭桌前的与会者们，全然不知肉之味，酒之香。一直以金欧无缺自夸的我大日本帝国，现在不正在面对可怕的末日审判吗？“白虹贯日”这句古代人常用的代表不祥之兆的谚语，就像一道闪电，在默默地使用叉子的人们脑中掠过。

自从在中国的《战国策》记述以后，这句古语一向被认为是“刺杀天子的前兆”。大阪府警察部新闻检查有关人员，一下子就发现了这4个字，于是，立即向内务省警保局告发了《大阪朝日新闻》，声称“日”即指天皇，“贯”即是兵乱。

1918年11月，内务省警保局以违反报纸法对编辑及作者进行起诉，并判处发行人山口信雄和执笔者大西利夫25个月禁锢。以头山满为首的右翼暴力团体“浪人会”也对进步知识分子进行威胁。社长村山龙平被迫辞职，长谷川如是闲、大山郁夫等优秀记者被迫退出该报。

这一事件激发了吉野作造等人的拥护言论自由运动。吉野著文指责右翼暴力团体，说他们是假“拥护国体”之名，行暴力迫害之实。“浪人会”竟派人登门挑衅。1918年11月23日，吉野作造不畏强暴，在神田的南明俱乐部同“浪人会”展开了辩论。在“浪人会”为阻止吉野演说而行暴的威胁下，吉野宣言：“在进行言论争论时，暴力突起本身就已经说明攻击者的败北和吾人见解、主张的正确性。”吉野作造的演说在青年学生和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获得了成功。这次演说，不但有力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而且还成了以黎明会为首的进步团体纷纷成立的契机。

以吉野为中心的黎明会于1918年12月成立。其纲领是：在理论上阐明日本国体，完成日本的使命；扑灭与世界大势逆道而行的危险及顽固思想；顺应战后的新趋势，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定充实。这个极为平凡的纲领，却成了时代的警钟、启蒙的标语。1919年2月，早大人民同盟会成立。1919年2月11日，以东大新人会为中心的“全国学生促进普选同盟”成立。1922年，日本大专学校进步学生团体“学生联合会”成立，1924年改称为“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所有这一切，与当时日益高涨的普选运动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更有力地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

政党政治

第二届山本内阁在虎门事件（狙击皇太子事件）中倒台后，枢密院议长清浦奎吾在1924年1月1日受摄政之命组阁。

元老西园寺公望之所以奏请、举荐75岁的官僚政治家清浦奎吾组阁，是想要制造一个以政友会为参与党的中间内阁。西园寺本意是推举政友会组阁，但由于政友会分裂、党内混乱，组阁困难，因而只好奏请清浦奎吾组阁。

西园寺企图在 5 月进行众议院议员的总选举后，把组阁事宜交给控制多数议席的政党。按西园寺的推测，政友会有成为第一党的可能性，结果会出现政友会组阁。基于此种想法，清浦被作为一种政权交接的过渡性人物推上了首相的宝座。

1 月 1 日受命组阁的清浦本想组织政友会、贵族院研究会的联合内阁，但由于接受了平田内相的“超然主义”的方针，无奈只能组织以贵族院研究会为中心的“超然内阁”。但研究会干部和政友会之间有联盟之约，研究会干部如果没能取得政友会的谅解，则不能参加清浦内阁。最终，经过研究会、政友会首脑的多次接触、会谈，都倾向清浦组阁，而政友会在选任阁僚时则保持着暧昧态度。不了解政界情况的清浦在组阁遇到困难之后，把选任阁僚工作委托给贵族院研究会的干部，在 1 月 7 日组织了以贵族院各派为中心的“贵族院内阁”。

清浦贵族院内阁的成立，使三次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的政党团结起来掀起了护宪运动。1 月 11 日，首都新闻界人士发起了恳谈会，宪政、政友、革新三派的少壮议员参加，商定排斥贵族院内阁和实现政党内阁，并决定以三派联合为基础组织联合内阁。政宪两党的干部中间，也出现了联合的倾向。政友会内部，以总裁高桥是清为首的一派与以床次竹二郎总务为首的反对派之间的对立加深，退党者相继出现。1923 年末，政友会和宪政两党的首脑多次会谈，以“实行不向民众和报纸献媚的政治，来确立国是方针”为宗旨。两党约定，组织绝对多数派为基础的坚强的政府，重建政党内阁。

清浦组阁时，政友会虽然拒绝合作，但其党内围绕着对新内阁的态度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总裁高桥是清站在与宪政会联合倒阁运动的前列反对清浦内阁。与此相反，中桥德五郎、山本达雄、床次竹二郎等人退党后，组织了政友本党，和护宪运动相对立。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三派有志之士间就打倒清浦内阁、成立政党内阁、改革贵族院、组织三派联合内阁等问题达成协议。1924 年 1 月 18 日，在三浦梧楼的斡旋下，高桥、加藤、犬养等三党领袖会谈，重申“宪政本义就在于政党内阁的确立”。进而是 20 日，召集护宪派代议员协议会，一致达成以下几点共识：确立政党内阁制；打倒特权势力的专制；为贯彻此目的，将来一致行动；根据以上宗旨，否认清浦内阁。

会后，护宪三派立即在东京、大阪等地开展了拥护宪政、打倒清浦内阁的国民大会和示威运动，掀起了第二次护宪运动。护宪三派攻击清浦内阁，说贵族院内阁的出现，是特权阶级向国民的挑战，是阶级斗争的开端。而清浦内阁和与其合作的政友本党则指责护宪运动是煽动群众运动，使阶级斗争激化。这时正是第 48 届议会召开之际，众议院以皇太子结婚典礼宜避免政争纠纷为理由，自动休会。1 月 31 日刚一复会，当在野党对企图颠覆护宪三派干部所乘列车事件进行追究时，暴徒突然闯入议会。内阁以此为理由，强行解散议会，同时谴责了护宪三派。但护宪三派亦成竹在胸，在 1924 年 5 月 10 日的大选中，护宪三派获得了大胜。宪政会在以新中间阶层为主体成立的市民政社的支持下，获取胜利，成为第一大党。清浦内阁在办完皇太子的结婚饗宴后，6 月 7 日总辞职。在元老西园寺的推荐下，摄政命令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组阁。在人事构成上，宪政会的若槻礼次郎任内相、滨口雄幸任藏

相；政友会的高桥任农商务相、横田千之助任法相；革新俱乐部的犬养毅任递相。这样，战前日本的政党内阁——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了。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标志着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成熟。自此之后，两个政党依靠选举轮流执掌内阁的所谓“宪政常道”，曾一度左右了行政权力的更替交接。

加藤高明是在以宪政会所公开约定的普选、整肃纲纪和整顿行政财政三大政策为支柱而组阁的。在其组阁后最初的议会——1925年初的第51届议会上，提出了一向成为悬案的普选法案。政党在讨论普选法时，连闯两道难关——枢密院、贵族院。最后规定，凡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都有选举权，年满30岁以上的男子都有被选举权，但妇女、接受救济的贫困者和无住居者仍无选举权。

在政府提交的原案中规定，“只有生活上接受公费救济的人”没有选举、被选举资格。在枢密院审查时把“公费”改为“公私”。一字之差，可谓天壤之别，从父母处得到包括诸如学费资助和生活资助的青年知识分子，可能都因此而失去了选举权。后来，双方在把“救济”改为具有施行恩惠意义的“抚恤”后达成协议。贵族院想把没有资格条款改为“生活上接受公私救济或扶助者”，以限制选举权的扩大。结果，在贵族院的修改之上又加入了“因为贫困”的字句，遂达成协议。

这样，大正民主运动的最高要求——普选终于有了结果。它的通过，尽管经历了30余年的时间，受到种种限制，遭受许多挫折，但毕竟能够证明，即使在专制制度下，社会成员的政治选择权和政治责任权也是无法否认的。通过的普选法，是一部有限制的普选法，但有权者人数从330万人增加到1250万人，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值得重视的是，在整个法案的提出和审议过程中，内阁和议会几乎没有认真考虑过人民群众对普选资格的看法。内阁的方案首先排斥了妇女的参政权，而且时刻警惕着普选运动的“左翼化”倾向。贵族院和枢密院则对财产限制作出种种修正，力图尽量缩小有权者范围。如吉野作造所说：“似乎像我所主张的，其实又不像。”“普选权”的不彻底性，只有与天皇制联系起来才能最后解释清楚。

在《普选法案》通过之前，第51届议会就通过了《治安维持法》。这个法案规定，以“变革国体或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而组织参加结社者，予以判处10年以下徒刑或监禁；为上述目的而进行协商、煽动和提供资金者也要处刑。这个法律是为专门取缔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农左翼运动而颁布的。

《治安维持法》中的“国体”一词首次在法律中出现，代替了以前的“紊乱朝宪”、“秩序安宁”等，对后来统制国民思想发挥了极大的魔力。此外，《治安维持法》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农运动中的革命左派和改良主义的右派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促使其运动内部分裂。

护宪三派内阁成立后，最大的任务就是有限制的普选的实现。但这个《普选法案》是与《治安维持法》同时通过的，所以在枢密院和贵族院方面来看，似乎带有交换的意味。而且，从护宪三派内阁成立时颁布的三大政纲——“普选”、“整肃纲纪”、“行政”、“财政整理”来看，表明了政党内阁企图通过对社会政治秩序一左一右的控制，来巩固地位，改善经济财政状态的施政目的。

《普选法案》一通过，护宪三派的暂时团结就发生了混乱。各党派为了能使自己的意志在政策上得以充分体现而发生了对立。1925年4月10日，

政友会总裁高桥辞职，田中义一被推举继任总裁。上一年大选中曾为第三党的政友会，由于同政友本党恢复了旧关系而势力大增，想夺得政权的意识很强。加藤首相为了维持三派合作，要求田中作为高桥的后任入阁，遭到拒绝。1925年5月，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中正俱乐部实行合并，政友会升为仅次于宪政会的第二党。革新俱乐部的犬养毅等人提出以“产业立国”主义作为政友会的基本政策以抬高本党的威望。到了7月，政友会从正面向加藤内阁挑战，目的是想逼迫加藤内阁倒台。由于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加藤内阁总辞职。政友会和政友本党为取得政权立即商定合作，但“惟一的”元老西园寺蔑视这一阴谋，遂下令让加藤高明组织了宪政会的单独内阁。这样，加藤第二次组阁，但宪政会的议席远没达到半数，形成了宪政会、政友会和政友本党的三党鼎立，使政局动荡不安。

虽然三党鼎立格局形成，但按普选法规定，他们本应举行大选，接受国民的选择。但三党都极力避免解散议会，因为他们都害怕民众登上政治舞台，都对普选有抵触情绪。他们对大选表示消极，希望实现不经选举的政权更迭。宪政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有的主张解散议会，但加藤、若槻等官僚、贵族院出身的人都反对解散。加藤内阁想和政友本党妥协度过议会期，政友本党则一面想通过政本合作来牵制加藤内阁，另一面又和加藤谈判，想私相授受政权。政党如此脱离国民，说明了其腐败性，也给予贵族院和枢密院等机构以充分策划的余地。

自1922年山县有朋、1924年松方正义死后，西园寺公望就成了唯一的元老，担负着向天皇举荐首相人选的责任。西园寺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已经由他继伊藤之后出任政友会总裁时表现出来。而每当天皇向他询问首相人选时，他所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如何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中找到一个制衡点。“米骚动”时他推选原敬，是他相信惟有原敬才能收拾国内混乱的形势。原敬死后，他并不想推荐政友会继任总裁高桥是清，是因为顾忌原内阁时政友会力量过分膨胀。后来同松方协议后推荐高桥，亦是无奈之举。在他脑子里并不以议会、政党和政党内阁为政治取舍的基准，而是把怎样才能完满地履行辅弼天皇的责任作为最高的考虑。从1924年成为“惟一的元老”后，西园寺在推选首相时，有两种考虑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西园寺以大选的结果为准则，推选了以前一直忌讳的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不仅如此，当三党鼎立、政友会和政友本党企图搞掉加藤内阁时，他仍然依据宪政党还是第一大党这个事实，继续推荐了加藤。此后的若槻内阁、田中内阁、滨口内阁、第二届若槻内阁，他都以其所率政党是议会第一大党为根据推荐并请天皇下敕任命。使宪政踏入议会第一大党组阁的“常道”。

第二，自松方死后，西园寺就下决心让“元老”在自己有生之年中结束。当别人以“惟一的元老”看待他时，他更以“最后的元老”来看待自己。所以，当宫中有人向他透露是否将清浦奎吾和山本权兵卫也列为元老时，他回答：“不管世间如何评论，我已决心一身侍奉皇室。若有陛下询问之场合，也已决心以自己一人奉答。”即以自己的一身担当责任的决心，拒绝自己所不信任的势力进入宫中。

按一般常规，以期待“宪政的至善至美”这点来看，元老本身的存在是宪政上的变态。元老不是宪法上所规定的机关，而由宪法上不存在的机关推荐内阁总理大臣的做法，退一步讲也只能是一种在宪法政治的过渡期被允许

的制度。如果政党发达、政权更替能在政党之间顺利进行的话，元老的存在并不必要。西园寺公望也熟知这一点。但在政党政治时期，如果没有西园寺的话，“宪政常道”这一惯例能否得以维持，恐怕还值得怀疑。虽然宪政常道的内容很暧昧，但多数政党人士认为：众议院的两大势力互相担当政权是国政运用上最为现实的。但是，想谋取政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在政党内、外、议会内外都存在着。第一次加藤内阁辞职时，政友会和政友本党合作，企图夺取下届政权。第一次若槻内阁的三党首脑会谈后，安达谦藏递相和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搞宪本联盟，为的是不把政权交给政友会。第二次若槻内阁末期，安达内相、富田幸次郎民政党干事长、久原房之助政友会干事长之间，推行所谓合作内阁运动，可以说是他们各怀鬼胎、同床异梦的产物。他们的确都是政党内阁论者，但他们都没有诚心遵守政权互让原则也是事实。如果把“宪政常道”委托给各政党，政权互让原则则最终难以维持下去。之所以能够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就是因为元老西园寺的存在。

由此，内阁首相政权交接实际是在西园寺的监督下进行的，他的权威被认为是绝对的。政界的人士都在思忖西园寺的意图，并按其意图而行动。西园寺的选择往往与政党意图和欲望不相一致，但却具有说服力。在一门心思觊觎首相位置的人们看来，他本人已经成为决定首相人选机制的人格化身。如果缺少他的人格权威的力量，“宪政常道”可能早就会被大多数贪婪的政治家所践踏了。因此，西园寺的存在，是使战前政党互相交替政权得以进行下去的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晚年的西园寺稳坐别墅坐渔庄，遥望东京的政界，对皇室侧近及有关人士毫不避忌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许多自认为在政界中有所作为的政党人士，每当听到西园寺那里传过来的声音，便有如芒刺在背，感到十分不自在。他要求处理对炸死张作霖事件负有全责的田中内阁，又鼓励滨口雄幸全力签订《伦敦海军军备条约》。由于推荐首相被认为是政界最高的权力，所以政党领袖们都注视着坐渔庄的动向，猜度西园寺现在在想什么，下届首相可能会是谁。在政党政治阶段，最长的内阁也挺不过2年，有时几个月就要换一届。所以，政府、政党、军部和财界的什么人一旦被西园寺喊去谈话，无不怀着喜忧交加的心情。西园寺本身的存在，成了当时决定政局稳定度的关键因素。

从桂—园体制到政党体制的确立，政治体制变动的主要动力源自大正民主运动。而当护宪三派内阁时期，男子普选权的获得、贵族院的改革都从关键环节上推进了民主化进程。另外，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者们所关心的普选权和政党内阁制的实现，至少在形式上表明议会民主主义力量在同专制势力的长年较量中取得了暂时的优势。在这一进程中，有许多人士的名字值得记取。但首当其冲的两个人应当是原敬和西园寺公望。

金权政治

自政党成立之日起，各党的党内党际纷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政党政治成立后，这种纷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引起党内纷争的第一原因还是金钱问题。先看原敬时期的政友会，从原敬1914年9月17日的日记可知，他从西园寺接手政友会时，党内日常开支经费仅2万日元左右。但从原敬的遗嘱又可知，在原敬任总裁后8年期间，政友会的经费已上升到100万日元左右。这100万元的利息被用于党内开支，而其本金或嘱托团琢磨通过三井银行作公债买

卖，或作银行存款。原敬在党内的绝对威望，亦同他出色的蓄财理财能力有关。

但失却原敬强有力领导后的政友会，派阀之争就趋于激烈。接任原敬在党内地位的候补人选，计有内相床次竹二郎、藏相高桥是清和农商务相山本达雄。高桥被推荐为继任首相因而当然地成为政友会总裁后，自然引起了床次和山本的不满，双方的斗争就激烈起来。这种对立使高桥仅仅执政6个月后就短命地下台了，内阁大权复归海军的加藤友三郎。这一结果使高桥在党内受到更猛烈的攻击。终于在对清浦奎吾内阁支持与否问题上，导致政友会的大分裂。山本和床次声明脱党，成立了政友本党。这时高桥已不可能再继续担任政友会总裁，党内一再内证要求一位具备更高威信和政治手腕的人物出任总裁，平息纠纷，迫使高桥隐退下野。

但是，被党内一致拥戴就任总裁职务的田中，其威信和手腕却又何在呢？原来是他若出任总裁就能给政友会带来300万日元的承诺。其实，迫使高桥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友会内部对他搞不到钱的普遍责难。“高桥的引退还是钱的问题。政友会相当需要钱。干事长岩崎勋等常来取党的经费。作为总裁拿出钱来是应该的，可要拿出更多的钱来，就使高桥吃不下饭了。”民政党总务樱内幸雄在抨击田中内阁时说：“说到田中大将的300万日元事件，是田中大将从神户的高利贷者乾新兵卫那里借了300万日元，说拿了去买政友会总裁。若仅是这样倒也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它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用陆军省的定期存款变换的国库公债作担保……这是乱用官费，违反军规的行为”。宪政会的论客中野正刚更是在众议院演说中提出这300万日元同陆军的机密费有关。西伯利亚出兵高达2400万日元的军费，其用途十分不透明，中刚揭露其中的800万日元被挪入陆军省大臣官房金库，后来陆续换成了公债。田中向乾新兵卫借钱的担保，以及政友会同革新俱乐部的合流，皆与此笔款项有关。因为贵族院议员拥有司法豁免权，所以对田中本人的审问根本不可能进行。在众议院认可下对鸠山一郎等与此事有关议员调查后，证实中野的指责基本属实。但因此事件最终同闲院宫有关，所以调查最后不了了之。各政党拼命筹措经费，主要用于议会选举。以1928年大选为例，政友会、民政党为争夺天下，都投入了大量资金。政友会以田中为首，在其他干部合作下，一举投入500万元。各候选者被招呼到首相官邸，直接从总裁手中领取竞选补助费。民政党则在滨口雄幸总裁和床次、若槻等人的协力之下筹得300万元，向各候选人提拱竞选补助和旅费、通信费及广告印刷费。另据《大阪朝日新闻》报道，1930年的议会选举中，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政友会仍然投入资金350—400万元，而民政党则投入了400—500万元。在1932年的议会大选中，政友会投入500万元，民政党投入300万元。政治资金投入的多寡，甚至直接影响了大选的结果。1930年民政党当选总人数为273人，而政友会则为174人；但1932年政友会当选301人，而民政党仅为146人。由于选举费用越来越昂贵，仅靠从本党获得的补助远远不够，所以能够自己拿出钱来竞选的多被选上，使众议院的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政党的首脑们将巨大的资金投向议会大选，时时以政治活动需要最必要的润滑剂聊以自慰。这些资金的主要来源，只有财阀为自身的利益出发所作的政治投资。随着政党力量的逐步加强，财

阀们认为向他们提供政治资金是失有所偿的，并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井一政友会、三菱一宪政会（民政党）两种政财联姻关系。安田、久原、古

河、住友基本属于政友会系，根津、山口属于民政党系。这种关系自明治维新时期倒幕派领袖与政商的私交关系，经过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最终成型于原敬内阁时期。

将财阀与政党的关系联结起来的渠道有三个。其一，自甲午战争后，财界出于与其帮助议会势力增长、不如直接影响政策决定的考虑，开始向议会直接渗透力量。1902—1917年，实业者议员在帝国议会中的议席从52席增加到131席。这种情况表明，财阀的势力已开始进入政党的决策中枢。

其二，财界出身的议员进入政党后，其中的代表人物就同政党的首脑建立了隐蔽的然而却是密切的关系。他们将财界的意思透露给政党的领袖们，作为交换，财阀向政党提供的资金也通过他们的手直接交到政党的总裁或总务手中。这种关系的典型例子，可以从加藤高明与三菱、仙石贡与滨口雄幸、团琢磨同原敬的关系中得到证明。这也是后来法西斯军人在“毅然崛起”后将团琢磨等人作为袭击对象的理由。更有趣的是，凡大财阀向政党提供资金时，并不计较眼前的利害关系，所以鲜有被政敌揭发的事。而中小财阀、地方财阀向政党提供资金，因急功近利地要求政党立即兑现要求，所以往往成为政党之间相互攻讦的材料，如前述的“5个珍品”事件和满铁高价收买内田信也经营的船只事件。

其三，自1920年后，原内阁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公开对大财阀归并中小企业予以政策支持。原内阁时期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对战前八大财阀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三党鼎立的局面下，政友本党床次竹二郎率领自己辖下的势力，一面宣言“政本非合同，政宪非提携”，一面在政友会和宪政会之间来回摇摆，意欲以支持政宪中的一党使之成为多数党为诱饵，捞取实惠。第二次加藤内阁是以下到议会半数议席组阁的，所以急欲掌握议会多数。于是，一下子向床次派支付50万日元，其中30万日元直接落入床次个人腰包。床次居然还向张学良要钱50万日元，更是震动社会的丑闻。政党用金钱来推动政治发展党势，财界同政党之间保持的这种用金钱收买权力的关系，简言之，即金权政治现象是伴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对手政党皆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互相揭短事件在新闻界频繁曝光，必然招致社会各界人士一片唾骂。对政党政治怀有理想的大正民主思想的代表吉野作造，在1932年6月号的《中央公论》中，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和失望，这样写道：

我也是自大正初期就热心地主张实施普选制的人士之一。我曾指出普选制的一大功德便是不使用金钱，而一旦金钱从政界匿迹，那么代替它的无非就是言论和人格。但是，这并非仅仅改变一下制度就能使之实现的事情……今日之选举界最具有发言权的是金钱和权力。选举就是询问人民的意向，理想的办法是追求彼等的自由判断。用金钱和权力蹂躏之实在不堪忍受。但是，用政治术语讲，蹂躏者都不是坏人。蹂躏者就是坏人！一言以蔽之，其罪在于选民本身。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只有等待选民道德的觉醒。

曾为大正民主和对普选运动奠定民本主义这一理论基础的吉野作造，对选举政治堕为金权奴隶的批判，亦是入木三分的。

在金权政治的作用下，政友会和宪政会之间争夺组阁权的斗争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田中义一在就任政友会总裁的致词中说：“在我任总裁期间，我党若不能取得政权，切腹也无妨。”居然将打倒宪政会作为政友会面临的

最高目标。在现总裁的激励下，政友会全体党员都踌躇满志地发誓，不把政权从宪政会手中夺回来誓不罢休。反过来，宪政会也是以同样态度对待政友会的。两党之间又有宪政本党和其他小政党浑水摸鱼，混沌不清的政争使民众对“宪政常道”越来越不信任。《大阪朝日新闻》1926年3月7日刊载的讽刺漫画，将政党喻作一帮竞相用泥往别人脸上抹、比谁抹得多抹得快的小丑，辛辣地抨击了政党争夺政权相互揭短的丑态。《朝日新闻》甚至发表社论，公开批判政党“只知追求私利私欲”。

因此，在政党脱离民众，根本不为民众考虑社会福利的同时，社会民众对政党的不信任感自然而然地向厌恶情绪转化。把1924年以后的政界视作“宪政史上最丑恶的政争时代”，至今仍有许多日本老人这样认为。应当说，在腐败政治下，这是极正常的社会心态，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就带有很大危险性。简言之，自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经济一直在长期不景气之中徘徊。1920年、1927年、1929年的经济危机接踵而至，政党内阁连续颁布的经济政策，在同样连续的经济危机打击下，没有发生根本的作用；政党内阁一贯执行协调外交，认为同华盛顿体制相协调也可以实现国家利益，但协调外交最终失败了。不管内阁怎样频繁更迭，内政外交都不能打开局面，而政党的丑行却不断充斥民众视听。这就为社会右翼势力的猖獗提供了兴风作浪的环境。

最初，右翼势力一般还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试图在思想界重新抬头。他们将裕仁践祚作为绝好时机，在大正民主运动尚未完全平息的同时，开始高唱“昭和维新”。他们认为，社会正沉溺于“华美轻浮”的欧化风中，当务之急是建设一个恢复固有传统的日本国家。他们宣称，从“欧洲直接输入”的民主主义制度不适应日本，所以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现在已经败北，而且注定要彻底崩溃。他们叫嚷什么“议会中心主义”与“天皇中心主义”已经没有再争论之必要，日本必须在天皇直接统治下才会有再次维新的希望。他们尤其憎恨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因为所有反对现行制度的政治运动都令他们焦虑不安。

各报刊的社会版，关于由于经济不景气和政治腐败、伦理颓废而导致凶杀、偷盗、自杀和精神失常等报道，也日甚一日。在电车中或集会场合，对现实不满的牢骚和意气消沉的感叹，时时能博得共鸣。大正民主时代自由轻松的时代气氛，正逐渐地为保守灰暗的气氛所代替。出版物中，西方的童话和小说的翻译作品越来越少，而歌颂西乡隆盛、吉田松阴、楠木正成等英雄气节的传记，以及《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万叶集》等都越出越多。

对右翼势力来说，更大的麻烦接二连三地在海外发生。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排日移民法，在中国发生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势力对整个东亚地区越来越大的影响，都令右翼怵目惊心。他们越是鼓噪尊皇爱国、牺牲精神、刚健质实、伦理道德，就越是感到传统的“美风”行将崩溃。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从大正民主主义向“昭和维新”转向的社会精神状态。其中呼吁救济农村的权藤成卿和加藤完治、高唱伦理政治的后藤新平、鼓吹大和魂的德富苏峰，主张日本主义的津久井龙雄和推行国家主义革命的大川周明、北一辉，都是这股右翼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客观地说，当时的人们并不能觉察到这种思潮的发展蔓延会给他们的国家及他们本身的生活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从天皇制对政治体制的规定来说，政党政治的虚弱体制是天生遗传。分

析政党政治 1924—1932 年近 10 年各届内阁的政策，也必须指出，某些政策不成功的原因并非在于政策的制定者或政策本身，而在于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更在于国家主义运动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用非法律的手段推行的“国家改造”。但是，在经济政策彻底失败的前提下，政党以权力和凭借权力扩大党势为最高目的，根本忘却了立宪政治的基本要求，亦是政党政治失败的重要原因。党内派阀林立，党际攻讦揭短。为图一时之利，或分裂另立山头，或率部投靠他方。政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势，以至于使金钱和权力互以对方为获取利益的手段，酿成了政党政治内部的危机。试想，在社会民众普遍要求“打破现状”的期待中，在大正民主被社会右翼思潮取代的过程中，从社会右翼思潮向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思潮的发展，不过就是借助惯性再走一步而已。政党政治的破绽及其失败，使得政党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显著降低，苦熬几十年才获得的行政权力主体承担者的地位，在不到 10 年时间内便无奈地失去了。1932 年“五·一五”事件后，天皇向铃木贯太郎侍从长表示，后续总理大臣人选必须具备 7 项条件，铃木将天皇的旨意向西园寺公望传达，7 项条件中的第 1 项是首相必须具备出类拔革的人格。第 2 项是改善当前政治的弊端。西园寺内心虽还有继续推荐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之意，但迫于来自社会和军部的压力，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苦思冥想 4 天 4 夜，仍无法定夺。5 月 19 日后，在东京同侍从长铃木、高桥是清、枢密院议长仓富勇三郎、内大臣牧野伸显、若槻礼次郎、近卫文磨、清浦奎吾、陆军元帅上原勇作，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等军政要人会谈后，于 5 月 23 日选择了海军大将斋藤实。至此，政党政治实际已告完结。取而代之的是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频频登上政治舞台的政治军人们。

第 18 章

平民宰相

早期政友会

既然宪法将国家预算案的审议大权交给了议会，那么，批准、修改或否决内阁预算案就成了在众议院中占多数的民党向藩阀斗争的合法武器。自第 1 届国会召集以来的经验表明，超然主义的态度也好，直接干涉选举也好，并不能改变众议院中民党占多数的格局。这意味着藩阀政府每年都要在国会召开之际遭到一次猛烈的打击。改变这种形势的方法只有两个：或者废止宪法，或者设法掌握议会多数。

比起大多数“开国元勋”的蛮横来，伊藤博文一直在苦思化解这种形势的策略。1892 年 1 月，他向天皇上奏说，要组织一个政党来标榜天皇大权，以压倒民党。由于没有得到天皇敕许，其他元勋们也不赞成，只好作罢了。

在松方正义第一届内阁时期，议会曾因民党和政府的对峙而休会 7 天。民党在口头上摆出要求内阁总辞职的姿态，但在背后却在寻求避免大冲突的途径。自由党的河野广中和立宪改进党的岛田三郎私下同伊藤接触，要求伊藤组织内阁。1895 年伊藤第二次内阁后期，依靠自己同自由党的合作，成功地操纵议会，使包括耗资巨大的扩军方案在内的“政府案悉皆通过”。这些事实表明，政党并非一味地置国家的“大局”和自己的利益于不顾，专门同政府作对。在政党与立宪派藩阀之间实际上确实存在着共同点。

基于这种认识，伊藤进一步地认识到民党的可利用性，以及同民党妥协的必要性。1896 年，在三菱社长岩崎弥之助的撮合下，进步党的党首大隈重信出任第二届松方内阁的外相。这一年的预算案史无前例地达到 2.4 亿日元，陆海军军费几占其 50%，但在进步党的支持下，也通过了。商界不希望议会与内阁对峙的愿望以及进步党同样也可以合作，于此可见一斑。这就使伊藤更加明确了为了维护自己一手制订的宪法、实现政治安定，必须控制议会的想法。

要控制议会则要同政党相妥协，对伊藤来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当他第三次组阁，想通过同时将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拉入阁而实现“举国一致”的计划时，却意外地失败了。原因是两党反目，而且都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于是，“举国一致”不成反被“超然主义”所乘，第三届伊藤内阁成了完全排斥政党势力的内阁，而自由党和进步党却因此加强联合，于 1898 年 6 月成立了合二为一的宪政党。

从这时起，伊藤和山县两巨头之间已经萌生了巧妙维护立宪主义和坚持超然主义立场的隔阂。这种隔阂尽管不甚分明，但从山县控制的内务省方面表现出对伊藤的反感，已经说明了问题。至少伊藤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山县在给松方正义的一封信中，也流露出对伊藤想出任新党党首的计划的不满意。在这种情形下，伊藤反而更加坚定了组织新党的思想。1898 年 6 月 24 日，伊藤在元老会议上又一次提出组建新党的计划，要求马上建立“国民的政党”。在提出计划之前，他已经同财界人士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益田孝等磋商，并在财界人士的支持下筹集了建党的经费。井上馨、西园寺公望、黑田清隆和金子坚太郎等也表示支持。但山县有朋等人坚决反对，使

计划再度搁浅。会后，伊藤出人意料地以极端的手法予以反击：他一面向天皇提出《公职、勋位、爵位奉还表》，一面强烈推荐宪政党党魁和自由党坂垣退助联合组阁。当天皇准奏并“降大命”于大隈、板垣之后，山县伤感地对侧近说，“尔时，本朝政海之一大变动。明治政府终于陷落了！……败军之老将再无谈兵之必要，除隐退之外亦无别途矣！”

由辞官辞爵辞勋而恢复“自由身”的伊藤博文，开始了真正的建党活动。在错综复杂的党派斗争和宪政党与山县内阁关系的纠缠之中，伊藤以自己 and 井上馨的亲信和侧近为基底，打算通过对既成政党宪政党的改造来组织新党的想法明确起来。在伊东已代治从事的将伊藤和宪政党力量撮合起来的秘密工作的同时，伊藤本人则到全国各地游说，说明建立新党的本意，争取地方有势力者的支持。一方面为新党积累力量，一方面为日后的选举铺平政治道路。1900年5月，与山县内阁提携的宪政党，在阁员组成问题上同山县的交涉宣告失败。24日，星亨和松田正久等宪政党首脑在下矶同伊藤晤面，就宪政党解党与新党合流达成协议。伊东已代治起草了建党文件。原敬、井上馨、西园寺公望、渡边国武、金子坚太郎、末松谦澄等，以井上馨的内田山私邸为据点，昼夜策划。他们理解伊藤组建政党以期拥有“自己的亲兵”的设想。而伊藤本人则通过对山县做说服工作，使山县表示对成立新党一事加以默认。1900年8月25日，伊藤召开立宪政友会创立委员会会议，指定出席者有西园寺、渡边、金子、末松、本多政以、林有造、长谷场纯孝、星亨等13人，官僚和政党各占一半。会上以伊藤博文名义发表了立宪政友会宣言和纲领。9月15日，在帝国饭店举行隆重的立宪政友会成立大会，1400人参加。宪政党同时宣布解散，大多数党员转入立宪政友会，大会一致推举伊藤博文为首任政友会总裁。当天下午，内阁大部分阁员，枢密院院长、贵族院和众议院议长以及财界、政界和各方代表，出席游园会以表庆贺。

从政友会总务委员的组织成员看，金子坚太郎是伊藤的得意门生，末松谦澄是伊藤的女婿，都筑馨六是井上的女婿。原敬是井上后妻之女的丈夫，可称井上的准女婿。西园寺和本多政以是旧公卿旧贵族、伊藤的政治好友。其余大部为原自由党但后来加入宪政党的议员，计有星亨、松田正久、林有造、片冈健吉，还有原帝国党的大冈育造和原宪政本党的尾崎行雄。星亨、尾崎、原敬、片冈和大冈被指定为常务委员。成立大会的同时，政友会向无党派议员、各市市长及市政官员、各府县议员、多额纳税者、各地商会的正副会长、资本金10万日元以上的银行首脑和5万元以上会社社长都发出了入党劝诱书。政友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便表明了要成为第一大党的姿态。

从8月25日伊藤博文向西园寺等13人发表的关于创建新党的趣旨可以窥知立宪政友会的“纲领”。政党对国家须举全力一意奉公；实业家人士积极主动过问政治；巩固地方自治制度；政党应依据法律展开活动；发现和提拔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等等。从政友会的组成和纲领看，一意奉公、发展地方势力和促成政治与财界的联系是其最主要的目的。政友会既缺乏自由党成立之初那种激进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也没有公然标榜皇室主义国体思想。应该说，其本身是在伊藤欲占领众议院的初衷下官僚政党化和以原自由党力主的政党保守化这两种政治倾向互相接近的结果。亦是伊藤博文将激进的、年轻的政党改造成保守的、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功实验。是日本资本主义

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开始向垄断过渡时期在政治上寻求安定的体现。

不管今天的人们怎样评价政友会，其实也不如当时的人们用自己的行为对它所作的评价。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在“大逆事件”中被专制政府处死的幸德秋水，在《万朝报》上发表《自由党祭文》说：“当时谁也不曾料到，……彼等的热泪鲜血，他日竟被供作其仇敌专制主义者惟一的装饰。”借追悼为自由平等而奉献生命财产的自由民权的斗士之名，行抨击自由党主流变节之实。而几乎在同时，山县有朋因反对和阻止新党成立失败，无奈之中只好默认既成事实并深感忧闷，辞去了内阁总理职务。幸德秋水气恼的是，自由党居然堕落到甘愿被昔日的仇敌伊藤博文所吞并，沦为“政治的朋友”；山县有朋担忧的是，伊藤一心想占据议会而同政党妥协，为政党人士入阁打开了方便之门，日后的变化可能更不可预测。左派憎之，右派忧之，正好说明了政友会混同激进和专制而成一体的特点。

山县有朋于9月26日总辞职，向天皇推荐伊藤为下届内阁首相。有学者分析此举不乏山县向伊藤进攻的意味——趁政友会成立伊始立足未稳之机，以让渡政权组阁入阁扰之，造成其内部的分裂。伊藤似乎窥穿这一点，不愿接受。但是，原敬却异常热心地希望伊藤能出马组阁。他在日记中写道：“同伊藤就接收内阁和指名政友会总务委员之事可以同时进行，并就组织内阁正乃此时机之趣旨内谈。”29日原敬访问井上馨，劝井上出面说服伊藤组阁。原敬的热心正好证实了山县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原敬看来，掌握政权的政党，不仅可以扩张本党的势力，而且又是作为政友会的总务委员的自己一步入阁的绝好时机。

伊藤于10月7日组阁，阁员中除山本权兵卫海相、桂太郎陆相和加藤高明外相之外，余皆为政友会成员。第四届伊藤内阁被称为“政友会内阁”。星亨等宣传政友会内阁的建立就是政党内阁的建立，但伊藤本人却认为这是集合了官僚、华族、实业家和政党人士在内的国家政党内阁的建立。今天的学者也不认为此即政党内阁。原敬后来接替星亨出任邮递相。其他政友会人士无不为自己入阁而沾沾自喜。但是，伊藤博文为组阁竟花费了3个星期亦是事出有因。政友会总务委员长渡边国武认为自己出任藏相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又探知伊藤想让自己的盟友井上馨出任藏相，便“心机一动”，通过曾在宫内省任职的兄长渡边千秋，从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处搞到了就任藏相的内敕。对此全然不知的伊藤指名井上为藏相时，渡边便在报纸上公开攻击伊藤博文。伊藤只好向井上说明原委，称自己已是“欲哭无泪”。正当组阁之际，又不能同宫内省方面发生正面冲突，遂只好让渡边国武辞去总务委员长一职，再任命渡边为大藏相。这就埋下了使第四届伊藤内阁崩溃的伏笔。

这届内阁刚启动伊始，便又遇上了邮递相星亨污职事件。此事本发生在政友会成立之前，身为东京市参事委员的星亨收受贿赂，与政友会并没有关系。但贵族院抓住不放，迫使星亨辞职。星亨辞职不久，便被剑术师范学校的伊庭想太郎在东京市政府的会议室里暗杀了。

这两个事件预示着伊藤最后一次组阁充满困难。但是，依靠政友会在众议院的议席中占有156席之多的优势，伊藤依然顽强地向第15届议会提出了酒税、砂糖税和海关税增税案，用以弥补被挪用作出兵镇压义和团军费的甲

[日]坂野润治：《近代日本的出发》，第313页。

《原敬日记》，第2卷，第276页。

午赔款基金。这个增税案在众议院通过了，但在贵族院却遭到了否决。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本来，众议院一贯以休养民力为口号，屡屡反对政府的预算案。现在却颠倒了过来，众议院成了政府的支持者，而贵族院却反而拾起了被众议院弃之不用的老口号，用以对抗伊藤内阁。

这当然是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官僚势力对伊藤博文政友会内阁的反击。而且，宪政本党的一部分人员也参与其内，与贵族院里应外合。山县有朋对政友会成立素有反感，已如前述。宪政本党对政友会和伊藤也持强烈不满。1898年进步党和自由党合并成立宪政党，不久便出产了隈一坂内阁。但宪政党内部分自由党派和进步党派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就在隈一坂内阁时期，终因政见分歧，进步党派召开大会欲分裂宪政党，被身为内相的坂垣退助发党勒令其休会，除非改名不叫宪政党才行。于是，改称宪政本党，宪政党就成了过去的自由党的别称。伊藤同宪政党合流实质是与自由党合流，将宪政本党即大隈系的进步党力量排斥在外。伊藤成立内阁时，宪政本党本来以为本党或许也会有几人入阁，但马上就发觉这是很幼稚的幻想。于是，宪政本党内部的“左”派便在犬养毅率领下，接近贵族院的近卫笃磨、佐佐友房等人，决心与政友会相对抗。先是提出对俄强硬论、反对伊藤等人的日俄协商论，继之便在增税问题上，通过贵族院的近卫笃磨、谷干城和朝日俱乐部、庚子会，与同是贵族院的山县派的研究会、茶话会，共同抵抗政友会和众议院。

这样，在1900年时，就出现了政友会和政友会控制下的众议院同宪政本党的“左”派与贵族院之间不甚紧密的联合之间的对抗。伊藤在停止议会15天和请求山县，松方两元老出面调停均告失败后，只好请出天皇诏书，才使增税案得以通过。但是，在预算和紧缩财政问题上，伊藤、大藏相渡边与原敬、末松、林有造等阁员发生分歧，伊藤本人在心灰意冷中宣布辞职。

尽管第四届伊藤内阁仅存在了半年多时间，但它在日本政治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其一，它成功地使政友会人士大批入阁，为政党人士成为执政党提供了经验，原敬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引人注目；其二，它结束了元勋首相、官僚内阁的时代。在它之前前10届内阁总理大臣绝对地由维新元勋、有过参议经历的伊藤、黑田、山县、松方、大隈等5人担任，在它之后的总理大臣和各省长官则由桂太郎等第二代官僚来担任。“二流内阁”的出现正是政权交替的一个预兆；其三，它将由于政治力量分化改组后如何对待新的政界格局的课题，提上企图想掌握政权的政党的议事日程；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是政党和官僚之间进行了一次尝试性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在照顾双方利益的同时，首次使议会成为政府的“合作者”。这就为将来政治体制的变动积蓄了经验。首先通过元老与政党双方接近，而后两者成立政党形成组织统一，依靠众议员多数去控制议会，支持内阁。有些学者称之为“1900年体制”。

1901年6月登台的桂太郎内阁，其阁员或是贵族院的官僚，或是此前尚无入阁经验的技术官僚，如外相小村寿太郎、内相内海忠胜、文相菊池大麓、农商相平田东助等。小村寿太郎就任后不久，就向桂太郎提出了《关于内政外交的十年计划》，对于政友会原敬等人主张的“积极政策”给予新的评论。认为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扩张陆海军、铁道国有和宽轨化、发展电信电话事业是有益的。财源不足只好募集外债。这些计划因向美国募债失败而未能实施，惟有陆海军的军备却仍以巨大财政支持扩充着。1900年下半年起发生了金融危机，生丝和棉纱的出口也不够稳定。在财政的重重危难之下，桂太郎内阁依靠外交上突破性的进展而得以延续下来。1902年结成了日英同

盟。1905年打胜了日俄战争，桂内阁成为历时4年半的长命内阁。

桂内阁成立之后，政友会便从执政党变成在野党，但依然占据众议院多数。这时，政友会和伊藤都面对着一个颇为困惑的问题。因为这时的伊藤是元老和政友会总裁，已经不是能将这两个对立的身份统一起来的首相。作为元老，他理应从国家和天皇的利益出发，为国政运筹策划。作为党的总裁，他当然又应该事事从党益党利出发，捍卫在野党政友会的权力和地位。一旦桂太郎向作为元老的他咨询国政，他该怎样履行总裁的责任？同样地，一旦政友会内部讨论议会对策时，他又该怎样履行元老的责任？可以说，伊藤本人这时已经成为内阁和政友会双方共同的不便了。无奈之中，伊藤决定出游欧美，以回避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但是，政友会的干部们却以为，即使如此，作为党首的伊藤此时脱离政局，对党务和党势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政友会干事长原敬为“考虑将来如何对策”而从京都返回东京，同政友会干部冈崎邦辅等商议后，内定在伊藤出游期间由西园寺公望任副总裁总理党务。两天后，又同松田正久、大冈育造等总务委员在政友会本部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首先应阻止伊藤外游，若不成则推举西园寺为副总裁，并指名总务委员长，讨论对马上要召开的第16届议会的方针。会后，原敬和松田急赴大矶会晤伊藤。伊藤除执意出国外，其他诸事一应同意总务会议的决定，指名松田为总务长，又提出请井上馨秘密协助政友会诸事务。1901年10月12日，伊藤出席庆贺政友会成立1周年纪念会、宣布以上决定后就出国了。

伊藤出国之举将其不再适合担当政友会总裁之事暴露无遗。而原敬则在领导政友会反对桂内阁地租增税案和寻觅倒阁时机的运动中逐渐提高着在政友会中的地位和人望。他与松田正久成为西园寺之下政友会的实权人物。因此，当伊藤内阁辞职后“二流内阁”出现、政权由元勋向第二代官僚转移的同时，伊藤回避性出国在政友会中留下的权力空白，也为纯粹的政党人士掌握政友会的领导权提供了机会。在第16届国会召开之际，政友会在300个议席中占有159席，而执政的三四俱乐部和帝国党加起来不过39席。原敬将伊藤出国视作倒阁夺权的好时机，与松田和尾崎行雄等决定在清朝辛丑赔款处置问题上，同桂内阁正面冲突。政友会认为清朝的赔款应作为特别会计，用于整顿财政、刷新行政。而政府为摆脱财政困难、扩充战备，打算将其列入一般会计内。为了稳操胜券，原敬和松田曾考虑同宪政本党犬养毅等提携。曾大力协助伊藤建党但后来又醉心于花草养植的伊东，这时再度活跃起来，及时地将政友会内部各派的主张通告正在俄国的伊藤。伊东的目的是想把国家元老伊藤从政友会原敬等人手里夺回来，削弱政友会。伊藤在收到伊东的信后，给井上拍了一份电报。井上接到电报后马上约见原敬，原敬读了电文后生气地反问井上：“根据这份电报，岂不是要让我知道巩固现任内阁使之永续不倒吗！”翌日，原敬将电文告诉松田，松田立即反应说：“若把这份电文泄露出去，没有办法，会酿出纷扰，所以请告诉井上要严守秘密。”但是，桂太郎访问井上时，就知道了电文的大致内容。另外，政友会议员田健治郎也知道了电文内容。但原敬等人依然引导政友会全会作出了将清朝赔款列作特别会计的决议。

井上为了调停内阁与议会的冲突，又将伊藤从柏林发回的电报转给原

《原敬日记》，第2卷，第417页。

《原敬日记》，第2卷，第418页。

敬。伊藤明确表示将清朝赔款列入一般会计。这时，内阁阁员芳川显正、警视总监大浦兼武等通过冈崎邦辅、武市彰一等政友会干事向原敬探问妥协，山本权兵卫海相也向松田表示政府方面有协商的愿望，遂使政友会决定谈判。当桂太郎、山本同松田、尾崎的谈判破裂、原敬召集全党大会就是否还要继续同政府交涉表决时，64票赞成继续谈判，67票反对谈判。这样，围绕伊藤的电文，政友会内部分成了软硬两派。

硬派以红叶馆为据点，软派以滨之屋为据点。伊东乘机向软派运动，桂太郎也使出收买手段，分裂政友会，软派的力量逐渐强大。在这种形势下，原敬为了阻止分裂，决定向软派和政府妥协。事态平息后，他又马上将软派的头目田健治郎、井上角五郎开除出政友会。清理了“门户”。1902年2月底，伊藤外游归来。他不知道自己的两份电报在党内引发了几近分裂的危险，而在党内分裂与避免分裂的派系纠葛中，他却又置身局外。这只能表明伊藤对政友会的控制力减弱了。

在摆平了政友会内部的分歧之后，原敬又在地租增税以充扩张海军军费问题上再同内阁纠缠。在1902年8月10日根据新选举法实施的大选中，政友会在376个议席中一举夺得191席。原敬本人不仅当选议员，而且出任众议院预算委员长。他在同党内人士的磋商中一致认为，地租不能再增税，理由是日英同盟既已结成则海军不必再扩大军备。并决心即使议会将解散，也要否决增税案。

然而，桂太郎却并不慌张。不仅他自己采访已经归国的伊藤，伊东也屡屡向伊藤进言。两人态度恭谦，语气亲切，逼伊藤表态。政友会方面因为有过上一次教训，原敬、松田也屡次访问伊藤，坚持向伊藤说明反对增税的理由。对于来自对立双方的“工作”，伊藤一直未作明确答复。这种态度使内阁感到希望，使政友会感到担忧。桂太郎窥知伊藤内心已倾向于政府，但因为担心“已不能驾驭政友会的党人原”才一直保持沉默。桂太郎将原敬称作“政友会之院内总理”，清楚地意识到，原敬在政友会内部如日中天的地位，是伊藤一直缄口不言的重要原因。而原敬则将伊藤的“缺乏战斗力的优柔寡断”归究于想第5次组阁的权力欲在作祟。

在三方面僵持的状态中，1903年4月，俄国在第二期撤兵期至时不仅不撤兵却反而逼清朝签订关于满洲权益的条约，刺激了日本朝野。桂太郎、伊东和山县，从不同方面或向伊藤咨询对策，或向伊藤施加压力。最后，伊藤在同桂首相的会谈中表示，如果扩充海军不以地租增税为财源的话，政友会可以承认并支持地租增税案。伊藤单独以政友会名义同桂太郎的妥协，引起了政友会内部的地震。从1903年5月起，有一半政友会成员宣布脱党，议员也从193人锐减至170人。大量政友会成员宣布脱党，应当视作是对伊藤为首的政友会干部的抗议。而导致大批党员脱党进而造成政友会势力衰退的罪魁祸首当然就是伊藤博文。7月，由于山县有朋和伊东、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和内大臣田中光显等人的活动，一份让伊藤就任枢密院议长的诏书自天而降。官僚方面认为这不仅等于给了伊藤一个体面的台阶，而且也是将他拉回元老阵列促其反省的好机会。但对于政友会方面来说，与其说失去了一个元老总裁，不如说迎来了一个再打开局面的契机。7月12日，伊藤辞去总裁就

伊东已代治：《翠雨杜日记》，卷五，9月15日。

德富苏峰：《公爵山具有朋传》，下卷，1933年，第532页。

任枢密院议长。7月14日，政友会推荐西园寺为继任总裁。对于这一变化，已经将政友会大权总揽手中的“院内总理”原敬，至少是不会反对的。

桂园体制

当1903年12月第19届国会召开之前，政友会和宪政本党这对冤家都在考虑为了攻击政府有必要在议会再度联手。这时，日俄之间的战争危机已经越来越迫近，桂太郎便借众议院院长河野广中弹劾上奏问题一举解散议会。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爆发，全国各地都卷入战胜祈愿之中，议会形势也为之一变。政友会和宪政本党在20届议会时共同地与政府达成妥协，通过了预算。原敬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协定在议会通过不仅最为便当，而且也开始显示出政党效用之微妙。”在议会召开之前，是原敬同井上、伊藤、西园寺密议后，一手促成了政府同两党的和解。

在当年底召开第21届议会之前，依照前约三方再度协商妥协。宪政本党提出的预算削减额是政友会的3倍。政府觉得，如果一定要同两党中的一党妥协的话，那么，同政友会一方协商似乎更有利，便通过政友会总务委员大冈育造，向原敬透话要求接近。西园寺、原敬和松田认为，这可能是桂太郎为应付战争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策略，便通过伊藤了解桂太郎的真意，得知桂太郎真的决心长期信赖政友会并希望直接面谈。于是，原代表政友会访问桂邸，同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敞开胸襟的密谈”。根据当日（1904年12月8日）原敬日记记录，这次密约达成的意向性协约对日后日本政局的走势进行了超乎寻常的规定。其内容为：桂内阁决心将政友会作为长期合作的政治伙伴；政友会认为双方政见须大致相同，共同担当政事；桂太郎许诺战争期间无意辞职，战后若辞职则将内阁转让给西园寺公望。

1905年4月16日，原敬再度同桂密谈。桂表示战争应早日结束，所以不可能对媾和条件寄予太高期望。如果“国民不能满足媾和条件，故已决心牺牲自己一身……举荐西园寺”。当年8月14日，就政权让渡问题，原敬第三次密约桂太郎。桂表示，“让渡西园寺的意见丝毫未变”，可根据西园寺的意思随时准备辞职。原敬则表示，“不与进步党联合，与诸君等共同提携”，保证不称政党内阁，不搞黑幕政治，不同宪政本党（即进步党）联手。

在伊藤博文组建政友会之前，日本政局是四种力量相峙。伊藤系官僚、山县系官僚、宪政党和宪政本党（即自由党和进步党）。政友会成立后（虽然后来伊藤又退出政友会，但仅是他本人单独退出，其势力或被政友会吸引，或退出政治舞台不再拥有政治发言力），四角对峙便成了三角鼎立。以被俗称为山县阀的包括军部、贵族院、官僚为一方，以政友会为一方，以宪政本党为一方。其他中小团体党派尚无力割据一隅以求一逞。1905年12月，在众议院379个议席中，政友会占139席，宪政本党占96席。在原敬与桂太郎频繁接触的同时，宪政本党也在同政友会协商，打算在日俄战争之后再建联合内阁。政友会一边同宪政本党协商，原敬一边同桂太郎磋商，终于达成了政权私下授受转让的契约。原敬在1905年9月17日的日记中记道：“政界今日之情况，有进步党、政友会和藩阀三方。改进两党皆不能以各自之独力维持内阁，而藩阀此后亦不能将其他两势力置之度外而从事政事。但此三分子之中若二分子联合，则天下事易为。故政友会与现当局派提携执掌政权，理应为国家前途作大贡献。”

三分之中二分的联合，便可执掌政权。原敬经过冷酷的计算，毅然将同为政党的宪政本党摒弃在政权之外，同政党的“敌人”山县阁携手。在桂太郎辞职之前，本应由元老举荐天皇敕许的后续首相人选，便已经决定下来。宪政本党想同政友会再建联合内阁的行动当然也只好停止了。这样，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到1912年底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总辞职的7年间，或者从第一届桂太郎内阁成立的1901年起计算的11年间，是世界政治史中最独特而有趣的“桂园体制”主宰日本政治的时代。内阁总理大臣总是在山县阁的第二掌门桂太郎同政友会第二任总裁西园寺公望之间交替转让。当桂组阁时，政友会自然就成了桂内阁的参与党，当西园寺组阁时，政友党就兼有执政党和参与党的双重身分。而宪政本党则陷入无力过问政权的苦境之中。

从第一届西园寺内阁的组成来看，除西园寺、原敬和松田是从政友会入阁的之外，其余皆为官僚或由官僚举荐。所以，第一届西园寺内阁同西园寺本人的身分相似，半政党半官僚性质很强。原敬出任内相，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政友会中的地位。两派联合压住剩下的另一派，官僚实现了期望的政治“安定”，政友会将同官僚的联合作为党势发展的一大成果，也满足于这种“安定”。

政友会又一次达到了组阁这样的大发展，西园寺内阁一成立，就又打出“积极政策”的旗帜。这些积极政策包括：铁道国有化，炼铁厂扩充计划，电信电话扩大计划，河川港湾改善计划，奖励产业以及扩充教育等事业费，1907年的预算竟达到了6.1亿日元。这个预算案虽然遭到一些小团体所属议员的反对，但宪政本党的领袖之一大石正巳却认为，若反对这些政策，“相反会失去国民的同情，以至于会以社会的实力集团为敌”，支持政友会通过了预算。为此，宪政本党内部分裂成“民党派”和“改革派”，大隈重信为首的“民党派”处于少数地位，大隈被迫辞去了总裁职位。之后，在宪政本党内形成了革新派（右派）大石正巳和非革新派（左派）犬养毅的对立。

由于这些“积极政策”为资产阶级和各地地区带来了实际利益，因而充实了政友会的社会基础。即使在宪政本党的地盘东北地区，由于铁道的建设、高等教育机关的设立和水利建设，支持政友会的人显著地增加。这正是自始至终坚持“积极政策”的原敬所期待的。在第10次全国大选中，政友会的议席数达到187席，而宪政本党的议席却减少到70席。政友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但是，反对政友会的力量也在积聚之中。首先是铁道国有计划所招致的反对。因为要国有就要由政府出资收买私铁。当时有两大私铁，山阳铁道的大股东是三井，九州铁道的大股东是三菱。政府的收买计划自然也将这两条最长的私铁包括在内。三井和三菱当然反对，伊藤、井上和山县也支持反对论。尤其是外相加藤高明，入阁不到两个月，便因反对积极政策而辞职，造成内阁危机，西园寺只好自己兼任藏相。西园寺和原敬费尽周折终于使铁道国有法在众、贵两院通过，但承受了反对党议员总退场的压力。原敬在1906年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关于其方法有许多说法，但我赞成其主义。……加藤外相固执地反对，近来他精神不振，很神经质，但反对该法案并不仅因为身体，原因无非是三菱一派也反对，就不好办了。”

刚度过铁道法危机，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影响生丝出口，西园寺的积极政策再度受到考验。大藏省断然新设酒税、砂糖消费税和石油消费税，以图通过增税来度过财政困难。此举令因经济危机而期待减税的中小企业主大失

所望，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商业会议联合会的率领下，全国展开了反对增税和废除盐专卖税、通行税和织物消费税所谓“三恶税”运动。

对这些中小业主的呼声，河野广中、岛田三郎等急进的自由主义者政党犹兴会首起响应，1907年12月组织了议员、实业家、新闻记者等100人的反增税有志者恳亲会。田添铁二等议会社会主义者也向工人们宣传反对增税和要求普选。在宪政本党内部，自大隈辞职后一直处于少数派的犬养毅非改革派也重新回归党内领导地位。1908年2月14日，宪政本党的党报号外刊登了《警告》一文，全面批判了西园寺内阁的“积极政策”。在野的反对党在增税问题上虽然没有使政友会处于绝对被动地位，但刚同政友会结成政治盟友关系的山县军阀官僚们，也明显地表现出对西园寺内阁的不满。

在第10次议会中大获全胜的政友会，在没有同桂太郎商议的情形下，就对内阁实行“改造”，松田正久被任命为藏相，贵族院木曜会的千家尊福被起用为法相，同是木曜会的崛田正养被起用为邮递相。这引起了官僚派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政友会有意识地向贵族院渗透势力。于是，便同宪政本党以及反对增税的财界联手，想以新的三者联盟取代桂一园体制。元老和财界见政友会虽能赢得大选，却不能克服经济不景气，便以“健全财政”为理由，逼迫西园寺内阁下台。

原敬在1908年5月19日的日记中担心山县和桂太郎会利用“经济界的不景气颠覆内阁”。6月2日，桂太郎给同情政友会的井上馨写信道：“西园寺内阁一向无视殿下的财政紧缩政策论，而您为什么还要支持这个内阁呢？”6月20日，他又给前政友会总裁伊藤博文写信：“仅仅乐观地等待，经济不景气也可能自然地恢复。但毕竟还是相信怎样按照人意使之变化。”这等于明白地告诉伊藤和井上，自己还有再掌内阁的想法。

西园寺内阁的铁道国有化计划，是依靠募集5亿元内外债务来支撑的，由于财政软弱，偿还能力疲惫，所以必然导致公债价格低落，进而导致用以支付公债的铁道债券也不值钱。金融界要求政府用政策来维持铁道公债的价格，但西园寺内阁的财力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也造成了金融界倒西园寺内阁、复活桂太郎内阁的原因。

在官僚、财界、产业界、宪政本党和其他各种色彩的政党有意识地夹击或无意识地参与夹击情况下，西园寺内阁于1908年7月宣布辞职，桂太郎第二届内阁成立。这一届内阁的阁僚无一人出身政党。

第二届桂内阁在施政方针上提出了一些针对西园寺内阁的政策，这些政策全部包含在桂太郎上奏天皇的“12条政纲”之中。第2条内容为恢复关税自主权；第3条为铁道宽轨化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1条，即抑制政友会势力，强调中立主义。政纲写道：“不据党派之异同草率地或合或拒……假若忘却国家之公以私为党，以至趁机假借势力施加压迫，纵令数回解散，亦敢不辞而为之。”这就是被当时议会诸势力视作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宣言。在已经同西园寺、原敬达成密约的前提下，桂太郎第二次上任便打出“一视同仁”的旗帜，不仅威胁了政友会的势力，而且促成了非政友会系诸党的合并。1910年3月13日，以宪政本党为中心，加上戊申俱乐部、大同俱乐部等，成立了“立宪国民党”，对政友会一党支配议会的局面形成强大的压力。

对此，政友会的反击也颇具力量。1909年2月号《政友》载文反驳道，“一视同仁的结果无非就是‘百方皆敌’”，告诫在立宪政体下万万不可以此为施政方针。在立宪国民党的反击下，政友会仍然维持住议会第一大党和多数派的地位，发出这样的警告亦是有力的。在1909年3月第25届国会召开之际，政友会依然沉着地保持住参与党的态度，使议会诸事平安终了。原敬在会议闭幕的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政友会用力量使桂内阁“了解到若不依靠政党则会一事无成”。当然，这时宪政本党内部又爆发了改革派和非改革派的正面冲突，犬养毅斥大石等“为谋接近桂一派而无条件出卖我党”，主观上也为政友会向桂内阁反击、度过桂园体制的危机创造了条件。

最后促成两派重修旧好的是偶然发生的农村地主和自耕农要求减轻地租运动。对于地租减轻运动，宪政本党认为应迎合之并趁机在农村扩大地盘，所以发表了减轻地租宣言。而原敬则毅然决定对此运动保持沉默，并不惜同松田正久决裂。桂在这种形势下，只有选择接近原敬并在他的支持下尽量压低地租减少率。从1910年初起，两人又频繁地秘密接触，冰释“前嫌”。尤其是在第27届议会上，政友会支持桂内阁通过了海军扩张案，加强了桂内阁的对政友会的依赖度。1911年1月29日，桂首相在众议院精养轩招待全体政友会议员，并发表了如下演说：

以贵党稳健之政见，贡献于国家，余辈素有认识，又常多恃其协力。今虽朝野所处有异，然于为国家所执施設及方针早已同出一辙。以情投意合协同一致收获宪政之美果，此岂止余辈之切望，贵党之见亦不出其外，乃深信不疑也。

对此，西园寺总裁在答辞中回答：“阁下与政友会情投意合，如此协同一致共收宪政有终之美果，亦是余统率政友会之志望也。”这种“情投意合”的宣言，被人们理解成是官僚和政友会欲永久地掌握政权的宣言。

官僚和政友会都从理性的冷酷计算出发，达成了感性的“情投意合”。经过第一届西园寺内阁和第二届桂太郎内阁，两人之间保持政治契约关系，就能把第三派力量排斥在政权之外，轮流坐庄，利益分享，维持政治安定，这已反复得到验证。这种关系所形成的体制，相对于元老藩阀政治来说，由于政党人士频繁入阁组阁，且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日益增大，当然是日本近代政治的进步。但这种体制的建立，是依赖于官僚和一个政党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经过冷酷的交易达成心照不宣的妥协，且各自又每时每刻在提防对方翻悔，当然又是极其不正常的。更有甚者，两者以各自所拥有的“力”，无情而且蛮横地将拥有正常宪法保护权力的第三党排除在外，把宪法对公民权力的保护变成了纯粹的利用，把理应公开进行的政治竞争和政权更迭变成了秘密交易和私下授受，这就绝对地偏远了“宪政有终之美”。政友会治政的经验——掌握议会多数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日本政治的发展，都起到了长久的影响。

在这种情投意合的合作关系下，政友会自然可以从容不迫地积聚并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一点，桂太郎的“私人部队”中央俱乐部的议员们看得很清楚。在发表“情投意合”宣言的当日晚上，桂太郎在自己的私邸招待这些议员。但招待会会场的秩序极其混乱，大家异口同声批评桂：“这次结果招致

政友会力量更加膨胀，其跋扈之弊，其不周到，难以弥救。”

1911年8月，桂太郎又将政权交还给西园寺。其他政治势力再拼命也不免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苦。政治的进步性被这种情投意合封闭的感觉，充斥于政党人士、知识分子和城市青年的心中。在第一届西园寺内阁时期发生的“红旗事件”和第二届桂内阁时期发生的“大逆事件”，都是这一体制在“宪政”之下的专制或不民主的表征。农民运动和工潮，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以及前述都市个人主义的兴起，是对这种体制的两种不同角度的批判和反抗。

大正政变

由“情投意合”开辟的政治格局，典型而形象地说明着“桂园体制”欲揽天下于“一统”的特点。在国家政策的制定方面，由于实现了众议院制霸，有政党与无政党，有议会与无议会，实在没有什么差别。这种状态就把这一体制的直接“缔造者”桂太郎和原敬推上了权力的顶峰。当时的情形是，原敬位于首相西园寺之下任内相，桂太郎自然也无法僭越山县有朋，但两人一人在内阁内，一人在内阁外，对内阁施政拥有绝大的发言权。陆军中将上原勇作将这种形势喻作：“不管是由井正雪还是大盐平八郎，皆屏息鼠迹而不知所措。”

上原勇作的这句话反映出陆军的反感与不安。陆军主流派领袖田中义一和少数派领袖上原都担心桂太郎这样地“迁就”原敬，是否会对军队产生不利影响。1911年2月18日，田中义一、海军次官财部彪和上原阔的主要人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在宇都宫家密议，讨论桂太郎此时将陆海军的发展置于何等地位。

尽管3人都各怀心事，但共同的前提毕竟是陆军和海军的扩军计划能否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因此，将桂太郎视作正在向政党靠拢的军部，从这时起更加密切地注视着桂、园两人合作的一举一动。

“情投意合”对桂太郎的“私人部队”中央俱乐部的冲击亦是强烈的。桂太郎只好再三向手下表白与政友会的联合不附带任何“条件”，竭力安抚心中忿懑的俱乐部成员。

惟有在野党国民党（宪政本党变名）的犬养毅对此表示欢迎态度。在此前，犬养毅曾频繁地与原敬等接触，欲实行两党联合，再建联合内阁。而右派大石等则努力同桂太郎接触，要求提携。

“情投意合”后，犬养毅固然打消了联合内阁的构想，但同时也等于宣告大石要求与桂合作的想法被拒绝。这样，犬养毅担心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暂时缓解了，他把“桂园体制”视作政党发展途中的必由阶段，因此莫不如说对“桂园体制”是欢迎的。

这样，各有所思的各种势力对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态度，基本上表现出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与其反对不如先顺应政权的授受交替，并向这届内阁楔入本方力量。宇都宫太郎通过原敬和寺内正毅，很快实现了由上原勇作取代石本新六出任陆相。另一种倾向是海军和陆军内部的萨摩系势力（代表

上原勇作文书研究会编：《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52页。由井正雪于1651年策划反对幕府计划未遂自杀。大盐平八郎1837年在大阪领导市民起义，失败自杀。

人是町田经字），当然还有国民党犬养毅等人，力图真正地确定西园寺内阁的地位。前者是想拉紧萨摩系势力同西园寺内阁的关系，支持海军发展，后者是想借西园寺内阁树立真正的政党内阁。海军次官财部彪，铁道院监督部长、鹿儿岛出身的山之内一次和前警视总监、鹿儿岛出身的安乐兼造，就想迫使对陆军扩军计划抵制不力的海相斋藤实下野，换上前海相山本权兵卫。并且还想进一步运动在政友会内同原敬地位相差无几的松田正久，实现西园寺和山本的“情投意合”关系。此举因斋藤抵抗而未遂。

正当陆军和海军热心地同西园寺内阁周旋时，西园寺内阁和政友会内部亦不是固若金汤的营垒。引起政友会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原敬个人威信和势力的又一次提高。自“积极政策”争论以后，松田正久对原敬积怒甚厚，为对抗原敬势力的急速扩大，松田主动地接近山本权兵卫，以图借助萨摩派最大的实力人物的力量，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力。

西园寺本人对原敬也抱有强烈的戒心。1911年6月8日在一次晤谈中，西园寺透露了“长期处在这个地位有些为难”的意思，原敬却回答说：“短时期内好不容易刚接手内阁，等内阁的后续者和政友会的后续者确定之后再离开内阁亦无妨。”这番话将西园寺对原敬的猜忌和原敬的确想让西园寺引退、自任政友会总裁、把“桂园体制”变成“桂原体制”的打算，清楚无疑地暴露了出来。所以，西园寺对松田谋划的自己同山本的联合，基本上是持默许态度的。

这样，在内阁外，实际出现了两派隐形的，松散的政治联盟关系：桂太郎、原敬、陆军和国民党的大石正己为一方；西园寺、松田、海军和国民党的犬养毅力另一方。当然，这种结盟关系并不是十分牢固的，因为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缺乏一种绝对的共同利益，而且任何一派中的任何一方同另一派的某一方又都有局部性共同利益存在。所以，对立自然是不明显的。但是，尽管如此，也必须这样认为：在1911年1月桂太郎与原敬宣布“情投意合”、“桂园体制”最终形成的同时，由于触发了多种矛盾的激化，这一体制离崩溃的日子也不远了。

对于势力遍及军部、枢密院、贵族院、官僚层、在政界拥有强大实力的山县有朋和桂太郎来说，明治天皇的死不啻一种严酷的警告。不管他们拥有几重身分、掌握多少层重叠的权力，他们都需要接受从天皇那里折射的光亮来加强权力的合理性。宪法第11条统帅权独立使军部直接同天皇联结在一起，宪法第56条将约束内阁的权力交给了枢密院。明治天皇的权威不仅源自建国神话，而且源自王政复古、废藩置县、西南战争、颁布宪法、修正条约、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政绩”的积累。但如果要向大正天皇寻求同等的威严和庇护，起码在短时期内是不太现实的。山县有朋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将要去欧洲视察的桂太郎火速从哈尔滨招回，让桂太郎任内大臣兼侍从长，企图将自己的直系送到新天皇侧近，来补充由于明治去世而可能失去皇权庇护的空白。

但是，山县和桂即陆军这样强行地控制皇宫的做法，引起了政友会和海军的反感。原敬和海军次官财部彪都在日记中记下了内心强烈的不快。这层矛盾不仅强化了上述的对立，而且使之更趋复杂化。所有纠缠在一起的矛盾与摩擦，终于在预算案问题上一举爆发出来。在国际收支状况极端糟糕、再增加税收恐怕要激怒民愤的状况下，前内阁仍然公开表示支持扩充海军，对陆军增设师团的要求也予以默认。内务省、邮递省、铁道院都提出庞大预算，

并摆出了一付不肯让步的姿态，主张紧缩政策的现任藏相山本达雄在无奈之中告急于元老松方正义，松方联络井上和大山严，向内阁正式提出了缩小财政规模的劝告。

一贯主张“积极政策”的内相原敬认为老人们多管闲事，“其论陈腐”。他在当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将老人们“当作讨论的对手毫无意义”，仍然坚持“积极政策”。但政友会内部的西园寺、松田，山本和萨摩系的文相长谷川纯孝等人在反对“积极政策”上形成了对原敬的包围，进而联合元老和海军的力量使原敬陷于孤立。山本藏相以三元老的劝告为后盾，正式提出延缓铁道扩建计划。

在内阁紧缩财政意见占上风的情况下，陆军和海军却为本方的扩军计划能在议会上通过而大造声势，陆军方面说，石本新六前陆相和奥保巩参谋总长在明治在世时就动用“帷幄上奏权”，为向新领地朝鲜施加压力威服民众，需要在朝鲜配置2个常设陆军师团。海军方面更不甘示弱，宣称前海相山本权兵卫在1911年7月11日拜谒明治时，已经从明治那里得到了“来年务必使海军充实案成为现实”的敕语。山本权兵卫同海相斋藤实会谈，决定支持制定否定陆军增设2个师团的预算案，若此举关系到本届内阁进退存亡时便向天皇奏，而若天皇挽留的话就请奏天皇下敕令更换陆相。山本又同西园寺首相会谈，鼓励西园寺“这回把腰板挺直干吧”。

陆军方面见原敬在政友会地位降低，海军同西园寺内阁频繁接近反对增设陆军师团，便决心在山县有朋和桂太郎支持下，在增设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计划在必要时推倒西园寺内阁，推举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为首相。其中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同国民党密谈，取得了国民党的支持许诺。这样，山本权兵卫同政友会的提携和寺内正毅同国民党的提携已经形成最大的对峙。他们决心在海军扩充还是陆军增设问题上一决雌雄，“情投意合”的桂园体制已面对行将崩溃的形势。参与党政友会内部尾崎行雄等亦在考虑另一种准备，即向反政友会的在野党呼吁“以大同团结，谋根绝官僚政治”。

1912年11月22日，陆军大臣上原勇作代表陆军强烈要求政府在预算案中编入增设2个师团的费用，开始正面向西园寺内阁施加压力。正在进行行政、财政整顿的西园寺内阁，对陆军的要求断然予以拒绝。另一方面却将行政财政整顿得到的3700万日元用于产业、减税和扩充海军方面。在内阁制定的预算案中，编入1000余万日元，作为海军3艘战舰的建造费。上原勇作认为西园寺内阁以海军压陆军，遂决心同西园寺力拼死活。12月1日，西园寺则怀着“即使得不到后任陆相以至于倒阁”的决心，要求上原勇作辞职。早有思想准备的上原，12月2日不向内阁而向天皇辞职。3日，西园寺访问山县，请求山县推荐后任陆相，但山县亦断然拒绝，以“陆军罢工”的方式来逼西园寺内阁垮台。4日，西园寺向全体阁僚表明辞意；5日，乃正式宣布内阁总辞职。天皇并没有像山本权兵卫预想的那样下诏挽留。6日，在讨论后续内阁的元老会议上，寺内正毅、松方正义、平田东助、山本权兵卫依次作为候选，但又相继被拒或被否。于是，山县决定以长州系势力为基底，推荐刚任内大臣和侍从长不久的桂太郎出任首相，收拾局面。12月17日，桂向天皇奏请组阁诏书，并奏请同时下达任命斋藤为海相的诏书。12月21日，“大命降下”，第三届桂太郎内阁成立。

从第三届桂太郎出台的方式看，由桂太郎同政友会西园寺、原敬之间私下授受的方式被放弃，继任首相的遴选再一次回到元老推荐，天皇下诏这一

方式上去。从内阁的组成人员上看，警察官僚大浦兼武任内相，三菱女婿加藤高明任外相，殖民地官僚后藤新平为递信相和铁道院总裁，出任藏相的若槻礼次郎当时正是桂的直系。这样，桂太即便将政党人士完全排除在阁外。最后，从第三次组阁的桂太郎组建立宪同志会的活动来看，亦证明桂本人完全断绝了同政友会再度修好的念头。据若槻礼次郎回忆，桂太郎在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时出访欧洲的目的，就是想充分调查国外政党的各类情况，回国后组织自己的政党。任内大臣之后当然便不能再考虑建党。所以，当他从宫中再度返身政界后，立即着手组建立宪同志会。他以国民党的大石派和中央俱乐部为基底，并吸收非政友会派各党派，共同发起者有大浦兼武、后藤新平、大石正巳、河野广中、武富时敏、岛田三郎、箕浦胜人、仙石贡等人，共同创立了以政友会为对手的新党。这样，通过桂太郎和西园寺代表各自政治势力实行妥协维持政治“安定”的三分之二联合即桂园体制，彻底地寿终正寝了。这一体制从桂太郎第一届内阁起至第三届桂太郎内阁成立日止，其中还经过二届西园寺内阁和第二届桂太郎内阁，共 11 年，正好于改元大正的 1912 年时宣告崩溃，所以被称作“大正政变”。

桂太郎一建立立宪同志会，便最终撕毁了三分之二联合。政党的政治权力完全被置于无视其存在的地位。连一直希望稳妥对策的松田正久，此时也不能忍受胸中的愤怒，投身于反对桂内阁的宪政运动之中。此前，当元老会议还在小田原讨论后续首相人选时，以尾崎行雄为首的政友会左翼势力，连同以犬养毅为首的国民党左翼势力，在筑地的精养轩召集了拥护宪政大会。在激进的政党人士看来，政党势力完全被摒弃于政局之外，是破坏宪政无视宪法的行为。从犬养毅一贯的主张来看，这一结果似乎又是他早就有所预测的，一旦桂体制破裂，便是拥护宪政的大好时机的来临。会议很快就决定了护宪运动的三大口号：打破阀族政治、发扬政党主义、拥护宪政，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在歌舞伎町于 12 月 19 日召开。政友会和国民党两党的议员、新闻记者、实业家和学生共 3000 人出席了大会。福泽谕吉创设的交询社的成员们推举尾崎和犬养为运动领袖，以本社为护宪运动的本部，发表“阀族的横暴跋扈已达极点，宪政危机迫在眉睫，我们断然排除妥协，根除阀族政治”的宣言。

从 12 月 27 日第 30 届议会召开，一直到翌年 1 月 20 日休会期间，护宪派分赴各地宣传民众，使全国各地连续召开拥护宪政的大会。整个运动已充分准备在桂内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时同藩阀和军部大干一场。国民党这时也完成了分裂。2 月 5 日，议会刚复会，政友、国民两党议员就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桂再次下令休会 5 天。2 月 8 日，桂要求会见西园寺，请西园寺撤回不信任案。西园寺予以拒绝。9 日，天皇召见西园寺，下达协助解决议会纠纷敕语。西园寺开始动摇，但尾崎和犬养认为这是桂太郎的阴谋，不能服从敕语。10 日早晨，传出山本权兵卫劝告桂太郎辞职的消息，山本接着访问了政友会本部。这时，政友会和犬养毅等已经看到了赢得这场斗争的希望。

10 日，议会休会期已到，只好再度开会。愤怒的民众包围议会，高呼护宪和反对藩族的口号。会场内外，对桂内阁形成了巨大的综合压力。此时，护宪运动已经脱离了政友会人士所能控制的范围，民众久等不见桂内阁倒

[日]若槻礼次郎：《古风庵回顾录》，讲谈社文库 1990 年版，第 180 页。

台，便开始掀起暴动，发泄长期以来郁积的气愤。政府系统的报社一律遭到民众的袭击。在东京爆发的骚动，立即波及到关西各城市。大阪的骚动索性以桂太郎立宪同志会议员的私宅为袭击目标。神户、广岛、京都、姬路等相继爆发民众动乱。

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桂太郎失去了解散议会再战的斗志和勇气。原敬认为，“如果仍然不辞职，将会引起革命性骚动”。2月11日，桂太郎在全国一片唾骂声中，被迫宣布内阁总辞职。不久，桂太郎因得脑血栓死去。

为决定继任首相人选，又召开元老会议。初次以元老身分出席会议的西园寺推荐山本权兵卫为首相获得认可。山本以政友会推荐阁僚与支援为条件接受组阁。仍在激情中的政友会党员们认为，以萨阀代替长阀没有什么两样，仍然反对。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稳健姿态的原敬，再度活跃起来。原敬对党员说，坚决反对则可能倒退到官僚内阁去。原敬约定山本权兵卫以政友会的主张为施政方针，阁员除首、外、陆、海四相外，余者或者由政友会推选，或者以加入政友会为条件。原敬想说服山本让犬养入阁，但遭拒绝。这样，一个以政友会与官僚混合而成的、以政友会为参与党的官僚政党混合内阁诞生了。在山本内阁的出台过程中可以看到，若没有原敬极力将政友会从激进主义立场拉回到现实主义路线上来，大正护宪运动将如何收场实难预料。由此，犬养毅斥原敬的做法为“变节行为”，宣布对山本内阁采取中立态度，亦和政友会断绝了2个多月的联手关系。而在政友会内部，尾崎行雄和冈崎邦辅因不满意原敬的妥协，退出了政友会，成立了政友俱乐部。

在政友会再次成为内阁参与党、即所谓“变节”和妥协过程中，原敬本人也从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后期的孤立和消沉的状态中脱出，再度登临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中心圈内。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再一次获得确认。1914年6月18日，身为元老的西园寺退出政友会，推荐原敬出任政友会总裁。这样，一贯以民间政党人士活跃的原敬，历尽宦海的种种坎坷和考验，终于抵达了政治生涯之中最光彩的顶峰，成为战前日本最大的政党的掌舵人，亦是最早以平民身分出任政党总裁的政党人士之一。

比起日比谷骚动起来，1912年末开始到1913年初的大正护宪运动，以其鲜明的捍卫宪法、打击军部和阀族的政治性格，表现了不同凡响的政治斗争水平。它结束了官僚、军部与政党相互媾和的政治体制阶段，开始了基本由官僚主动寻求妥协、而政友会和立宪同志会及其他政党都有机会问鼎入阁机会的政治制度新过渡阶段，而这种形式是继官僚政治——1900年体制——桂一园体制之后，继续向政党政治过渡的重要一步。

在护宪运动中，广大城市中间阶层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成为左右胜负的决定性力量。犬养毅和尾崎行雄当之无愧地成为彻底护宪派的领袖。这派力量和运动并未因政友会的妥协而终止，相反，以更为深髓的思想为武器，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承担者。

而政友会的实力——众议院过半数议员以及遍及地方的各级组织，在斗争中为实践所认可。政友会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实力证明，从第三届平民总裁诞生日起，它越来越具有掌握政权的能力。原敬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冷酷清晰的计算能力，亦成为政友会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大正护宪运动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近代日本政党，尤其是拥有左右政局能力的大政党，包括立宪同志会在内，虽然都是元老或元老级的人物创立的，但它一旦进入政治生活，因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就逐渐地脱离开创立

者的创建初衷，不断地具备起作为民间政党的特点。这是不以藩阀官僚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亦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明治宪法的客观的社会作用。

在时代转换之际发生的大正护宪运动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民众向往新政治的理想和热情，亦迫使官僚阀族们认识到，他们要想像过去那样控制表层政治机构——即内阁和议会，越来越困难了。他们在内心不得不承认自身政治力软弱的同时，就更加注重对宫中权力的控制。近代日本的内层政治机构——枢密院、贵族院、军部和内大臣、侍从长的所谓“辅弼”作用，也越来越直接地面对社会民众运动的强大压力。

平民宰相

大战景气下通货膨胀引起物价普遍上涨，全国总人口尤其是工商业发展造成都市人口增长，酿酒原料需求量的扩大，寄生地主制下大米生产的停滞，凡此种原因，造成从1918年春起日本全国米价直线上涨，普通民众叫苦不迭。以东京米价为例，1917年1石为20日元52钱，1918年4月为32日元98钱，6月为34日元20钱。投机者见米价扶摇直上，便乘机兴风作浪，地主有米不售，米商屯积居奇，尤令民众切齿。8月份宣布出兵西伯利亚之后，米价更以一天1日元、2日元的速度上涨。8月5日为40日元，7日为47日无，8日为49日元，9日为53日元。狂乱的米价，使都市人民面对饥谨的危险，空气中飘荡着一种令人发怵的不安气息。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18年7月22日早晨，在富山县下新川郡鱼津町村，几个渔家妇女朝停泊在渔港内满载大米的汽船前聚拢。“从春天起就抓不到鱼，但米价却不知顶棚在哪里似地一个劲往上冒！”“米价为什么这样涨法？”七嘴八舌之间，其中一个渔妇指着停泊在港内的汽船喊：“那不是么？”大家朝手指方向望去，不由地大声喊着说：“今天装这么多的米，明天好像还要装，明天不让他们把米运出去不行吗？”翌日，46名主妇自发地向海岸边聚集，但被警察赶走了。

根据近年来富山县地方史研究者研究的结论，阻止当地投机者在警察保护下将米转运别地去牟利的民众运动，最早是7月上旬从东水桥町开始的，此后是鱼津町村和西水桥町、滑川町等地。8月3日，这些地方的数百名农妇自发地团结起来，挤到米商店门前，要求停止转运并廉价出售大米。当她们的要求被拒绝后，便自发地掀起抢米风潮。第二天全国各报都以“越中女房一揆”（妇女暴动）为题报道了这个消息。报纸据实报道本是一种新闻责任，但所起到的作用等于将富山县的火种点燃了全国这堆干柴。8月8日冈山、和歌山、高松市，8月10日京都和名古屋，11日大坂、神户，13日以东京为代表，关东各地和九州以及近畿、东海、四国、中国，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米骚动”。政府甚至出动军队也不能轻易平息民众的愤怒。抢米风潮还引发了矿工暴动和农村混乱。自发而起的群众暴动一直断断续续、此起彼伏地延续了2个多月才告平息。

米骚动的直接后果，是与大正民本主义结合起来，埋葬了实行严厉言论控制的军阀寺内正毅内阁。在社会各界追究内阁责任的一片谴责声中，寺内正毅只有选择辞职一条路。

在寺内辞职之前，原敬就预料到政局的变动行将发生。7月23日，他对好友内田康哉讲：“余感到现内阁倒台已几成定局，彼等若无自觉，遂不免

被枪毙。故两党最应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彼等倒台推举后继内阁之际，两党应公然提携，防止官僚内阁再现。”而此时寺内并非没有辞意，只是因为山县有朋挽留，又感到“强压维持现状，与屈节而倚政党，皆非万全之策。”所以，一直拖到9月21日才正式辞职。在寺内辞职之前，山县的确在考虑后继首相人选，平田、伊东、清浦等人相继被他否决之后，才开始考虑原敬。但寺内辞职后先被授命首相的却是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力荐原敬并同山县和松方两元老进行磋商。27日，原敬终于受命出任首相组建内阁。29日，原敬内阁成立，除外、陆、海相外，其余皆为政友会成员。

由政党总裁任首相，大部分阁僚又都是政党成员，这样的内阁并非前所未有。但是大隈、伊藤、西园寺任首相时，其身分除了政党总裁之外，同时还拥有标志着特殊权力的身分爵位。爵位不仅仅只是一种荣誉，而且还是一种宠幸。它使爵位持有者同皇室权力之间保持着若明若暗耐人寻味的关系。在政治势力的划分时，也将西园寺最终归并到官僚集团那一派去。原敬以政党人身分做总裁，又以政党总裁的资格担任首相，确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平民宰相”这一俗称，戏剧而又醒目地强调了原敬不拥有爵位故而拥有“清白”平民身分这一特点。所以，尽管原敬内阁的出台并不是靠坚决斗争才成功的，若不是“元老”们普遍感到已无更合适的人选却又必须有人担当此任，若缺少西园寺在最后关头说服山县、松方，特别是若没有遍及全国如火如荼的“米骚动”无意中开创的契机，原敬便没有问鼎内阁的可能。但一旦原敬内阁诞生，它在日本政治史上的地位便绝对地无可替代。自1890年国会召开以来，藩阀官僚同政党之间斗死斗活，藩阀内部与政党内部分解组合，为的就是这个官僚不让并尽量推迟而政党则力图早日实现的政党内阁，现在竟然这样不期而出生了。

在“平民宰相”一片欢呼声中，原敬开始了其内心酝酿了很多年的改革。原敬的手法是：利用民众的压力，逼元老、军部、贵族院、枢密院等特权机构让步；与特权势力妥协，来抵御民众的压力。在此过程中，寻求政友会党势扩张。为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原敬则将改善教育、整顿交通、充实国防、奖励产业作为四大政纲。这四大政纲不仅同一战以来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相适应，而且又想通过军备扩充和整顿产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刺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有这些政策，当然对扩大政友会党势用处颇大。

首先看高等学校的发展。此前全国一共只有8所高等学校(高中)，1919年新开新潟、松本、山口、松山4所，1920年再开水户、山形、佐贺、弘前、松江5所，1921年又开5所，高校一举增加到22所。与此同时，1919—1921年间又增设了23所专门学校。1918年12月公布的大学令，将庆应义塾、早稻田、明治、法政、中央、日本、国学院、同志社8所专门学校一举升格为8大私立大学。

原敬一贯主张的“积极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扩建铁道。1918年铁道总长度为15879公里，但到1922年时竟延长到20830公里。议员们拼命使铁道在自己的选区里修建，被称作“我田引铁”，使支持自己当选的地方势力享受铁道带来的方便和利益，显著地发挥了扩张党势的作用。

为了同军部协调关系，原内阁对军事预算的制定和政友会对预算案的审议，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1918年军事费用占全年财政支出的36

%，已经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了。但 1921 年共支出军本费高达 7.3 亿日元，占全年度财政总支出的 49%。这个纪录，一直到 1933 年时才被打破。

原敬还将文官任用范围扩大到殖民地长官。1914 年 4 月，关东都督府改作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在任用文官为关东厅长官的同时，认可关东军司令在维持关东州治安和保护南满铁路时，在必要情况下可使用武力出动军队。这样也就安抚了军部的不满。于是，在南满出现了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满铁社长和奉天总领事馆等四头政治统治机构。

从这些政策分析来看，原敬用实际利益调谐阀族军部和议会政党之间的对立关系，居然使近 30 年来一贯难以共处的冤家对头，一时间都处于基本满足的相安无事状态之中。原敬用他的政治手腕告诉双方，一旦军方和官僚彻底地放弃“超然主义”立场，给予政党以足够的、应有的筹金，那么预算案是可以商量的；政党方面也应懂得，在政治地位得到承认（尽管是不得已的）的前提下，在军费预算上作一些让步亦是必要的。安抚住军部的心情，是取得政党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另外，原敬在扩充教育和铁道建设方面的政策，也多少考虑到了广大中间阶层的利益，对提高政友会和内阁的威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原敬了不起。”山县有朋在仔细听了侧近对原敬内阁政策的介绍之后，禁不住让夸奖脱口而出。本来是苦干“米骚动”后社会动荡、惧怕难以收拾局面、不得已让原敬出马的山县，也不得不承认原敬的政治才能。当时因“色盲问题”而陷入困境的山县居然感叹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此前不知道原的态度，这次看他对议会的做法，原实在是一个出色的人物。像原这样的人只今恐怕已经没有了，……将来如果自己辞职成为一个平民的话，就想同原合起来干啦！”可以说，原之所以能这样充满信心和勇气果敢地推出一系列政策，是因他相信山县不会对他的政策加以干涉。在原的日记中，可以不费力地找到许多处他对山县的厌恶情绪的表露。在原敬看来，山县一贯以“勤王家”的忠心自居，但不过是想把私利私欲权力化而已。山县讨厌看到别人的成功，喜好动辄对政府横加干预。他将自己的侧近配置于宫内省和枢密院，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前途。但对山县的这类切齿之恨，原敬从来没有在行动中表现出来过。相反，若因一些政事处置必须同山县接触的话，原必亲访或通过适当的渠道将自己的态度有理有节地透露给山县，并听取山县的意见。原敬只是将对阀族的恨全部溶化在 20 多年苦心经营之中，他只想用行动的结果来对阀族进行反击。

促成原敬内阁时期山县和原两人台前台后“合作”的原因，共有三点。一是“米骚动”后山县对政局透彻分析后得到的无可奈何的结论；二是两人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者的过激言行的共同忧虑；三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对天皇殊途同归的忠诚。尤其是大正病势沉重后两人对设摄政一事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山县认识原敬的才能后对他的夸奖，则是山县单方面的观点。原敬内心对山县的评价则是始终贯一的。原特别警惕在野党宪政党力量的扩大，因而时常主动作出一些让步，山县亦是十分清楚。

在这样的关系背景下，再加上原本人同加藤友三郎私交密切，所以，当加藤海相出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时，约定由原敬首相代行海相事务。海军并无反感，陆军亦保持沉默。

“两院纵断”是原敬为确保政友会地位最根本的考虑。由于西园寺公望

元老推荐原敬任总裁后，党内“天敌”松田（原自由党派代表）又病逝，原敬在政友会的地位稳固多了。这样，在众议院保持住绝对多数，并向贵族院渗透力量，使贵族院亦成为政友会的地盘，潜移默化之中将宪法规定的贵族院对众议的羸弱悄悄消解，即“两院纵断”（控制两院）的想法，是原敬任首相后最高的策略考虑。因此，这种策略与原敬内阁相始终。

原敬设计的第一步是向第41届议会提出的小选举区制改革。内相床次竹二郎在向议会作说明时说：“大选举区制选举费用颇多。同一选举区内相互竞争对政治道德影响也很大，对政党的发展不利，即使是大选举区制，但各候选人纷纷私设选举区，这一事实也表明必须进行选举制度小选举区制改革。若采用小选举区制，无疑将巩固候补者的地盘，同时亦可促进选民的投票欲望和政治思想的发展。”理由堂堂正正，令人慑服。

与小选举区制改革同步进行，原内阁还提出了选举资格应从纳税10日元以上降低到3日元以上。投票的结果，小选举区制以205票对144票、纳税条件以203票对147票，通过内阁的原案。根据新选举法，议员人数增加到464名，选举区共374区。而选举权拥有者人数亦增加了几十万。扩大的选举权大都使政友会的基础——农村中的小地主受益。在1920年5月10日依据新选举法进行的大选中，政友会获得278席，对宪政会的110席占据绝对优势。政友会此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一直执众议院之牛耳。

原敬接着便开始推进对贵族院的工作，对象是贵族院内最大的会派，即由伯、子、男爵位者为主组成的研究会派。自桂太郎死后，研究会逐渐放弃了稳健中立原则，向积极参与是是非非方向转换。原敬任首相后，主动地同研究会的三岛弥太郎以及少壮派成员永野直、青木信光、前田利定、酒井忠亮、牧野忠笃等人会谈，坦陈政见，疏通分歧，联络感情。1919年4月19日，贵族院议长德川赖伦访问原敬，要求原让出自己兼任的法相位置，让研究会派的大木远吉出任。随后，原敬频繁地同研究会的中坚分子接触商议。5月15日，原敬成功地使大木入阁就任法相。同年12月6日，在贵族院拥有141议席最大的会派研究会，宣布了“支援原敬内阁”的决议。

这样，原敬的“两院纵断”谋略完全兑现，原敬对贵族院的改造工作也获得了成功。当研究会的干部会宣布支持宣言以后，原敬为自己梦寐以求的贵族院的政党化倾向已经清晰可见而感到欣慰。他对研究会的干部们说：“今后的政界，贵族和平民分离必将带来大害。贵族和平民共同维持稳健分子势力，对国家是有益的。”“两院纵断”是原敬有恃无恐地推进积极政策的坚强后盾。

1921年9月，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被朝日平吾刺死。从身为大陆浪人的朝日在给北一辉的遗书内容看，他完全接受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主张。11月，原敬为出席政友会近畿地区大会，从大家站乘电车去东京站，在入口处被一个年仅18岁的车站职工中冈良一用短刀直接刺中心脏，当时绝命死亡。中冈良一的动机至今未能查明，似乎是对政友会和宪政党在议会相互攻讦诸如“五个珍品”事件有关。朝日平吾舍身刺杀“奸富”安田善次郎的牺牲精神对他好像也是一种激励。学者们猜测中冈与右翼可能有所联系，但至今也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一代平民宰相，如此这般地被一个热血青年所葬送，使战前日本在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缺少了一个能对国内国际形势

[日]松山治郎：《近代日本政治史》，白桃书房1972年版，第135页。

作出冷静判断的政治领袖，其后果是不能简单估测的。

开创了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原敬内阁，对日本政治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原敬以平民身分任首相，使战前日本的行政权力的主体发生了积极变化，普通政党人士任内阁总理就不再是禁区。原敬领导的政友会在议会中拥有强大的力量，迫使首相人选由绝对地需要元老推荐的惯例，向元老象征性地推荐议会多数党领袖的做法（战争期不在此例）转变。原敬实现的贵族院众议院两院纵断战略，巧妙地削弱了专制对政党的压迫，使众议院多少代表民众利益发言的力度增强。更重要的是，长期被元老们用“超然主义”态度所蔑视的政党，如同被压在石板底下的竹笋，顽强地生长起来，以原敬内阁为标志，掀翻石板，挺起身躯。两者势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从一次大战结束后至1936年法西斯主义全面上台时止，正式形成了选举的（众议院与政党内阁）政府与不用选举的（元老、枢密院、军部）政府对峙的“双重政治结构”。

自然，只能在天皇制框架内活动的政党政治，其权力发生源依旧在天皇，所以，未能建立起责任内阁制，仍然是十分软弱的。政党的政治活动在一般场合下都落后于由知识分子推动的民主运动。在推动政治民主的主体两重性前提下，政党领袖只注重运用政治手腕和技巧取得组阁权，而民主运动的领袖只满足于纯粹精神思想方面的宣传，缺乏成为行使行政权力主体的主动欲望，是政党政治不够强大的重要原因。所以，尽管政党政治有所发展，政党上台执政，但在同军部的争夺中，只能让其收敛气焰，而不能让其伤筋动骨丧失权力。进步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原敬的死，对政友会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原敬之后，政友会就缺少一位能够将全党各派力量进行统合、对政友会的行动进行指导的领袖。其结果是，当日本政党政治发展到最高峰时，政友会却失去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

第 19 章

“成金日本”

“成金”风潮

国家通过投机或冒险一举成为“强国”，公司或企业追随和利用国家的政策可以分享一杯羹，成为巨富。按将棋规则，功能最弱的棋子步兵如果一旦冲入敌阵，即可取得护佑在王将左右的金将的战斗能力，将棋术语称之为“成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来，许多企业和个人都发了战争财，成了大富或小富，甚至根据职别不同出现了“铁成金”、“船成金”、“株成金”、“丝成金”等流行语。“成金”梦成为大正时期许多日本人的精神支柱。人们将一夜之间变成暴发户的现象喻作“成金”，多少带有一些轻蔑的意味。和田邦坊画的漫画《成金》，一个手持百元大票的小老头，让簇拥在他身边的三个女子将他的皮鞋擦亮，准备回家。尖锐地讽刺了大正初年的世相。

以神户港为根据地的铃木商店，在战争爆发前是一个拥有资本金 50 万日元的贸易商社。在战争打响后，立即购入了大量的战争物资和船只，数月之间便变成了大型商社。

原本在三井物产船舶部任职员的内田信也，1913 年 33 岁时辞职，当了一名船舶买卖中间人。1915 年开设内田汽船公司时只有 1 条船，第二年便拥有 16 条船，公司股票的红利竟达 60%。1918 年创立内田造船，有资本金 200 万日元，人称“船成金”典型。某日，他乘坐的列车翻了车，将他压在座席下面，他拼命大喊：“我就是神户的内田呀，出多少钱都行，救救我！”此事经报纸渲染，恶名也顷刻之间传遍全国。

三井、三菱等大型财阀企业，不仅在战争期间使自己的资本金倍增，而且在同期间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三井财阀的资本总额在 1917 年时仅为 6000 万日元，到 1919 年竟扩至 2.7 亿日元，1920 年时共拥有直系、傍系企业 60 家以上，总资本金达到 5.6 亿日元。

在战争中发财的不仅仅是大中型企业，连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收入。松尾尊允在 1961 年出版的《米骚动与劳动者》一书中举例说：

“在炮兵工厂能赚钱，在民间的工厂也能赚钱。在日本兵器会社干活的朋友，因一个月赚了 200 块，就拿着工资袋给我瞧。日本兵器会社生产俄国订购的炮弹，数量大且限期又短，所以都玩命似地干赚钱。我拼命干 12 小时，能赚 15 块。有个家伙好像为了刺激成金的劲头，就包下了一个女人，每天从娱乐店到厂里来回通勤不回家。……我就从那时起开始有钱，100 块、150 块、200 块，很快就攒了 600 块。”（曾在大阪炮兵工厂工作的野田律太口述）

前述的内田信也 1918 年 3 月在杂志《生活》上撰文《从三井跳槽之后》说：

神户的船舶界在战前就是东洋第一市场。（中略）所以神户的资本家、船主和劳动者，分别都大大小小地成了金，换言之，神户全体都成金了。

一举暴富的人有了钱，便过上了奢侈放荡的生活。他们玩股票，逛妓院，

上饭店，建私宅，使得许多尚未发财者羡慕不已，于是，更多的人都拼命向投机发财一条道上挤。内田信也在须磨给自己盖了一幢宅子，正厅是一个有数百榻榻米的大房间，被称作“须磨御殿”。日本邮船的社长近藤廉平，人称财界的“罗马法王”、花柳界的“社长大人”。其公司的股票红利 1917 年竟达到了 70%。更有甚者，“船成金”山本唯三郎、因船票暴涨而聚敛了 7000 余万日元资产，便琢磨起“怎样才能让他人知道自己富”的问题。于是，在 1917 年 11 月，他派 200 余人组成征虎队去朝鲜猎虎，一共打了 30 余只猛兽。回到东京之后，他特意在帝国饭店举办“虎肉尝食会”，招待各界知名人士尝鲜。当晚来了 200 多人，其中有清浦奎吾等枢密顾问官 2 人、现任内阁大臣 2 人、陆军大将 1 人。在从休息间去宴会场的过道上，将所捕猎物的皮制成样本，尽露凶猛狰狞模样，装饰两旁。内有全罗道的虎、弥巴里的猿、永起的豹、金刚山的熊等。

对内田信也、山本唯三郎等人的行为，社会自有褒有贬，但因风潮所致，在功利主义盛行、发财就是现实的当时，毋宁说更多的是眼热向往。日俄战争以后的致富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算圆了。“成金”的欲望推动着人们为自己能摆脱贫困而拼命奋斗，这多少减轻了国内政治对政府的压力。而在“成金”风潮的初期，因社会分配不均可能造成的负作用尚未充分表现出来，连任两届首相的大隈重信和后继首相寺内正毅，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外交活动中。

“成金”风潮的虚饰性，还可以从粗劣产品的质量中反映出来。由于中小企业在技术、设备和资金调筹方面都比不过大企业，为了不致在竞争中失败破产，粗制滥造的产品便充斥市场，输往海外。在外国，“太麻烦、日本”这句口头禅竟成了粗劣的日本产品的代名词。但是，毕竟是由于经济发展才给了人们“成金”的机遇。在一次大战中，伴随经济大发展的过程，相继出现的日本工业俱乐部、日本经济联盟会，是由企业组成的独占性经济组织。工业俱乐部的理事长是团琢磨（三井系），专务理事是和田丰治（三井系）、乡诚之助（三菱系）。这个由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为中心组成的垄断组织，同政府及政党的关系密切，是此后长时间内统制经济的运筹和执行组织，世称“隐形政府”。

1917 年 7 月出版的《中央公论》杂志，刊登了渡边铁藏的一篇杂文，题目为《排除迎合富者的政府并论设立战时利得税》，痛快淋漓地抨击了议会“实际上为经济的幸福阶级四处奔走，相反为经济的不幸阶级尽心尽力之举却根本见不到”；批评政府以巨额国费“毫不吝惜地奖励造船，奖励航海”，却无视“尚有领不到工资的小学教员和因米价腾贵而只好少吃的人民”，并疾呼应设立战时特别所得税以平衡社会分配，渡边铁藏特别列举了连丹麦和挪威等中立国都征收战时特别税，英国的战时税甚至达到了所得利润的 60%，而“惟有我国放置战时既得利益者于不顾”，认为这种无所作为的政策要招致极大的危险。

渡边后来是一个积极反共的“斗士”，在 1948 年东宝映画（电影制片厂）劳资纠纷中坚决站在反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东宝辩护，根本忘却了自己曾是批判大正“成金”风潮最犀利的斗士之一。然而，他将大正时期的议会和内阁斥为迎合富者的政治毕竟不是空穴来风。最大的财阀三井和三菱，分别成为最大的政党政友会和宪政党的后援者，已是公然不争的事实。大大小小的“成金”者，同政党和政客之间都连结起一条条看不见的“金脉”线。这种

关系最彻底的曝光事件，是 1912 年所谓“珍品五个”事件。

“船成金者”内田信也，在 1920 年总选举时，将自己经营的內田造船所新造的船，以每吨 325 日元的价格买给了“满铁”。当时战争已经结束，船价正在暴落，内田卖出了这个好价钱让同行们羡慕不已、吃惊不浅，引起了种种猜测。同为造船业者的在野党宪政党议员桥本喜造，在众议院大会上公开质问：“内田向原首相贿赠，在其荫庇下才成功卖出这种不正当价格。”在宪政党穷追猛打式的质问下，政友会不能有力地辩解，以致闹到要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的地步。政友会在急忙中由干事长广冈宇一郎发现了“珍品五个”事件，并以此为武器向宪政党反击成功。原来，在大选前宪政党总裁加藤高明向内田信也要求政治捐款，内田是一个普选政治慎重论者，便问加藤对社会中议论纷纷的普选问题持什么态度。加藤回答说时期尚早，内田便托人给加藤送去 5 万日元。加藤收到后在答谢信中写道：“珍品五个。”政友会在掌握了这些内情后，以宪政党放弃和不支持普选为条件接受 5 万元政治贿赠，迫使加藤高明承认接受贿赠（但加藤否认有交换条件）。战败投降后，内田信也在 1951 年出版的回忆录《风雪五十年》中证实确有其事，同时证实也向原敬政友会赠款的事实。

在议会中政党间为金脉政治而相互攻讦屡见不鲜，有时发生的一些事传出后甚至令人忍俊不禁，其戏剧性使人们欲恨而不能，说明金钱已经在何等程度上侵占了议会政治。福泽谕吉的女婿福泽桃介是通过买卖股票而发达的实业家，但他对有些人“成金”之后，请友人知己吃饭时让全裸女招待斟酒上菜的做法十分不满。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出生贫寒，天生就对富人有反抗心，我要用金钱去打倒金钱。”大战发生时，他已经是政友俱乐部的议员。政友俱乐部是在野党，按照计划他去议会发言，主题是反对预算案，没想到一激动，说着说着就离了谱，攻击起日本邮船和政友会来。他说：

邮船会社的当局者中，有我不少好友。该会社为了什么目的怎么样地花钱的，我听到不少。（中略）我今天想在这里发表（公开讲出来），可一想会伤害在场的天下知名人士，又不忍看到自己的好朋友被投入监狱，只好暂不发表（这时会场骚乱，有人大声喊应该发表）。穷人对富人的憎恨和不平是难免的，然而政府却加以特别保护，如果听任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话，那么，恐怖或者应当忌讳不讲的社会主义就会来了吧。诸君，明治 44（1911）年 1 月 18 日，政府对幸德秋水一伙逆徒宣判死刑。彼等的罪恶固然个人憎恨，但彼等毕竟是帝国的臣民。使彼等演出如此之狂态者究竟乃何人之罪耶！

据称，当时会场沸腾，已经根本看不到作为帝国议员应有的矜持。政友会议员松田源治和福井三郎从自己的议席上跳起来，大声叫嚷：“拿出证据来！不许侮辱神圣议会！如果没有证据就让他蹲监狱！”福泽也毫不示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纸文书，一挥喊道：“想看一下吗？什么时间，什么人拿了多少钱，请瞧一瞧再念一遍吧，这就是证据，就在我手中！”这时，会场虽然更乱了，但一直在挨福泽痛骂的政友会议员却安静下来，脸色突变者有之，面面相觑者有之。福泽这时更用力地来回挥动着那张纸，心里感到特别痛快。

其实，福泽手里挥动的“证据”，根本不是什么根据，如果政友会的松田或福井敢于接过来看一看，福泽桃介立刻将哑口无言，不仅会受到党内谴责，而且会因藐视议院而被起诉。福泽在 1939 年出版的《福泽桃介翁传》中

但言，当时手里拿的是日本瓦斯会社的考勤表，痛快之余也有一种余悸之感。问题是，福泽桃介为何有勇气冒险，而松田和福井等人却为什么连怀疑一下这是否是真证据的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呢？回答恐怕只能是，这种不敢公开的金脉政治不仅有而且的确十分普遍。

日本经济在一战期间跳跃式的进步是以这场战争为最基础的条件的。1919年一战正式结束，这种基础条件亦不复存在。紧跟着而来的，则是1920年的经济危机。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企业利润短期上涨，以及许多人都醉心于其中的“成金”风潮，由于经济危机而遭受打击。参战各国几乎不约而同地执行通货紧缩政策，日本也在国际收支赤字、硬通货不断流向海外（1920年人超额为3.8亿日元）的情况下，采取了紧缩政策。

在紧缩政策下，整个经济界当然是呈现着动荡不定的状态。股价的跌幅竟落到原价50%以下，地产、固定资产等资产的评定价格，也降至一年之前的一半以下。有许多企业在危机中破产，即使幸免破产者，其在大战期间积蓄的财产也差不多都被消耗殆尽。在大战期间浑水摸鱼聚敛钱财大大小小的“成金”者们，随着经济环境的巨变，绝大多数又都回到了“成金”之前“步兵”的原起点上。

首先，是传统输出品生丝的价格直线下降。每100斤生丝，1920年1月时的价格为4400日元，到3月时为1900日元，7月时竟降到1100日元。生丝历来就是日本替代进口最有力的输出产品，丝价的暴落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政府立即提出了保护和整理政策。所谓保护政策，就是成立“帝国蚕丝株式会社”，收买滞销的生丝以维护生丝价格。所谓整理政策，就是支持郡是、片仓等大型缫丝产业动用战时积聚的利润，对近几年来因海外需求大增而簇生的小型生丝工场进行合并收买，鼓励农民生产优质生丝并许诺收购。这种政策的作用毕竟阻止不了与生丝产业有关的产业的滑坡。尤其是作为生丝原料供应地的农村，一方面由于农业收入和兼业收入减少，一方面又由于缫丝工厂的工人大量回流农村，陷于极度穷困之中。

其次，在大战期间急速扩大的海运业和造船业，以及关联产业如矿业、金属、电力和煤气等生产部门，以至于所有生产部门，由于股份暴落，银行无力贷放款，价格下跌，而处于减产停产的境地者难以数计。中小企业受害最深，而工人则或被解雇或被降薪。对此，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力图减轻危机的程度，维持社会安定。这些政策包括：动用日本银行的救济融资，对主要企业进行救济；颁布产业立法，对各类产业进行奖励或者合并；颁布信托法和改革银行条例，规定法定最低资本额，否则便对其进行归并处理。

由于政府如此大规模地介入并干预经济，露骨地推行加速企业形成垄断政策，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浅野、大仓、古河、川崎等八大财阀，辖领其直系会社、子系会社、傍系会社共539家、关系会社共234家，将除了国家资本和纺织会社之外的其他全部产业，都置于其巨大的伞型经营体系之中，在全国社会资本中占有64%的资本。此外，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第一等银行在金融业，大日本纺、东洋纺、钟纺、富士纺、日清纺在纺织业，片仓、郡是在生丝业，王子、富士在造纸业，台湾、明治在制糖业，浅野、小田野在水泥制造业，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取得制霸地位。

在政府这一系列政策干预下，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金融活动的危险投机活动，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抑制，产业结构也呈现出有序状态。但是，垄断企业的大量涌现和垄断体制的形成，带来了价格协定和贩卖组织化倾向，也抑

制了自由竞争，使日本资本主义早早地就带上了国家垄断的特点。同时，由于重视对都市产业化的调整，忽视农村经济，造成政策偏颇，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寄生地主制正是从这时开始出现衰退端倪。更主要的是，政府的这些对策并没有给已经在一战期间扩大起来的社会生产带来与之相适应的、同样扩大化的、稳定的国内外市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自 1919 年起出现的入超，年复一年、年甚一年地扩大着。从这个意义上讲，既然不能根治疾患的药方只能起到抑制的作用，那么，这种政策自然就成了诱发慢性、持续经济不振的原因。

经济衰退和政府扶植垄断的直接后果，是早在一战期间“成金”热高扬时形成的庞大贫民阶层的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报纸和杂志中时常出现的有关贫穷问题的评论或反映人民生活实态并为之呼吁的文章，成为众多读者关心的题目。随着“成金”梦的破灭，失意后的愤恨甚至会使有些人挺而走险，为获得金钱而犯罪。于是，有关贫困的话题，便成为人们愈来愈关心的焦点。

当时日本到底有多少贫民呢？有一个信奉基督教以救济贫民为己任的教徒，为了履行自己的祈愿，特意搬进神户的贫民窟去生活，从事传教和救助活动，他就是比河上肇还早关心贫民问题、看来出版了《贫民心理的研究》的贺川丰彦。据贺川调查，月收入 20 日元、房租支付能力 3 日元以下者，是最低贫困线。那么，根据月收入 300 日元以上者全国仅 125 万人、95 万户，不到全国户数 1/10；月收入 240 日元户不到全国户数 1/2 来计算，全国总人口中的 1/4 可以说是穷人。神户地区全部户数的 36% 为 3 日元。以下房租支付者，若按 10% 的比例来推算，那么，仅神户地区就有 75 万贫民。这些贫民为了活命，每天都在从事着单调枯燥机械的工作。比如，从早上 5 点起一直干到晚上 11 点或 12 点，贫民窟的女人们除了吃饭上厕所，便不停地坐在那里贴火柴盒，一天贴 3500 盒可得工资 35 钱。后来，神户地区来了几台贴火柴盒的机器，人工贴 1000 盒就只能给 8.5 钱了。

贺川丰彦最吸引人的研究，就是通过大量实际调查，生动地刻画了贫民一生的轨迹。他写道，他曾询问贫民窟的孩子长大以后的理想，最多的回答是：卖咸菜、卖捕鼠器、当电车驾驶员或去掏大粪。待他们长到十二三岁时，便告别了父母崇拜时代转向英雄崇拜。这时，12 岁的少女中绝大多数的人是想长大当演员。十三四岁以后的少男少女们，发现了他们的父母或兄长们为了生计拼命工作赚钱养命的艰辛，甚至发现了卖淫的秘密。于是，他们也开始模仿，希望去女人们聚堆的点心铺玩，他们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家，也能享受天伦之乐。他们开始从梦中惊醒，或去干活，或过上放浪的生活。一直到 30 多岁，男的可能已经换过了十几种职业，女的也可能经历了三四个男人，但依然在为自己能有一个理想的家而跋涉。到了中年，过了半百，许多人看破红尘，喃喃自语道：“不行了，不行了，人生原来就是梦。”一到 60 岁，就常常对别人讲：“活着也是别人的累赘，不如早死啦！”自杀的事便屡见不鲜了。贺川还特别写出了老太婆的自杀心理。她是一个赌徒的母亲，72 岁了，便对家人讲想死的话。于是，故乡的老家便差人送来了 20 日元丧葬费，老人放心了，将钱放在枕头底下，谁料被儿子的赌友偷走了。老太婆发现之后便什么也不再说什么，当天晚上饱饱地吃了一顿饭早早地睡下，待家里人睡着后她用蚊帐的吊绳把自己勒死了。同住一家的儿子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母亲已经吊死了。

为数众多的贫民过着如此贫寒而又缺乏教育的生活，无数的社会问题便层出不穷。经济学家河上肇于一次大战时在欧洲游学，注意到先进国家的贫民问题，他为贫民的不幸遭遇和社会动荡的危险而担忧。回国之后，他在大坂《朝日新闻》上，从1916年9月11日至12月26日止，断断续续地连载评论《贫乏物语》，被众多读者称作诚实文章。河上肇向社会发出呼吁，说只要继续维持现在的经济组织，就只能听任巨大的贫富差别继续存在下去，就搞不明白有钱人为什么能买这么多奢侈品来享乐，就不可能根绝社会的绝症——贫困。而如果有钱人能自动放弃享用奢侈，就有方法矫正社会贫富差别，使社会成员的所得不致拉开明显的距离。如果在生产和分配中能杜绝使个人发大财的一切机遇或可能，像军备或教育那样改由国家主办，那么，根治贫困也就指日可待了。

客观地说，河上肇的关于制止奢侈解救贫困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的色彩。这种空想的说教之所以能在当时唤起公众的注意，原因就在于引起了公众的感情共鸣，就在于社会分配不公使得人们对社会现实怀着强烈的不满，就在于唤醒了醉迷于“成金”梦中的人们的贫困意识。河上肇本人此后数年间一直在思索着解除社会贫困的有效方法，却终不得其解，以至于全身投入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中。河上肇以及贺川丰彦写《贫乏物语》的最直接的动机，是担心贫困的人们走投无路最后导致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但是，人们不久便发现，大正年间的贫富问题确实酿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而且还是引发比之更具危险性和破坏性的暴举的社会原因之一。

“大众社会”

产业的发展使产业人口的构成发生变化，导致的结果便是都市人口的膨胀和都市规模的扩大、都市建设近代化。自1915年起从农村脱逸的劳力向都市集聚的趋势，基本上一直呈现着持续增长状态。流量之大，势头之威，足可以同1950—1960年时期相比。在这一时期，制造业约增加了90万人，商业约增加了50万人，公务员和其他自由职业者约增加了20—30万人。这些数字形象地表明了社会分工的剧烈变动，变动的自然原因是城市职业者的工资收入远远高于农业收入。在就业机会增加的前提下，宁可在城市吃些苦、干别人不想干的活也总比呆在农村强，就成为迁徙者的心态。随着这一运动的进行，农业人口减少而城市人口增加，需求增大，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村的所得也逐渐与城市工薪阶层所得拉平，新的社会分工之间的收入差别趋向平整，人口向都市集中的速度也就放慢了。其后，由于经济危机的发生，人口曾一度向农村倒流，都市和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又明显起来，倒流运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停止了。总的趋势是：1920年前是农村人口流出时期，其后10年间，农村人口反过来缓慢地增加，但仅仅是一部分人口又倒流回来。1930年以后，这种大量流出、少量流回的现象就停止了。

据统计，1898年、1913年和1920年、1935年，全国人口的81.6%、74.2%和62%、54.3%居住在人口1万人以下的町村中，同期居住在10万人以上都市的人口则分别为9.1%、12.5%和19.5%、25.5%（剩余部分居住在2—10万人的市町中）。从以上统计来看，1913—1920年是人口居住地构成

[日]中村隆英：《战前期日本经济成长分析》，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18页。

变动最大的时期。都市化的倾向，不仅由人口的流动表现出来，城市道路、上下水道、公园、学校、大型贩卖店，交通网络与交通工具等，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甚至从近郊到都心的通勤电车和住宅建设等单纯民间投资，也在扩大规模。担负这些城市基本建设的，主要是由各都、道、府、县的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负担的。1920年以后，尽管战时景气已经失去了势头，但都市化却并未停顿下来。1923年关东大地震令许多建筑和民房毁于一旦，但也带来了规划城市建设的机会。东京、横滨、大阪、名古屋和神户的城市面貌竟以地震为契机数年后焕然一新。由于都市化的推进，就要求将居住、商业、社会活动和各级政府官厅占用地与同一时期也在推进中的工业化占用地隔开适当的距离，又由于最经济地利用交通运输等生产条件的要求，大都市周边在1914年—1925年迅速地崛起了一圈工业地带，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京（东京）滨（横滨）工业地带和阪（大阪）神（神户）工业地带。产业工人阶级也随之而壮大起来，1920年在民营重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人数为36.4万人，占全部工人人数的23.5%。若再加上在国立工厂（八制幡铁所、炮兵工厂、海军工厂等）的工人人数，则为51.5万人。

都市的大都市化和市町的都市化，就为既非“成金”者阶级、亦非贫民阶级的广大中间阶层，提供了工作、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空间。为了概要地叙述，我们将拥有中等水平收入和中等学历的工薪阶层，统称为“中间阶层”。这部分人一般拥有能够或接近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经济状态，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生事物具有极其敏感的嗅觉，并能根据个人的爱好和能力去加以评价和选择，在都市人口构成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人口向都市集中所必然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经由社会上层通过自己的行为不自觉地示范后，便全部由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接受和普及，成为一种“时尚”而渗透到生活的末节细梢之中。

1920年2月1日，俗称“蓝公共”的东京市公共汽车公司，宣布即日起在从前的无人售票公共汽车上，一律配一名身着西式套服的女售票员，一时引起世人轰动，争睹新式女售票员登场。其实，衣着的变化早在明治初年就开始了，但西装的大众化普及化却在一战以后才真正地展开。因其经营的商品需要衣着烘托一种亲切感，商人和个体服务者还喜欢穿和服，但公司的上班族在工作时一律身着带马甲的西装，却已成惯例了。因为存在女人不穿和服便有碍风俗的偏见，人们才会对女售票员换洋装大惊小怪。果然，仅在第二年，三越店让所有的女店员一律换着西式制服，而且连发型也要求改梳齐耳短发，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在街头涌动的人流和挤电车上下班的人群中，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着便于行动的西装。出门换西装很快成为一种习惯，相反，穿和服挤电车的人倒变得容易让别人注意了。

在服饰“洋风化”的同时，食物的“洋风化”也在迅速推进中。比起日本式的煮物和生食来，“洋食”的长处是快捷便当，更适合于职员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吃午饭。“洋食”以三大主力——咖喱饭、炸肉饼，炸猪肉片为先锋，很快使居住在都会中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它，在这些人们的食谱中占据主导地位，最后也出现在晚餐桌上。最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日本人根据自己的胃口也反过来对“洋食”进行改造，推出日本式洋食并造出了象形字“丼”为之冠名，其意思相当于中国的“盖浇饭”，从1921年时起堂而皇之地进入饭店，并一直沿袭至今天。当然，人们愿意接受“洋食”的重要原因，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洋食”物美价廉。身着和服、系着白围裙的女招待

们，在专门经营“洋食”的店子里，殷勤地为客人服务，颇得好评。

随着衣食方面的变化，洋式住宅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1922年在东京上野的和平博览会上，展出了几套美国风格的“文化住宅”。其红瓦屋脊倾斜地覆盖在淡色的墙壁上，整洁宽敞的房间和明亮的厨房，使前来参观的日本人称赞不已。不久，在东京郊外便出现了类似风格的洋宅待价而沽。在人均居住面积1.03榻榻米的大阪和东京，这些住宅就成了人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

1921年，电灯和煤气开始普及。自来水还未能彻底取代井水和河水，但也开始进入普通人家。只是下水道的铺设进展迟缓，全国以东京为首的各大中小城市，人们为无法及时方便地处理排泄物而发愁，以致有人违反规定将其倒在附近的河流中和海岸边，或无奈地叹息“人与屎尿同居”。工业发展、人口增加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已经酿出初级公害。

1907年时，日本全国只有16辆小汽车；1914年增加到1066辆时，私人汽车已经出现。小汽车被认为是贵重的财产，其主人也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据当年东京市内汽车牌照记录，前25人中，大多数是商人。但第12号、19号和24号，则分别为山本权兵卫、大隈重信和西园寺公望。1920年，私人小汽车已增加到9999辆；1927年，增加到51862辆。中间阶层中也开始有人拥有高级代步工具。

夜食住行的西洋化，不仅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亦以中等阶层以上的人们对它的普遍接受和有能力接受为必要。明治以来近代产业的发展，是在对西方技术和各种制度的追求中实现的。由近代技术和近代工厂生产出来的近代产品对生活所发生的直接作用，无时不在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观点。近代社会的发展，增加了各种社会关系的紧密度，增强了人们相互交往的必要性。在过去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中培养起来的对人生的认识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常常与地域的历史和生产现状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多方向、多层次、变化节奏慢且不轻易变化的特点。而近代产业则将全国联成一个相互合作、依赖的整体，快速增长为人们带来了各种机遇，输入的舶来品将时间和空间浓缩在为人们带来刺激的那一瞬间。生活在都市的人们以及能接触到社会变化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因改变着的社会新景象而调整注意力、兴趣力和欲望的方向，一种或若干种并不相互矛盾的社会性认可，便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而当社会的主要成员都愿意接受它或准备接受它时，它也反过来成为制约为获得它的人们的行动的力量。大正时期的大众文化的形成，十分生动地证实了这一点。

“今日帝剧，明日三越”，是三越吴服店在1915年提出的广告词，“帝剧”指的是帝国剧场，1911年建成后因它典型的西洋建筑风格和演出的西方音乐使人们认为只要在这里坐着看场戏便是走在时代最前端的“先觉者”。三越吴服店专营高档品，将上流阶级作为顾客的经营方针于此可见一斑。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三越店的经营方针根本性地转换了。高级和服中心主义被大量生产标准化流行装所替代，中间阶层成为这里最大量的顾客。三越店本身也大动干戈重新装修，进门购物不用再换鞋，人们随便进入这个现代型的大型百货店。三越店经营方针的变化，与其说是经营者方面经营思想的主动变化，不如说中间阶层的审美观和购物能力迫使经营方面作出

相应的改变。

以私营铁路为中心，为适应广大公司会员上下班需要的电网友已经形成。1922年，政府批准经营的私铁线有41条，长度达到386公里。1920年阪神急行电车开通，阪急专务小林一三建议在各大车站建设大型百货店和食堂，便于乘车者购物和吃饭，收益颇好。阪神接着在沿线开发住宅，在宝家设游园地，招徕消费者。

旅游事业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首先被开发的是箱根的芦之湖，堤康次郎在箱根买下大片土地，经营温泉旅馆等各种观光设施。后来，他又将盈利移用来经营铁道事业，创设了著名的西式铁路。此前，所谓观光旅行和避暑旅行多为上流阶级的“专利”，大众往往将去神官参拜等宗教行为同游览观光视作一体。但怀着恭敬的心情去见神佛，会缺乏轻松和享乐的情调。此后以娱乐为目的观光避暑旅行在中间阶层中成为时尚，为旅游服务的旅馆和宾馆急速地增加起来。

棒球运动的兴起典型地说明了欧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从1915年起由《朝日新闻》成功主办第一届中等学校棒球锦标赛之后，1924年可容纳5万人的著名甲子园棒球场落成，1925年沿袭至今的东京六大学棒球联赛开赛，冠军的获得者成为当时体育界的王者。

各大报纸的办报方针出现了转换，政论性文章逐步减少，而可读性强的各种记事以及广告等商业性报道却多了起来。大阪的《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以及东京的《读卖新闻》，每天发行量在有100—150万份之间，且分别拥有自己的订户和读者。通俗小说以连载形式在三大报纸上登载（1923年前田曙山的长篇连载《燃烧的漩涡》和中里介山的《大菩萨岭》等），博得大众广泛的兴趣，也增加了报纸的客户。各大报纸兼有大众文学舞台的功能，大佛次郎、白井乔二、吉川英治，野村胡堂、林不总等作家成为通俗小说的代表作家。

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1925年1月发誓要成为“日本第一有趣、日本第一有为和日本第一订数”的杂志《王者》，由讲谈社发行。创刊号卖出77万册，被称为文化大众化商品化的象征。1923年由菊池宽创办的《文艺春秋》在1926年变成综合性杂志，受到公司职员等中间阶层的欢迎。1926年12月，改造社开始出版《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其每册定价破天荒地便宜到1日元一册、压低出版、印刷和发行成本，就是为了让广大中间阶层有足够能力来购买。1927年新潮社发行《世界文学全集》，全57卷订数达到58万册。同年，更为便宜的《岩波文库》出版了，每册的售价居然只有20钱，这些“廉价名著”的发行，迎合了中间阶层的志趣，又考虑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因而获得成功。

1925年3月1日，东京广播电台试播，7月12日正式播音。当时听众只有5455人，3年以后听众超过6万人。电影、照片和唱片等满足人们听觉和视觉的文化工具，在一战结束后急速地发展起来。从美国输入小型廉价照相机，增加了摄影爱好者的人数。由于德国不向日本输出有关照相的材料和机器，促使日本致力于研制自己的光学仪器，相继出现了日本光学、高千穗光学（现在奥林派司的前身）、旭光学、东洋干板（今富士胶卷）等，诞生了日本自己的光学产业。唱片和留声机，也由于1915年由主演《复活》而名噪一时的女演员松井须磨子的一曲《卡秋莎》而流行起来。松井的头一张唱片一举卖出2万张，说明了唱片和留声机的普及程度。

然而，给予人们的感官以最大冲击的，当然还是电影。1897年2月，大阪商人稻烟胜太郎在京都的东向屋首次使用由他本人从法国输入的放映机放映电影。3个月后，东京的荒井商社采用从美国输入的机器在神田的锦辉馆放映电影，是日本最早的电影。当时放映的是无声记录片，如旧金山的景色、消防队救火的场景、纽约的市容等等，使有幸观看的日本人惊叹不已。但是，能够经常看电影消遣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如皇族、官僚和大商人。1911年11月9日，明治天皇赴九州视察陆军大演习途中，饶有兴趣地观看捕鲸的记录片后对桂太郎讲：“真是不可思议”。一战之后，电影就已经成了青少年打发闲暇时间的最好手段。著名的德国文学研究家和田洋一回忆，1918年他在同志社中学上三年级时，平均一个月要看15次电影。电影的内容也开始迎合观众不再是猎奇而是欣赏的口味。因为电影仍然是无声电影，所以许多出身中产家庭的高中毕业生，都把当电影现场解说员作为一生憧憬的职业。电影的放映馆也因观众众多而纷纷建造起来。由于从美国输入的电影经常将侦探英雄作为主题，所以日本的青少年都纷纷模仿，酿出恶性事故。电影院里的风纪也成为问题，1917年警视厅甚至颁布电影观看规则，例如男女席隔席，未满15岁的少年禁入等等。

一言以蔽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典型的大众社会已经出现了。对大众社会的分析，甚至可以窥视到今天日本社会的雏型。如何对这一时期的社会进行评价呢？首先想列举两个不容忽视的数字。

其一，人口虽然是在向都市集中，但是1925年时10万人以上的都市只有21个，居住人口仅874万人，在全国总人口5918万人中所占比率仅为14.8%。1924年在全职业人口2787万人中的51%计1421万人，还在从事农、林、渔业。第一产业尚无力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从而将更多的劳动力输往城市，而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亦相当有限，并不能向农业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说明大正时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尚落后于同期强国。

其二，中学教育虽然在普及之中，但能进入大学学习的仍然是极少数人，大学文化教育的普及面十分有限。1925年大学新生为10914人，全部在校学生为46885人，平均每1万人中仅有8人。显而易见，在少数接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与仅接受完国家要求的义务教育的大众通俗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

从以上两个数字可以看到，大正时代大众社会固然出现了，但还是十分幼稚的。工业的产值虽然在逐年增加，但仍未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压倒性比例。对来自西方的文化传播缺乏必要的批判。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十分明显，城市中上层社会与中层社会之间的距离也不能轻易地缩小。贫民问题十分突出。

然而，大众社会的出现和大众文化的形成却是明治维新以来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近代日本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完全应该这样认为，明治时代社会经济的初步发展和近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不平等条约的改正，同大正年间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与大众社会的形成，同样是明治维新的意义所在。或许更应该这样认为，在贯穿整个明治时代的政治对抗中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其结果就是促成了大正大众社会的

据1987年日本文部省公布的数字，大学教师人数为115870人，学生数为1934486人，每1万人中有大学生160人。

形成。只有将明治以来近代化推进的最高体现视作大众社会的出现，而决不是或决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确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福泽谕吉在被国粹主义者斥为“功利主义者”的批判声中，依然不遗余力地主张借外来文明之力，启发日本国民的文明精神。他用心良苦地提倡“一身独立”才能达成“一国独立”的趣旨，用他在1905年自己的生日宴会上用欣慰的口吻说的话可以道破：要使锁国的“东洋小国”变成充满生机的独立国，他一生所致力的工作就是要把长期在无知状态下睡眠的“无气力之愚民”，改造成“洋洋新社会”担负者的“国民”。从日比谷暴动至一战结束之后数年间，这样的“国民”才成为一个中间阶层，才由中间阶层推出了一个大众社会。尽管当初的相当部分的为政者从其自身的立场出发，往往采取了以这个社会为敌的政策，但这个由拥有一定程度判断力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对政府政策乃至政治制度的监督和强大反作用，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大正时期的大众社会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官是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我们从对大众社会的上述描述中，清楚地看到明治末年的个人主义思想与之的联系。这种个人主义可以表达为两种意义，即以个人要求个人利益为准则向社会索取自己希冀得到的东西；尊重个人的政治权利，从而对政府政策形成了压力。

其二，它是随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而同时到来的。大正时代的确是日本最早出现的大众消费时代。人们对社会的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仅仅是生存的需要范畴。人们开始要求让自己个人的生活变得较前有趣味，无论是衣着食物住房等物质享受，还是读报看书看电影等精神享受，都要根据个人的喜好通过个人的消费去达到个人的要求。大众消费的高涨，正是近代社会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它的出现既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又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后果。

其三，是文化的通俗性和粗糙性。也许这正是它的初级性和被国际国内因素阻断一直到战后才充分发展起来的原因所决定的。大正时代大众的审美行为和消费行为，大多数停留在较为肤浅的阶段。不仅对只要成为“时尚”的事物便一味去追求之占有之，而且大多数追求和占有仅仅是满足了个人的直接的欲求。极端的例子，便是即使是无声电影也力图通过衣着和举止来撩拨观众并收到期待的效果。据中村三郎在《日本卖春取缔考》（1954年出版）中考证，1924年持有政府准许的游乐场有537所、娼妓22325人，游客23405397人次。每一娼妓一年平均接客1048人，一月平均88人，一日平均3人。如此惊人的数字，可见嫖娼行为竟是大众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对于一个大众化的社会来说，这也许并不是不正常的。

认为这一社会是近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必由阶段，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它的危险性就在于：“成金”者的过度富足和贫困者的极度贫穷，而夹在中间的中流社会是一个庞杂的个人主义性质的因而极易莽撞行动的社会集合体。

关东震灾

大战景气消退后，政府颁行了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政策，企图依靠大战的

积蓄和政策的支持，在正常环境下也能维持经济的增长。但是，政府干预并不能收到预想的结果。从国际收支统计数字来看，1922年的逆差额仅比1921年少1000万日元左右，而1923年则比1921年多1700万日元。正当财界和政府为摆脱国际贸易的窘况而苦思对策时，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一场以东京的相模湾浅海底为震源、震级为7.9级的大地震袭击了东京以及整个关东地区和静冈、山梨一带。大地震以及由地震引起的火灾和海啸对这一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著名的国粹主义者三宅雪岭在《同时代史》(5)(1953年版)中描述道：

东京市起火处有134处以上，当天风速为21.8米，先刮南风，再刮西风，又转北风。火势或合或分，纵横肆虐逞威猛。最悲惨者乃本所被服厂遗址，下午4时许，旋风高百米乃至200米，以反时针方向旋转，将水上的小船抛起1间(1.82米)或2间高，裹挟着正在凶猛燃烧的高等工业学校的烈焰，在横纲町河岸登陆……由被服厂中央向北蔓延，点燃避难群众的行李，烧着避难者的衣服，顿时出现了一个灼热的人间地狱，夺去了38000余人的性命。

据今村明恒的《关东大地震报告》的记载，在大地震中死亡和失踪者人数达142807人，毁坏房屋128266户，受害者计有340万人。电信电话全被切断，交通瘫痪。有乐町、大手町的官厅、警视厅、内务省、大藏省、铁道省都被烧毁。上野公园和皇宫前广场挤满了饥馑的难民。在受灾地严重的湘南，许多上流社会人士在这里盖的别墅被震塌，闲院宫载仁亲王的第四女宽子女王等3名皇族被压死。

东京陷入毁灭状态之中，日本经济和市民生活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更为严重的是，天灾之上再加人祸，使关东大地震在历史上留下了不能抹去的大污点。

在震灾发生前的8月24日，加藤友三郎首相故去，萨摩系的山本权兵卫受命组阁，救灾善后工作就落在已经提出辞呈的加藤内阁的阁僚身上，而直接负责的是水野炼太郎内相和赤池浓警视厅总监，水野在米骚动时任内相，朝鲜“三·一”运动时任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起用赤池为警务局长，对朝鲜人民进行过镇压。出于其“职业习惯”和对朝鲜人的仇恨心理，水野早早发出了取缔“不逞者”命令，并要求出动军队维持治安。京滨地区多为从事土木建筑体力劳动的朝鲜人。从1日下午起，川崎、横滨和东京盛传朝鲜人要暴动的谣言。警视厅即以此流言为事实，命令涩谷、世田谷和品川等署“沿街配置署员，如有不逞之徒，立即击毙”。内务省竟向全国紧急通报朝鲜人要暴动的谣言。2日黄昏，在没有经过枢密院审议的情况下，政府向东京都和府辖5郡下达了戒严令。

军队和警察以“保护”为名，将大批朝鲜人集中拘捕，而民众则自发地组织所谓“自警团”，袭击朝鲜人。在大地震中丧失了财产、房屋和亲人性命的日本人，完全处于一种惶恐和无以名状的报复心态中，他们从官宪宣布戒严和拘捕朝鲜人的一系列行动推断，朝鲜人要暴动的流言是属实的，于是便在乡军人会和青年队等为中心，组织了许许多多“自警团”，用刀剑、竹枪和棍棒等武装起来，一俟发现朝鲜人，便施以暴行，或殴打，或侮辱，甚至残忍地加以杀害。整个东京市以及周边地区都处于一种丧失理智后的恐怖之中。据说有6000名朝鲜人在这场人为灾祸中丧生。

当年就职于三菱银行东京本店的三宅平心，在其回忆录《我的始末书》中追忆，当日下午下班回家途中，他被自警团抓住了。一个拿着日本刀的少年问他是不是朝鲜人。他回答说自己是朝鲜人，是日本人。那个少年不相信，让他唱一首日本儿歌“鸽”来证明。三宅是一名出色的银行高级职员，颇感屈辱不想唱，但不唱就会被杀，便只好唱了。他回到家后彻夜不能入眠。

参与自警团杀害朝鲜人的日本人，根据后来法院审判的记录，多为人力车夫、马车夫、流动商贩和打日工的下层居民。军队和警察也参与其间。

在大地震中被杀死的，不只是朝鲜人，还有中国人。许多调查表明，大约有700名中国人（多为温州籍）被残忍地集体屠杀。据从屠杀现场侥幸逃命的华工黄子健回忆，9月3日中午，日本军警、青年团及浪人们手持铁棒等凶器，来到东京江东区大岛町八丁目中国人住的旅馆里，让他们马上回国。华工信以为真，便老实地跟他们离开住处打算回国。走到一处空场处，他们突然说地震又来了，马上卧倒，让华工们全部伏在地上，然后就一举将所有华工计174名全部杀死了。黄本人被打昏，头部两处重伤，被屠杀者误认为死了，才逃了出来。

此后，南千住、三河岛等地又相继发生杀害华工事件，消息传开之后，旅日中国留学生领袖“共济会”会长、周恩来的好友王希天，于9月9日，只身骑车前往大岛町、南千住、三河岛等处看望华工，了解华工遇害情形，途中被日本宪兵绑送龟户警察署拘押。长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揭露王希天被害真相的石井良一先生谈到：宪兵中队长对王希天说：“你的同胞要骚乱，替我们去训戒一下他们吧。”王希天信以为真，被宪兵队带走了。当他们一行来到江东区龟户町逆井桥时，事先等候在那里的垣内中尉冲了出来，从后背将王希天劈死。随后毁容，烧掉他身上的衣服，并将他身上携带的钢笔和10日元70钱掠去。

在残酷地杀害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同时，官宪对日本社会主义者也举起了屠刀。9月3日，东京南警备队司令官石光真臣第一师团长向他的部下发生训令：“不法分子不一定只有朝鲜人，应当记住还有利用他们的日本人。”这里所指的日本人，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

在幸德秋水被杀害以后漫长的“冬季”，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完全停止行动。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自发表《贫乏物语》以后，一直在苦心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1919年1月起创办了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创刊号竟卖出12万册。堺利彦和山川均等人也创办了《社会主义研究》，使社会主义的著述活动又活跃起来。同年4月，山本实彦的《改造》杂志、6月由黎明会创办的《解放》杂志，都以当时的流行语命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其人望直逼《太阳》和《中央公论》。在社会主义宣传重新活跃的情形下，堺利彦、山川均等社会主义者联合大杉荣等无政府主义者、友爱会和信友会等劳动组合、新人会等工人、学生团体和思想文化团体，于1920年12月9日共同创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全国约有3000名会员。这一同盟成立以后，意味着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在组织上形成同盟。工人运动因此高涨起来。1921年5月28日该同盟被政府勒令解散。

日本儿歌，多半浊音和促音，一般外国人不会唱。朝鲜人发半浊音时略带口音。

《王希天纪念文集》，长春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石井良—1994年9月4日在长春“王希天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

此后，大杉荣同堺利彦和山川均等又展开了无政府论与布尔什维克论的争论使运动分裂，而派往上海向共产国际领取了6500日元活动经费的近藤荣藏，一回国便在下关挥霍，引起官宪怀疑而被捕事败，使得成立共产国际小组的计划流产。这种自设的障碍影响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此时，堺利彦等人接到共产国际的指令，要求1922年秋召开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必须以日本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出席。德田球一于1922年5月回国，说服堺利彦等立即成立日本共产党。7月15日，日本共产党成立，并于同年11月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成立纲领强调日本的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半封建性，国家政权被掌握在官僚、财阀手中，提出推翻天皇制政府和废除君主制，领导普选和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等问题。由于共产党的成立，工潮和农民运动又出现了高涨的兆头，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1923年由《社会主义研究》、《前卫》和《无产阶级》3家社会主义者的杂志合并，发行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赤旗》。

共产党的活跃当然引起了当局的不安。警视厅与社会右翼团体串通一气，由右翼寻衅挑起与学生运动冲突，警视厅便以此为籍口，于1923年6月首次检举了共产党。大地震发生之后，警宪方面最担忧共产党鼓动群众发难，便于9月3日逮捕了在救灾现场活动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并于5日将工人运动的首领平泽计七和川合义虎等8人处死了。

根据后来法院的审判，证明了“朝鲜人要暴动、中国人要骚乱”完全是别有用心制造出来的、挑衅性的谎言。工人首领也仅仅向区公所和工厂要求出来为灾民送饭而已。但这些都当作了既成事实，用此充作镇压群众的口实。7日与紧急敕令一起公布的《关于维持治安的惩罚条例》，更加强了白色恐怖下的萧杀。16日，大杉荣、伊藤野枝和6岁的外甥，在东京宪兵队本部被甘粕正彦极其残忍地杀死。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高压政策下反而相信政府是在保护自己，表示出拥护政府的姿态。在紧接着召开的第47届临时议会上，也几乎没有人认真质询事件真相，追究责任者。杀死大杉荣的主凶甘粕正彦在一场假惺惺的审判中被判处10年徒刑，但3年后便赦免出狱，在巴黎闲赋2年后，又到中国东北从事文化侵略活动。

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在顺境中发展的日本，经两次冒险战争，一举成为国际强国。就在此“春风得意马蹄疾”般的高速发展中，关东大地震似乎代表了一种超乎异常的意志，给了这个以“神国”自居的岛国以一记痛击。根据古老的传说，日本列岛下面的大海深处，静卧着一条硕大无比的鲑鱼，每当天照大神要对她的子孙表示不满时，这条鲑鱼就要翻身骚动。于是，自古便有天皇在大震后自动退位，以谢罪神明的先例。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大灾难的责任该谁来负？或者说，应当怎样才能将国民可能要迸发的指责与愤怒的方向，从政府和天皇身上转移开？毫无疑问，担负转移群众视线职能的是那些流言。但这些流言究竟是谁放的，出处何在，至今仍然是谜。或认为是政府有意“泄漏”的，或认为是右翼团体散布的，但因根本无证可考，所以仅仅是推测而已。然而，学者的这种推测毕竟还是有些根据的。这些根据便是：当无辜的朝鲜人和中国人、还有共产党人被杀死后，日本国民真的没有给政府制造什么麻烦。于是，杀人犯们在受到保护性“审判”后，都逃之夭夭逍遥法外了。

[日]笠原一男：《日本史研究》，山川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页。

1919年8月，当朝鲜发生“三·一”运动、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列强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而“成金”梦还在困扰着许多日本人时，一个尚鲜为人知、但因在1906年自费出版《国体论及纯社会主义》而受到警察跟踪、被河上肇和幸德秋水赞赏的年轻人北一辉，在中国上海一家医院中开始了几乎在“绝食”状态下的写作。40余天后，在没有一本参考书、没有一册辞典的情形下，他凭借笃信法华经所获得的近乎偏执的精神力量，一口气写成了结构严谨、辞章整然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这本书1923年出版时更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现收录在三铃书房出版的《现代史资料5·国家主义运动2》中。当时，或许连他本人也未曾想到，这本书竟然成了此后20年间一种社会精神乃至决定1930年以后日本国家命运的社会运动的象征。

北一辉1883年4月3日出生于新潟县佐渡岛。自幼体弱多病，惟好读汉文典籍。1901年去东京疗眼疾，接触到了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等人的思想，同时又读到了黑龙会的刊物《黑龙》。1905年在早稻田大学当旁听生，翌年便写了《国体论》一书。1906年经友人宫崎滔天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1910年入“黑龙会”，此后10年间一直在中国过浪人生活。他与宋教仁、谭人凤等结为密友，反对孙中山，多次参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1916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著作《支那革命外史》。这样的经历形成了其思维敏锐却有失偏颇，窃破社会陋疾，欲以“恶”治“恶”，敢以天下为己任甚至不惜冒险和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等等性格特点，成为他撰写《改造法案大纲》的思想背景。

《法案》由三个要点组成。第一是断然使用政变手段，破坏旧的统治机器；第二是实施“国家改造计划”，建设新的国家统治机器；第三是确立侵略战争计划，建设一个地跨亚洲太平洋的大帝国。三者之间的联系其实是很明了的，但如果将其阐述的内容稍微展开一下，就会知道他的思想受到当时许多人赞成的原因。

北一辉的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的想法，是一种“清君侧”的想法。他将现在正在政坛上活跃的政党人士和军部上层人物一律视作“奸臣”。他要求立即停止行使宪法，解散议会，废止贵族院和华族制，罢免一切枢密顾问官，以比暗杀大久保和大隈重信更大的规模，将享受民脂民膏的元老和玩弄政治权术以逞私利的政党人士统统从现在的地位上赶下来。甚至提出取消天皇财产，取消皇室所有的土地、山林和股票，以恢复被奸臣们扭曲的天皇应当保持的神的本来面目。

关于新的统治机器的建设，用北一辉的话来讲便是“将阻隔天皇和国民的藩屏撤去”，代之以“辅佐天皇”的由50人组成的顾问院，通过普选设立国家改造议会和召开由“各种功勋者互选或敕选”的上院和审议院，地方知事也一律更名为国家改造知事。因为在他看来，财阀、军阀、元老、重臣、华族、高级官僚和政治家们只是将天皇当作自己权力的象征，只是他们在天皇制内部各自谋求伸张各自的权力和利益的名目。他想通过反藩阀、反官僚、反民主、反议会的途径，实现天皇亲政。

北一辉将100万日元作为私有财产的限制度，若超过这个数目者一律处以死刑。将私有土地持有限度定为金额10万日元，超过部分作为国债收买。他还主张8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学、平均分配遗产、25岁以上男子有普选权、禁止重工、国民享受教育的权利等等主张。

所有这一切主张的要旨在于建设一个天皇直接统辖下的、上下同心、举国一致的“新日本”，以实现其在《改造法案大纲》第8卷中所主张的国家的权利——建设向亚洲侵略、规模宏大的亚大大帝国。此即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当这本书油印出版后，许多对现实不满的日本青年读后感到十分新奇，以为只要按照书中的理论去实践，就能涤荡污垢，复兴日本。另一个持差不多相同主张的“博士”大川周明甚至特意去了上海，劝诫北一辉回国展开实际行动比呆在上海空发议论更有必要，并将其迎接回国。北一辉回国之后，即同大川周明一起组织了激进主义团体“犹存社”。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在评论北一辉的思想时，说他是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在理论的基点、展开的根据和最后的结论上，两者当然有天壤之别。但由于北一辉同样看到了贫富不均和社会特权现象，痛恨之并想通过他自己的办法去解决之，不仅引起了贫民和农民阶级的共鸣，而且易被一些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善良的人们误解，或被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用心良苦地加以曲解。从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主角下层青年军官鲁莽的行动来看，他们的确把北一辉激进主义思想的危险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此后，每当内阁更迭时动辄使用“举国一致”来宣传民众，也说明《改造法案大纲》对战争体制的形成的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因此，在二次大战爆发的特殊环境下，将北一辉的思想作为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原版，也是十分合理的解释。

同北一辉一样怀着共同思想的人们，在陆军内部也存在着，只不过是出于职业的限制，他们更注意行动罢了。1921年，一些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陆军担当要职的青年中坚军官，开始形成秘密集团，策划“改造国家”。10月27日，这个秘密集团的3个重要成员——永田铁山陆军少佐、小畑敏四郎陆军少佐和冈村宁次陆军少佐，人称“三羽鸟”，在德国的巴登—巴登温泉一所蒸汽浴室里聚拢了。他们光着身体泡在雾气蒸腾的矿泉中，讨论的却是决定今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他们作出了3点决议：改组陆军，掌握陆军的领导权；改进陆军装备，使它尽快地学会飞机和坦克等现代化装备作战；安排人事，选择11个人作为贯彻这一纲领的核心力量。这11人全是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和1905年的毕业生。其中有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矶谷廉介等人。陆军统制派的主要角色，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乃至太平洋战争的主犯，几乎全部包括在内。

这样，不论在民间，还是在军队，都在同时孕育着推动战争思想和行动。

华盛顿体制

1918年8月18日，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大谷喜久藏大将一抵达海参崴，就向参谋本部要求增派部队。8月24日，政府决定

增派第3师团。而在此之前的8月15日，第7师团已经占领了北满。9月5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哈巴罗夫斯克后，便一路西进，至10月末，占领贝加尔湖以东的东西伯利亚。

但是，布尔什维克军队趁冬季来临开始反攻。1919年2月26日第12师

团 72 联队第 3 大队在同苏俄军队的作战中遭到全歼。

由于气候寒冷，供应紧张，日军士气低落，烧掠村庄、残杀村民的凶虐行为频频发生。因担忧士气低下容易受过激思想感化，日军从 1919 年 3 月以来不断更换各地驻军，动员军队达到 11 个师团。司令官的参谋们也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待高尔察克反动军队被苏俄击溃后，1924 年初，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相继从西伯利亚撤走干涉军，日本军队就成了深入东西伯利亚的“孤军”。此消彼长，东西伯利亚的各城市都纷纷成立了革命政权，甚至连日军司令部所在地的海参崴也成立了临时政府。日军寻衅向临时政府展开攻击，于 4 月 29 日同临时政府签署军事协定，迫使苏俄和临时政府在乌苏里铁道沿线 30 公里范围内撤去一切武装团体。然而，3 月 12 日发生的“庙街事件”中，守护在古拉耶夫斯克的日军及其侨民大部被当地游击队杀死，剩下的悉数投降。原敬内阁 7 月 3 日作出惩罚性占领北库页岛的决定，派儿岛惣次郎中将为萨哈林（库页岛）派遣军司令，进驻北库页岛。在此之前，苏俄在扫清反革命势力的同时，为在日军和苏俄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地带，成立了以赤塔为中心、处在苏俄控制下的远东共和国。这时，成为干涉口实的捷克军团已经全部绕道返回故国，日本已处于欲“干涉”而不能的境地。6 月 1 日，原敬内阁决定撤军，至年底从哈巴罗夫斯克撤军完毕，但仍占有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北库页岛。这时，日本国内要求从西伯利亚全部撤兵的舆论已经十分高涨。耗时 4 年、耗费 6 亿日元、士气低落、军纪败坏、丑闻不断的出兵西伯利亚，至此已宣告彻底失败，原敬内阁要考虑的是如何体面一些从那里撤兵。

从美国等国从西伯利亚撤军之日起，日本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一战期间国力大大增强的日本，在其一系列扩张行动——出兵山东、“21 条”和出兵西伯利亚——中所表现出来的欲望，已经告诉国际社会，日本随心所欲地掠取利益，至少是要在亚洲称王称霸。对此一直深怀戒心的美国，和多少也曾感到担忧的英国，共同地意识到不能再让日本这样干下去了。它们注意到，至 1920 年时已经拥有军舰 238 艘、总吨位达到 86 万吨的日本海军，在当年举行的第 43 届特别议会上，又被允许再建 8 艘战列舰和 8 艘巡洋舰，即所谓“八·八舰队”计划。为了完成这一计划，1921 年全年财政支出 14.9 亿日元之中。军事费用竟达 7.3 亿日元，占全年财政支出的 49%。日本这样不惜甘冒财政崩溃之险、大肆扩充海军的举动，对英美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结果竟导致 3 国间造舰竞赛。同年，英美两国的军事费用支出各占全年财政支出的 23%。于是，在日英同盟行将到期之时，英国已无意再续同盟关系。而取代威尔逊继任美国总统的哈定，也认为有必要将凡尔赛会议的遗留问题——关于远东和太平洋势力范围的调整问题加以解决。7 月 11 日，哈定向英、日、法、意非正式提议召开华盛顿会议，8 月 13 日发出正式邀请。除上述 5 国外，还有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参加。

日本方面派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为全权代表赴会。在海军大臣离任期间，由原敬代理海相。所谓远东和太平洋问题，实质上即是以海上力量为核心的对该地区的控制与反控制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承受的军备竞赛

当年 2 月，守护庙街的日军同围城的地方游击队缔结停战协定，但日军于 3 月 12 日突然向游击队发动攻击，结果战败投降。5 月，在日军援军到达之前，游击队方面将所有日军俘虏和侨民计 700 余人杀死。

能力为后盾，会议一开幕便要求裁减海军。在美国务卿休斯的提案中，包括废除建设中的主力舰，淘汰老舰，十年内禁止建造主力舰。美国的提议显然已经同英国达成了默契，矛头直指日本。日本代表团随员加藤宽治中将不同意按 10：6 的比例，要求按 10：7 的比例来规定美英对日的军舰保有量。但是，加藤友三郎以断然承担责任的态度，压倒了加藤宽治的意见，决定接受美国提议。加藤友三郎这样地表达自己的信念：

如果不能真正地充实国力，任凭怎样地充实军备也是没用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和德国退出之后，日本要打仗也许就只有美国了。假设用军备就能有力量对抗的话，那么像日俄战争时那样，用不多的钱就能打仗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即便说可以从什么地方借到这笔钱，除了美国以外能借给日本外债的国家根本看不到。而如果以美国为敌，日本则必须自己搞钱，但这是不可能的。

这样，按 10：10：6：3.33：3.33 的比例，就决定了美、英、日、法、意 5 国的军舰保有量比例。具体地讲，主力舰保有量美、英各为 52.5 万吨，而日本则为 31.5 万吨；主力舰最大排水量为 3.5 万吨，主炮口径最大力 16 英寸；航空母舰保有量美英各 13.5 万吨，日本则为 8 万吨。条约期限为 15 年。

10：6，似乎对日本不利，但是英国要用这些力量守护整个“日不落”帝国，而美国则要将舰队分别配置于太平洋和大西洋，对于只要将所有战斗力集中在东亚即可的日本来说，这个比例仍然是绰绰有余的。

接踵而至的便是日英同盟问题。从日俄战争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日本对外膨胀抢夺利权最大依靠的英日同盟，是以英俄、英德的矛盾为缔盟主要理由的。现在，俄国和德国已暂时宣布从竞技场退出，于是，这个对英国来说已无意义的同盟相反却成了美国眼中的一枚钉子。中国早就认为该同盟成了日本的侵略武器，强烈反对让其继续留存下去。在 1921 年 6 月英联邦会议上，加拿大强烈主张废除，代之以太平洋问题主要有关国家进行磋商。英国从注重英美关系的新立场出发，委婉地拒绝了日本方面续约的希望。1921 年 12 月 31 日，美、英、法、日 4 国缔结了关于相互尊重太平洋方面各岛屿的属地以及岛屿领有的权利的条约，即《四国公约》。这个用词有些含糊的条约的惟一的明确含义，在于宣告自该条约 1923 年 8 月 17 日生效起，日英同盟就不复存在了。

这样，会议就转入了另一个最主要的议题，即中国问题。在中国代表提出的公布、审查各国的特权和废除对中国政治，司法、行政自由的限制等 10 项要求被大会否决后，会议就美国代表卢特提出的 4 项原则进行讨论。4 项原则颇有针对性的指出：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领土和行政的完整；给予中国建立和维持有力的、强大的政府以充分和无限的机会；维持在中国各国国民机会均等主义；不承认损伤友邦国民权利的特权和危害友邦安全的行动。将这 4 项原则具体化，就签订了华盛顿会议惟一份所有与会国都署名的《九国公约》。

在香港和台湾被割让、辽东半岛事实上被占领的状况下，《九国公约》第 1 款写明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颇有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自欺欺人之感。《九国公约》事实上对列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构成不了任何限制。然而，它使美国一贯主张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条约化，等于用协约的

形式否认了某一国在中国获得排他性利权的企图，批判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独占独得行径。同时，由于《九国公约》的签订，也意味着被人们理解为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的《石井—蓝辛协议》，在公约自1923年4月14日生效后就被废弃了。

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在美国斡旋下，日中两国在会外进行了直接磋商。日本答应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但交换条件是中日合办山东铁路。中国予以拒绝。最后达成中国以铁路为担保，用15年分期偿还的公债买回山东铁路。在未赎清之前，由日本人担任运输主任，矿山则以日中合力共同经营。此项协议于1922年2月4日签署，日本军队从5月5日起开始从青岛撤军。日本在占领山东期间所获得的商业利益全部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山东就成为仅次于南满的日本在华势力范围。

最后是西伯利亚问题，与会各国关心的是日本何时从海参崴等地最后全部撤兵。从1921年8月起，日本同远东共和国代表在大连谈判。由于日本要求获得在西伯利亚的利权和限制军备，使会议陷入僵局。在华盛顿会议上，迫于各国的压力，日本代表不得不声明对西伯利亚没有领土野心，谈判一旦成功就从海参崴撤兵。1922年6月，日本宣布从北库页岛以外地区撤兵；9月，经过长春会议同远东共和国的再次谈判；10月底，除北库页岛外日军从西伯利亚撤退完了；11月，远东共和国就同苏俄合并了。

华盛顿会议于1922年2月6日闭幕。同日，两个主要协约海军军备条约和九国公约签署完毕。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善理工作，竟是在亚洲和太平洋问题上结的，不由得让人们感到有趣。其原因就在于当欧洲各国忙于打仗时，日本竟在亚太地区趁火打劫。从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四个结果来看，缩小海军军备、签署《九国公约》、达成四国协议和解决西伯利亚遗留问题，需要日本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必须承认自己是次于英美的海军国家；将山东权益的大部分归还中国，日英同盟寿终正寝；承诺从西伯利亚撤兵和被告知日本不拥有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不能不使人认为华盛顿会议专门是为制裁日本在一战期间的抢劫行为而召开的。

以往的研究对华盛顿会议的评价，诸如帝国主义列强调整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美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确立霸权，与凡尔赛会议一起共同构成反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阵营等等，都是中肯的。但是有必要加以特别强调的，是日本同意将掠夺物的大部分交出来，这就表明它也承认了华盛顿会议所建立的协调体制对自己具有约束力。日本之所以甘心服从这一体制，正如加藤友三郎的发言所表明得那样，经济实力不能给美英以致命打击，而且在贸易和外债问题上还必须依赖美英两国。以华盛顿会议为契机，甲午、日俄战争以来持续向外扩张的日本战车似乎应当刹一刹车了。日本要么顺应这个体制，要么就将受到这一体制的惩罚。以原敬为代表的政党力量和现行内阁决定执行协调外交的方针。似乎是膨胀政策转向的象征，1922年2月1日，即华盛顿会议闭幕前5天，资格最老的军阀山县有朋死去了。

1922年华盛顿体制所形成的来自俗世间的限制，和1923年源自自然界的关东大地震的袭击，是近代日本近60年来“顺调”发展抵达终点、行将走向反面的确凿的表达。然而，今天的历史学者回顾1868—1945年日本历史时很轻易就能发现的这一看法，在当时却鲜有人感知。政党政治家相信协调外交、产业立国和守护既得利益，就能够继续获得国家的新利益。石桥湛山的放弃中国东北和朝鲜利权的呼吁实在太微不足道。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反对

国际协调和缩小军备的势力开始积聚起来。“犹存社”解散后，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分道扬镳，各自经营自己的秘密组织。“三羽鸟”从巴登—巴登归国后，在陆军内部佐官级军官之间成立了军内秘密团体“二叶会”。民间和军队但主要由陆军推动的“国家革新运动”从1922年以后正式起步。

第 20 章

帝国困厄

昭和改元

大正天皇嘉仁因生过脑膜炎，所以被大多数人认为缺乏理政能力。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从登基时起此后七八年时间内，他依靠西园寺和大隈等几名重臣，应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也时刻注视着国内政局和民情的状况。他热衷于学习西方典籍，又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专制者。他时常穿戴德国骑兵式的服饰，蓄着胡子，有时甚至亲手鞭笞失职的内侍。但是，1919年夏，当凡尔赛和会还在继续时，大正天皇开始得了以后连续发作的脑溢血，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大正的病虽秘而不宣，但他走路蹒跚，双手发抖，记忆衰退，已是宫中贵族和侍从有目共睹、尽人皆知之事。在检阅一年一度的秋季陆海军演习时，他不可思议地走下检阅台，亲手打开一个士兵的背包，看看里面装了一些什么物品。在议会开幕时，他居然将要宣读的诏书捻成一个纸卷，像用望远镜那样窥视议员们。

大正天皇的病势，使日本的政治生活顿时失却了中心。这时，皇太子裕仁便格外地引人注目起来。1912年9月9日被立为皇太子之前，他一直跟随乃木希典学习修身之道。乃木自杀之后，安排裕仁学习的主要导师是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东乡精心组织了一个教师小组，裕仁在这里学习了法语、德语、武士道、数学、历史、机械、化学和生物进化论。向裕仁讲述伦理学的是杉浦宪冈，他着重向裕仁阐释三件神器的真谛，并向裕仁讲述雅利安族的强大和中国的衰退。

在裕仁 17 岁那年，他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选择了良子为未来日本的皇后。这件事 3 年后成为使元老山县有朋最终失去政治影响的起因。当裕仁初定良子为妻时，山县并没有立即反对。慢慢地，山县感到有萨摩岛津氏血统、其叔怕又是不太喜欢自己的亲王东久迩宫和朝香宫的良子与未来天皇结婚，会不利于自己，他认为有一个阴谋正在向他进逼，最终将彻底地使裕仁与自己的关系疏远。于是，山县就以良子有色盲血统会玷污皇统为由，策动手下亲信明确要求解除双方婚约。此举被大正天皇和节子皇后制止，山县由此失势。该事件被称作“宫中某重大事件”。在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裕仁一直保持着沉默，但他显然对山县的干涉是不满的，因此一直恪守婚约，并于 1924 年 1 月 26 日与良子完婚。

1921 年 3 月 3 日，经过长期准备以后，裕仁率领由 15 名侍从官和海军军官组成的随从队，出访欧洲。此举的目的，除了裕仁想走出书斋和皇宫领略一下欧洲文化的异趣之外，似乎还带有重修英日同盟的目的。船队经新加坡、锡兰，在埃及登陆小憩 4 天后，直航英国朴次茅斯港。在英国，他参观了飞机厂和造船厂，同英国军方讨论了一战时期英国陆军的编制，访问了英格兰民俗，出席了一连串宴会应酬各方来宾，并去了一趟比利时看了一战战场；在德国，他又视察了炮兵学校，顺访了荷兰，观看飞机坦克表演；最后，裕仁经意大利回国。

裕仁回国之后，被普遍认为具备了执政的一切资质。这时，山县有朋身患重病已去日无多，不久后原敬又被一个叫中冈良一的年轻人刺死，大正天

皇病势日甚不能主政。在这种情形下，1921年11月25日，皇室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裕仁代替大正任摄政。这是近代以来惟一的一位摄政。实际上，从此时起，裕仁已经接管了一个有5600万人口的、其发展速度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快的国家。摄政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任命西园寺公望为元老，长期负有为他人推荐内阁首相的使命。摄政遇到第一桩棘手的政务是关东大地震。摄政的第一次涉险是在1923年12月27日。在近在咫尺的距离内不可思议地躲过了社会主义青年难波大助射向他的子弹。

1926年11月11日，宫内省首次公布天皇的病情：时坏时好逐渐恶化。在天皇养病的叶山御用官邸（神奈川县三浦郡叶山郡），皇族与政府官员络绎不绝前往探视。居住区周围的居民、儿童，青年团员和在乡军人会的会员，自发地组织起来，轮流在官邸前祈愿天皇早日康复。同明治死去前夕不同，祈祷天皇不要死的人们一般不是个人而是有组织的团体，特别是12月9日天皇并发肺炎的病情公布后，祈祷天皇康复运动遍及全国，各地的寺院和神社不停地接待前往参拜的人们。据大阪《朝日新闻》报道，1926年12月10—23日，共有223个团体前往大阪府辖下神社参拜祈祷。而前往名古屋的热田神宫祈祷的团体达到252个，共2.7万亲人。参拜祈愿的团体中，以学生、在乡军人会和劳动组合为最多。12月16日，大正天皇的病势恶化的消息公布后，有人在祈祷时自杀。接下来，祈祷运动便向“自肃”运动升级。佃农争议、电车工人罢工甚至政党的演说会和成立大会，都因天皇病危而一律改期举行或自行取消。

在因大正病重而不得不设摄政的情况下，民众并没有对设摄政事表示过异议，但天皇病危的消息却像冲击波一般震撼了民众的心，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对天皇的尊崇是如何深入人心，民众又是怎样牢固地被国体观所束缚的。对执政时间最短的大正天皇的祈愿运动，超过了民众自发的个人或家族形式为主的对明治天皇的祈愿的规模，也是昭和病笃时不能比拟的。其原因除了民众真诚地尊崇天皇外，似乎还有一种对当时国家在发展途中已经走到三岔路口时的担忧。

1926年12月25日凌晨1时25分，嘉仁天皇病逝，摄政裕仁立即践祚，凌晨3时15分在叶山御用官邸从神官手中接过剑玺，继承了皇位。叶山聚集着所有的皇族和全部政府官僚。若槻礼次郎内阁召集内阁会议，取《诗经》“百姓昭明，万邦协和”之意，改年号为“昭和”。上奏新天皇后，枢密院会议通过新年号，决定从12月26日起，改元“昭和”。12月28日，新天皇举行登基后的第一大礼“朝见之仪”，向以闲院宫载仁亲王、西园寺公望和若槻首相为首的陆海军军人、枢密官和内阁官僚们下达敕语。对西园寺公望的敕语是再一次确认了他的元老地位。翌年2月7日，在新宿御苑举行了大正天皇的葬礼。全国所有官厅、公司、学校一律放假，全国百姓都向着大正天皇葬处八日多摩陵方向致遥拜礼。

然而，比起这些来，更大规模地宣传天皇尊崇感和国体观的契机，是1928年11月在京都御所举行的即位大礼。新天皇的即位是大日本帝国最大的盛典，在警视厅营建的肃杀的氛围中举行。京都从8月1日起就进行了户籍调查，实行严厉的警备。不仅从全国调集4071名支援警官，而且又动员了消防队员、在乡军人的青年团员等1.6万人作为辅助警官。特别高等警察的活动更具森严，从8月1日起3个月内共进行了7次人口检查，对12.06万余人进行了重点审查，发现可疑者814名，拘留其中310名。对朝鲜人的警戒尤

为苛厉。

另一方面，似乎是在显示作为日本人的荣幸，国民对即位大礼的关心与感激程度，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1月6日一早，天皇从东京站坐电车去京都时，有20万人前往跪拜送行，其中绝大多数人彻夜未眠一直守候在车站。翌日午后抵达京都时，正逢降雨，但冒雨通宵迎候者竟达30万人之多。天皇从京都返回东京时，送行的人群更是达到58万人。在11月10日行即位礼，14日夜到15日凌晨行大尝祭，16日到17日大飧之时，全国各地所有国民载歌载舞，举行各种祭天祀神的传统宗教仪式，无不沉浸在感激和自豪的心情之中。在绝大多数国民都企盼新天皇即位能给国家和民族继续带来好运的热烈的气氛中，也有人感到某种难以言状的危机正在逼近。三宅雪岭在《同时代史》中忐忑不安地写道：

大礼可喜可贺顺利结束了，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是容易明白的。但国内的情况与国外的情况相互关联，于不安之空气漂泊之中连续发作，其结果究竟如何实不可测，吾深忧之。无论国内国外都有不安全之处，其将如何发展却不知晓。任凭人们各自臆测，要紧的是它在没有抵达应该抵达的地方是不会停止的。而其到底将走到哪一步却全然不清楚。恰如影随光至，安定之侧常有不安定存在。若不懂得此理，则有不安定分子潜至，而经数年后才渐为人知。总之，和平会议似有使国际关系安定之感，然此实似于火山之上踏舞，不知何日便将爆发。

币原外交

常常被人们视为凡尔赛体系的继续的华盛顿会议，在其功能上与凡尔赛和会有本质的差别。凡尔赛和会侧重于一战战后的善后、调停，而华盛顿会议则侧重于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战争爆发之前，先确定一个预防性的国际契约。这个契约并不是简单地要求各与会国恪守约定，它明显地带有对违背约定行为的惩罚暗示。而这个暗示的主要针对方面自然不是为这个协定提供力量依据的美国，而是对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觊觎之心由来已久的日本。虽然它并没有要求任何一个与会国放弃已经获得的在中国的各种利权和势力范围，但以卢特四原则为趣旨通过的《九国公约》，不仅重申了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张，而且也给予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以理论上的承认。

从原敬内阁的后期始，政府决定了与这个体制相适应的方针，有如前述。但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课题——既要遵守许诺，维持中国和太平洋现状，又要对付在中国不断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运动。自1924年护宪三派组阁至1930年所谓“政党政治”的高峰期，是日本接受华盛顿体制约束、执行所谓“协调外交”的时期。具体负责这一外交政策的执行者是曾4次出任加藤、若槻、滨口和犬养毅内阁外相的无党派人士币原喜重郎。在第49届议会以后连续几届议会外交施政演说及质询答辩中，他屡屡提出协调和不干涉主义的外交方针。对币原的答辩，有人喝采，有人痛斥。从社会右翼和军国主义分子对币原“软弱外交”的批判来看，币原外交是近代日本在其达80年持续坚持向外膨胀的过程中，所实行的有限度的自我克制和短暂间歇。

币原“协调外交”包括两个重要概念，即他在第49届国会演说中提出的“正当权利”原则和“相承主义”原则。关于“正当权利”，币原说：“帝国外交在于拥护增进我之正当权利利益之同时，尊重列国之正当权利利益，

从而以确保太平洋方面之和平、进而维持全世界和平为根本主义。”关于“相承主义”，币原说：“一国政府公开与外国所作的约定，不管是否根据条约，也不论国内内阁有何更迭，不得因此种更迭而更迭。”

一言以蔽之，“正当权利”是“前后相承”的。问题在于，何为“正当权利”？在币原看来，凡日本以条约或协定为依据已经取得的“一切权利”就是“正当权利”。具体所指的就是：殖民地——朝鲜和台湾，势力范围——中国东北和东蒙，南太平洋日属3个群岛，以及在中国获得的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各国应当重视日本的“正当权利”，日本也重视各国的“正当权利”。日本和各国的“正当权利”相互承认、彼此协调，以维持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格局。根据这种设想，日本积极地调整了日美、日英、日苏关系。而调整这些关系的主旨，在于不触犯强国利益或取得强国“谅解”的前提下，开展对华外交。

据统计，在本世纪20年代，日本主要输出品依次为生丝、棉布、绢和棉纱，主要输入品依次为棉花、钢铁、大米、油类、机械、羊毛、砂糖等。以1919年为例，输出总额为21亿日元，输入总额为21.7亿日元，大抵相当。向美国和欧洲输出生丝以换取工业品钢铁、机械，向中国输出工业品棉布棉纱以换取棉花等原料，是战前日本贸易循环结构。要使其维持下去并产生良性循环的结果，需要一个前提。即生丝输往美国和欧洲、棉纺织品等商品输往中国和印度必须畅通无阻。惟此才能维持平衡，争取出超。生丝出口量从1900年到1929年增长了7倍，棉纺织品出口量同期增长了15倍。虽然生丝仍是第一宗输出品，但主要是靠家庭工业或作坊生产的传统产品，棉纺品则是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工业品，其生产额和输出额有与生丝持平的势头。所以，它的增长尤为重要。

向中国输出的棉布棉纱占全部日本棉纺织品输出总额的30%强，而美国对华输出仅占其全部输出额2.5%、英国只占2%，日本对华输出竟占其全部输出额的25%。对华输出是日本资本主义生命攸关的大事，由此可见一斑。这就是币原为何费尽心思提出协调外交、而其重心却是对华外交的原由所在。

为了分析币原所执行的对华外交政策，需要对1924年以后涉及日中外交关系的几个事件加以剖析。

自1920年经济危机以来，日本资本主义在加强向中国输出商品的同时，采取向中国直接投资的方式，以廉价原料、廉价工资榨取超额利润。1922—1924年，中国从日本、英国进口的棉纱和棉布，年平均价值为6.85亿两，其中日本占3.07亿两。1920—1924年，日本共在上海、青岛等地开办12家纺织工厂。截至1924年底，日本在中国共有17家纺织厂、纺锭1062288枚、织机5325台。在数年间，日本在中国的纺织业投资已经超过英国。仅以英国在华势力中心上海为例，1924年日本纺织厂共拥有纺锤913376枚，而英国仅有262884枚。日本向中国输出商品和资本，不仅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形成矛盾，同时也与英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五·卅”事件发生后，面对中国人民的抵制运动，币原制定的对策正是从上述两个前提出发的：竭力缓

[日]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9卷，538页。

东亚研究所编：《日本对华投资》，原书房1987年版，第215—217页。

[日]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82年版，第197页。

解中国人民的反对日本资本主义压迫的情绪，并利用这一时机加强与英国竞争。所以，当英国向日本提议共同出兵镇压时，币原对英驻日大使查尔兹表示：“以强制力压服政治觉醒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反而会激化运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考虑将侨民临时向安全地区转移。”币原充分估计到英国的强硬对策一定会遭到中国人民更强烈的反对，故予以拒绝。币原一方面指令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对运动保持沉默，对某些日本人趁机煽动中国群众反英情绪的举动采取冷静、不怂恿态度，以免弄巧成拙，引起中国人民更大的反感；另一方面，又指示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材锐市召见纺织界的代表——大日本纺织副社长福本元之助和内外棉纺织公司董事大谷登，要求他们满足罢工工人的部分要求，向中国工人妥协。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沙基惨案”发生后，日本抓住这一时机单独同中国政府谈判，议定日本向死伤者偿付1万美元，向罢工工人偿付10万美元，解雇2名日本职工，并承认了工会。于是，以“沙基惨案”为转机，中国人民的抵制运动和“三罢”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了英国。这样，币原以妥协和克制的外交手腕缓解了中国工人及各界群众的反日情绪，同时，排挤了英国的权益，在这一场外交危机中获利。

根据华盛顿会议的规定，中国要求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关税特别会议于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币原对中国贸易一向最为关注，所以在会议开始前先作了周密的调查。通过他的助手佐分利贞男、谷正之、堀内干城等，币原了解到中国一定会在会议上立即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对此，英国和美国当然不会马上赞成。英国的理由是中国内战尚未平息，美国则可能提出以撤除“厘金”为交换条件。

日本代表曾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不能过早地将中国关税提高至12.5%，而应当按商品的级别制定等级税率。币原是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全权代表，根据所谓外交前后相承主义原则，他也不能轻易放弃等级税率主张，但是又必须同美、英、中取得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此时，苏联已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同中国清政府之间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先生在《北上宣言》中也提出撤消不平等条约问题。鉴于此，币原仔细观察了中国时局的进展，不能不承认近来中国国民所表现的“政治逐渐觉醒之征候”。于是，币原确定了参加北京关税会议的总方针：

1. 必须以实现差等税率为日本的最高目标；
2. 率先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以争取主动，并利用中国对日本抢先承认关税自主权之好感，实现差等税率。

果然，当12月26日北京关税会议召开、中国代表王正廷在会上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要求后，英国等国表示反对，但日本代表日置益却表示：“中国今日痛感之各种艰难障碍及困惑，吾人曾亲身经历，日本全权（代表）以同情与了解，对中国立场作友好理解……，有充分准备对中国全权代表提出议题中有关关税自主权问题加以极其友谊的考虑。”日本态度似乎情真意切，以致日置益走下讲台后，中国代表立即向他表示了感谢之情。

其实，币原的真实用意不在于承认中国收回主权。在他看来，尽管中国

[日]马场伸也：《通向满洲事变的道路》，中央公论社1972年版。

[日]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9卷，第690—691页。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94页。

必定会实现主权独立完整，但那是几年或十几年之后的事。币原的真实意图在于：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中国不能生产的商品或奢侈品。而日本向中国输出的商品，大部分是中国自己也能生产的。币原最怕英、美等国提出的、为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在中国实现国定税率之前，一律征收从价 2.5% 的附加税（奢侈品 5%）。这样，日本的输出品起码要交 7.5% 的关税，这不仅将增加日本商品的成本，而且会削弱其对中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力。因此，币原宁肯接受差等税率，也不肯交 2.5% 的附加税。结果，1925 年 11 月 19 日的会议上，原则上承认了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但要从 1929 年 1 月起才能实行国定税率，此前应当执行差等税率。1926 年 3 月，会议确定了 7 级差等税率。A 级为 22.5%，以下依次按比率递减，G 级为 2.5%。根据差等等级别，日本有 60% 以上的输出品只需交 2.5% 的关税，18% 左右的输出品只需交 5% 的关税。所以，日本在中国增加的 9000 万美元关税收入中，只承担 19%，而美国为 28.8%，英国和香港总计为 37.5%。再加上中国将撤除厘金、整理外债（对日本是西原借款）作为条件，日本的损失不大。因此，在北京关税会议上，币原外交彻头彻尾地贯彻了日本财界的一切意图。

1927 年 3 月 24 日和 4 月 3 日，在南京和汉口先后发生了北伐军下级官兵和群众同英、日、美帝国主义当地势力的冲突事件。

南京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在其军队士兵有微小伤亡、侨民及使馆受到一些冲击的情况下，拒绝参加英美等国出动军舰炮轰南京的侵略行径，坚持以外交手段寻求解决途径。但是，10 天后，汉口也发生同样性质的事件时，日本却派 200 多名海军陆战队登陆，以保护侨民为由，用机枪驱散中国人民群众，并打死打伤 17 名。相隔不足半月，日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原因何在？

北伐进程中，北伐军内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立，国民党内部右派与左派的分歧，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和“迁都事件”显露出来。克复武昌后，国民党左派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迁到了共产党控制下的武汉。很明显，武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阵营。而当武汉政府成立时，蒋介石已抵达距离南京不远的芜湖。

“南京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就将具体经过及一些动向报告了外务省。其中谈到：1. 第六师师长戴岳在事发后三小时，以本人和党代表的名义派兵守卫使馆，并发布告示，“严禁进入外国人住所，违者就地枪决”；2. 当日，蒋介石抵南京，立即下令解散共产党南京支部；3. 第 17 师师长杨杰向他赔礼道歉时表示：“掠夺皆因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煽动并带领士兵所为。”在另一份报告中，森冈又称：“此次南京事件，乃第 2 军、第 6 军及第 40 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中党代表及共产党下级军官和南京共产党支部事先准备的计划……，蒋介石以下各军长各师长以本事件为颇大遗憾之事，表示努力取缔之诚意……”这两份报告已明白无误地告诉币原和外务省，蒋介石同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存在着尖锐矛盾，并摆出了镇压共产党的态势。币原当然深悟其中利害，他在召见英、美驻日大使时，对蒋介石的处境表示同情，又告诫蒋介石应立刻下决心向各国赔偿道歉，并指令上海领事矢田会见蒋，要求蒋负责解决南京事件，维持上海治安。

[日]卫藤沈吉：《东亚政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第 152—153 页，第 154 页。

[日]卫藤沈吉：《东亚政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第 152—153 页，第 154 页。

东方会议

正当币原极尽外交手腕同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反帝运动周旋时，批判币原外交软弱无力、劝戒其中止“忍隐自重”政策、向“积极雄飞”政策转换的社会呼声日甚一日地紧迫。政友会不甘于自己的在野党地位，千方百计地寻隙推倒宪政党内阁，以图再执大权。这样，1927年4月发生的金融危机就使若槻内阁面临窘境。政友会猛然推动倒阁运动，枢密顾问官伊东已代治又在枢密院会议上否决了若槻内阁为解决金融危机而提交的紧急敕令案，迫使若槻内阁总辞职。田中义一被西园寺推荐为后继首相组阁。田中曾任参谋次长、陆相，是山县死后长州阀的代表，陆军大将，在高桥是清引退后又成为政友会总裁，田中在政友会大会上发表演说，表示“我帝国乃东洋之盟主”，对中国“要提出特别的措施”。他自己兼任外相，外交事务一概托付给出身三井财阀、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

田中内阁上台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为阻止中国北伐军北上，以保护侨民为由，在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情况下，竟然出兵山东，迫使蒋介石暂时停止北伐。

正当日军出兵山东之际，由森恪一手策划的东方会议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出席会议者为外相、陆相、海相以及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有关人员，以及担任对华外交的外务省官员。讨论的议题是在北伐军节节北上的情势下如何决定对华政策。

与会各方的意见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关东军方面的意见是：策划东三省自治，敷设新铁道，开垦土地，采掘矿山，设日本人行行政、财政和军事顾问。若张作霖支吾搪塞，则“推举帝国以为之适当人选作东三省长官”，如“有拒绝我之对满蒙政策之实施，则断然排斥之，必要时准备使用武力”，主张采用强硬政策。而田中首相本人认为，为确保南满洲统治权益，应当继续利用张作霖。

对此，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材锐市认为，仅利用张作霖一人乃短识之见，且张作霖在中国根本无人支持，宜选择合适的人物取代张作霖，以对付北伐。

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则表示，即使张退回奉天，也只有继续利用张为满洲当权者，别元良策。森恪、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则具体提出了满蒙分离构想，将该地区“从中国本土割开，……使日本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和地区”。

东方会议的结果是十分暧昧的。关东军的意见既未被采纳，又未被说服放弃。最后形成的结果，折衷了各方意见，形成了文件《对支政策纲领》。其要领为：1. 满洲是关系日本国防及国民生存之重大利害地区，在满蒙“如有侵害我特殊利权地位之虎时”，则须“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的措施”；2. 在中国本土则在支持“稳健分子”之同时，镇压“不逞分子”，并决心对在华居留地实行现地保护政策。由于这份纲领没有对军部的意见作出明确答

参谋本部编：《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岩南堂书店1971年重印本，第46—47页。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97—101页。

[日]白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塙书房1971年版，第52—54页。

[日]山浦贯一：《森恪》，1940年版，第599—600页。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01—102页。

复，因而将巨大的危险深深地掩藏起来，成为军部狂热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单独行动的隐因。

为了对付中国北伐战争的特殊形势而召开的东方会议，不仅本身是秘密的，而且达成的对策也是秘密的。1929年在日本召开的讨论所谓满洲问题的第三次太平洋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了一份名为《田中奏折》的文件，指证这是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上奏天皇的奏章。该奏折表明，日本企图征服满蒙，进而征服中国，最后征服全世界。由于其内容不仅说中了军国主义分子的欲望，而且也与其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过程大体吻合，所以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当时就指出其行文上的许多矛盾和失误，认为这是伪文书。争辩其真伪性，在本世纪3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当然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意义。时至今日，则仅有学术性研究方面的价值了。日本学者一般都否认《田中奏折》是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上奏天皇的内奏，也有中国学者倾向于田中奏折并不存在。

实际上，在中国方面正式诉诸国际社会《田中奏折》之前，1927年12月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就刊出了《帝国对满蒙的积极政策》一文，此即《田中奏折》的前名。文章一经刊出，舆论界就掀起轩然大波，短时间内在中国就已是家喻户晓。这种情形，无意识地掩护了在东方会议上提及的“稳健分子”的活动。这个“稳健分子”就是当时还高举继承总理遗志的大旗率军北伐的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的“稳健性”是在他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就得到日本方面确认的。当时还在外相任上的币原，命令日本驻芜湖代理领事面谒蒋介石，要求蒋收拾南京事变。得知蒋去了上海后，币原令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与蒋接触。矢田设法通过中介人黄郛与蒋接上头。密谈后，蒋不仅痛快地答应了赔偿日本在南京事件中的一切损失，而且还趁机向矢田透露了自己准备整肃共产党的决心和计划。

待田中外交取代币原外交出台后，出兵山东的举动本身就证明了田中内阁并不满足于蒋介石反共。如果北伐的最终指向是打倒盘踞北京城的奉系张作霖的话，势必将波及到日本的特殊利益满蒙地区。日本断断不能坐视蒋的“统一”将东三省也一并“统一”进去。于是，蒋与日本进一步接触的必要性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接触的主题很明显，即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应当或必须在何等程度上考虑日本的利益，“统一”的地理局限在哪里。尽管这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但仍重兵在握，绝对是惟一够资格同日本讨价还价的关键人物。

根据东方会议的判断，如果北伐军一旦渡过黄河，则张作霖就很可能在战争中失败。如张作霖失败，必退回奉天。若把顺势追击的北伐军引进中国东北，事态就不好收拾了。于是，在同蒋接触之前，田中先派山梨半造去游说张主动放弃北京返回奉天，终于使张就范。而此时蒋介石也恰到好处地来到了东京。蒋介石到日本表面上的目的是向宋美龄求婚，但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就再举北伐一事同日本磋商。蒋一下榻于日比谷帝国饭店，便同自己的老友、参谋本部部长、后来南京战役的总指挥松井石根取得了联系。松井将蒋

从行文看，奏折在转奏人、大臣副署、用语和篇幅上都存在明显伪造痕迹。参见邹有恒《“田中奏折”真伪论》，刊于《外国问题研究》1994年第1期。

[日]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埤书房1971年版，第38页。

接到自己家中，立即同森恪确定了蒋介石同田中义一晤谈时间。头山满和天皇的表兄弟们也访问了蒋介石。据当时的国务大臣、企画院总裁铃木贞一回忆，蒋介石同田中的密谈，安排在风景雅静，人迹罕稀的箱根举行。森恪和张群是双方各自的陪同随员。会谈伊始，田中便直接了当地发出劝告，希望蒋介石专心巩固在中国南部的统治，放弃北伐。若如此，日本将尽最大可能予以援助。但是，蒋介石拒绝放弃北伐。田中就暗示日本最大的、惟一的心愿是维持满洲的治安。对此，蒋介石则回答：“中国之所以产生排日运动，乃日本援助张作霖之故。中国国民十分厌恶军阀，并认为军阀的靠山是日本。所以，日本应当帮助国民政府，早日完成革命，以消除国民的误解。如若这样，则满洲问题容易解决，而排日运动自应绝迹。”最后达成密约：日本援助蒋介石完成“统一”，并支持打击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作为回报，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并且保证对日本人在长城以北的行动只表示象征性反对。从这个密约的内容来看，日本实现的是最低要求，而蒋介石则实现了自己的基本要求。后来的事实是，蒋介石于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4月7日发布北伐宣言。5月1日，国民革命军击溃山东北方军队，进入济南。

3日，同日军发生冲突，演成巷战。在日军向蒋介石发出通牒并增派军队至1.5万人占领济南的情况下，蒋介石没有给予任何答复，仅命令军队主力绕过济南继续北上，进入济南的军队停止同日军接火。不久，北伐军便进驻天津，兵临北京。

正当张作霖迫于日本的强硬劝告退出北京时，长期以来一直视并不乖顺的张作霖为障碍的关东军指挥部，已作好了出动军队赶张下野再立新傀儡的准备。但张警觉地同日本先签了北满新铁道铺设协定，使田中义一再一次认为张尚有价值，阻止了关东军的计划。眼见大好机会逸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焦虑不安。这时，他从建川美次陆军少将的部下田中隆吉大尉那里得知张作霖将于6月4日凌晨乘火车返回奉天。于是，河本便精心布置下了一个阴谋：预先在沈山线沈阳车站附近皇姑屯车站的一个桥洞上安置了三包炸药，引爆装置控制在附近的一个小山包上，同时雇用三个中国士兵来放哨。三个陪同张作霖乘同一列火车回奉天的日本军官中的二人中途下了车，只剩下义贺少佐继续陪同张打麻将。东方欲晓，河本按照杀人灭口借尸嫁祸的预谋，向三个中国士兵突然袭击，刺杀其中二人，剩下一人却幸运地逃脱。当火车驶近爆破点时，义贺少佐从自己的卧铺上取下毯子，跑到公务车上，裹住身子躺在后面车门的过道上。当张作霖的专列经过爆炸点时，顿时烈焰迸发，浓烟弥漫，卧车被炸出铁轨，张作霖身负重伤、不久身亡，吴俊升等16人全被炸死。惟有义贺战栗了一下，从公务车上跳下，兴奋地高呼：“呀，好可怕呀！”

经济危机

1924—1928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安定，以对美输出生丝、对华输出棉织物和资本为中心的日本对外贸易，也一时趋于平静。从1924年起，连年居高不下的外贸赤字额开始下降，

至 1929 年 6 年间每年分别为 6.4 亿、2.6 亿、3.3 亿、1.8 亿、2.2 亿和 0.67 亿日元。虽然没有克服入超状况，但总体局面是在好转。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一时期经济的显著特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涉，在原内阁时期就已经开始，而且也推行得十分坚决。但这一时期除了各类产业的归并组合仍在继续之外，重要的是，宪政党政府于 1925 年颁布了《重要输出品工业组合法》和《输出组合法》，尤其是后者，堪称世界最早的政府干涉强制卡特尔法。颁布这一法令的目的在于通过干涉，对重要输出品产业（生丝和棉织物）进行保护，并强化对与输出方面相关的生产集中，这包括制丝、纺织、钢铁、煤炭、用电、铁道和重化工业等。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国家干涉的重要手段，国家资本对社会资本的介入也在增加之中。1925 年时，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 30% 左右，但由于国家资本全部集中在若干产业（比如在铁路、道路总资本中竟占 66%）之中，所以毫无疑问地起到了支配的作用。

自原内阁始，至护宪三派内阁时强化的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对于加速垄断和形成有助于输出的生产合理化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些政策却都是基于一种主观的愿望——即快速地让日本经济强大起来的意向而制定的。所以，在收取短期效果的同时，也使一种危机正在从中滋长起来。历届政党内阁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势头，一直在采取救济对策：由日本银行发放救济贷款（政府向日本银行提供补贴），挽救在垄断过程中濒临危机的大量企业。这种政策的消极作用是，因为它并不能彻底地改善为数众多的经营不善企业的财政状况，所以就将本来应该在竞争和垄断中消失或被吞并的企业得以苟延残喘，使得小型的局部性的危机连续发作且向慢性转化。而政府的这种补贴措施，势必加重财政负担，惟一的后果便是形成对通货膨胀的依赖。因此，政府贷款⇒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汇率下跌⇒输出不振⇒贸易入超⇒政治危机，这条互为因果的反应链已为有识之士所明察。

在政府的这一政策的制动下，银行不得不长期担负着向各类企业提供数量颇大的固定化的资金的职能。由于相当一部分贷款并不能如期回收或无望回收，银行的经营就陷入长期危险状态之中。依靠政府和日本银行的救济以及短期借贷，企业维持着摇摇欲坠的业务。1927 年 3 月，政府为了促进企业合理化和振兴银行，向议会提出震灾票据处理案。在审议过程中，有“毒舌”之称的政友会议员吉植庄一郎尖厉地质问政府，要求就震灾票据的内容向全体议员作说明。因为有不便公开的内容，藏相片冈直温的答辩有些支吾，因此更遭致在野党议员的攻击。情急之中，片冈不慎说出：“就在今天中午，渡边银行马上就要破产。”

渡边银行的全名为“东京渡边银行”。当片冈在国会答辩时，该银行还在营业，表面上根本看不出破产的征兆，实际上却正为支票兑现资金缺乏而向日本银行求急，但好歹算是凑到了钱，将当日的业务对付了过去。这样，藏相片冈的发言就成了“失言”。第二天，渡边银行借机宣布停业，引起大小储户的不安。二、三流中小型银行相继出现“挤兑”风潮。中井银行宣布停业之后，犹如决堤之水，八十四、中泽、左右田、村井、久喜、山城、桑船、浅沼等 8 家银行相继停业，并且引发琦玉、京都、岐阜各府县许多银行面对挤兑，宣布停业。这就揭开了金融危机的序幕。在野党攻击说，是片冈藏相的“失言”导致了金融危机，因而向众议院提出了谴责藏相失密的决议。

所谓震灾票据处理案，实际上包括《震灾票据补偿公债法案》和《震灾

票据善后处理法案》。因 1923 年 9 月 1 日发生大地震而难以兑付的各种票据，根据山本权兵卫内阁的决议，以 1 亿日元为限款，进行比率补偿。而这些票据的期满日为 1925 年 9 月 30 日，因为灾后经济长期不景气，一直无力对此进行处理，已经两度延宕。至 1927 年 9 月 30 日，若再不处理就要第三次延期。按内阁决心要对此进行结算的两个法案的规定，以 5 分利公债对震灾票据进行结算的话，那么，公债总额要达到 1.7 亿日元。这时，拥有震灾票据的银行和支付人就成了议会审议的焦点。政友会认为执政党宪政党内阁是想通过这两项法案救济倾向于自己的政商。

根据调查，拥有震灾票据的银行从北海道到殖民地台湾共有 50 家。其中最大的拥有者是台湾银行，总计超过 1 亿日元，以下是朝鲜银行等。而最大的债务者是地处神户的铃木商店，总计达 7000 万日元以上。这时，疑问就油然而生：以台北为本店的台湾银行和特别是以神户为据点的铃木商店凭什么成为最大的被救济者？

在一次大战的“成金”风潮中脱颖而出的铃木商店，由于金子直吉专务有勇无谋的“积极经营”，一心要想以从事压过三井、三菱的规模开展贸易业务，向化学和重工业投下了巨额资金。但是，它投下的资本并不是自己的钱，几乎全是借入的贷款。正当铃木商店投出巨额资金之后，1920 年经济危机突然袭来，使其财政一下子出现亏空。自明治后期以来，铃木商店一向靠向台湾银行借贷支持经营，于是就将台湾银行也拖入泥淖。为了避免两方同时破产，台湾银行只好忍痛强作精神，以期铃木好转后再补亏损。不料，此后铃木的生意一直恶化，向台银的借贷有增无还。百般无奈之计，恰巧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铃木商店和台湾银行就将地震作为天赐良机，庞大的借贷债务一下子便变成了救灾票据，可以无限期延滞结算了。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台湾银行、朝鲜银行与久原商事、东京渡边银行与甲州地方的财阀谷尾家族等借贷关系上。由此可见，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当然不是法冈藏相的“失言”，亦不是关东大地震，而是在“成金”风潮中投巧心理所驱使的冒险经济活动。

由渡边银行引发的挤兑风潮，进而对大手银行也形成了压力。三井银行、横正金银行、藤本银行、川崎银行和安田银行等，都感到资金吃紧。台湾银行于无奈之中，通告冻结对铃木商店的融资，迫使与铃木商店业往来紧密的神户地方的小型银行第六十五银行宣布停业，进而导致整个神户地区的金融界立刻处于混乱状态之中。这样，更大规模的第二波恐慌从此开始。

这时，台湾银行只剩下资金 4200 万日元。为了阻止其破产，政府命令日本银行给予其特殊融资，但枢密院会议在审议时却否定了政府的这一救急措施。这样，台湾银行在日本的分店全部宣布停业，而其冲击使关东地区的近江银行也宣布停业。其后，在大阪、滋贺、冈山、广岛、福冈的 6 家银行宣布停业。随后，更加耸人听闻的消息使全日本为之一震——号称“宫内省金库”的第十五银行竟也宣布停业。由东京渡边银行引发的危机至此已发展成了金融界的“海啸”。

第十五银行停业后，三井、三菱等财阀银行感到情况已非同一般，全国各银行危若累卵，动辄便有倾覆之险，因此向政府和日本银行强硬要求紧急对策。时值内阁已换届，田中义一遂决定，从 4 月 22 日起，全国银行 3 周内停止付款，与此同时，全国所有银行、信用社宣布临时停业。

拯救危局的办法只有日本银行无限制地大量放款。此前，日本银行借口

通货发放责任重大，几度拒绝政府及台湾银行的放款请求。但事至如此，日本银行只有声明全力放款。从4月24日起，日本银行开始动用非常贷款，通宵达旦地接待各户贷款请求，日本银行本店及各地分店昼夜不停地向外数点款子。短短数日间，日本银行非常贷款竟达到10多亿日元，其中贷给安田银行2.9亿、台湾银行2.2亿、川崎银行1.4亿、第一银行1.2亿日元。以下则依次为第一、第十五、日本昼夜、三井、古河、朝鲜等各银行。日本银行的大量放款，挽救了包括台湾银行在内的许多银行的命运，终于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

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它惩罚性地警告政府，应清醒地估价干涉经济的限度，理性地识别经济增长中的实际成分和超涨因素。它给予大战期间的投机者们以严厉的打击，迫使被称之为二流财阀或后进财阀中的大部分宣布破产或削减经营规模。

危机平息后，日本的银行实行更大规模因而也是更加彻底的归并。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和第一银行，以及在1933年成立的三和银行，将许多二流银行都归并在内，形成了金融界的六大巨头。由于危机后立即通过的《日银特融法》的颁发，日本银行除了发放还贷之外，同时兼有了全国性救济机关的职能。

从日本银行放出的钱款，却是印刷备用的或赶印赶制的新票，直接后果便是通货膨胀的加剧，物价的高涨几乎将金融恐慌的巨大负担全部加在普通民众身上。在长期不景气状态下，雇佣和劳动条件的持续恶化，使得工人被迫发动各种劳动争议。雇主方面或用解雇来镇压，或派工贼打入工人内部分化工人团结甚至争夺领导权，更成为争议规模扩大的原因。

据内务省社会局的资料记录，1926年和1927年是争议多发年份。1926年共发生争议和罢工1260起，参加人数达到127207人。1927年9月发生的野田酱油罢工一直持续到翌年4月末才告结束。此外，有名的工人斗争还有别于铜山争议、共同印刷会杜争议和滨松争议等。著名作家德永直的小说《没有太阳的街道》，深刻地揭露了官宪的镇压和社会右翼团体的暴行，描述了工人们“死斗”的场景。没有太阳的街道就是今天东京文京区大家窪町和本乡白山高台一带，当时是工人密集居住的地区。

在劳动争议中，出现了由左翼组合评议会领导的运动和由右翼稳健派总同盟领导的运动两种倾向。右翼运动最激烈的手段是发动儿童联合拒绝上学、和要求向天皇直接诉讼等。而左派评议会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下，采用阶级斗争至上主义原则，主张展开激烈斗争。两派展开猛烈的论争，相互排斥。这削弱了工人内部的团结，分散了斗争的方向。毫不退让的斗争最后只好导致组织分裂，使不同纲领和方针的无产者政党从中产生出来。以安部矶雄为委员长、片山哲为书记长的社会民众党，主张社会改良，否认阶级斗争，是为右派。以三轮寿壮为书记长的日本劳农党宣布“切断左右两翼，树立无产阶级运动的正道”，是为中派。以大山郁夫为委员长的劳农党，是左派。社民、日劳、劳农三党鼎立，使劳动者内部的统一完全破裂。在这种情形下，工人政党在1928年的总选举中，共有89人被提名候选，有8人当选。此8人为劳农党的小谷长三郎、山本宣治、日劳党的河上大太郎、社民党的安部矶雄、西尾末广、铃木文治、龟井贯一郎以及民宪党的浅原健之。在劳动大

众内部分成右中左三派的情形下，尚有 8 人当选，令当局感到震惊。更有甚者，就在 1928 年总选举之前，共产党的活动又复活了。2 月 1 日，非合法报纸《赤旗》创刊，公然喊出了“树立劳农政府”口号，并散发废止天皇制的传单。

在反政府活动趋向活跃的刺激下，官宪于当年 3 月 15 日对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人士进行总检举，逮捕了 1000 多人，并勒令左派三政党和团体立即解散。翌年 4 月 16 日，官宪再一次出动，对共产党员和同情者 800 余人再检举，给予共产党势力重新集结以毁灭性打击。“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走上极端反动的标志，但由于劳农大众内部各派不团结，共产党又因着急焦虑而一味推行极左冒险主义，同广大民众所脱离，因而未能组织有力的抵抗。

刚刚从金融危机中透过气来，大藏省于 1929 年 11 月 21 日宣布废止 1917 年大藏省第 28 号令，这等于宣布黄金输出解除禁令，全面复归金本位制。根据该法令，金解禁将于翌年 1 月 11 日起施行。

提出这项政策的滨口内阁，把健全日本的经济体制作为最大的施政目标。为此，将协调外交和金解禁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自 1897 年实行金本位以后，日元就以黄金为媒介同英镑和美元挂上了钩。1917 年宣布金禁止输出是为了同早于日本宣布金禁出的美国的政策相协调，但 1919 年美英等国恢复金本位以后，日本之所以没有回复，是高桥是清为了积蓄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黄金。同时，一战期间“成金”风潮中物价持续上涨也无法实行金解禁。在金融危机中饱受折磨的滨口内阁，痛切地认识到，平抑物价，稳定汇率、压低外贸赤字、实行紧缩财政同实行金解禁是互为因果的，于是就由藏相井上准之助具体着手推进金解禁。

实行金解禁的直接效果是，当日元汇率下落时，可以用黄金直接支付避免损失，而当日元汇率上涨时，可以用输出物比如生丝赚到钱在美国市场购买黄金输回日本，争取超额利润，即为运用金融技术活动提供了途径。同时，在国内实行金本位制，也能通过发挥其自动调节作用，来控制国内物价和国际收支趋干平稳。另外，在金融危机时接收大量政府救济的大手银行，也苦于游资过剩，希望由金解禁打开海外投资的渠道。

为了推行金解禁，积累必要的黄金是首当其冲的措施。黄金保有量虽曾一时达到 13 亿日元，但滨口内阁上台时却只有 8000 万日元。政府为了在收购黄金的同时又不致引发市场黄金价格的暴涨，就令横滨正金银行出面收购输出支票，而由政府和日本银行秘密提供资金。这样，至 1929 年末，黄金储备终于恢复到了 2.5 亿日元。与此同时，井上又令津岛寿一财务官向英美财界筹借了 1 亿元外债。这样，金解禁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正当日本踌躇满志准备实行金解禁之前，1929 年 10 月 24 日“黑色星期四”冲击了纽约华尔街股市。大藏省官员们认为，股价下低会影响利率降低，是防止由于金解禁造成黄金流出国内的绝好机会，因此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欢迎之，已经成为三井银竹常务的池田成彬，正好从美国回国，一上岸便毫不犹豫地向上准之助提议立即颁行金解禁。正在美国同有关方面进行借款谈判的津岛寿一，也对美国经济的趋势持乐观态度，拼命地推进交涉。谁也没有想过因金解禁而向世界市场敞开大门的日本经济实际上正在面对着巨大的危险。

1930 年 1 月 11 日，金解禁正式施行。当日，以东京股票市场为首，金融市场一片平静。井上准之助轻松自如地对记者发表谈话：“上午以来股价

稳定，公债和利息也保持好调。没有丝毫担心。多年的阴云于此一扫而光，国力进展的秋天来临了！”

由此可见，井上对美国经济是持乐观态度的，同时对已经结束的日中美关税谈判和正在磋商中的伦敦海军条约也持有乐观态度。这就妨碍了他对美国股价崩溃的成因作出合理的解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农业国和贸易出超国。许多人出于对美国“永久繁荣”的幻想，急欲在交易所投机热潮中一试身手，对设备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也充满着信心。然而，从1920年之后，美国国内固定资产的更新已呈现出接近尾声的征兆，住宅建筑和耐久消费品的消费热潮也呈现不平衡状态，商品的赊销方式的作用也显著降低。欧洲各国的经济恢复工作，在这时已完成或接近完成，容纳美国商品的国外市场已今非昔比。但是，美国的工业生产仍在继续扩大规模，交易所的投机活动也丝毫未见冷却。从1929年起，以小汽车为首，商品库存大量堆积起来。于是，股价崩溃犹如点燃火药库的导火索，资本家的所得和资产总值猛然下降。市场猛然缩小，找不到销路的商品无法实现价值，迫使生产规模一压再压。物价下降，失业和汇率下跌也纷至沓来。屠杀牛羊和烧毁咖啡豆等倾过剩农产品的行为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

以美国为策源地的经济危机，使同美国经济密切相关的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都发生了经济危机。德国在危机中形成了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势力。危机对日本的打击亦是沉重的。

首先是生丝和棉布遭到了最直接的打击。以美国市场为依靠的日本生丝，由于美国人对奢侈衣饰绢绸的需要锐减，导致丝价暴落。1929年100万生丝的售价为1330日元，一年后仅为540日元，跌幅为60%。生丝工场发不出工资而导致社会问题。蚕茧卖不出价钱，使整个农产品价格都受到影响。输往中国和印度的棉布，因农产品价格下落和银价下落而失去了购买力。纺织厂缩短工作时间、降低工资也引发了工人罢工。以绢和棉为两大支柱的日本经济，因输出不振而给予整个经济界以决定性的负面影响。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8%，输出下降了47%，个人消费支出下降了17%，设备投资下降了31%，雇佣工人减少了18%，实际工资水平下降13%。

这确实是井上准之助和滨口内阁始料未及的。随着金解禁而来的，哪里是什么“真正的好景气”，实在是“真正的大恐慌”。在井上和全体滨口内阁成员使出全部力气来谋划度过危机的方策的时候，也有人在考虑已经不必再给他们以机会，应当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取而代之了。

第五编

血色太阳

第 21 章

东方会议

田中组阁

1927年3月，日本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史称“昭和金融危机”）。首府东京首先出现了挤兑存款的风潮，渡边、赤地、中井等银行相继歇业。不久，台湾银行也因挤兑而濒临破产。

同年4月13日，若槻礼次郎内阁（1926年1月30日—1927年4月20日）向枢密院提出发布紧急敕令案，试图由日本银行向台湾银行提供非常贷款，以挽救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当枢密院进行审议时，顾问官伊东已代治和平沼骥一郎等人却不是谈敕令案的可否，而是指责若槻内阁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和平外交”，认为外相币原喜重郎对华政策“软弱无能”。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一股强硬外交的恶潮。当时的政友会积极鼓吹：绝不容许放弃帝国的权利，反对对中国革命的不干涉主义。海军首脑、陆军部和六大城市的商工会议所也都主张“用强硬措施对付中国”；日本在华拥有纺织系统的财阀则发表声明，言称外务当局没有充分保护他们在中国的权益，为此“深表愤怒”。各派报纸更是连篇累牍歪曲中国革命真相，煽动向外扩张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若槻内阁垮台，4月20日，长州藩阀继承人、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登台组阁（1927年4月20日—1929年7月2日）。

田中义一（1863—1929年），生于长州藩萩市下级武士家庭。1883年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进陆军大学，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1892年被授予中尉衔。1894年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制定的《作战动员计划》被军部采纳，晋升为大尉。1902年，担任参谋本部俄国课主任。1905年他在《随感录》中所论述的“攻势”国防方针，受到山县有朋的赏识。日俄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大本营参谋、满洲军司令部参谋等职。1909年以后，田中历任陆军省军事课长、第2旅团长、陆军省军务局长。此间主持修订《部队内务书》、《步兵操典》、《辎重兵操典》、《陆军教育令》和《陆军补充令》等军事条例。尔后，田中官运亨通，成为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之后的长州系军阀的继承人和推行“大陆政策”的典型代表。

1913年，田中潜入中国东北刺探情报，与当地驻在军宪和有关人员详细地调查了“满蒙”内外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写了臭名昭著的《滞满所感》一书。他说：“中国东北土地肥沃，可容纳很多移民，可以把那里的居民改为日本人……向大陆发展是日本民族生存的第一步……把贫困的日本变为富裕的日本，惟一的方法是将中国变为我国的势力范围，利用中国的资源首先把东北作为日本人安居乐业之地。”为此，田中提出了许多具体主张，其中特别是企图控制中国东北的铁路。用他的话来说，“满鲜铁路平时是为了营利，战时是惟一的战略路线”，要“以满鲜铁路作动脉，各机关相互配合，日臻增进发展大陆的事业，完成先帝陛下之遗业”，以“建设新日本”云云。

为此，他主张为把“满蒙”变为“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而斗争”。

1915年田中晋升为参谋次长，参与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亲自主持制定《满蒙独立计划》，并插手发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一战后，田中先后出任原敬内阁、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的陆军大臣，并被选为贵族院议员，变本加厉地强化国民军事教育，实行所谓“军队社会化”、“社会军事化”的“良民良兵主义”。1919年春，田中兼任在乡军人会会长和青年团中央部理事长，建立了梦寐以求的小学、青年团、现役军人、在乡军人这种梯次结构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并把这些组织作为他日后掌握政权、推行反动政策的社会基础。显而易见，田中义一的登台组阁，是日本统治者决心对内加强军事法西斯统治、对外扩大侵略的标志。

与币原的所谓“和平外交”不同，田中内阁积极推行攻势外交（这是其攻势国防方针的延续），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4月22日，田中在施政演说中就强调指出，“当前最迫切、最直接的重大问题是中国的局势”，并要求中国对于骚动的激化进行反省云云。这和币原外交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调子完全不同。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表示要对中国革命进行积极干涉。他说，“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最深的是日本”，“在东亚具有重要责任的日本对此绝不能忽视”，试图采取积极政策。

为了干涉中国革命，牵制革命势力进入张作霖在华北的势力范围，5月16日，田中内阁便命令第2遣外舰队开往山东沿海。24日，陆相白川义则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出兵“护侨”。27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出兵山东，把满洲第10师团的步兵第33旅团共4个大队派往青岛。次日，天皇裕仁裁可。6月1日，日军在青岛登陆；7月上旬，进据济南，兵力增至4000人，是为“第一次出兵山东”。

田中内阁网罗了一批右翼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内务大臣铃木喜三郎、法务大臣原嘉道、铁道大臣小川平吉、农林大臣山本梯二郎等皆是“国本社”成员。而“国本社”实际是1924年成立的右翼团体。其主要成员为军界、财界和官僚中的知名人物。它以发扬“国体精神”为宗旨，来推行日本国家的法西斯化。据称，最盛时期有170个支部，成员多达20万人。由此可见，田中内阁与右翼团体是沆瀣一气的。

田中内阁是财界尤其是三井系财阀的“政治代理”。实际上，田中政友会内阁的上台，本身就是财界支持的结果。当年，钟渊纺织公司总经理武藤山治在“金融危机”时便强烈反对政府救济台湾银行；而三井银行在台银危机时则撤回数千万日元的短期通融资金。从经济上看，这是卡住台银的喉咙使三井在华南及南洋群岛的最大竞争者铃木商店倒闭的妙招，但同时也是打倒若槻内阁、为政友会内阁出台制造契机的筹码。为此，田中上台后便把三井的代理人森洛安置在外务省政务次官的重要职务上，而森恪正是以“三井人”自诩，在田中内阁的对外政策决策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此外，农林大臣山本梯二郎、“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等也都是三井系财阀在政界的代理人。

由此可见，田中内阁是军界、右翼团体与财界代理人的混合体。

东方会议

为了贯彻强硬的对华政策，在出兵山东的同时，田中便指示森恪着手筹备一次讨论有关中国问题的会议，以期扩大侵华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历来怀有实现“政府的政策与政党方针一致”、“政治家与军部一体化”的森恪如鱼得水，开始积极地活动起来。是时，森恪已同陆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如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少佐、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陆军大学教官石原亮尔中佐等人秘密纠集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筹划满蒙独立的中心”，并穿梭于外务省与陆军省之间。

5月11日，田中内阁决定了如下议题：一、对中国政策的根本方针，包括（甲）对各政权的方针，（乙）对满蒙政策即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二、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策；三、避难民的救恤问题。5月18日，确定了《会议组织草案》。5月24日，田中命令驻北京公使芳泽、奉天（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为出席东方会议暂时回国。5月30日，田中向陆相通知会议议题的同时，邀请陆军次官、陆军省军务局长、关东军司令官、参谋次长等参加会议。

在这一形势下，1927年6月6日，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向东京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以下简称“斋藤恒方案”）。其中心思想是：“帝国此刻必须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别区的实力派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为此，应向中国要求：1.宣布东三省自治；2.缔结建设新铁路的协定；3.开垦土地、采掘矿山；4.设置由日本人充当的行政、财政、军事顾问。上述各项如中国方面拒绝，“日本应坚决准备使用武力实现其目标”。森恪的谋划与“斋藤恒方案”的出笼表明，执政党政友会与陆军在攫取中国东北，进一步推行大陆政策方面已经有了默契。一系列酝酿活动说明，在东方会议之前“田中外交”对华政策的基调，特别是肢解中国东北这一点，已经大体上确定下来。

于是，1927年6月27日—7月7日，在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全部都是所谓的“中国通”和军部及政府中的强硬派。会议采取委员制，设委员长1人、委员19人、临时委员2人，共22人，此外有干事4人、旁听者数人。委员长是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委员（包括临时委员）中有外务省本省6人：政务次官森恪、外务参与官植原悦二郎、外务次官出渊胜次、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堀田正昭；驻外使领馆4人：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汉口总领事高尾亨、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陆军省4人：次官烟英太郎、参谋本部次官南次郎、军务局长阿部信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海军省3人：次官大角岑生、军务局长左近司政三、

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殖民地官员3人：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浅利三郎；大藏省1人：理材局长富田勇太郎。旁听的是铁道大臣小川平吉、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内务大臣铃木喜三郎、大藏大臣三土忠造、文部大臣、农林大臣等官僚。

[日]佐藤元英：《东方会议和初期“田中外交”》，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66），有斐阁1980年版。

[日]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论》，1975年版，第30页。

会议首先由田中义一一致开幕词。他说：“最近中国政局极为混乱，因此政府执行对华政策要慎重考虑，并借此机会征求诸位对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充分理解，以便执行统一的彻底的政策。”从田中的开幕词以及参加会议的成员来看，这次会议实际是日本内阁和军政外交人物的总动员，即统一思想，集中全力，以便实行所谓的“彻底政策”。这次会议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大会，即全体会，由田中亲自主持。如他不出席，就由森恪主持；二是特别会议，即分组会，由木村锐市主持。

根据《田中义一传记》中的记载，会议的日程如下：

日期	上午	下午
6月27日	11：00—11：40 田中外相致开幕词 亚洲局局长木村说明会议日程	
6月29日	9：00开会 矢田上海总领事：《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政治形势》	高尾汉口总领事：《政治政府的组织情况及4月3日汉口骚动事件前后》 吉田奉天总领事：《东三省事情》 松井部长讲话
6月30日	9：50开会 武藤关东军司令官： 关于《从军事上看到的满蒙政策和交通经济关系及满州资源》的说明 左近司海军省军务局长：关于《海军对这次中国动乱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 儿玉关东厅长官：《对满铁沿线、关东州租借地行政的意见》 芳泽驻华公使：《对中国一般形势特别是中国南北双方势力对立的近期预测》	
7月1日	9：30开会研究满蒙问题	研究满蒙问题 审议长江一带的复兴及救济撤回侨民的政策
7月2日	9：00开会 审议复兴长江一带我国经济问题	
7月4日	9：20开会 一、研究对华投资问题 二、研究修改《日中通商条约》及违反现行条约问题	
7月7日		2：00开会 木村亚洲局局长：《经过报告》 田中外相：关于《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 儿玉关东厅长官致答辞

会议期间，外务省发了 10 份文件，参谋本部发了 4 份材料，关东厅发了 2 份材料。此外，还发了数份参考资料。

东方会议期间主要研究讨论了五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中国的政局。如日程表所示，他们的报告和发言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南京、武汉、北京政权及其相互关系和变化趋势。第二大问题是维护和扩大在华经济权益问题，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中国南北政局动荡的历史时期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是东方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而其中占据首位的是满蒙经济权益问题，如铁路、土地商租权及财政整顿等。第三个问题是从山东撤兵和中国人民排日、抵制日货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对华武器输出问题。第五个问题是各委员向政府提出的四条建议和四条批评，其中有一条是批评政府对张作霖的援助，主张政府放弃援助政策。

7月7日会议闭幕时，田中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这实际上是东方会议的总结，也是新任首相摒弃“币原外交”后统一内阁、军方和驻华使领馆有关对华政策的认识而宣布的“田中外交”施政纲领。《纲领》共有八条，1—5条主要是对“中国本土”的对策，6—8条是对“满蒙”的对策。其主要内容是：

一、把“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作为最高国策。

《纲领》的根本方针即“对支那本上和满蒙……必须加以区别”。所谓“加以区别”，也就是“把满蒙从支那本土割离……作为另一种疆域区划，并使日本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和地区”。

《纲领》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6条）

“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

这些规定表明，田中外交对于“满蒙”并不只满足于维护其既得权益，还要求必须保持“满蒙”的所谓“静谧”，也就是要绝对确保“满蒙的治安”，并企图只以“满蒙”的实权人物作为交涉对象，把“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来，置于日本武力“防护”之下。

二、决定在中国实行其所谓的“自卫”措施。

1.东方会议出席者名单；2.东方会议日程表（密）；3.支那政治情况概观（1927年6月25日，密）；4.田中总裁1927年4月16日在政友会临时大会上和6月12日该会关东大会上的讲话，4月22日田中就职声明；5.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绝密）；6.救济长江流域侨民问题；7.发展对华经济政策（绝密）；8.出兵山东的反响；9.日本在华投资、贷款、贸易额概况表；10.7月7日田中外相《对华政策纲领》训示。

1.派往中国各军一览表（密）；2.苏联对北满的企图（密）；3.苏军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部署（密）；4.从北京劳农大使（馆）没收的秘密文书（密）。

1.南满洲附属地地方行政统一案（密）；2.民间对华（字迹不清）。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文书第101—102页。

森恪在会议上解释“何方”是指南京政府、北方的苏联、一切外国以及东三省内部。森恪的说明，见上村伸一著《日本外交史》，第223页。

[日]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3页。

“田中外交”一改“币原外交”实行撤侨的保护政策，而改行“就地武力保护主义”。《纲领》规定：“当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第5条）

这是公开声明日本政府准备随时以保护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的

“安全”为借口，对中国实行武力侵略。田中内阁刚一成立就把“向他国领土出兵”的行动确定为外交上的一项原则，而这一决定则进一步表明，即便是由于中国内政的原因，也不能容许“满蒙社会秩序紊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将随时出兵，采取“断然行动”。

三、欲在中国确立亲日而统一的反共政权。

《纲领》明确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对乘政局不稳而蠢动的“不逞之徒”“进行镇压”（第5条），日本要以满腔热情协助“中国稳健分子”（第2条）。日本希望“统一政府”成立（第4条）。也就是说，如果国民党人反共，日本政府将给他们以支持，并建立日本所希望的“统一政府”，以使日本在华权益得到所谓“公正的保护”。

此外，《纲领》进一步规定，对“东三省实力派”应予“适当的支持”，条件是他“尊重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并认真采取安定该地政局措施”（第7条）。森恪解释说，这“既不意味着支持张作霖，又不意味着排斥张作霖，我们以独自的立场来行动”。吉田茂说得更清楚：有用则支持他，无用则踢开他，张作霖的命运听凭张“自身的力量”。在这一条下原注明“本条不予公布”，因为在讨论如何实现“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的问题上有两种方案：一是“内科方法”，对张作霖行贿和恫吓兼施，使他接受日本的计划；一是“外科方法”，用武力解决，占领东北。森恪和关东军坚持实行“外科方法”，但田中事前同张作霖的亲信日本顾问町野武马秘密谋划，认为先采用“内科方法”在国际上比较有利。

田中向町野表示决心说：“如果不成功，将赌国运，用武力干！”因此一面在《纲领》中作了本条规定，一面决定“此项不予公布”，给一旦“内科方法”不能奏效时留有换用“外科方法”的余地。这一条文内容实质是支持东三省亲日派，以所谓“东三省人”来“安定东三省”。

由此可见，上述《纲领》实际上勾画出了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因此，以“东方会议”为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的阴谋，已经被列入了田中内阁的行动日程。关于这一点，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同田中首相有一段毫不隐晦的对白。

武藤：……如此重大的方针，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估计到将会引起世界战争。在这一情况下，怎么办？阁下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

田中：我有这样的决心！

武藤：以后不致发生动摇吧？

田中：没问题，我已经下了决心。

森恪在东方会议上解释“不逞之徒”是指“共产主义者鼓动的排外者”。

森恪在东方会议上解释“中国稳健分子”是指“反共的国民党人”。

森恪解释说这一政府不一定在北京成立，在南京成立也可。

[日]町野武马：《关于张作霖被炸死前后的回忆》，见《中央公论》1949年9月号。

武藤：只要政府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时候命令一下，我推行政策就是。

后来在中国曾发现一份史料称，田中义一于7月25日向日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通称《田中奏折》）。这个文件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战略：“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它强调日本要控制亚洲大陆，掌握“满蒙”利权是“第一大关键”，并且详细阐述了日本实现“满蒙积极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

《田中奏折》与《对华政策纲领》、“斋藤恒方案”3个文件，在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置于日本统治之下这一指导思想上完全一致。

《田中奏折》所提出的主要措施，与《纲领》、“方案”相对照，有的完全一致，有的基本相同，有的更加具体。

《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虽有争议，但从奏折所提出的征服“满蒙”，独霸中国、向西伯利亚及东南亚发展等一连串的对外政策，与自“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为止日本所走过的道路相对照，几乎全都与奏折相吻合。这些事实及其内在的联系，可谓比争论《田中奏折》存在与否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攫取“满蒙”铁路权

为了实施“满蒙”分离政策，田中义一选择的突破口是推行“满蒙铁路计划”，先取得在东北建筑几条有高度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新铁路的权利。

在东方会议上，日本外务省曾有一份《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的提案，其附件之一便是《关于满蒙铁路问题》，即准备向中国要求以下7条线的筑路权：长春—大赉线；呼兰—绥化线；新邱线；白音太拉—开鲁线及其延长线；吉林—会宁线（包括图们铁桥）；齐齐哈尔—昂昂溪线；洮南—索伦线。如果把这几条干线连结起来，可以形成日本到中国东北的环球线。这既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控制，又便于对吉林、黑龙江两省经济资源进行掠夺。因此，尽管陆军认为桃索线将来对苏作战很有用，主张应及早修筑，而外务省认为苏联对此敏感，担心影响日苏关系，要求慎重对待，但会议最终还是决定了“铁路计划即作战计划”必须“迅速实现”的方针。

为此，会后田中内阁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手段。在指使山本条太郎进行秘密外交的同时，又部署驻华使领馆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进行交涉。

7月20日，田中训令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责成他同奉天当局交涉“满蒙问题”，新铁路计划“力求在短期内实现”，使奉天当局接受“东方会议”方案中的一两条或三条铁路。田中指示，“须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可暂时默认奉天当局征收2.5%关税附加税，必要时施以高压，并暗示他们：如果不答应日本的要求，将不准东三省方面通过南满铁路进行军事运输；停止供应东三省兵工厂煤炭、材料；禁止京奉线军用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以此向奉天当局发出警告。

吉田茂是以惯施强硬手段著称的日本外交官。23日，他同奉天省长莫德

[日]山浦贯一编，《森恪》，东京1941年版，第636—637页。

惠开始谈判。吉田一开始就指责奉天当局“违反条约”，建造“满铁平行线”打虎山—通辽铁路等线，应当“反省”。接着，吉田提出日本要求敷设吉会线的敦化—图们江段、长春—大赉线和新邱运煤线，态度极为蛮横，当时中国局势严峻，对于涉及东北主权的重大问题，奉天当局不敢轻率允诺。为此，吉田茂便以首相训令为依据，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策划后，于8月4日向奉天省长莫德惠发出警告：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将在8月7日禁止京奉线军用列车穿越南满铁路附属地。显然，这是一种极为蛮横的要求，无异于一份“最后通牒”。

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行径激起了东三省民众的强烈反抗。奉天、洮南、长春、哈尔滨等地，先后举行反日示威游行，规模由数千人迅速发展到了几万人。面对中国人民如此高涨的抗日声势，尽管吉田的“警告”就是首相训令暗示的，但8月5日田中还是电示吉田，暂不采取强硬措施，并派出政务次官森恪赴旅顺，召集驻华文武官员进一步磋商实施“东方会议”决议的措施。8月15日，森恪在旅顺关东厅长官官邸主持召开了“大连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议，最后把交涉“满蒙问题”移往北京，由驻华公使芳泽与张作霖直接谈判。

3月24日，芳泽与张作霖开始交涉。不久，奉天又发生了抗日游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等等。日本政府怀疑这些活动是张作霖在幕后唆使的。9月6日，田中指示芳泽向张作霖提出抗议，要他下令取缔，并暂时中止了这种交涉。

此时，由田中部署的以山本条太郎为主角的秘密外交，也在悄悄地进行着。

早在田中刚刚上台的时候，就曾召见过张作霖的亲信顾问町野武马（1927年4月）。田中对町野说：“我此次之所以出任总理，就是为了解决正处于不知如何解决才好的中国问题，就是说处理满洲问题。满洲是我日本的生命线……关于这个问题，只要张作霖同意为日本修建5条左右新的借款铁路，那就一切都好办了。”经过两者的密谋，田中决定幕后交涉由町野进行，正式交涉由满铁总裁出面。对此，田中胸有成竹地说：“我打算把山本条太郎放到‘满铁’，由他去演这出戏……我没有请他入阁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接着，田中与山本、町野进一步秘密策划。田中决定由山本作为“首相的代表”去同张作霖交涉，“应将全部情况严格保密，不可让外务省轻举妄动”，并于7月19日任命山本条太郎为“满铁”社长。山本早年任三井物产公司牛庄、上海分公司经理。1927年2月受政友会总裁的委托到中国，分别会晤过蒋介石和张作霖，对中国政情十分熟悉。8月27日，山本赴大连就任“满铁”社长。此后不仅扩建了鞍山炼钢厂，创办了抚顺的油页岩提炼人造石油和煤炭液化等大企业，而且在为了确立钢铁联合生产而创办新义州炼铁厂的计划等方面，也极尽能事，充当了田中的“马前卒”。

有关铁路的交涉，向来被当作一种技术性问题，多由“满铁”出面进行交涉，因为这种办法远比那种通过正式外交途径更能避免使问题政治化，从而收到实效。山本上任后首先派遣与张作霖关系密切的江藤丰二到北京试探和疏通。江藤与三井财阀有联系，是“中日实业公司”董事长，是可以随便出入张作霖寝室密谈的政治掮客。他携带“东方会议”通过的“满蒙铁路计

划”去见张作霖。张作霖看到日本要把朝鲜铁路与北满联成一气，不禁吃惊地说：“这不是日本准备与俄国开战的铁路吗？”他觉得修了这些铁路，好比“怀里抱着炸弹”，表示不能接受。江藤立即恫吓道：“如果你不合作，日本军队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江藤的要挟，使张作霖表现得极为踌躇。经江藤再三游说，张作霖战战兢兢地在文件上圈了4条铁路。江藤又怂恿说：“7条中至少该答应5条吧？”张又圈了1条，但他对江藤说：“这只是预备性商谈，你们暂且不要发表。”

经过这番疏通与准备，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亲自出马了。10月10日，山本到达北京，通过町野武马的联络于次日“礼节性”拜访了张作霖，双方进行了紧张的谈判。山本通过町野和江藤对张作霖奉上了一份“厚礼”——以“筹备费”名义给张作霖500万元，对张进行贿赂。同时，日本以同意东北当局修建海龙—吉林铁路为条件，诱使张作霖接受日本的方案，并且乘张之危迫其就犯，于是产生了《山本条太郎—张作霖协约》。

“协约”规定，中国政府“委托”满铁“承办建造”5条铁路：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江岸线、长春—大赉线、吉林—五常线、洮南—索伦线、延吉—海林线。还规定：竣工移交后，承包款项应付与满铁；如不支付，即转为“借款”。作为交换条件，山本同意张作霖修筑吉林—海龙铁路，但不准将打虎山—通辽铁路展修到通辽以北，禁止张作霖修筑开通至扶余间的铁路，“协约”最后一条规定：“本协约签字后尚须两国政府的代表正式签字。”

也就是说，“协约”还只是一份草案。

为此，10月14日，町野、江藤直接要求张作霖在“协约”上签字。张作霖认为日方条件苛刻，而且当时中国人民反对田中侵华政策的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当，所以张作霖不敢断然接受。次日，町野、江藤携带文件再次会见张作霖，张在上面写个“阅”字。于是，日方则以此作为张作霖已“同意”的证据。

山本得寸进尺，又对张作霖说：苏联从北方威胁你、蒋介石北伐从南面袭来，你的处境危险，日本愿协助你保住满洲；为此，双方应建立攻守同盟和经济联盟。也就是要求张作霖同日本缔结具有政治和经济性质的两项协定，并把事先在大连拟订的协定草案交付给张作霖。

其中所说的政治协定，是《关于维持东三省治安换文案》。这是一份以“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的名义致日本政府的“换文”草案。日本替张作霖拟好的换文案中写道：“贵国政府（指日本。——引者注）鉴于东三省之治安与贵国领土之安宁及经济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当东三省之治安混乱或有可能遭到破坏时，不问其原因来自民国内部或外部，为维持地方之治安，（贵国政府）将采取必要之措施。……我认为应采取上述措施。”

不难看出，山本的“换文”草案实际是要把《对华政策纲领》中规定的日本对东三省“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的条款，变为中日间的“政治协定”，从而使日本攫取东三省的治安权。这

[日]满铁调查部：《满蒙新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之突破》，《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690—694页。

[美]入江昭：《帝国主义形成以后：1921年到1931年远东新秩序的探索》，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80页。

样的政治协定一旦缔结，日本帝国主义拟议的“日本把满洲的治安担当起来，以此为核心，把一切干起来”那一套肢解中国东北的阴谋，就可以“合法”地实现了。

所说的经济协定方案，则是以开放“满蒙”腹地和实行所谓商业租借权为目标。日方起草的协定方案的主要条款是：1.日本人在“满蒙”享有居住、营业、土地商租权；2.“满蒙”生产制造的一切货物得自由出口；3.实施“21条”中“将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租借期限延长到99年”的条款；4.有关“满洲”的一切其他日中条约继续有效。

由于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高涨，张作霖认为“事关重大”，不敢接受。但是，此时田中“特使”的秘密外交却进一步清楚地证实了“东方会议”制定的“满蒙政策”就是要全面控制中国东北的政策。

关于铁路问题，通过各种周旋，山本终于和张作霖达成“协约”。但山本因越权插手外交事务受到公使的强烈谴责，于是，山本携“满蒙新五路”的协约离开北京。此后，铁路问题继续由“满铁”负责处理，其他有关政治问题则继续在北京进行交涉，而有关“满蒙”当地的各项悬案则在奉天由吉田总领事负责处理。

再次出兵山东

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之后的又一侵华行动是第二、第三次出兵山东。这是“东方会议”决策的具体实施。

在“东方会议”上对第一次出兵山东是否撤兵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虽然也有一些人主张撤回山东日军，但会议结束时田中内阁却决定让业已登陆青岛的日军进一步进犯济南，7月12日，田中内阁批准向青岛增兵2200人。此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到胶济铁路沿线各地。这时，中国南京、武汉两政府合流，国民党各派倾轧，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由于中国局势发生变化，革命军的北伐暂时停止了。日本政府于3月30日宣布从山东撤兵。

9月29日，蒋介石偕同张群等人访日，请求日本给予支持。11月5日下午1时半，蒋介石同张群访问田中的青山私邸，会谈约达2小时。由于时间紧迫，双方依依不舍中不得已结束会谈。田中明确地对蒋说，“你不必急于北伐，首先注重巩固自己的地盘”，“应该专心致力于南方一带的统一”，如果你“巩固江南”，日本必将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会晤双方就“反共问题”取得一致，田中说：“假如长江以南不能统一，其间共产党便会成长，即使一旦摘掉嫩芽，仍会再次发芽生叶……将为极大的隐患。”蒋介石也说：“共产主义者侵入军队，令人胆寒。”田中相信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看法与他自己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的逻辑是：共产党在日本蔓延，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增大，日本的革命力量发展了，一定会危及日本“国体”。蒋回答说，对共产党“非清除不可”。蒋介石要求日本政府不要援助张作霖，田中否认日本“支援过张作霖”，强调说：“日本的希望只在于安心维持满洲的治安。”蒋表示：如果日本不支持张，“则满蒙问题容易解决，排日亦

1913年袁世凯曾与日本缔结过一个《满蒙五路秘密换文》。为了与旧“满蒙五路”相区别，故称1927年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五午铁路为“满蒙新五路”。

可杜绝”。但对田中所提出的“不要急干北伐”一事，蒋介石没有应允。11月8日，蒋应国民党电召离日回国。

12月23日，田中训令驻上海总领事矢田秘密告诫蒋介石：如果北伐军到济南，为了“护侨”，日本政府将再次出兵山东。26日，矢田奉命到黄郭寓所又一次警告蒋不要北伐。1928年初，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冯、阎、桂三派准备北伐，日本对此迅速作出反应。日本联合舰队游弋于中国海面，“出访”香港，南京政府的访日代表被田中拒之门外。北伐前夕，日本第1遣外舰队出现在山东沿海，以“游历”之名泊于青岛；第2遣外舰队则进入长江，泊于江阴、南京；陆军也扬言增兵朝鲜，共同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11日，黄郭被任命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这是蒋介石准备一旦北伐便于对日疏通的一招。急于“统一中国”的蒋介石于4月7日宣布北伐。蒋亲自率第1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内阁决定按照“东方会议”既定的方针行动。4月16日，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少佐向参谋总长要求出兵，陆相和参谋总长认为“时机适宜”，应立即出兵。次日，田中内阁仍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并于19日正式宣布。日参谋总长19日下午发布了关于派遣第6师团及“临时济南派遣队”的第1号命令，命令第6师团从熊本出发，在青岛登陆后，立即实施对济南及胶济沿线要地的军事占领。派遣军最高指挥官福田彦助中将训令各部：“我部队之派遣乃受大命而为，应作充分精神准备……此实为宣扬帝国之国威于世界，发挥我军队之精华于中外之大好时机。”为了抢先控制济南，日本政府命令驻天津3个步兵中队赶赴济南。4月20日，日军侵入济南。21日，南京政府对日本出兵提出严重抗议，但田中内阁悍然不顾，决意实施武装侵略。

25日，第6师团首批部队1381人在福田彦助中将的统率下在青岛登陆，次日侵入济南。至27日，第6师团及所属部队5091人登陆完毕，作战物资有2.3万吨，呈现出一副临战态势。

4月28日，北伐军占领万德，向济南进发。30日夜，张宗昌军北逃。5月1日，北伐军平静地开进济南。2日上午，蒋介石进驻省督办公署。两个半小时后，日本侵略军司令官福田中将接踵到达省城。此时，济南有日侨2160名，入侵的日军达到3500名。侵略军在商埠一带部署警戒线，划定东西两个“警备区”，并在各交叉路口堆积沙包，设置活动电网，构筑机枪阵地，规定报警信号，士兵均进入战斗准备状态。这样，济南出现了日本侵略军与中国军队对峙的局面。此时，蒋介石急于北伐，既对日军的武装行动缺乏警觉，又随时准备与日军讲和。这种妥协退让的态度，使北伐军失去应有的准备，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5月3日早上8时，日本代理总领事西田畊一、驻济南武官酒井隆等拜会蒋介石，声称日军当天就要撤离济南，特来辞行。但当他们离开总司令部不久，日本军队就发起了进攻。开始，国民军宣传员在张贴“打倒张宗昌”之类标语时，日军出来干预，随之大批日军蜂拥而至，沿途遇到中国人，不

蒋介石与田中义一会谈记录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102—106页。
李家振：《济南惨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0页。

论兵民立即开枪，当场打死打伤数人。此后，商埠各地枪声四起，日军 3000 余人倾巢出动，对中国军民发动突然袭击。10 点以后，日军开大炮轰击，“一时商埠房屋炸裂焚烧者，不知凡几”。下午，日军攻占邮政局、电报局，并炮击中方无线电台。日本“在乡军人会”配合日军在商埠大肆搜查、捕杀打散的中国官兵，洗劫中国商店，滥杀和平居民。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军践踏国际法准则，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凌辱和集体屠杀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人。在“五·三”这一天，被日本侵略军野蛮屠杀的中国军民在 1000 人以上。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新任外交部长黄郛是随蒋介石进入济南的，此时赴正金银行福田司令部交涉。黄郛到后未能见到福田，一个日本军官竟持枪胁迫他在一份所谓“中国军队枪杀日兵”的“调查报告”上签字。直到黄郛被迫签了“阅”字，才放他回蒋的总部。面对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政策。他下令国民军“不准还枪”。3 日深夜，中国军队全部退出商埠。蒋介石决定绕道北上，对日本侵略军继续退让。

但田中内阁不肯罢手，狂妄宣称对中国还要实行更加强硬的政策。日参谋总长告知福田：“决由内地尽量增兵，此际须采取断然措施。”他们一面肆意颠倒是非，反诬中国军队抢劫和杀害了日本侨民，为进一步扩大侵华制造借口；一面继续向济南增兵。4 日，日本政府决定急调关东军陆军第 14 师团第 28 旅团及其他特种部队 2000 多人增兵济南；海军增派军舰赴长江华南口岸及青岛。

为寻求进一步扩大在山东军事行动的借口，福田彦助于 7 日下午 1 时下达了《扫荡南军的命令》，4 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限 12 小时内答复。内容非常苛刻，如处分军官、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严禁反日宣传、胶济线两侧 20 华里内撤兵等。福田意在待蒋拒绝之后立即给中国军队以沉重打击，以向中国和世界显示日本帝国的“武威”。

当时，日本国内参谋本部、陆军省共同拟订了《对华方案》，其中竟然宣称：这次济南事件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的心理的具体表现”。要“显示皇军的武威，使全中国感到震撼”，根除中国轻侮日本观念，“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该《方案》还提出了具体措施，内容与福田“通牒”相似。为讨论该“方案”，参谋本部、陆军省专门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会议。8 日，田中义一主持内阁会议，决定采纳《对华方案》，并增派名古屋陆军第 3 师团（1.5 万人）及其他特种部队 2 万人，实施第三次出兵山东。日皇裕仁迅即裁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第三次出兵山东的借口，已经由“保护侨民”改变为对中国实行“惩罚”了。

5 月 8 日拂晓，福田向所部下达侵占济南全境的攻击令。日军首先轰击和摧毁了新城兵工厂、无影山弹药库。接着，又野蛮炮轰内外城居民密集地区。城内火光冲天，居民被虐杀者到处皆是。9 日，日军在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构筑新的炮兵阵地后，再次向内城发起全面攻击。10 日夜，蒋介石下令立即放弃济南城。11 日晨，济南沦陷敌手。日军疯狂屠城，进行惨无人道的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 页。

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济南惨案》，1928 年 6 月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 14 辑，第 123 页。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 页。

残杀、抢劫和奸淫。据“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调查：在“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 6123 人，伤 1700 多人，财产损失达 2957 万元。

日本出兵山东，侵占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各要地，制造“济南惨案”，是日本军国主义按照“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推行武力侵华方针而预谋发动的一次战争行动。它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重新走上了武力侵略中国的道路。

炸死张作霖

早在东方会议前后，日本侵略者已在暗中磋商张作霖的去留问题。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主张“排斥张作霖论”、“领有满洲论”和“一举解决满蒙问题”。木村锐市亚洲局局长在 1927 年 6 月提出的一份《关于中国时局对策之考察》报告中，认为张作霖的“自我消亡只是个时间问题”，明确提出要抛弃张作霖，树立新的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而田中外相的意图则是劝告张作霖从北京返回东三省“保境安民”，与张之间“解决满蒙问题”，在日本的控制下，实现“满蒙铁路计划”，进而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

军部和关东军则主张排除张作霖，使用武力“积极干预内政”，“领有满蒙”。

济南事件发生后，南京政府军队绕道继续北进，威胁到京津地区，奉系军阀张作霖败局已定。这时，日本统治集团业已着手研讨一旦蒋介石兵临北京、天津和山海关，日本对“满洲”应采取的方针以及如何对待张作霖和乘机以武力攫取东三省的问题了。

关东军首先向军部提出武力控制“满洲”的主张。1928 年 4 月 20 日，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向参谋本部提议：奉军如处于不利地位，张作霖率其 20 余万军队退回东三省，“满洲的治安”

将受到骚扰，“威胁”到 100 余万“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日本政府有必要发表声明：如战乱波及“满洲”，日本将采取“自卫手段”。关东军应从南满铁路附属地出发，不失时机地开往锦州或山海关，解除进入东三省的奉军或南京政府军队的任何一方的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内阁按照其既定的“对华积极政策”，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逼张作霖实施“山本条太郎—张作霖协约”，乘机攫取东三省的路权；二是发出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五·一八备忘录》。

日本侵略者把有关建造“满蒙新五路”的“协约”视为“东方会议”后攫取中国东北权益的重大步骤，因而急于将其付诸实现。但是，奉系军阀感到这样的卖国行径会使自己不仅保不住政治上的“宝座”，而且将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张作霖在同日本的接触中变得越来越谨慎，因而有意拖延，一直没有同“满铁”签署承建合同。

田中义一指示“满铁”社长山本尽快谋求签订“满蒙新五路”的全部承建合同。5 月 7 日，江藤丰二奉命访问张作霖，提出此议。张作霖为了谋求日本支持他与北伐军作战，表示同意签署合同。交通总长常荫槐害怕承担卖国罪名，躲往天津。江藤连日催逼。13 日，张作霖竟以中华民国政府“大元

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济南惨案》，第 83 页。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 98—100 页。

帅”的名义在“满铁”事先制作好的延吉—海林、洮南—索伦两路承建合同上签了“阅”字和“准行”的字样。但张作霖在心惊胆战时，又灵机一动，命令交通部司长赵镇以“交通部代理次长”的名义在吉敦路延长线（敦化—图们江）、长春—大赉路两项承建合同上签字。令人可笑的是，赵镇“代理次长”的任命却是14日才颁布的。江藤发现后又让赵镇将签署合同的日期改为“5月15日”。张作霖卖国心虚，要求日方“在3个月内绝对保守秘密”。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攫取了觊觎已久的“满蒙”4条铁路的修筑权。

与此同时，中国南北两军的作战，对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也有不利的一面。按照田中的意愿是：蒋介石在南方“遏制共产主义”，张作霖在东北“保境安民”，最适合日本的需要。于是，他在积极推行侵华政策的同时，向中国南北两军发出武力威胁，要求他们停战，并逼迫张作霖撤往关外。16日，田中内阁举行阁议，决定在18日向张作霖、蒋介石两政府发出“备忘录”。18日，日本一面向蒋介石政府递交备忘录，要求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地区；一面劝张作霖迅速退至关外，否则不能保证不解除奉军之武装。备忘录声称，今动乱波及京津地区，满洲亦有受其影响之虞。维持满洲之治安，系帝国最为重视之处；如扰乱该地之治安，或者出现扰乱该地之治安的祸因时，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因此，当战乱进展至京津并祸及“满蒙”时，帝国政府为了维持满洲治安，必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五·一八备忘录》。显然，这严重地破坏了国际法准则，粗暴地干涉了中国内政。所谓“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实际就是绝对禁止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东北。此外，田中训令芳泽和日本在华一切能起作用的代表同张作霖及其助手接触，命令他立即返回满洲，并警告张作霖，如果他不肯听命，一旦败退关外，日本将解除奉军的武装。一言以蔽之，这项备忘录的实质乃是田中企图乘中国内乱之机，将“东方会议”决定的“满蒙分离政策”付诸实施。

5月17日深夜11时，芳泽来到顺承王府会晤张作霖。在通知《五·一八备忘录》的内容之后，芳泽告诫张作霖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祸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返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同时，芳泽恫吓说：如果你的军队逃回满洲，日军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对此，张作霖大怒。两人一直争论到凌晨3点，无结果而散。进而，日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少将于22日前往保定，向张学良、杨宇霆转达了田中首相的意图，重申了“在奉军溃败的情况下，日军将解除其武装”的要挟，逼迫张作霖退至关外。

这时，关东军急不可待地要攫取整个中国东北。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收到陆相白川义则的指示“用一切手段制止南北两军越过长城”后，立即着手准备，命令第40混成旅团集结奉天，准备派第14师团开赴锦州。5月22日，村冈决定把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迁到奉天。

5月下旬，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满蒙”问题如何处置存在很大分歧。在关东军出兵问题上，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支持关东军，主张向锦州

[日]满铁调查部：《满蒙新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73—974页。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116页。

《时事新报》1928年6月14日，《张作霖被炸与东三省近况》。

周大文：《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出动。海相冈田启介反对轻率动武。首相田中踌躇不定。在要不要张作霖下台的问题上，陆相白川主张日本必须让张作霖下台。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也力主排除张作霖。而首相田中则是想要继续利用张作霖，以完成其“东方会议”的“满蒙铁路计划”，以及从中国肢解“满蒙”的图谋。为统一步调，田中命令森恪召集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各省主要官员磋商方案。从5月20日开始，经过6天的马拉松式讨论，议而未决。25日，森恪以议长的身分作出结论：“按既定方针进行。”这就是说，按照“东方会议”的决议行事：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来，由日本负责维持东三省的“治安”，使之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与此同时，关东军开始策划谋杀张作霖的阴谋。原来杀死张作霖的具体行动计划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策划的炸车方案，一个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派遣刺客行刺的方案。村冈认为：“除了杀死巨头，此外断无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因此，村冈决定派遣关东军参谋竹下义晴前往北京，计划同那里的日本华北派遣军配合，在张作霖撤退前夕相机袭击，刺杀张作霖。但在竹下出发之前，这一行动为河本大作所知。河本劝竹下放弃这项没有成功把握的冒险计划，而同自己合作，专门在京侦察张作霖的行踪，为尔后的行动提供确切的情报。竹下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关东军司令官和高级参谋谋杀张作霖的两个计划，在河本大作的策划下合二为一。不久，河本收到了竹下的密码电报，内称张作霖真的要逃往关外回奉天了。于是，河本又向山海关、锦州、新民府和京奉线的重要场所派出了侦察人员，以监视张作霖的通过地点，并准确地报告张作霖专车的通过时间。6月1日晚，河本单身一人到皇姑屯察看地点，选定了“南满”、京奉两路交叉口，认为这里是关东军警备队警备地带，行动方便。河本还决定万一在上述地点炸死张作霖的计划归于失败时，就实施第二个步骤，即颠覆列车脱轨，趁乱让“拔刀队”杀掉张作霖。6月2日夜，河本亲自率关东军工兵队“布下所谓‘必死之阵’：在铁路交接点里埋置了30麻袋黄色炸药，在500米外的瞭望台上安装好电流引爆装置，在交接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并指定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东宫铁男大尉为现场指挥。河本还雇用了3名中国士兵来放哨。

5月30日，北伐军占领保定。张作霖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对策，决定下总退却令，返回东三省。6月1日，张作霖邀集驻北京各国使节在居仁堂举行告别仪式。2日，发表“出关通电”。3日深夜，张作霖含泪乘专车悄悄离开北京。4日晨5时27分，当张作霖的专车行至奉天近郊皇姑屯地方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点的旱桥时，轰隆一声巨响，专车被炸翻起火，黑烟高达200米。张作霖身受重伤，4小时后死去。这就是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策划和执行的。1927年6月，他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随行参加了“东方会议”，深知田中义一有决心以武力实行“满蒙分离政策”。但他对首相坚持依靠奉系军阀首脑极为不满，因而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制定了炸死张作霖的计划，以制造东三省的动乱，再以“维持满洲的治安”为名，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占领东

[日]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译文见《近代史资料》总47号，第118页。

张新才：《为什么旧事重提》，《人民日报》，1958年11月5日，第4版。

三省各要地，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政权，推进所谓的“满蒙自治”。”皇姑屯事件”实际上是3年后“九·一八事变”的预演。

在张作霖的专列快要驶到爆破点时，日军向3名中国士兵发起突然袭击，杀死2人，另1人却侥幸逃脱。因此，尽管关东军编造说暗杀为北伐军便衣队所为，但当时的吉林省省长刘哲在为铁道事宜同森冈正平领事交涉时，悄悄地透话给森冈：侥幸逃命的那个士兵跑到了张学良处，张学良已经知道了全部真相。张学良不过是为了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才将杀父的不共戴天之仇强忍在胸口而已。

张学良在稳住了局势之后，于7月5日发布和平通电，开始南北妥协。进而不顾日本方面再三阻挠，1928年12月29日，中国东北也挂起了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并入国民政府辖下。这是张作霖被炸死之后日本方面估计的最坏结果。东北易帜表明，企图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的阴谋遭到了灭顶之灾，同时也宣告田中“积极外交”的彻底失败。

当年年底，根据西园寺公望的劝告，田中义一向天皇内奏：“日本军人犯罪的疑问很浓，不能放置不管，所以打算调查事件真相。如果结果表明确系日本军人所为，就向国内外公布真相，严厉处分以正军纪。”但是，田中的内奏遭到军部、一部分阁僚和政友会部分干部的强烈反对，民政党对事件责任的追究也遭到这些人的阻挠。于是，田中便想将调查压下去不了了之。这引起了裕仁的愤怒，迫使田中辞职。3个月后，田中在忧郁中去世。而河本大作却在满铁干领俸给，打发着悠闲的日子。1945年，他在山西被中国共产党逮捕，死在战犯管理所。他的儿子河本敏夫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家、议员、自民党一个派系的首领，也曾是日本首相的有力角逐者。

第二次币原外交

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最终导致田中内阁倒台，滨口雄幸的民政党内阁再一度登场。尽管滨口内阁还力图使外交政策再度回复到协调路线上去，币原再一次出任外相，但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反对协调路线的社会呼声不再再度高涨，而且右翼分子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币原力图使因田中出兵济南和炸死张作霖而完全停顿下来的日中外交复活，便想通过最后缔结关税条约来带动对华外交。他派出自己的亲信佐分利贞男担任驻华大使，受到中国方面的欢迎。佐分利于1929年10月赴南京，同蒋介石和王正廷进行了会谈。据说会谈气氛轻松，但讨论的问题却十分微妙。

佐分利在11月20日回国，同外务省首脑就对华政策进行了密谈。按计划佐分利应当马上再去南京，但他29日在箱根富士屋旅馆宿泊时却突然死了。当时的现场是，佐分利仰卧在床上，右手拿着一支八连发的手枪，似乎是当枪口对着太阳穴时扣动了扳机，头上蒙着被。

由于佐分利死前一直在兴奋地从事工作，故不能找到自杀的有力理由，却又不能断定为他杀，因此就酿成了“佐分利怪死事件”。警视厅以自杀说匆匆结束了取证，但是，币原和佐分利的哥哥秋山广太却对此深表怀疑。

有人猜测是否因为同中国方面的谈判太困难、自感不能胜任而被迫自

杀，但币原否认了这种猜想。秋山广太在回忆录《窗下漫笔》中写道：

我知道自关税会议之前起他就被政友会的人所侧目，大阪实业界也有一部分人说他软弱反对他。而积极政策的主张者，想一举夺取四百余州的梦想家，职业性习惯总想闹事的支那浪人，从自己的利益打算或一部分忌恨支那人抬头的在华居留人，当然都反对他。他寻求机会推心置腹地同他们恳谈，去箱根的当天晚上还经朋友介绍同某个团体会谈，似乎正为会谈的结果而高兴。尽管他本人对中国问题也不抱什么乐观态度，但我知道他是抱着充足的希望的。

此外，秋山还否认了弟弟是为怀念死去的妻子而自杀的说法。佐分利的妻子文子死了之后，他经常将鲜花供在亡妻的遗像前，出门时也总要带着文子的照片。但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佐分利就没有时间顾及儿女情长了。秋山怀疑自杀说的第一根据是手枪。佐分利时常携带防身用的是支小型连发枪，而他死时手里拿的是一支大型连发手枪，秋山不知道他是怎样得到这支手枪的。秋山的第二个根据是，佐分利是身穿旅馆的浴衣并将红色的带子系紧后入寝的。如果是决心自杀，那么这套装束似乎有些过于草率。

由于佐分利赴任而趋于好转的日中关系，因佐分利的“怪死”而更趋紧张。中国方面认为是日本政府不承认佐分利的工作而致其自杀的。佐分利死后，币原拟委派小幡酉吉为后任公使，并向中国征询意见。在委派大使前向中国征询意见这是没有前例的，尤其是当中国政府听说小幡就是日本逼迫中国签订“21条”时的参事官、对华强硬派后表示拒绝，此事就被右翼和政友会当成攻击币原外交的武器。后来，币原起用重光葵为代理公使，并于1930年5月同中国缔结了关税条约，但这已经不可能带动中日关系全面好转了。

既然要接受华盛顿会议规定的国际契约的规制，不能采取军事行动夺取新的殖民地权益，那么，尽量援引既成条约守卫既得利益，并通过耍弄外交手腕谋取实际利益，就成了币原外交的中心。如币原所言：“中国的人口与资源对他国来说，仅仅意味着增加贸易额，而对于日本来说，却生死攸关必不可少。”就当时日中两国经济、贸易和技术发展的差异来说，日本凭借自身先于中国近代化所获得的一切优势，通过谈判和契约，对中国的原料予以加工，对中国市场予以开发，对中国的劳动力通过贸易手段进行剥削，以收取经济上的实惠，并不是不可能的。甚至如关税谈判所表现的那样，日本也可能同中国签署取消不平等法权的条约。

应当承认，当币原外交一度施展之时，日本也曾暂时从1894年以来几乎每隔5年就要打一次海外战争的扩张轨道上脱离，在对外关系方面进行内部调整和自我遏制。

1894年，日本对华输出总额为2.97亿日元，1925年达到3.83亿日元。同期，英国对华输出则由4.36亿海关两，下降到3.3亿海关两。日本在中国各港口出入船舶总吨数由1924年的3470万吨，上升到1926年的3890万吨，而英国则从5570万吨下降到4760万吨。日本不仅扩大了对华输出，而且还在竞争中排挤了英国的势力。

[日]马场明：《日本外文史》，《满洲事变》，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11~12页。第11—12页。

东亚研究所编：《日本对华投资》，原书房1987年版，第217页。

政治上的收获亦很可观。由于币原外交的工作，改变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对日本的想法。1925年6月，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达到高潮时，国民大会主持者袁良对日本驻华大使芳泽表示：“反帝运动的对象正逐渐集中指向英国一国。”上海日本商业会议副会长戴天仇也表示：“今后的抵制运动，拟将日本从英国分离出来对待。”

但是，币原的协调外交最终是不能同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相协调的。1927年4月，币原外交为田中外交替代，正好说明了连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社会右翼对这一点都深信不疑。更有甚者，被日本视作生命线的“满蒙”地区同中国内地的政治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有作为的领袖都不会容许疆土分裂；任何一个时代的民众都将收复失地作为当政者最大的功绩。币原外交能同北京关税会议协调，也能同全面回收和恢复在被侵略战争中失却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民众运动相协调吗？因此，任何认为如果币原外交能一直推行下去则日中之间就不会爆发战争的想法，不是低估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冒险时的疯狂，便是以当时中国当政者也许会承认“满蒙独立”为前提的。

那么，夹在两次币原外交之间的田中“积极外交”又将怎样予以评价呢？如果将出兵山东作为有限度的、局部性的军事示威来看，它在当时就已不可能产生想象中的作用了。当北伐军绕道北上、只管完成自己的军事计划时，在济南发威的日本军队惟有对天咆哮而已。实际上，将田中外交葬送掉的并非是“皇姑屯事件”，而是军部认定这种外交同币原外交的软弱一样也是“无能”的。据此判断，关东军和军部就认为，不理睬政府而独断地推行自己的计划，已经越来越具有现实性了。

第 22 章

祸起东北

“山雨欲来风满楼”

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中国东北，由来已久。1921年5月13日原敬内阁制定的《满蒙政策》中就露骨地写道：“不仅要确保和有效地利用我国在满蒙既得的特殊地位与利权，而且今后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我国之国防与国民经济生存上所必须的地位和利权。”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其既定的“大陆政策”和“东方会议”上所确定的对外策略，为强占中国东北、摆脱日本国内陷入经济危机的困境，又开始制造侵略舆论，为扩大侵华活动进行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军界政界头面人物、右翼政党、民间法西斯团体以及侨居中国东北的军国主义分子，一齐出动，相互串通，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散发传单，疯狂地进行煽动。其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满蒙”独立论，强调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如日本政友会头目森恪在1931年9月6日发表的《紧迫之满蒙对策》中言称：“日本消耗了20亿国费，以10万同胞之鲜血，好不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的故乡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言外之意是，日本用鲜血取得了中国东北并开发了这块土地。因而，他在同年9月9日于名古屋市举行的一次讲演中公开声称：“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洲人的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本土的18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方历来都是不关心的。”这种公然否定中国领土主权的煽动，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目的在于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制造“合法”的根据。

二、宣称“满蒙”同日本的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如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在1931年春发表的《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中说：“今日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同样，当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在制造这种侵华舆论方面也十分活跃。1931年3月，他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所作的题为《从军事上所见之满蒙》的讲演中声称，“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帝国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之地区”。

而当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菱刈隆在同年5月29日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更是公开宣称：“惟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此乃无需赘述者。”“对满蒙问题做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的第一步。”此外，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于同年8月4日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称：“满蒙地区在国防上，政治上，并将在经济上同帝国的生存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三、鼓吹统治万国是日本的“使命”。在这方面，日本民间法西斯思想

家大川周明可以说是一代典型。他到处游说，发表演讲，不仅与上述军人法西斯所主张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沆瀣一气，而且狂妄地宣称“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使命”，日本不仅要吞并中国，还应占领西伯利亚和南洋群岛，建立以日本为主宰的“大东亚共荣圈”。

“山雨欲来风满楼”，舆论是行动的前兆。这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说明日本进入30年代以来进一步扩大侵华势在必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还制造所谓的“赤色恐怖”。1931年7月，日本各报刊登了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在内阁上的讲话，他说：“苏联五年计划的完成给日本造成了严重威胁……有鉴于此，满蒙问题务须迅速而切实地加以解决。”从此，日本掀起了所谓“保卫满洲，免遭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广泛宣传。企图利用所谓防范“赤色恐怖”的口号来掩盖自身对中国东北的侵占阴谋，并期待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侵华行径采取容忍和赞许的立场。

旅行侦察

在各种侵略舆论纷纷鼓噪的同时，日本关东军为侵占中国东北而开始了军事侦察活动，从1929年7月开始到1931年7月前后的3年里，先后组织了3次所谓“参谋旅行”，即以组织参谋军官旅行为名，到中国东北各个军事要地进行军事侦察，了解预定作战区域的地形，制定武力侵占东北的军事计划。

第一次是1929年7月3—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统领，随员有佐久间亮三大尉等5人。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7月4日，他们到达长春后，由素称对德国克劳塞维茨军事学说有深刻研究并写有军事专著和具有战略家之称的石原讲述了“对现代战争的观察”，并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进行研究”的提案，委托佐久间亮三大尉对此进行具体研究。石原自称此次长春之行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7月5日，他在由长春至哈尔滨的列车上，又提出了作为旅行途中研究课题的《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在于解决满蒙问题案》。其主要内容是：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即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掌握在日本手中。石原在满洲里还就《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作了补充说明，使之更加系统化、具体化。他说：“在满蒙的日本人应从事企业经营和脑力劳动，朝鲜人应从事水稻的种植，中国人应从事小商业和体力劳动。”对占领东北之后实行统治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详尽设想。与此同时，石原等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洮南等地还进行了军事地形侦察及渡江作战的研究。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仍由板垣、石原两人统领。这次旅行的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在“沈阳城攻击要领”及“弓长岭夜袭”的研究已有成案后，石原等人还就从新民屯渡河、向锦州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进行了具体研究。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畑俊六于1930年5月还专程到东北对关东军进行视察，并参与指挥了关东军在长春举行的军事演习。

1930年9月，佐久间大尉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写成了《关于满蒙占领地之统治草案》。对未来日军占领东北地区之后的行政统治事宜，如统治机关

的设置、治安的维持、立法与司法的实施以及财政、交通、产业、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它把对“满蒙”占领的统治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预计半年到一年，作战初期，将部分地区置于军政之下；第二个时期一年至两年，计划占领整个东北。并拟将东北三省当时的总收入（1.2 亿或 1.3 亿元）的 40% 或 50% 作为关东军军费开支，不足部分由“帝国军费填补”；第三个时期，预计东北三省将收入 2 亿元，计划将其中的 1.6—1.7 亿元充作统治费用，产业以农业为主，工业在不威胁日本国内工业的范围内，发展依靠当地原料的工业。总之，贯彻“以战养战”的原则，准备长期占领“满蒙”。

第三次是在 1931 年 7 月进行的“北满参谋旅行”，继续由板垣、石原两人统领。研究课题是《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随员有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长中佐一名、关东军大尉参谋二名和大尉部副一名、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少佐参谋一名及日本驻满洲里特务机关长一名。7 月 11 日，板垣等人由旅顺出发，经郑家屯、洮南、昂昂溪、伊力克得、海拉尔到满洲里，归途经哈尔滨，于 20 日返回旅顺。此次实地考察了北满的全部地形。

这三次所谓“参谋旅行”为日军公开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做好了军事侦察方面的准备。关东军在加紧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之同时，于 1931 年 6—7 月间，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以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万宝山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这里既不属于“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 1909 年签订的《中日图们江界约》所定的特区，完全为中国政府所辖之地。1931 年 4 月 1 日，长春县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借长春县三区境内（位于万宝山与伊通河之间）荒地 500 垧（1 垧 = 7 亩），为期 10 年。契约上写明：“此契约于县政府批准日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准，仍作无效。”但是，郝永德未得到县政府正式核准，就擅自将 500 垧荒地使用权转租给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而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李升薰等人。签约之后，李升薰等朝鲜农民为引水灌田，招来 180 余名朝鲜农民在中国农民的熟田里挖壕建坝。这样一来，万宝山和伊通河下游地区的几万亩熟田，随时有可能遭到河水淹没。于是，中国农民向长春县政府申诉。6 月 7 日，长春县政府派员前往现场劝阻朝鲜农民停工。但在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派出的日本警察保卫下，朝鲜农民日夜挖渠，加紧筑坝。日本便衣警察还混入其中进行挑衅，并增派大批日本警察携带机枪，企图以武力开渠通水。7 月 1 日，中国贫苦农民眼看渠坝即将完工，担心自己的大批田地即将淹没，自动集合起来前去填渠。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公然开枪，打伤中国农民 1 人，捕去 10 人。以后在日本警察武力保卫下，朝鲜农民于同月 11 日将坝修成通水。

在这场冲突中，中国农民受伤、被捕，日本警察和朝鲜农民无一伤亡。但日方却进行欺骗宣传，煽动反华情绪，以致朝鲜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复仇暴行。7 月 3—8 日，在朝鲜仁川、新义州、元山、汉城、浦南津等地先后爆发了袭击华侨、掠夺华侨财产、毁坏华侨房屋等一系列暴行。仅仅一个星期内，就有无辜华侨 109 人被杀，160 余人受伤。日本政府还趁机扩大事态。7 月 7 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此后，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同中国东北地方当局开始谈判。但由于日方坚持无理要求，谈判陷于僵局。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

谈判也为之中断。然而，这一事件却成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

“中村大尉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为武装侵略东北制造借口而挑起的又一事件。1931年6月，日军参谋本部派出部员中村震太郎大尉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中村率退伍骑兵军曹井杉延太郎，扮成中国人，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在归途中，于中国军事禁区乌兰浩特西北约30公里察尔森附近的四方台，被驻防当地之东北屯垦军第3团逮捕。中村所测绘的地图中，记载着交通、气象、土壤、水源及兴安岭中国驻军等情况，并携带三八式步枪、南部式手枪各1支及日记、测绘工具等。在审讯中，中村承认是以农业技师身分作掩护，实则是侦察中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布防及该地区铁路建筑情况。

中村的间谍行为危害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当时，第3团团长关玉衡考虑到如果将该间谍上交，日方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将其索回。所以，在审讯弄清中村的罪行后，下令将中村等人就地处死。按照国防公法，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完全有权处死外国间谍。可是，正在寻找侵略借口并准备武力侵华的日本帝国主义却利用这一事件，于8月17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种种强硬要求，同时动员右翼组织，尽量扩大渲染中村事件，煽动战争狂热。8月20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8月24日，日本陆军省就中村事件的处理作出决定：如果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中村的事实或者不能满足日方的要求时，则有必要对中国东北的洮南、索伦地区实施保护性占领等等。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煽动下，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炽热的程度。9月7日，日军驻京都第16师团派飞机到日本的福井、金泽、富士、松本等地的上空，散发了10万张传单。传单题为：“醒来吧，国防！”其内容除了主张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外，还附有注明日本在“满洲”特殊权益的地图。

阴谋策划

在大造侵华舆论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具体进行政治、军事的阴谋策划。1928年8月9日，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要点》。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纲领，其中强调“满蒙”同日本的特殊关系，准备寻找机会，制造借口，随时对中国东北实行武力占领。

1930年，日本陆军大臣则指令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制定了《1931年度形势判断》。计划用三个步骤，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

1931年4月1日，即日本若槻内阁成立之日，中国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约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向他表示了中国政府关于对以往不平等条约的新政策，即准备分五个阶段逐步予以废除或改定：第一阶段，收回海关关税自主权；第二阶段，废除治外法权；第三阶段，收回租界；第四阶段，收回租借地；第五阶段，收回铁路、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行权。王正廷还明确告诉日方：中国政府决意收回的租借地包括日本租借的旅大地区，收回的铁路权包括旅顺至长春的南满铁路。

为此，重光葵立即回国，向外务省做详尽报告。而日本外务省则很快地将这一最新动态通报给陆军省、海军省和关东军。

关东军接到外务省通报后，立即加紧制定对东北实施军事占领的计划。

并于同年6月初向日本军部提出《变满蒙为日本领土》的意见。6月11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再次指令转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建川美次，主持召开了包括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大佐、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大佐、欧美课长渡久雄大佐、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参加的 secret 会议，进行关于“满蒙问题”的全方位研究。

经过8天反复研究，建川等人于6月19日制定出在一年内占领东北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其中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军事行动。

在此以前，经板垣、石原等人的策划，关东军司令部也制订了所谓《处理满蒙问题方案》，确立了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施办法。这时，板垣和石原等人业已相互勾结，形成了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秘密班底。其主要成员还有沈阳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张学良顾问柴山兼四郎少佐的辅助官今田新太郎大尉、沈阳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精通爆破技术的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河本末守中尉、沈阳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驻虎石台的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驻旅顺的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等人。这个秘密班底多次开会密谋，并做了具体分工，例如组成爆炸柳条湖铁路的秘密班子和进攻北大营及沈阳城的秘密班子。他们吸取“皇姑屯事件”的教训，预定在发动事变的同时，争取邻近驻朝日军越境增援。而此项活动则由驻朝日军高级参谋神田正种中佐具体负责。

为发动事变、随时了解军部中央的动向，板垣等人还在军部组织了秘密班子，其主要成员有日军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陆军省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中将等军部重要人物。特别是被称为“第二秘密参谋本部”的俄国班，除班长桥本欣五郎外，小原重孝大尉、田中弥大尉，天野勇中尉等也是这个秘密班子的成员。

关东军的秘密班子同军部中央的秘密班子相互串通、来往频繁、互通信息，形成了一股强硬的侵华势力。1931年4月中旬，日本军部调仙台驻军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到中国东北，代替日军第16师团。该师团的士兵大都是日本寒冷地区生长的，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与此同时，日军南满铁路独立守备队也进行了一系列重新部署。将原来较分散的各部队相对集中于各军事要地、重要车站，加强对铁路沿线的戒备，并配发重武器。驻朝日军第19、20师团也同时开始在中朝边界河图们江沿岸集中，举行针对侵略中国东北的水陆联合军事演习，并侵占了中国在龙多岛和图们江的领水。8月下旬，日军多次在图们江进行越界架桥和在水中施放水雷的演习，并越界过江在中国境内埋设地雷，步兵也越过图们江在中国境内进行散兵演习。

1931年8月1日，日本军部为了适应“满蒙问题”的需要，做出一项重要人事调整，任命日军第10师团长、通晓中国事务、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本庄繁中将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对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极为熟悉。同时还任命原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为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中国大陆长期居住达18年之久，是一名真正的“中国通”，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日本军部此时将这两位精通中国事务的高级军官调住中国东北，很显然是为侵华战争作准备。

本庄上任后，以对守备地进行巡视为名，从9月7—18日下午，由石原等人陪同，对关东军各部队进行了为期12天的视察检阅。所到地区有海城、

鞍山、本溪、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其中的沈阳是其视察的重点。在此期间，本庄还多次观看了各地日军的军事演习。如 9 月 14 日驻长春日军越出铁路附属地的演习，15 日驻沈阳日军第 29 联队（团）、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16 日步兵第 29 联队的装甲汽车队、山炮队联合演习等。由此可见，所谓“本庄视察”实际上是对“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实力的考察，也是制造柳条湖事变前的一次战前动员。

此外，关东军在制定进攻沈阳计划时，考虑到沈阳城墙较坚固，需用重炮才可奏效。1931 年 7 月，经日本军部批准，由日本东京兵工厂运来了两门 24 厘米重炮。据关东军参谋中野良次记述，日军在运炮及安装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以掩人耳目。从神户港到大连用客船装运，到大连码头后，直接卸到地下室。卸炮日军士兵一律穿上中国便衣扮作搬运工人，把炮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木箱里。到达沈阳后，直接卸到日本独立守备队的管区内。安装重炮是在深夜 12 点到凌晨 3 点之间，把炮口对准了北大营和飞机场，并预先就“攻击目标”的位置在炮身上做了记号，在实际射击时只要把记号和标尺配合起来，炮弹就可以完全命中目标。经过一番周密配置，9 月 10 日重炮的安装工程竣工。关东军还从国内运来军用飞机 30 余架、各种野炮 20 余门及其他大批军火，以便战争之用。

为了把军事准备变成行动，9 月 4—5 日，日军在沈阳兵工厂附近举行大规模包围或攻击演习。9 月 8 日，日军越境在沈阳中国东北军第 7 旅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旺官屯、关帝庙、老瓜堡等地进行野外实战演习，并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随后还不断进行城市边沿战、夜战、拂晓战等一系列军事演习。9 月 14—17 日，日军在北大营附近连续进行实战演习，多次贴近北大营围墙。17 日，竟有 2 名日本警察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与此同时，中国东北的日本在乡军人（即由日本退伍军人、预备役军人、后备役军人和受过短期训练的人员所组成的右翼法西斯军人）组织也于 9 月 8 日接到密令，分别到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沈阳关东军于 9 月 10 日前后多次召集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竭力煽动日侨仇华情绪，并发给枪支进行军事训练。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侵略者在疯狂准备战争，当时的中国东北已是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九·一八事变”

早在 1930 年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就策划把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1931 年春，板垣等人又制定出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1931 年 6 月底，又进一步制定了在柳条湖地段炸毁铁轨的详细计划。时间预定是 9 月 28 日，并计划同时用重炮轰击北大营，实施“闪击战”，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沈阳是当时东北四省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东省特别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东北军司令部所在地。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石原选择了距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为爆破地点，并规定了第一期军事占领的范围：“以满铁线的长春及其以西 250 公里的四洮路的桃南，长春以东 100 公里的吉林，以及吉林以东 150 公里的敦化为界限，大体相当于整个东北地区的 1/3 的南满地区。”关东军在选择发动“事变”时机之时，充分考虑了当时中日间所谓“满洲问题”交涉的形势。

在“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交涉过程中，关东军就曾企图以此为契机，发动事变。1931年8月上旬，关东军曾密令在四平街组成的装甲列车、步、炮兵联合部队作出动准备。军事形势在当时紧张到了顶点。石原莞尔还于8月13日写信给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提出强硬请愿，主张关东军效法德国占领中国山东，以“中村事件”为口实，直接占领中国东北。

9月中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变”的计划在日本国内透露出来，日本政府、军部不同意近期发动“事变”，主张下一年度时机成熟时再发动。但关东军在得知日本军部这一最新态度之后，即决定把原定日期提前10天。9月18日，关东军一手制造了“柳条湖事变”，亦称“九·一八事变”。

9月18日，沈阳的天气异常晴朗，白天平静无事。夜间10点20分，日军按预定计划，由独立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几名部下，在距离北大营约六七百米处的柳条湖东侧南满铁路上点燃了炸药，炸毁了一段铁轨。此后，日本侵略者使用贼喊捉贼的惯技，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和袭击了日本守备队，发动了侵华战争。

关于“柳条湖事变”的真实情况，参与策划这个事件的花谷正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

18日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黑沉沉一片；流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个离兵营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在这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包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10点多钟。爆炸时轰的一声，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有炸死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做到，使在满铁线路驰骋着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让工兵作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高速行驶的火车暂时地倾斜一下后，还可以通过。根据调查所得的这个安全长度，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在炸毁路轨之同时，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木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这时，呆在铁路爆破地点以北约4公里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今田大尉不但在现场附近监督爆破作业，而且他本人是一个精通剑术的人，发起冲锋时，他亲自挥舞着日本军刀，杀进了北大营。

当时，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名义，接连发布4道攻占北大营和沈阳城的命令：

- (1) 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扫荡北大营之敌；
- (2) 令步兵第29联队进攻奉天（沈阳）；
- (3) 令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从北面进攻北大营，受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指挥；
- (4) 要求第2师团以主力增援之。

9月19日凌晨1点30分至2点之间，板垣又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了由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起草的3项电令，除了命令占领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外，主要是命令有关部队迅速集中沈阳，支援进攻沈阳的日军，同时还请求驻朝日军越境增援。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于板垣、石原等人扩大侵华的主动行为表示赞

应为柳条湖。

易显石等编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133—135页。

许，对板垣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发布的 4 项命令予以追认，并把这些命令和以自己名义发布的 8 项电令一起电告日本军部。

随着从沈阳南站向北大营和飞机场发射的 24 厘米重炮的炮声，日军开始了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进攻。9 月 18 日夜 11 点 30 分，日军守备队第 2 大队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接着又于 19 日晨 5 点 30 分完全占领了北大营。进攻沈阳城的日军第 29 联队兵分三路，第一路攻商埠地南市场，第二路攻商埠地北市场，第三路攻入大小西边门。先将警察署包围，接着又包围宪兵总司令部、电话局、有线电局、无线电台，然后包围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及东三省官银号、中国和交通两银行。被日军包围的中国军队警察宪兵均被缴械，未被包围者四处逃避。其他各种军政机关、学校、工厂也被陆续侵占。到 9 月 19 日晨 6 点 30 分，沈阳城完全被日军占领。由于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在日军大举进攻之下，均主动放弃兵营撤退，致使日军的侵略气焰更为嚣张。

日军在占领沈阳后，掠夺了中国大量军用物资，其中有飞机 262 架、各种炮 3091 门、坦克 5 辆、各种枪支 12 万余枝等，中国损失极为惨重。

9 月 19 日上午，沈阳城内外贴满了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颠倒黑白，反诬事变是由于中国军队制造爆炸，破坏了日本南满铁路正常运营，日本关东军的行动纯属自卫等等。

9 月 19 日凌晨，日本军部接到事变通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满蒙”局势的最新发展及处理方针。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陆军省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中将、参谋本部次长二宫中将、总务部长梅津中将、作战部代理部长今村大佐、情报部长桥本少将。会议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适时宜的”，并决定向中国东北增兵。会议责令陆军省军事课开始着手准备增派驻朝日军一部及国内日军第 10 师团支援关东军的紧急调遣计划，以便借此次“事变”一举解决“满洲”问题。

9 月 21 日下午，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銑十郎在尚未接到正式命令之前，即独断下令所辖步兵第 39 混成旅团连夜乘火车越过中朝边境鸭绿江，向中国东北进发，参加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

9 月 22 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对驻朝日军之行动采取了“追认”的态度，并决定增拨临时军费。同日下午，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将此事联合上奏天皇，并获得天皇的批准。这样，关东军和驻朝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得到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政府、军部的全力支持。此后，日本关东军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东北各地扩大侵略。战争的硝烟弥漫东北大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临着—场空前的浩劫。

占领东北三省

1931 年 9 月 24 日，日本政府公开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这个声明是按照日本军部的基调写成的，表明日本政府和军部基本协调起来。声明表面宣称所谓“不扩大”方针，而且还保证“日本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但这不过是欺骗国内外舆论的谎言。与此同时，声明还公然声称日本军队“认为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铲除危险的根源”，从而为关东军扩大侵华战争提供了所谓的依据。在短短的 8 个多月里，日本侵略军

不仅完全占领了东北三省及热河省，而且还把战火烧到了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一·二八事变”）和北平、天津二市。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首先是想要侵占以沈阳为中心的南满铁路和安奉路沿线的重要城市，以图牢固控制南满。这是日军第一期作战计划，而且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的：第一步：制造“柳条湖事变”；第二步：攻占沈阳城；第三步：在攻占沈阳城之同时，占领安东（今丹东市）、凤凰城、营口。（19日上午5点30分，日军侵占安东；上午8点30分，侵占营口；10点，侵占凤凰城。）随后又有第四步：占领长春。长春是南满铁路的终点，又是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的交点，也是吉林省和东省特别区的临界线，占领了长春，就可以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西图洮南，进攻齐齐哈尔市。所以，攻占沈阳的同时攻占长春，是关东军阴谋策划的既定方针。

9月19日深夜12点15分，驻长春日军司令官长谷部少将得知日军攻占沈阳城的消息后，当即以“日本南满铁路被中国军队破坏数段，辽宁方面已经开始军事行动，旁边自应采取一致行动，以谋自卫”为借口，决定对长春进行总攻击，同时对南岭和宽城子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在中国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不到一日，长春也沦入日军的铁蹄之下。

日军在占领沈阳、长春等地之后，于19日将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主力转移到作战前线。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至沈阳，第2师团集结长春，为下一步侵占吉林、哈尔滨作准备。

占领长春之后，日军按照其“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战略方针和不失时机、主动进攻、“防患于未然”的战略进攻思想，决定以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为第二期作战的主要目标。因为占领了吉林、哈尔滨，既可以巩固对“南满”的军事占领，又可以夺取整个“北满”。

9月21日上午9点30分，日军乘装甲列车开始进犯吉林市。由于吉林省边防署司令、省代理主席熙洽的叛变，中国驻军于21日全部后撤。熙洽又派出密使与日军接洽，达成无条件投降并迎接日军进城的卖国协议。9月21日下午6点30分，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地占领了吉林市。

与此同时，日军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中佐等人于9月21日密谋策划制造了爆炸事件。当日夜晚，哈尔滨日日新闻社、朝鲜银行、日本总领事馆、日本特务机关同时被炸。哈尔滨日本总领事大桥忠一先后4次急电请求关东军派兵保护日本侨民。关东军一面报告日本军部，一面将占领吉林的第2师团主力调往长春集结，待命攻占哈尔滨。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及军部担心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严令关东军暂缓进攻哈尔滨，等待时机。

9月23日，日本军部制定了《关于军事占领地的范围》，规定了几条军事占领界线。

第一条是最小限度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以辽河一线，即以郑家屯、新民、营口为界；东线以吉林、海龙为界。第二条是可以向外扩张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以洮南，通辽、大虎山为界；东线以敦化及延边地区为界。第三条是哈尔滨和延边地区。暂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进行交涉，等待时机全面占领。这个军事占领线的提出，再一次证明日本军部同关东军在扩大军事占领上都是以中国整个东北地区为目标的。

日军暂时停止进攻哈尔滨之后，改由洮（安）昂（昂昂溪）路北进，进

攻黑龙江省。这是日军的第三期作战计划。为此，日军制定了《关于征服北满的方略》。企图以所谓“和平的手段”处理解决“北满”问题。利用投降日本的桃南镇守使张海鹏叛军进犯黑龙江省，是日军图取黑龙江省的第一步。

10月1日，张海鹏宣布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政权，并于10月4日、13日两次在日军的空中支持下，进犯黑龙江省。在黑省军队的阻击下，叛军的进攻均宣告失败。日军在企图利用叛军占领黑龙江省的阴谋失败后，决定直接出兵攻占黑龙江省。为制造出兵借口，以中国黑省军队破坏嫩江铁路桥、损害了日本南满铁路权益为理由，开始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11月3—6日，中国驻军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军在飞机、大炮、装甲列车的掩护下，多次向中国驻军阵地发动进攻，都被击退。但中国驻军因伤亡过重，于6日夜后撤，日军也担心引起同苏联的纠纷和国际舆论的反对，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

嫩江桥战斗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遭到的最为激烈的一次抵抗，是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官兵基于民族义愤而进行的一次自卫反击行动。全中国各地都进行了有力的声援，贺电、慰问信雪片似的飞向黑龙江，使黑省中国驻军更加斗志昂扬。但后撤以后，日军于19日上午9点进入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至此，黑龙江省大部地区也沦入敌手。

日军在占领黑龙江省大部及齐齐哈尔后，已无后顾之忧，开始调转矛头进攻锦州，袭取辽西地区。这是日军第四期作战目标。锦州是辽西重镇，地位极为重要。占领锦州不仅是完成对辽宁的全部占领，也是今后继续西侵热河、平津的最重要的基地。沈阳沦陷后，张学良于9月23日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锦州一时成了中国东北政权的临时中心。同时，大批后撤军队也陆续来到锦州集结。

日军第一次侵略锦州的行动，是10月8日对锦州实施轰炸。轰炸目标是中国兵营、省府长官公署、火车站等。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另搭一架运输机同时观察轰炸锦州的情况。日军第二次侵略锦州是指使所谓“东北民众自卫军”的伪军土匪部队进犯锦州。10月20日，伪军土匪开始向台安、辽中、海城、盘山等地骚扰，并进犯锦州，但都被中国边防军予以击溃。随后，日军又制造了张学成伪军的叛乱，也被中国边防军所消灭。日军第三次行动是利用“天津事件”出兵锦州。11月份，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挟持清朝废帝溥仪出逃，在天津先后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关东军即以驻天津日军陷入中国军队包围、需紧急救援为名，决定出兵锦州。11月27日，关东军第2师团主力、混成第4、第39旅团开始向锦州进攻。但在白旗堡饶阳河一带，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阻击。这时，日本政府及军部顾虑此举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于当日由军部两次急电令关东军停止进攻锦州。这样，第三次侵略锦州的行动中途停止。第四次侵犯锦州是在1931年12月内开始的。12月7日，日本陆军大臣致电关东军司令官，表达了军部关于侵占锦州的战略意图。12月13日，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拟订了“锦州攻击方略”，制定了从北向南直指锦州的作战方案。这时，日本国内由于财政困难、通货膨胀、法西斯势力猖獗，若槻内阁被迫于12月11日宣布总辞职。12月13日，成立了犬养内阁。法西斯军人“皇道派”头目、对华强硬派荒木贞夫出任新内阁的陆军大臣，以竭力主张侵华而闻名的政友会头目森恪出任内阁书记长官。这样，日本军部中央和法西斯右翼的结合进一步加强，

从而使日本军部首脑层在思想上同关东军完全一脉相承。其结果是犬养内阁与日本军部、关东军关于武力解决“满蒙”的态度完全达到一致，因而使关东军这伙法西斯军人更加无所顾虑地肆意扩大侵华战争。12月15日，日军参谋本部给关东军下达了关于侵占锦州和所谓“讨伐匪贼合时宜”的内部训令。训令中声称日军进攻锦州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应以“讨伐匪贼”、“扫荡根据地”为名，实施对锦州的全面进攻。12月18日，军部命令向东北增派日军混成第8旅团及战车、炮兵部队。至12月26日，关东军准备进攻锦州的军事作战方案在石原莞尔的策划下全部就绪，并发出了相应的攻击命令。12月28日，日军开始进攻锦州周围的北宁、大通、营沟等地。这次进攻锦州，是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以前所未有的大会战姿态进行准备的。1932年1月3日，日军发起对锦州的总攻击。投入兵力3个师团，从三面包围锦州。由于中国驻军事先按照“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率部退入关内”的秘令，在1月3日前全部撤出锦州，锦州抗敌政权自行取消。1月3日下午6点，日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锦州。关东军侵占锦州后，迅速地占领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

1932年1月上旬，日军在侵占锦州和辽西地区后，回过头来，继续“征服北满”，夺取哈尔滨，消灭宾县的中国辽宁省政府和海伦的黑龙省政府，这是日军的第五期作战计划。

当时设在宾县的吉林省政府，是按照张学良的指示于1931年11月中旬建立的，以与熙洽为首的吉林省傀儡政权相对立，由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任省政府主席。宾县吉林省政府建立不到一个月，全省41个县已恢复28个。设在海伦的黑龙省政府是中国军队撤出齐齐哈尔后于1931年11月19日建立的。由黑龙省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任省政府代理主席兼黑龙省军队的总指挥。这两个政权均奉行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

日军侵略哈尔滨的第一步，是指使汉奸伪军“北伐”，但立刻被中国抗日军队予以坚决击溃。于是，日军决定直接出兵攻占哈尔滨。在1932年1月27日，关东军借口在哈尔滨有4个日侨被中国抗日军队了超部所杀，下令进攻哈尔滨。同时令飞行队对哈尔滨进行空中侦察，并照会中东铁路管理局苏方代表：要求对关东军进攻哈尔滨提供军事运输方便。由于日军重兵压境，中国抗日军队几经抵抗，被迫于2月5日撤退，哈尔滨也被日军占领。

哈尔滨失陷后，宾县吉林省政府和海伦黑龙省政府亦随之不复存在。至此，经过4个月18天，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省）一区（东省特别区）全部沦陷。从此，以东北军为主体的对日抵抗活动逐渐消沉，代之而起的则是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建立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军事占领中国东北的情况下，为使东北变成日本占领下的殖民地，开始进行收买汉奸、建立“满洲国”的罪恶活动。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在所谓《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中言称：“要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王道乐土。”并规定这个新政权“国防和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等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伪傀儡

政权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也是建立伪“满洲国”的草图。

10月21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又炮制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为占领中国东北实施殖民统治而制定了三项准则：“一、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完全分离出来；二、将满蒙统一在一起；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质上掌握在我方手里。”

在日本军部及关东军确定了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形式之后，板垣、石原和花谷等人电召在中国东北的日侨右翼组织“满洲青年联盟”、“大雄蜂会”等法西斯组织，分赴东北各地协助关东军，策动满洲独立运动。9月28日，吉林省原边防署司令、省政府代理主席熙洽首先宣布“独立”，同时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并声明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同日，在辽宁省，由赵欣伯、袁金铠等老牌汉奸拼凑的伪政权也宣布脱离张学良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建立“新独立政权”。在日军软硬兼施下，原辽宁省长臧式毅也于12月16日出任伪“奉天（辽宁）省省长”。另外，吉林洮南镇守使张海鹏、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藏山在日军的诱使下，也分别于1931年10月1日和17日投降日军，自任伪“保安总司令”，宣布“独立”，脱离国民党政权，当了汉奸。

在黑龙江省，由于该省中国驻军坚持抗日，伪政权建立较晚。1931年日军攻占省会齐齐哈尔后，即指使汉奸成立“地方维持会”，同时决定由汉奸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1932年1月7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市宣布就任。至此，辽、吉、黑三省先后都建立了日伪政权。这些伪政权全部由日本顾问控制，都是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并为日军积极策划建立全东北的傀儡政权准备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进一步采取种种阴谋手段，首先便是把关东军内定的伪政权首领清朝废帝溥仪挟持到东北。当时，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受关东军司令官的委派，秘密潜入天津，勾结中国一些汉奸土匪、失意军人，于1931年11月8日制造了“天津事件”。他让汉奸组织便衣队，按计划在天津北门外的估衣街抢劫商店，鸣枪示威，并袭击中国军警，接着又破坏了天津至北平的铁路。在天津人民遭受浩劫的混乱状态中，土肥原乘机挟持溥仪出逃天津，乘船到达旅顺。

1932年1月29日，板垣征四郎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前往旅顺，同溥仪就建立伪“满洲国”一事进行协商。溥仪表示愿意充当“新国家”的首领。2月16日，在日军操纵下，召开了所谓“建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大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老牌汉奸赵欣伯、袁金铠、于冲汉，还有一度降日的马占山（后又举起抗日旗帜，继续抗日）。关东军方面有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知、驹井等。

在这次会议上，板垣代表关东军迫令汉奸巨头们接受他事先拟定的制造伪“满洲国”的计划，并限于3月1日前成立“新国家”。2月25日，关东军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的方案规定：所谓“新国家”，称“满洲国”，国家元首叫“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的五色旗为“国旗”，“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政治上信奉“民本主义”。

同年2月9日，关东军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伪“国务总理”，臧式毅为伪“国务副总理”，张景惠为伪“参议府议长”，袁金铠为“副议长”，于冲汉、赵欣伯分别为伪“监察”、“立法”两院的“院长”。3月1日，关东军借伪“满洲国”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3月9日，在长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

当天，溥仪同关东军签订了一项可耻的卖国密约，密约是关东军板垣等人一手炮制的，但采取了以溥仪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函件的形式，其主要内容如下：

- 一、敝国对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所需经费由敝国负担。
-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多种设施，竭力援助。
- 四、敝国参议院挑选贵国知名卓识的国民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

这份密约，从溥仪来讲，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卖身、卖国契约，意味着溥仪是一个十足的傀儡。从日本来讲，则是一份把中国东北变为殖民地的罪证。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与伪“满洲国”签订了所谓《日满议定书》，正式宣布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天皇任命武藤信义大将接替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官，并兼任关东厅长官和“驻满全权大使”，同时拥有对“满铁”的监督权。从此，关东军司令官集大权于一身，成为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炮制的殖民统治伪政权。在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中，日军凭借庞大的法西斯军事武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对东北人民进行了野蛮的法西斯统治，实行了残酷的掠夺和奴役，写下了日本侵华史上可耻的一页。

第 23 章

退出国联

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不仅激化了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而且引起了国际列强的注意。当时，国际联盟是在英法等列强操纵下、标榜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日本是国联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国联有一定的影响力。一战后，日本一直把国联外交作为一种筹码，力图通过国联来兜售其帝国主义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意识到中国可能采取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通过国联来压制日本，因而更加重视国联外交。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之所以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国联和列强出面干预，制止日本的侵略，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在国联和列强身上。

这样一来，国联外交便成了中日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之一。

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政府之命，正式向国际联盟理事会起诉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要求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立即召集理事会会议，讨论日本侵华问题，并请求理事会根据盟约第11条赋予的权力，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事态继续扩大，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的性质和数额等等。

时任日本外相的币原喜重郎，根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秘密报告，虽然认为事变很有可能是关东军蓄意制造的阴谋，但为了维护日本帝国的利益和形象，掩盖日军的侵略罪行，他还是就事变的起因向日本驻国联代表发出了一个颠倒黑白的训电，污蔑中国军队是事变的挑起者，言称日军的行动只是为了“自卫”等等。

根据币原的指示，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日本老资格的外交家，曾任驻华公使，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在22日召开的国联理事会上发言，胡说事变是由中国军队破坏日本的满洲铁路引起的，日军占领东北的都市，乃是“为了保护满洲铁路线及在该地居住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是“不得已而为之”，竭力为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辩解。

但是，鉴于日本与列强的矛盾及日本的国力尚不足与英美等一流的帝国主义及列强控制下的国联相对抗，加之历史上有过“三国干涉还辽”的先例，日本政府及外务省在竭力否认侵华的同时，又把排斥国联及第三国干预事变作为国联外交的最大任务。

事变爆发之初，芳泽便向币原建议，应该尽可能地不把此事提到国联理事会上审议。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也建议，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避免由国联或第三国来处理事变。这时，币原虽标榜“协调主义”，但在如何处理事变这一关键问题上，却暴露了他的本质。他所谓的“国联大会或理事会处理这一问题会进一步刺激日中两国的舆论，反使事情复杂化”的看法，实际上是担心国联对日本作出不利的决议，因而阻挠国联干预事变的口实。

为了排除国联及列强的干预，缓和与列强的矛盾，日本政府于9月24日发表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声明，再次颠倒黑白，污蔑中国军队破坏“满铁”、挑起战端。声明声称：“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

我方所期待的，归根到底，在于使帝国臣民能够有机会安心从事各种和平事业。……为使此次不幸事件不致破坏邦交，进而研究将来铲除祸根的建设性计划，帝国有决心和中国真诚合作。”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有三个要点：

一是诬称事件是中国挑起的，日军的军事侵略只是有限的“自卫”；二是言称日本对中国东北没有领土野心，中国、国联及列强尽可放心；三是日本愿意和中国进行“真诚合作”，解决事变问题，国联及列强不必插手。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蒙骗了国际舆论和列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联及列强的对日态度。

但是，中国代表团十分清楚日本的这一阴谋，因而坚持由国联处理事变，并表示愿意接受国联的任何处理结果。对于日方提出的中日直接交涉一事，则表示坚决反对。9月25日，国联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事变问题。中国代表施肇基表示，在日本占据着中国领土的情况下，日中直接交涉是绝对不可能的。与此同时，针对日本“保侨”的借口，施肇基指出，在日军撤兵之后，中国当会负责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

为了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真相，促使国联早日下决心解决事变，中国代表还向国联提出了向东北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的建议。日本深知，如国联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日本侵华的真相就会大白于全世界，这无疑对日本不利。为此，芳泽表示，日本不会接受此建议，但为了拖延国联对变事的讨论，他说可以就此事向日本政府请示。然而，就在国联等待日本回答的时候，日军却迅速北上，占领了长春、吉林等重要城市。在这种形势下，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的反对，决定向中国东北派遣7人调查团，成员由国联指定的第三国人员及中日代表担任。中国代表施肇基当即表示同意国联的这一决定。理事会要求日本迅速就派遣调查团问题正式表态。9月25日，币原训电芳泽，声称派遣视察员赴中国东北完全没有必要，希望国联相信日本政府的“诚意”，静待事态的发展。这实际上是日本为排斥国联而实行的拖延战术的继续。

在派遣调查团问题上，国联原本希望美国支持，并派员参加。但美国国务院却认为派遣调查团于事无补，反而会刺激日本的舆论，所以不支持国联的这一行动。美国虽不是国联成员国，但它是世界头号强国，而且是国际联盟的创建者，因而对国联及国际政治有极大的影响。由于日本反对、美国又不支持，派遣调查团一事就被搁置起来。

在国联的交涉中，中国外交的目标在于通过国联强有力的干预，迫使日本立即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因此，中国从9月21日正式向国联申诉日本侵华之日起，就坚决要求日本立即撤兵。然而，国联在英法的操纵下，却不愿得罪日本，迟迟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9月22日，国联理事会甚至不区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向中日两国发出了内容相同的通牒，要求中日双方“避免事态扩大，并立即由两国协商撤兵”。这个通牒实际上带有包庇日本侵略者的成分，令中国政府大为失望。而日本为欺骗国联和国际舆论，则宣称日军已大部分撤回原地，少数部队是为了“警戒”和保护当地日本侨民的安全才在各地驻扎的，一旦达到目的，便会立即撤回原地。日本的一番花言巧语，迷惑了列强、拖延了国联的行动。

9月30日，在中国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国联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务必于10月14日前从东北占领区撤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为了应付形势，芳泽言称他可以代表日本政府，接受理事会的这一决定（后因币

原反对，决议改为日本有条件撤军，即以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准，这就给日本拒不撤兵留下了借口），但对施肇基所提出的组织国联调查团前往东北进行调查以及组织中立国委员会监视日本撤兵一事，表示坚决反对。他反复宣称，日本政府“深信无须国联方面派遣任何特别委员团前往东北进行调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感到国联组织调查团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决定放弃组团要求，但重申日军必须在国联理事会指定的日期（即10月14日）之前，全部撤出占领区，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否则，中国政府“将要求国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但是，9月30日的国联决议只要求日本撤兵，并没有提出任何监督措施及违反决议后的制裁办法，所以，这一决议不仅没有制止日本的侵华，反而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10月8日，日军轰炸了远离事件地点的锦州，把事变初期的所谓“不扩大”方针，变成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的事实，充分表明了日本侵占全东北的野心。

10月13日，根据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东北问题的最新发展。会上，施肇基首先发言，愤怒谴责了日本拒不执行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决议，并轰炸锦州、扩大侵略的暴行。施肇基在发言中情绪激昂，大声疾呼：国联条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如同两个铁锚，世界各国犹如轮船，轮船凭借铁锚而进止。我们深信凭借两个条约，可以摆脱困境。两项条约乃是“世界和平大厦之栋梁，栋梁若折断，则大厦必毁矣”。施肇基的发言有理有力，博得了与会代表的赞许。

在全场代表鄙视的目光下，芳泽照本宣科，宣读了日本的长篇声明，重弹日中直接交涉的老调，并一再为日本拒不撤兵进行辩解，说什么只有等到日本侨民有安全担保时日军才会撤回原防。芳泽的声明遭到了中国代表的严厉驳斥，会议陷入了僵局。

为增强国联的力量，以实力制止日本的侵华活动，国联理事会决定邀请美国代表参加理事会关于东北问题的讨论。对此，日本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国联的讨论情况已对日本不利，如果美国再加入进来，势必会给日本造成更大的压力。10月16日，理事会对邀请美国与会一事进行表决。结果以13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而获得通过。理事会主席法国外长白里安立即向美国发出了与会邀请。美国政府表示愿意与国联合作，制约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16日当天，美国总统胡佛就派代表吉尔伯特出席了国联理事会会议。美国的与会及其表决结果，表明了各国对中国的同情和列强与日本之间的矛盾，表明了日本在国联已陷入了孤立地位，是日本国联外交的一次失败。

10月22日，国联理事会经过反复磋商后，通过了7项决议草案，要求日本陆续撤兵，并在下次国联理事会开会前撤退完毕；建议中日两国在日本撤兵后举行直接谈判。中国代表团表示接受理事会的这些决议。但日本代表芳泽却表示反对，并向理事会递交了日本政府的备忘录，要求对理事会的决议草案进行根本性的修改。10月23日，芳泽在理事会上再次发言宣称，日本不能确定撤兵日期，只有等日本侨民无危险、中国诚心诚意与日本合作时，日本才会撤兵。而关于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日本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商定具体办法。芳泽的无理要求受到了理事会成员国的一致反对。西班牙代表当场发言，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日本一日不撤兵，则中国一日不得安

全；日本撤兵之日，才是中日交涉开始之时。这位西班牙代表还正告日本：“应深刻反省国联所以有此项制裁之原因，其原因为何？即日本无端侵犯中国领土，致成在 20 世纪历史上违背人道正义之绝大污点。”西班牙代表的讲话深得人心，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芳泽受到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责问和批判，十分狼狈。最后，理事会对决议进行了表决，结果是 13 票赞成，日本 1 票反对，而日本的修正案则是 13 票反对，日本 1 票赞成。这次表决，再次证明了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为了削弱国联的影响，排除国联对事变的进一步干预，10 月 26 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次声明，除继续为拒不撤兵进行辩解外，公开了它向中国提出的所谓中日协商五项大纲，其主要内容是：一、否定互相侵略的政策和行动；二、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三、彻底取缔妨碍通商自由和煽动国际间憎恶对方的有组织的行动；四、对于在满洲各地的帝国臣民的一切和平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条约上规定的帝国在满洲的权益。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对撤兵一事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只要求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漫无边际的殖民权益要求，毫无解决事变的诚意可言。日本明知中国不会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而故意提出，意在把责任继续推给中国，排斥国联的干预，进而为日本拒不撤兵制造借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重申在领土被占的情况下，中国绝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只有在日本撤兵之后，才能谈交涉问题。这样，国联理事会的有关讨论再次陷入僵局。

李顿调查团

11 月上旬，日军入侵远离“满铁”的嫩江等地，暴露了日军企图侵占整个东北的阴谋，因而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而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背信弃义行为极为愤慨，敦促日本撤兵的要求也更力强烈。为缓和国际压力，迫使国联及列强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也为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争取时间，日本对国联外交作出了重大调整，改变了以往反对国联介入事变的态度，作出了与国联合作解决事变的姿态。

11 月 18 日，在一片要求日本停止侵略、立即撤兵的呼声中，日本代表芳泽向国联理事会提出，在承认日本所提出的五项协商大纲的条件下，日本赞成派遣国联调查团赴东北调查。芳泽的这一表态，令国联惊喜不已。法国代表白里安立即表示赞许，各国代表亦多随声附和。为了拉拢列强，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日本竭力主张调查团应调查与日本和列强关系密切的、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所谓中国排外、抵制洋货、国际条约的履行状况等外国在华殖民权益问题，而对东北问题的关键——日本的军事侵略行动及撤兵问题，却不允许调查和干涉。

此外，在派遣调查团的性质上，日本要求按盟约第 11 条办理，而该条款没有规定解决纠纷的具体办法。中国则要求按照盟约第 15 条派遣，争取国联理事会或国联大会提出谴责日本侵略和要求日本撤兵的报告或建议。对于中日双方的这一争执，国联理事会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把盟约第 11 条和第 15 条加以调和折中，只是笼统地称派遣调查团，不讲明是按哪条派遣。12

月 10 日，理事会正式通过了派遣调查团的决议，规定调查团“在实地调查影响国际关系并扰乱日中两国间的和平或和平基础的……一切事情，并将调查结果报告理事会”。为防止日本利用调查拖延撤兵时间，决议又重申了 9 月 30 日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日本撤兵的决议仍然有效。

根据国联理事会的决定，调查团有英、美、意、德、法五国各 1 人组成，中、日各派 1 人以顾问名义参加调查团，他们分别是英国委员李顿、美国委员麦考埃、法国委员克劳德，德国委员希尼、意大利委员阿尔德罗、中国顾问顾维钧、日本顾问吉田伊三郎。调查团的成员大都是前殖民地高官，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有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总的说来，他们对日本通过军事侵略占领中国东北，还是持否定态度的。

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李顿调查团才起程赴远东。等他们抵达日本时，已是 1932 年的 2 月底了。在此期间，日本已占领了东北全境，并赶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建立起了伪“满洲国”。以期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国联及国际社会承认。这样，东北问题又增加了一项与撤兵同等重要的内容，即对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为应付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日本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时的日本外相正是原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他在会见调查团时称，此次事变系中国政府推行革命外交、单方面破坏与外国缔结的条约所致，企图以共同维护列强在华殖民权益来引诱调查团上圈套。在调查团与日本方面的多次会谈中，日本重弹侵华有理的老调。鉴于伪“满洲国”已经建立的既成事实，李顿提出在东北实行国际共管或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建议。虽然这一建议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迎合了日本的一些侵略要求，但此时已不能满足日本的胃口，日本拒绝了李顿的建议。调查团与日本会谈的结果表明，日本决不放弃已到手的侵略果实。

3 月 14 日，调查团从日本抵达中国上海，首先在中国关内的上海、南京、济南、天津、北平等城市进行了调查。当李顿调查团结束关内调查、准备进入东北时，日本进行了别有用心的阻挠。为表明伪“满洲国”是“独立国家”，日本指使伪“满洲国”

出面拒绝中国委员（顾问）顾维钧入境，理由是“恐有激烈分子，对顾君加以危害，影响将来邦交”。对此刁难行为，调查团十分气愤，当即警告日本，如中方委员不能同行，调查团就不再去东三省。这时候，日本假惺惺地出面为“双方”调解，并向调查团宣称：“长春政府并非服从日本政府的意见，在该政府已经发表声明、反对顾维钧进入满洲的情况下，加以阻止是困难的。”经过日本方面的“努力”，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李顿等部分团员从陆路进入东北，而顾维钧等人则取海道从大连上岸进入东北。

调查团进入东北后，初期没有同伪满政权进行接触。对此，关东军认为，让调查团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是国际社会承认“满洲国”的第一步。为此，他们指使伪政权设置障碍，阻挠调查团的调查活动。为完成调查任务，调查团最终向日本作了妥协退让，于 5 月上旬先后访问了溥仪等伪满政权的主要人物。与此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日伪政权还竭力限制调查团与爱国抗日人士（如马占山）接触，只允许调查团了解、接受伪“满洲国”成立的既成事实。但是，许多爱国人士不顾生命危险，通过写信、暗访等多种形式，向调

查团揭露了日本蓄意挑起事端、武装侵占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政权的罪恶行径。调查团本身也进行了努力的调查，基本掌握了日本非法侵略中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的事实。

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后，于7月下旬回到北平。然后历时月余，完成了总共10章、洋洋1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书。10月之日，国联理事会公开发表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

李顿报告书是一个典型的妥协主义和两面性的产物。它表现在：一是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称“凡不承认此点或忽视日本与该地区历史上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根深蒂固”，不容否认；二是承认东北有排日倾向，但同时又批驳了日本关于中国军队挑起事变的谎言，认为事变是日军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三是否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认为东三省历来是中国领土。“九·一八事变”之前，从未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所谓“独立运动”，完全是日军操纵的结果。因此，“现在的政体，不能认为是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的”。报告书表面上显得不偏不倚，然而对日妥协的地方亦不少。但就整体来讲，李顿报告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否定，打破了日本利用调查团、迫使国联承认伪“满洲国”的阴谋。

除了上述三点外，调查报告书还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原则和办法——“满洲自治”。这一方案既不接受中国提出的要求日本撤兵，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的主张，也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承认伪“满洲国”的主张，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组成一个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在东三省实行高度的自治。该办法的目的之一，在于借机将欧美列强的势力引入自治机构，以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渗透并抵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企图。如该办法规定，由外国教官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作为东三省惟一的武装力量，其他的中、日武装力量应退出东三省；向自治政府行政长官指派相当数量的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重要比例；行政长官得从国联理事会提供的名单中，任用外籍人员监督警察和税收机关，赋予他们广泛的权限；行政长官须从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的名单中，指派1名外国人担任东三省中央银行的总顾问。按照上述办法，未来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将处于代表列强利益的外国顾问们的控制之下，而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将受到极大的削弱。

李顿调查报告书公开发表后，受到了中、日及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中国政府经过研究后认为，该报告书的前8章的叙述基本上是公正的，中国可以接受，但第9、第10两章完全迎合日本的要求，严重不公，必须修改。作为解决事变的原则，中国坚持要求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10月20日，中国政府就报告书向中国驻国联代表提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提出了中国自主地在东三省实行自治的方案，以排除日本及欧美列强的侵略和干涉，同时还提出了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决议不能因报告书而变更的原则。

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也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并起草了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的长篇意见书。该意见书对报告书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虽表赞同，但对报告中关于解决事变的原则和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尤其是东北自治方案，实际否认了伪“满洲国”的“独立”地位，这是日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此后，中日又围绕报告书的修改、承认问题，

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

退出国联

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开会讨论审议李顿调查报告书。对于此次审议，中、日两国政府都极为重视，特别是日本。因为李顿报告书通过与否，关系到日本是留在国联还是退出国联的大问题，故派出了以松冈洋右、佐藤尚武、长冈春一为全权代表的庞大代表团，并任命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本来，日本驻国联的首席代表是驻法大使佐藤尚武，已具相当规格。但为了同中国及国联进行总决战，日本特别起用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强烈鼓吹者、原“满铁”副社长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松冈洋右是日本著名的国家主义、对外扩张主义者。他早年留学美国，1904年进入外务省，长期在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任职。在外务省内，他是大陆政策的积极鼓吹者。1913年他辞去官职转任“满铁”理事，直接从事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以实现其大陆政策的梦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和建立伪政权的活动，批评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日本起用他任驻国联的首席代表。充分表明了日本对侵略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的态度，表明了日本对李顿报告书的立场。

中国对此次会议亦十分重视，派出了一个10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任命中国外交界元老颜惠庆及外交名家顾维钧、郭泰祺为全权代表，任顾维钧为驻国联理事会首席代表。顾维钧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外交家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法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他头脑敏捷，能言善辩，精通国际法，有长期在国联工作的经验，被认为是中国驻国联及理事会最合适的人选。

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开会，审议李顿报告书。果不出所料，开会当天，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和中国代表顾维钧就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松冈利用其“雄辩家”的“天才”，一再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诡辩，强调“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中国排日是事变的根本原因。反对报告书关于“满洲”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结论，声称建立伪“满洲国”才是事变“惟一可能的解决方法”。

松冈发言之后，中国代表顾维钧起而逐一批驳其谬论，并再次强调，日本必须继续承担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义务，认为这才是解决事变的主要先决条件。

在此后几天的辩论中，松冈采取拖延战术，要求国联不要急于解决东北问题，应当三思而后行。同时又竭力限制调查团的作用，宣称调查团报告书提交之后，该团已停止存在，已无发表任何意见的资格。他还要求理事会“慎重研究报告书内容，不可轻易批准”。松冈的这些谬论，意在否定李顿报告书，但遭到了理事会主席的驳斥。

由于日本无意接受李顿报告书，国联理事会主席狄凡勒拉（爱尔兰人）提议，根据盟约第15条（该条款规定，对于本条约规定之任何案件，理事会得将争议移交大会。经争执之一方请求，大会亦应受理）及理事会已经通过的有关决议，将中日争端及李顿报告书移交国联大会讨论审议。狄凡勒拉的提议得到除日本以外的其他理事会成员团的同意，获得通过。

12月6日，国联大会特别会议开幕，讨论中、日争端及李顿报告书。中、

日代表继续舌战，各自强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大会发言中，列强和中小国家的态度截然不同：操纵大会的法国代表言辞暧昧，英国代表甚至出来为日本侵华打圆场。但许多中小国家的代表仗义执言，猛烈抨击了日本的侵华行径，要求国联主持公道。

12月8日，西班牙、爱尔兰、瑞典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大会确认：1.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占领不能认定是合法措施；2.满洲政权是日军存在的产物；3.满洲现政权不符合现存国际义务；4.议案要求大会授权十九国委员会邀请苏、美两国合作，在上述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解决中日争端。结果，大会决定将问题移交给十九国委员会讨论。

十九国委员会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根据国联大会的决定于3月成立的专门处理中日争端的机构。该委员会由国联大会主席和除中、日两国之外的理事会成员国及大会选出的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匈牙利、瑞典等国家代表组成。12月12日，十九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报告书问题。会上，中小国家与列强的代表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小国代表继续支持中国，主张采用报告书的前8章（否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声明不承认“满洲国”。但大国的代表为了使日本接受国联的调停，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一再向日本让步。然而，日本代表团却坚持国联调停的基础是承认“满洲国”（为了造成“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迫使国联加以承认，日本已于9月15日与伪满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宣布承认“满洲国”），声称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鉴于调停已无希望，十九国委员会决定由起草委员会起草最终报告书。

2月14日，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了最终报告书。该报告书与李顿报告书相比，稍有进步。它用更明确的语言认定，日本是“九·一八事变”的挑起者和伪“满洲国”的制造者，要求日本按照国联已通过的决议，把军队撤至“满铁”区域内，并且决定了日军撤兵的方法、步骤和期限。在国联大会上，中国代表在指出报告书不足之处如未能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等之后，表示接受报告书。日本代表则表示根本不能接受。随后，大会进行了表决，结果报告书以24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获得通过。这一表决结果，表明了日本的侵华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声批判，表明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已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

国联大会通过报告书后，日本代表松冈洋右等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国联。从当时的国际关系来看，与其说日本退出了国联，倒不如说是被赶出了国联，因为退出国联并非日本的本愿。从国联审议中国东北问题开始，虽然日本多次要挟要退出国联，但均是虚张声势，目的是胁迫国联和列强在中国东北问题上让步。日本政府认为，退出国联对日本来讲并无益处，只要国联能在“满洲国”问题上让步，满足日本的要求，日本还是应该留在国联。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于1932年10月21日确定了对付国联的方针：巧为周旋，既要改变国联对日本的不利提案，又要给国联留点面子。松冈洋右正是带着日本政府的这一方针前往日内瓦的。虽然舆论界和军部法西斯分子叫嚷要退出国联，但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的国联方针是明确的。松冈洋右向元老西园寺公望辞行时明确表示：“绝不退出国联之事。”根据列强和国联在“一·二八事变”时的态度，日本估计它们会在日本的恐吓下，

接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日本也会继续留在国联。所以，广田外相曾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国联必须接受日本的要求，目前并不需要退出国联”。但是，日本的算盘打错了。

国联的决议草案是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的。它虽然对日本已作了很大让步，但日本却仍不满足，特别是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日本决心“即使把满洲化为焦土”，也要维护伪“满洲国”的“独立”。这与列强的调停基础相去甚远。日本忘记了这样的前提，西方列强及其控制下的国际联盟调解的总目标是维护华盛顿体制和秩序，它不可能承认日本单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这是国际联盟对日让步的最终限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强意识到，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它们长期耐心的调停努力，被日本视作软弱可欺。他们被逼到了要么维护由他们创建的国际联盟的权威，要么向日本投降、听任日本在远东胡作非为的地步。列强选择了前者，决心在国联大会的最后阶段向日本摊牌，把中日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进行表决。

这样，日本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悬崖勒马，接受国联调停，把中国东北的主权交还给中国，要么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坚持侵略政策，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日本最终选择了后者，退出了国联。

一战后，日本标榜“协调外交”，实行以国联为中心的外交路线。退出国联，意味着日本同“协调外交”的诀别、同国际社会的诀别。退出国联使日本陷入了孤立，同时也表明了日本坚持独霸中国的立场。

“天羽声明”

1933年春，日军继侵占了中国东北之后，又跨越长城，侵入华北，直逼平津，并于5月底迫使华北军事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城下之盟《塘沽停战协定》。此时的中国南京政府，虽继续推行“安外必先攘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剿共”，但也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没有止境的，如不认真对付，华北将会沦为第二个“满洲国”。这不仅会使中华民族遭受灭顶之灾，而且会直接危及国民党的统治，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怎样对付日本呢？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的力量太弱，仅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不了日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列强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上。蒋介石认为，只要中国顶住日本3—5年，日本就会与列强发生大冲突，国际形势就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死里求生的一线希望”。为此，中国政府利用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积极争取其政治、经济、军事援助，为最后对日一战作准备。而“九·一八事变”后列强的远东政策，也为中国政府争取外援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兵侵华北，直接威胁了欧美列强的在华利益，加剧了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日本随时威胁华北，如此下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不知道会变得怎样”。同样，英国在华也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自然也不愿意受到日本的排斥。因此，想要利用中国抗衡日本，以“保证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威望”。由于中国政府与欧美列强在抗衡日本对华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彼此间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合作有了较快发展。

为了加强争取外援的工作，蒋介石重用英美派人物宋子文等人，命其游

说欧美列强和国际联盟，争取外援。1933年5月，宋子文与美国签订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7月，宋子文又向英、美试探建立一个把日本排斥在外的中外协商委员会，以取代20年代建立的国际银行团，并要求该委员会“协助中国实现需要大宗财政支持的复兴建设计划”。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的请求下，国联决定设立对华技术合作特别委员会，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兴建设。10月，该委员会代表拉西曼来华，同中国政府商谈了合作事宜。

这一时期，在中国政府的争取下，列强开始对华进行军事援助。特别是德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团来华，对中国军队进行整训，提高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顾问团还帮助中国制定了防御日本进一步侵华的防卫计划，并斡旋向中国出售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美国及英国的对华军事援助也有一定的进展。

列强的一系列援华活动，虽然规模并不大，却深深地“刺痛了日本的神经”，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恐慌。为阻止中国强大和列强对中国的渗透，日本对列强援华活动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如中美棉麦借款合同签订后，日本政府即令日本在华纺织厂一律不得购买进口美棉，要求日本厂家“服从政治上的指导”。10月，广田外相还致电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表示希望“事实上消灭这个借款计划”。由于日本的破坏，加上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美棉积压，使棉麦借款的计划未能圆满实现。

1934年1月，广田外相在帝国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警告欧美列强，“帝国作为维持东亚和平的惟一基础，负有全部的责任”，公然露出了日本要独占中国及东亚的野心。3月，日本获悉国联驻华代表正在制定国际合作援华计划后，更是极尽手段予以破坏。当时，广田外相连续3次致电日本驻华外交机关，要求他们设法阻挠国际援华活动。广田在致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电报中狂妄叫嚣：“日本在远东的力量是国际联盟或英美及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及的。”为此，“如要进行任何有效的对华合作，其惟一的办法是以日本的实力和权力作后盾”。根据外务省的指令，日本驻华代表向上海商讨共同对华贷款的国际银行家们“坦率”地表示：日本不准备对华贷款，也希望其他欧美国家的银行家们放弃对华贷款，并威胁说：“举凡与中国及他国间有关之问题，最后之决定权力在日本。”4月下旬，国际联盟驻华代表将返回国联汇报工作。他还带有中国经济委员会关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十年计划，希望得到国际联盟的援助。中国的强大是日本最不愿看到的，国际联盟及列强对中国的渗透是日本最害怕的。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日本采取了恐吓的手段。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发言人天羽英二，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指示精神，赶在国联对华技术合作特别委员会开会讨论具体援华行动之前，于4月17日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天羽声明”。

在这个非正式声明中，日本攻击西方的对华经济及军事援助，反对中国利用外援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说什么西方的援华活动，“无论其名目是财政援助还是技术援助，都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意义，……作为原则，日本不得不加以反对”；而外国对华提供军事援助或政治性借款，更是“离间中国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必将产生与维持东亚和平相悖的结果，对此，日本绝不会默视不顾”。天羽还在声明中蛮横地干涉中国内政，说什么“中国的保全统一和秩序的恢复，有待于中国自身的决心和努力……如果中国采取利用他国排斥日本的手段或以夷对夷的对外政策，日本也不得不予以抨击”。天羽在声明中叫嚣，“日本单独承担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并有“坚

决履行这一使命的决心”。“天羽声明”表明了日本对华及列强政策的基本点：1.日本是东亚的霸主，中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西方列强不得插手这一地区的事务；2.中国的内政外交须接受日本控制，中国不可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反对日本，建设国家，威胁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一句话，这是个典型的、赤裸裸的独占中国，称霸东亚的侵略宣言，是东方的“门罗主义”。

“天羽声明”一出笼，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的同声谴责。英国舆论界指责声明公开破坏践踏《九国公约》，是东亚“门罗主义”。美国《纽约论坛报》发表社论指出，“天羽声明”表明“日本牵制中国与外国发生关系，将使中国空有独立与主权之名，而成为日本之保护国”。有人极为讽刺地向正在访美的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磨提问说：“是不是说欧美各国如没有日本外务省的许可，就不能在中国活动？”令近卫十分尴尬。4月23日，英国驻日大使林德赛会晤广田外相，要求日本政府对声明作出解释，并声明英国不承认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独断专行。美国国务卿赫尔则照会日本政府，反对日本企图在中国问题上“以自己的意志作为最后的结论”。

“天羽声明”蛮横干涉中国的内政，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4月20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天羽声明”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全中国的明显表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的这一企图。著名学者胡适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天羽声明”是“日本东亚门罗主义的最新纲领”，“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南京政府对此事也很重视，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对日进行交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先后两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损害”，中国与外国及国际联盟的关系，“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加干预”。“天羽声明”一出笼，就立即陷入了一片谴责声中。

“天羽声明”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使日本当局极为被动。为缓和激昂的国际舆论，天羽连忙在4月20日发表了一个补充声明，辩解说日本“无意侵害中国的独立和权益”，也“无意侵害第三国的权力”。此外，广田外相也亲自出马为“天羽声明”进行辩解。4月25日，广田向英国驻日大使“解释”说：“鉴于日中间的地理关系，如果中国发生火灾，日本作为其邻居，比远方的人更觉不安，此乃道理所在。”在会见中、美驻日使节时，广田又一再表白“日本没有任何损害中国独立性及其利益的意向”，并保证尊重《九国公约》，维护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与此同时，外务省修改了“天羽声明”中过于露骨的言词，将其译成英文，由广田外相转交给有关国家的驻日大（公）使，同时命有关的驻外使节向驻在国政府转交“天羽声明”的英文本，并作相应的“解释”，求其“谅解”。经外务省多方奔波，“天羽声明”的风波才逐渐平息下来。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却已昭然若揭了。

扩大对华侵略

“天羽声明”的风波虽然平息下来了，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结束。在对东北抗日武装的镇压告一段落之后，日本再度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

1934年12月，日本冈田内阁制定了新的对华政策，要求建立以日本为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77年版，第8页。

中心、“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的远东政治格局，并明确提出了分裂华北的方针，也就是先把与伪“满洲国”相邻的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将其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然后逼迫中国政府就范，一切听从日本的“指导”。

按照日本政府这一新的对华政策，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经过密谋策划，于1935年春夏之交，将分裂华北的计划付诸实施。1935年5月底，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分别代表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以天津汉奸报人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及孙永勤义勇军在遵化（属《塘沽协定》规定的停战区域内）活动时得到县长的庇护为借口，向华北军事首脑何应钦提出了如下强硬要求：1. 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2. 撤走宪兵第3团及军分会政训处；3. 取缔蓝衣社、复兴社等秘密机关；4. 撤走河北省内国民党党部；5. 禁止一切反日活动。为逼迫华北当局接受这些无理要求，日军派兵包围了河北省政府，关东军也在山海关及长城各关口集结兵力。在此形势下，何应钦被迫答应了日本的条件，与日方达成了《何梅协定》。随后，关东军又利用所谓“张北事件”（1935年6月关东军的4名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偷绘地图，在张北县城受到在该地驻防的中国第29军的拘留检查），逼迫察哈尔省当局签订了《秦土协定》，驻守察省的第29军及国民党党部被迫撤出察哈尔。这样一来，日本在察省扩大了侵略势力，并为进一步侵略华北创造了条件。

面对华北危机，蒋介石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稳定华北、改善中日关系。1935年9月，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奉命向广田外相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原则，一、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取消日本对中国的平等条约；二、双方不相互诽谤，不破坏对方的统一，不扰乱对方的治安；三、通过正式的外交机关，解决两国间的一切纠纷。除此之外，中国还要求取消上海和塘沽停战协定及有关华北事变的其他协定。蒋大使向广田表示，如日本承认中方所提三原则，则中国允诺停止排日及抵制日货，暂不过问伪满问题，开展两国的经济合作。中国的对日三原则及对日承诺，表明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让步，即通过默认伪满、镇压抗日等行动，换取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华北的安全。

针对中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外务省和军部经过多次协商研究，于10月4日向内阁会议提交了日本对华政策新方案，并获得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广田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必须彻底取缔排日言行，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

同时采取对日亲善政策，并予实际执行；

二、中国必须最终正式承认“满洲国”。目前要事实上默认“满洲国”的独立，停止反满政策；在与“满洲国”接壤的华北地区，同“满洲国”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三、为排除来自外蒙古等地的赤化势力的威胁，中国须在与外蒙古接壤地区，进行日本所希望的合作。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与华北问题息息相关。“广田三原则”特别强调华北要与伪“满洲国”保持密切的联系，要与日本合作防赤，其用意十分明

《中日外文史料丛编（4）》，台北1966年版，第15—17页。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303—304页。

显，那就是要借机把华北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在通过“广田三原则”的同一个内阁会议上，还通过了一个华北问题议案《鼓励华北自主案》，要求继续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广田向驻华日本外交官员说，要“相成相助，互为补充”，同时进行。也就是说，要以“广田三原则”压中国政府承认华北的分裂，同时以华北分裂来逼迫中国政府承认三原则，以此达到割裂华北、控制中国的目的。由此不难看出，“广田三原则”实际上是日本为了巩固伪满政权、分裂华北、控制中国的新的侵略计划。

10月7日，广田外相正式向蒋作宾大使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并宣称实行日本的这个三原则是“日中提携的绝对必要条件”。如果中国完全接受“广田三原则”，日本才考虑“渐次协商实行”中国所提出的三原则。

对于“广田三原则”，中国政府进行了仔细的研讨，认为它包藏祸心，不能完全接受。10月20日，中国政府指示蒋作宾大使，只有日本完全接受中国提出的中日关系三原则，中国才能就“广田三原则”作出承诺。并重申除东北问题外，一切都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

在此后的中日交涉中，两国都强调自己的三原则是接受对方三原则的先决条件，互不相让，使谈判陷入了僵局。

然而，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却加快了分裂华北的步伐。特别是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为了准备对苏战争，建立长期战争体制，急欲要把华北弄到手，以利用华北丰富的战略资源，建立日本的战争基地。10月，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华北军政首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建立以宋哲元为首领、以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统辖华北五省二市；保留南京政府的“宗主权”，但经济、财政、金融、军事、外交各方面都要脱离中央政府，与日本发生关系，与日满结为一体；此外还要消灭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代之以“东洋主义”。很明显，这是一个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的侵略方案。

土肥原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后，要求宋哲元必须按“自治”方案的要求，在11月20日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入侵河北和山东。为逼宋哲元就范，关东军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集结兵力，以武力相威胁。华北再度陷入危急之中。

华北是中国抵御日本南侵的第一道防线，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所在，也关系到南京政府的存亡。为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上没有重演“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悲剧，而是积极地抵抗日本的侵略。11月19日，蒋介石命令宋哲元停止与日本进行关于华北自治问题的谈判，并在陇海线调集军队，以强硬姿态对付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1月18日召集了三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研究对策。鉴于“过激”的华北“自治”运动会给日本的对外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会议决定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华北“自治”运动，目前可先进行“轻度自治”，并放宽期限。根据三相会议的决定，日本军部下令停止执行土肥原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这样，华北局势稍有缓和。11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就华北问题和“广田三原则”同蒋介石举行了会谈，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华北自治。对此，蒋介石表示，华北“自治”是日军强迫的结果，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他暗示，华北问题不解决，“广田三原则”就无从谈起；而他愿意以承认“广田三原则”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停止推行华北“自治”运动。由于双方意见相左，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为了缓和华北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最终对日本作出了一些让步。经与日方协商，于12月11日成立了一个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有一定“自治”色彩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一些亲日分子被塞进了委员会内。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并未满足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欲望。进入1936年后，日本又加紧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但此时中日政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亲日派汪精卫被刺去职，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职务，张群担任了外交部长。日本则在“二·二六事件”之后，成立了广田准军部内阁，有田八郎由驻华大使升任外相。基于两国政局的变化，从1936年春开始，中日外交当局就改善两国关系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因日方坚持以“广田三原则”为调整两国关系的基础，毫无平等、公正解决两国矛盾的诚意，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中日关系更加紧张。8月，日本利用“成都事件”（为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而发生的打死日人事件）大肆鼓噪，并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包括：缔结防共协定，建立华北特殊政权，彻底禁止排日，聘用日本政治、军事顾问，缔结新的中日关税协定、降低税率，在福冈与上海之间建立航空联系，成都开埠、中日合作开发四川经济。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化和继续。中日虽就日本的这些要求举行了谈判，但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在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开始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同年5、6月间，日军利用换防的机会，将华北驻屯军由2000人增至6000人，司令官也由少将升至中将，并由天皇亲自任命。9月，日军强占了平津的战略要地丰台，并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已处在日本侵华战争乌云的笼罩之中。

[日]《现代史资料·(8)》，第293—296页。

第 24 章

法西斯狂潮

膨胀的法西斯

1927—1937 年，从日本发生“昭和金融危机”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期间，植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加上德意法西斯的影响，逐步走向成熟，并在日本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日本法西斯势力日益膨胀的时期，民间、军队、政界、财界都有法西斯势力在活动，特别是民间和军队的法西斯势力更为猖獗。

这一时期，民间法西斯的代表和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头目是北一辉、大川周明、井上日召、西田税和内田良平等人。

北一辉（1883—1937 年）早在 1915 年和 1919 年就已经写出了《支那革命外史》和《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创立了所谓“支那保全主义”和“国家改造”的法西斯原理，并奠定了他在民间法西斯运动中的头领地位。1926 年，北一辉在与大川周明联合组织的法西斯组织“行地社”分裂后，开始独自进行法西斯活动。当时，西田税（1901—1937 年）以及受其影响的法西斯分子纷纷集结在北一辉的门下，形成北一辉派的法西斯势力，而西田税则成了北一辉的得力助手。从此，北一辉深居简出，许多事情都让西田税代理。自己则每天高声读经，在浓郁的宗教气氛掩盖下，神秘地操纵和介入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并同军政界的显贵和财阀亲密往来。

1927 年 7 月，西田税以北一辉为后盾创立了“天剑党”。1928 年出版了专供军人用的《改造案论策集》。从此，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即原来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被吹捧为法西斯圣典。特别是其中所谓日本必须“领悟剑的福音”，即妄图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国家的改造”、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世界帝国”的思想，更是受到日本军阀和官僚贵族的青睐。1928 年 9 月，西田税又以北一辉为后盾创立“士林庄”。通过“天剑党”和“士林庄”，北一辉开始和青年将校接触，以期通过下级将校和士兵来实现国家改造。

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是北一辉对日莲宗的“信仰”。北一辉从 1929 年 4 月 27 日到 1936 年 2 月 28 日，共记有 6 册日记，多数是记述他和夫人及其儿子的梦幻，还有神佛“灵告”和参拜神社的活动。但其中却体现了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潮。如“九·一八事变”的当天早上，北一辉在诵经中得到所谓“海上出现城池……后又出现彩虹”的灵告。及至事变爆发后的 9 月 21 日，他在日记中又连续写上了三个“进”字。这说明他的所谓“灵告”日记是与现实的扩大侵略连在一起的。1932 年，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之前，他在 2 月 29 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大日本帝国文武两道，武运长久。”3 月 3 日的日记中则以特大的字体写上了“善哉，善哉，大胜利”的字样。由此可见，北一辉对法华经的信仰，并不是要理解和接受法华经教义，而是企图通过神佛的“保佑”来实现对外侵略主义的“国家改造”。因此，1930 年滨口内阁

批准伦敦裁军条约、遭到军部强烈反对的时候，一贯仇视政党政治的北一辉便在答复军部官员的咨询时发明了所谓“干犯统帅权”的咒语。据当时日本进步法学家论证，所谓“干犯统帅权”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北一辉造出这个咒语是想要依靠军部和民间的法西斯势力，来打倒当时的政党内阁。随后，1931年，北一辉和西田税等人则参与了青年将校和大川周明等人策动的“十月事件”。

1932年，北一辉在《关于对 foreign 策的建议书》中赞扬“九·一八事变”的正确性，妄想依靠所谓佛教和日本国相结合的“日佛同盟”来“保证全世界的和平”，实质上就是想让日本独霸世界。北一辉还在文中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说苏联的野心是要在日美之间爆发战争后乘机攻击日本，以达到搅乱亚洲、搅乱世界的目的。1935年，北一辉积极参加了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的右翼活动。北一辉的主张与美浓部的学说是格格不入的，他认为：“国家有统治权，但天皇不是机关。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是国家的根本，必须依靠天皇来维护国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一辉和西田税等民间法西斯分子参与了陆军青年将校发动的“二·二六事件”。当时，北一辉不仅从精神上借助神的权威来支持青年将校们的行动，同时还在陆军上层进行活动。特别是对皇道派的头面人物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寄予很大希望，以期借助军队推行法西斯政治。这一事件失败后，北一辉和西田税被捕。1936年4月17日的《宪兵队调查书》中记载，北一辉声称他在《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中强烈主张“全面的帝国主义”，并叫嚣“日本是一个领土狭小的国家，作为国家生存权的侵略主义也就是日本的正义”。他承认《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全文是按照“应该把日本帝国变成像大兵营一样的组织”这种精神写成的。1937年8月19日，北一辉和西田税等一起被枪毙，其法西斯生涯走到了终点，但北一辉派却在法西斯狂潮中留下了难以根治的社会毒瘤。

民间法西斯的另一代表人物大川周明（1886—1957年）也在这一时期最为活跃。他和北一辉分裂后，带领自己一派的法西斯势力继续进行以“行地社”为大本营的法西斯活动。大川周明作为行地社机关杂志《日本》的主编，力图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自己一派的法西斯主张，并以杂志为媒介，积极从日本各地寻求法西斯运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与此同时，大川周明还进行殖民制度的研究，为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统治当局提供理论参考。1927年，大川周明出版了他的法学博士论文《特许殖民地公司制度之研究》。同年4月出版了他的《日本精神研究》一书，公开鼓吹“武士道”精神，极力推崇达太、犹太等人，佩服他们背叛基督，并把建设世界帝国作为伟大的理想。此外，大川周明还积极参与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他在早年作为“满铁”调查员的时候曾多次到中国内地和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收集资料、进行实地考察，而且在20年代末便逐渐确立了所谓“对满蒙的经纶”，也就是“满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命线，是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联盟基石”的思想。大川周明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来的是超国家的时代。要在世界上作为一个与“超国家”这一名词相称的真正的

伊文成等：《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3页。

[日]宫本盛太郎：《北一辉研究》，有斐阁1975年版，第192页。

[日]桥川文三编：《大川周明集》，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80页。

独立国家而存在，至少要确立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大经济单位。从日本的情况看，日本政治版图狭小、资源贫乏，需要政治性地支配一个大经济单位，其发展方向则是“满蒙”，而且取得这个大经济单位后，必须革新其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出能支配这种大经济单位的“大政治单位”，这就是他历来倡导的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联盟。这种所谓“对满蒙的经纶”中实际包含着他的世界战略思想。因此，他在1928年6月写成的《索罗维耶夫战争论》一文中认为：“战争是在历史进程中促进人类政治统一的主要手段……而今以东洋和西洋命运作赌注进行决战的争斗，正扩大到以全球为舞台。”大川周明的世界史的图式构想，首先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世界和欧洲世界相对立的基本结构。所以，1928年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后，他便窜到中国东北，多次会见张学良，迫使张学良接受日方延长吉会线铁路的要求。1929年，大川周明在日本各地大肆宣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极力鼓吹在“满蒙”建立“王道乐土”的新国家。他的这种说教，对日本帝国主义加速推行大陆政策、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大川周明还积极参与了国内的法西斯政变活动。如1931年3月，参与制定“三月政变”的计划；同年10月，又企图和桥本欣五郎一派相互勾结发动政变等等。

“九·一八事变”后，大川周明为了实现对内进行“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扩张，又利用民众对形势的关心，在军部的唆使下，选拔东亚经济调查局和“行地社”的“精锐”游说各地，继续鼓吹对中国的侵略。据说大川周明的演说很有煽动性，以致其信徒也非常活跃。1932年2月11日，大川周明创立了“神武会”。不久，“五·一五事件”发生，大川周明因支持这一事件被捕，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法西斯立场。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的时候，他对政府的这一行动备加赞赏。同年12月，他在写给北一辉的信中，更明确表示：“一定要促进和坚定地实现日本维新是自己一贯的本心。”

井上日召（1886—1967年）也是这一时期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代表人物。该人早年就曾利用“信仰日莲宗”，暗中给青年们灌输“革新思想”，进行以“国家改造”为目的的活动。这一时期，井上日召在法西斯狂潮中更有其“独特”的影响。20年代后期，井上日召把法西斯活动的重点逐渐转向农村。1928年底，他在位于茨城县东茨城郡大洗海岸的东光台开设了“立正护国堂”，以期把农民作为对象，来进行他的所谓“宗教形式的启蒙教育活动”。当时，井上日召的计划是，如果其信徒能发展到几万人，他便带领这些人包围东京市，在无抵抗的情况下包围议会，推举谈判代表，进行有关解散政党，撤销议会的交涉。与此同时，井上日召开始与当时正在霞浦海军航空队学习的海军法西斯分子藤井齐、铃木四郎等人交往，特别是与海军中尉藤井齐来往频繁。在两人谈论“国家改造”方法的过程中，藤井齐批评井上日召的“无抵抗”的宗教启蒙运动，而主张“暴力的改造运动”。这样，井上日召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企图通过暴力手段使处在国家领导地位上的统治阶级“觉醒”。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32年1月，井上日召指挥他的门徒，制造了“血盟团事件”。在日本国内造成一种恐怖

气氛，扩大了“一人一刀”的暗杀恐怖主义的影响。这一事件失败后，井上日召被监禁，直到1935年被假释出狱。他在狱中写了自述，在叙述自己

的国家观、国体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同时，也概述了包括天皇亲政（即君民一体政治）、废除议会制度、改革教育、限制私有财产等内容的“国家改造”构想。人们从中可以看出井上日召和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不同，他没有关于“国家改造”的系统的指导理论，只是注重实际行动，一贯主张实施“一人一刀”的恐怖主义。用他的心腹池袋正钺郎的话说，井上日召的破坏方法是“把总理大臣一个一个地杀掉”，把暗杀放在第一位，而且除了个人暗杀之外，团体的武力行动也是“必要的”。井上日召也对自己的恐怖主义作了说明：“我们的同志们应该抱成一团，作为肉体的炸弹投出去……用我们自己的肉体作炸药炸死我们的敌人。”这就是井上日召根据日莲宗法华经的“修炼”而鼓吹的精神至上主义。

在民间法西斯势力日益活跃的时候，日本军队内部的法西斯势力也猖獗起来，并成为法西斯运动的主力。

1927—1931年，是长期以来在日本军队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长州军阀统治的末期。日军内部早已存在的所谓革新潮流，开始转向“国家革新”的法西斯运动，并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力量。“九·一八事变”前，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主张激进的满洲政策，要求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占领“满蒙”，坚决对苏作战，即“北进方针”；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则主张渐进的满洲政策，在解决“满蒙”问题后，在一段时间内回避对苏作战，而把日本的侵略势力扩大到中国内地，即“南进方针”。但无论何种方针，都主张法西斯的侵略扩张，都是要扩大对外侵略。

1931年12月，荒木贞夫就任陆相，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军阀（昭和军阀）开始登场，并形成了以荒木为中心，加上真崎甚三郎和林銑十郎为首的政治集团。但不久又形成了以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为首的另一派。

荒木贞夫习惯用“皇道”一词，因此，以他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皇道派”。皇道派系统包括“革新的青年将校阶层”。这一阶层不单单是指年轻的青年将校，而且在日军法西斯运动中也是一支独特的势力。他们相信存在着能贯彻革新根基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国体，所以又被称为“国体原理派”。他们是“皇道派”的重要组成部分。皇道派把与自己一派意见对立的另一派称为“统制派”。“统制派”因主张军队一切行动由军部中央统制而得名，其主力是以永田铁山、东条英机为核心的所谓“中坚幕僚集团”。后来，桥本欣五郎，长勇等一部分中级将校为反对“皇道派”而结成的“清军派”也加入进来，构成了“统制派”的别动队。

30年代中期左右，是“皇道派”、“统制派”两派势力消长的重要时期。

1933年11月，“皇道派”青年将校集团和“统制派”幕僚将校集团围绕着如何应付国际危机、怎样进行国家改造和主导权属于谁的问题正式分裂。两派争执和对立的焦点，是通过政变来实现“革新派”夺取政权，还是逐步地驱逐保守的维持现状派，取得政权。“皇道派”主张取消政党政治，实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并顽固坚持反苏战争观。而“统制派”则主张立足于现存的天皇制军国主义统制体制，对其加以改进，由军部掌握国家权力，成立军部法西斯独裁，实现适应总体战要求的法西斯统治，并对苏联给予适当评价。1934年1月，“统制派”制定了《应付非常政治事变的对策纲要》。根据这一纲要来看，“统制派”企图利用民间右翼势力和“皇道派”军官发动的政变，一举“断然革新”，建立“统制派”所期望的强有力的内阁，因此特别强调大肆制造舆论的必要性。同年10月，以

“统制派”为中心，陆军新闻班制作了一个名为《国防本意及其强化国防的提倡》的小册子。从中可以看出“统制派”在同“皇道派”意见对立的同时，也主张尊重天皇的尊严和发扬皇道，并基于忠君爱国的思想来实现日本建国的理想。上述小册子希望全体国民了解国防的本意，创立新的国防本位的各种机构，发扬日本精神以克服危局，并进一步强调要“举国一致”地进行对外侵略，发扬国威，显示皇威。这个小册子的发行也是日本军人法西斯理论体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这一时期，政界、财界也有法西斯势力在活跃。诸如久原房之助、安达谦藏、森格和松冈洋右等人则是代表人物。

久原房之助是一战后靠经营铜矿而发迹的新兴财阀。1928年依靠田中义一进入政友会。后来成为田中内阁的重要成员，曾任外相，坚持强硬外交。“九·一八事变”前后，久原房之助坚持“一国一党论”。在政党政治末期的30年代初，他又和民政党的安达谦藏等人相勾结，策动放弃立宪政治。

安达谦藏是熊本县法西斯组织国权党的重要人物，做过滨口内阁和若槻内阁的内相，可以说是举国一致内阁的先驱。他当时强调政民两党拥抱并破坏内阁。“九·一八事变”前后，安达谦藏的亲军态度和鼓吹举国政治论更为明显。“九·一八事变”时，内阁成员中只有他一个人与军部的“举国一致内阁”主张同调。在政党政治衰落的30年代初，安达谦藏鼓吹建立军政民的合作内阁。

森格原本是三井物产的重要人物，但其另一面则是政党法西斯化的推进者。他坚持独裁和亲军的政党论，主张建立依靠军部的法西斯统治。1927年2月，森格当上了田中内阁的外务政务次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同时反对社会主义。同年4月，他在《动乱的中国视察谈》中言称：“最近中国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排日态度强硬起来，而日本还是采取同情和柔和的态度很不好。”批评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将促使中国发生变化。”为此，同年10月，他在自己参与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上提出了“想由日本来负责满洲治安”的构想。

与此同时，森格还与军部相勾结，同军界要人密切来往，企图使政党特别是自己所属的政友会走向法西斯化。1930年6月的一天，森格专程拜访了小矶国昭，征求他对政党的意见。当时，小矶国昭要他率领自己的政党向与军方合作的方向发展。对此，森格不仅当场欣然同意，而且随后则四处奔走联络。

为了达到与军部合作的目的，森格发展了当时法西斯分子所鼓吹的“一国一党论”，进一步提出了所谓“两大势力论”，即主张军部和政党两大势力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以挽救非常时期的国家危局。

当时，政界另一个代表性的法西斯人物便是松冈洋右。1927年，松冈洋右当上了田中内阁的“满铁”副总裁。为解决满洲铁路问题，他代表田中义一参加了同张作霖的交涉活动，始终是用强硬的态度逼迫张作霖接受日方要求。1930年1月23日，在第59次议会会议上，松冈洋右作为当时的在野党政友会的代表，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质问，并就“满蒙”问题提出了所谓“满蒙生命线”的观点。以后，“满蒙生命线”论在日本猖獗一时。1932年，

[日]中村政则：《昭和的恐慌》，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1982年版，第87页。

日本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所：《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满洲事变前夜》，朝日新闻社1988年版，第409页。

伪“满洲国”成立后，松冈洋右又在同年6月的众议院会议上，带头要求斋藤内阁承认伪“满洲国”。松冈洋右还主张取消政党，1933年，他组织了政党取消联盟。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法西斯狂潮泛滥的时期，政界和财界还出现了革新官僚集团和新兴财阀。“革新官僚”是“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官僚层中新出现的。他们与旧官僚不同，批判政党政治，想进行与军部相结合的“国家革新”。革新官僚包括以吉野信次为首的商工官僚岸信岸、椎名悦三郎和企划院官僚毛利英子等。他们自称是行政技术者，与“统制派”勾结，形成所谓战时统制管理集团，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技术合理性的代表势力。1932年1月，以阳明学者金鸡学会的主持人安冈正笃为首，组成了“国维会”，该会可以说是上述革新官僚的大本营。与此同时，“新兴财阀”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出现的，它们与以前的旧财阀不同，是构成日本法西斯主义统制体制的重要支柱。“九·一八事变”后，这些与军部官僚相勾结的新兴财阀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总之，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日本法西斯狂潮泛滥的时期。尽管这些法西斯思潮的派别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对外侵略，从而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尔后的扩大侵略势力准备了思想条件。

法西斯组织的横生

20、30年代的日本，随着国内法西斯狂潮的泛滥，法西斯组织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据内务省警保局调查，1927—1937年底新出现的“右翼团体”（实际是法西斯团体）便有634个，参加者有12万人之多，仅是东京一地就出现172个团体，参加者达3万人以上，其数量达到了大正年间团体总数的3倍。其中民间的法西斯组织大多是从传统的右翼组织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法西斯组织中蜕化而来的，大体属于以下几个派系。

1. 玄洋社、黑龙会系统：首领是头山满、内田良平，鼓吹“国粹主义”、“大亚洲主义”，其成员多为老的右翼军国主义分子。1929年11月，以同年5月铃木善一创立的信州国民党为母体，加上北一辉派的寺田稻次郎、西田税以及农本主义分子长野郎等人，共同成立了日本国民党。这个团体后来加入了“大日本生产党”。“大日本生产党”于1931年组成，是玄洋社、黑龙会系统法西斯团体的统一组织。同年11月第一次成立大会时，共有黑龙会、明德会、回天时报社、日本国民党、洛北青年同盟等19个团体。其首脑人物便是内田良平。该党奉行的主义是“以大日本主义为国家经纶”。1932年，急进爱国党也加入进来。同年，大日本生产党创立了附属组织职业组合联合会。1934年7月，内田良平又组织了“昭和神圣会”。

2. 国粹运动系统：属于这一系统的法西斯组织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运动的活动。这个系统的主体是“平沼系”，即平沼骐一郎一派的“国本社”一系。平沼系的上层多为军阀、官僚、财阀代表，中下层则以少壮将校和在乡军人为骨干。其核心团体“国本社”是早在1923年由平沼骐一郎创立的。爱国社也是这一时期国粹运动系统的重要团体，1928年由岩田爱之助等创立。爱国社特别注重青年层，在神奈川设

[日]河原宏等：《日本法西斯主义》，有斐阁1979年版，第19页。

爱国村塾，组织了爱国学生联盟（1931年）、爱国青年联盟（1932年）。此外，爱国法曹（司法）联盟（1932年）、爱国劳动联盟（1933年）也是爱国社一系的法西斯团体。

3. 属革新右翼的犹存社、行地社系统：即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组织的法西斯团体，它们鼓吹“国家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

西田税在1927年创立的天剑党，集结了后来与“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有关的大岸赖好、营波三郎、藤井齐等青年将校，想以军人为基础，集结全国的右翼分子，将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付诸实行。该党的纲领是把改造法案奉为“上天所赐之剑”的所谓“战斗指令纲领”。其主要内容是：“首先执行满蒙政策，进一步推行大亚洲主义，再向奉行世界道义的革命迈进。”其口号是“实现国民吾党化，军队吾党化”，实质就是要号令全国的法西斯运动。

1932年2月由大川周明以行地社为母体创立的神武会，是这一系统最主要的法西斯组织。菊池武夫中将、石原广一郎、河本大作等人参与该组织的创立。其资金由新财阀石原广一郎提供。神武会奉行的主义是：“宣扬神武建国精神，立誓效忠天皇，永远保持神圣的国体。坚定地把天业恢弘于四海，领导有色人种的解放，进一步向世界道义的统一迈进。”

4. “经纶学盟”系统：这个系统是由高昌素之系和御用教授上杉慎吉联合于1919年创立的法西斯团体——经纶学盟形成的系统。这个系统出了不少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头面人物，如津久井龙雄、天野辰夫，石川准十郎等。源于经纶学盟的嫡系团体是爱国勤劳党，1930年2月由津久井龙雄，天野辰夫等组织成立。此外，1932年春建立的以天野辰夫为主帅的神兵队更是这一系统的代表性团体。其全称是“大日本神兵队”，该团体纲领的主要内容是：“否定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一切制度和行动，确立基于日本主义的皇道政治、经济、文化，消灭阻碍皇国大业发展的财阀、奸贼以及他们的走狗，建设维新日本，把皇道传布于世。”1934年3月，石川准十郎创立了大日本国家社会党。在该系统的法西斯团体中，它是理论主张最多且完备的一个。

除了以上四大系统的法西斯组织外，其他零散的民间法西斯组织更是形形色色，恣意横生。如农本主义派建立了日本村治派同盟、农本联盟等组织。文化界创立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同盟，法西斯分子还把黑手伸向工人内部，建立了不少法西斯工会组织，如1936年4月，组成了全国性法西斯工会的统一组织“爱国工会全国恳谈会”。还有适应时局需要建立的其他组织，如“九·一八事变”前后组织的满洲问题解决同盟等，为打破“五·一五事件”后日本法西斯运动暂时出现的沉闷状态而组成的国难打开联合协议会等组织。

民间法西斯组织横生的同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百余个法西斯团体，其中主要的是双叶会、木曜会、无名会、樱会和王师会等。

双叶会、木曜会是1927年组成的两个军队法西斯团体。双叶会主要研究“满蒙”问题，木曜会则主要研究有关日本军队装备的问题。无名会是在1928年以军队法西斯分子的主要人物石原莞尔、铃木贞一、武藤章、永田铁山等为中心组成的，以研究未来战争和“满蒙”问题为主旨。同年11月，双叶会、木曜会、无名会等团体合并组成更大规模的法西斯团体——一夕会。1928年3月，海军方面的法西斯分子藤井齐集结海军部内的青年士官，组成了法西

斯团体王师会。该组织的宣言中咒骂日本革命势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奴隶、俄罗斯的走狗，标榜并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公然声明把尊奉天皇、使日本成为世界联盟的盟主，进行最神圣的事业作为日本军队的使命。该组织纲领的主要内容是：“发扬武士道精神，破除日本海军的一切积弊，建设世界最强的王师。完成明治维新，建设大乘日本，建设统一世界的大邦帝国。”

陆军中更有影响力的法西斯团体则是1930年9月由陆军省以及参谋本部的少壮派组成的樱会。该组织的最大主宰者是桥本欣五郎。樱会成立的目的是“以完成国家改造为最终目标，需要的话，不辞使用武力”。公开鼓吹仿效德意法西斯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他们企图对外积极进攻，对内实现国政改造。在制定关于“国家改造”的具体方案过程中，樱会内部又有所谓破坏派、中间派和建设派的区别，但破坏派占多数。樱会不仅和军部联系，还和其他法西斯组织密切来往，比如为了和海军法西斯组织进行横向联系，樱会还建立了星洋会。

王师会和樱会这两个军内主要的法西斯组织都把暴力手段作为进行“国家改造”的主要手段。它们标榜“昭和维新”，想指导全军法西斯运动。1931年7月，樱会中的国家改造派和年轻的尉官们成立了小樱会。1933年5月“明伦会”的建立，则标志着在乡军人也登上了法西斯运动的舞台。

暗杀与恐怖

法西斯狂潮的泛滥，法西斯组织的横生对日本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日益膨胀的日本法西斯势力为了促使日本统治当局加快法西斯化，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其中一部分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组织则是采用暗杀的手段来进行恐怖活动。为了在社会上造成强烈的反响，他们选择的暗杀对象是政界和财界的要人。在这种暗杀恐怖活动中，最先发动和引人注目的便是滨口雄幸首相被暗杀的事件和井上日召指挥的所谓“血盟团”的“一人一刀”暗杀事件。

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内阁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所制定的紧缩财政政策和“金解禁”政策不但没有为日本经济打开活路，反而使192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更加深化。在政治方面，滨口内阁虽然也采取了一些反动政策，但远远不能达到日益膨胀的法西斯势力的要求。在外交方面，为了给濒于破产的日本经济找到出路，滨口内阁还曾采取过“协调外交”。特别是1930年10月，滨口雄幸固执己见，顶住了军部和枢密院的反击，代表日本政府批准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这就更加激起了右翼势力、特别是法西斯势力的不满。

1930年春，民间法西斯团体爱国社头目岩田爱之助和其他几名主要成员秘密制定了暗杀首相滨口雄幸的计划。经过十多天极其慎重的研究讨论，最后决定由佐乡屋留雄和松本良胜两人来实施进行这次暗杀行动，但佐乡屋留雄决心独自提前执行计划。9月10日间，他在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下手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考虑，认为最好是用手枪进行袭击。当时，爱国社内藏有不少武器，佐乡屋留雄从中挑选了一支精致的六连发的小手枪。接下来是选择暗杀地点。当时，滨口雄幸在镰仓建有别墅，经常在星期六坐车到别墅去。佐乡屋留雄决定在途中伏击。但他经过观察后认为，用小型武器，单

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能成功的。于是，佐乡屋留雄又把暗杀地点选在东京火车站。为此，他多次到车站观察滨口乘坐火车的情况。他发现每次滨口到东京站时，随从人员都很多，而且戒备森严。但仔细一观察，发现也有不设警戒的地方。于是，佐乡屋留雄决定利用警戒空隙采取行动。随后，佐乡屋留雄从民政党的法西斯分子那里得到情报：“滨口首相要陪同天皇观看在冈山县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坐11月14日上午9点15分的火车从东京火车站出发。”于是，佐乡屋留雄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1月14日上午9点15分以前，佐乡屋留雄赶到东京站。正当他因为乘客稀少而怀疑滨口一行是否已经过去的时候，站台中央的台阶上突然人声嘈杂起来，只见在众多随从（多数是警官）的陪同下，滨口雄幸首相走了过来，而且对佐乡屋留雄毫无戒备。当滨口逐渐走近的时候，佐乡屋留雄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与此同时，他把手伸进怀中，打开了手枪保险，在抬头的同时，用右手握着的手枪射出了一发子弹。没等他再开第二枪，滨口的随从警官已将他抓捕。滨口雄幸因腹部中弹受了重伤，在1931年8月26日死去。佐乡屋留雄1933年被判处死刑，但后来一再减刑，1940年竟被假释出狱。出狱后他得知，对于他的死刑判决，全国递交了7万多份要求减刑的请愿书。可见当时这一针对首相的暗杀行动正符合了反动势力的心愿。以爱国社策划的暗杀首相滨口雄幸的事件为开端，日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动期”。而其后不久发生的号称“一人一刀”的“血盟团暗杀事件”更对这个“激动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在爱国社策划和进行暗杀滨口的恐怖活动的同时，井上日召一派的法西斯分子们也在蠢蠢欲动。他们活动频繁，目标转向了所谓“打破现状”的直接行动。1931年8月26日，在青山的日本青年会馆召开了陆军、海军、民间法西斯分子共同参加的所谓“乡诗会”。会上，经井上日召推荐，大家公推北一辉派的西田税为总负责人，约定各方面的法西斯势力要同心协力，共同进行“国家改新”的行动。但后来因大川派和北一辉派分道扬镳，陆海军法西斯分子也发生分离，井上日召一派决定独自采取行动并与海军法西斯势力加强了联系。

1932年1月9日，以井上日召为首的民间法西斯分子和以古贺清志为首的海军法西斯分子聚会，就如何采取行动问题进行协商，最后决定在2月11日纪元节那天，集体袭击前往皇宫祝贺的大臣。但在行动之前的1月28日，日本在中国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以藤井齐为首的许多海军法西斯分子随军入侵中国。因此，1月31日，井上日召集团和留在东京的海军法西斯分子再次聚会商议对策，对行动的日期和目标进行了变更，决定首先由井上日召一派进行“一人一刀”（亦称“一人一杀”）的暗杀恐怖活动。在井上日召主持下，秘密制定了“一个人负责杀一个人”的暗杀计划，其具体目标如下：

政友会的犬养毅首相（暗杀者森宪二，以下同），床次竹二郎铁道相、铃木喜三郎司法相（星子毅）；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前首相（田中邦雄），井上准之助前藏相（小沼正）、币原喜重郎前外相（久木田祐弘）；三井系的三井银行常务池田成彬（古内荣司）、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黑泽大二）；三菱系的三菱合资公司董事长木村久寿弥太（未定）；特权阶级中的西园寺公望元老（池袋正钏郎），牧野伸显内大臣（四元义隆或田仓利之）、

伊东已代治枢密顾问官（菱沼五郎）、德川家达贵族院议长（须田太郎）。

这个计划后来有所改动，关于准暗杀谁，井上日召对每个人都作了指示，并让他们严格保密，即使是集团内部的人也不许互相透露。以后，则发生了同年2—3月暗杀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干部团琢磨的“血盟团事件”和海军青年将校暗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

关于为什么要进行“一人一刀”的暗杀恐怖活动，“血盟团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当时正在东京帝国大学上学的他袋正钏郎，在回答警方的讯问时说，“我们把暗杀各界的重要人物作为破坏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新组织的第一个步骤。”井上日召指挥的“血盟团”暗杀恐怖事件是同年不久发生的“五·一五事件”的前奏，也是以后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的预演。井上日召独特的“暗杀恐怖主义”，对这些暴力恐怖事件造成了很大影响。从此，日本的法西斯运动进入了依靠暴力手段制造流血事件进行“国家改造”的阶段。“血盟团事件”成为这种转换的重要标志。

“国体明征”

日益膨胀的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制造一系列暴力事件、进行暗杀等恐怖活动的同时，还加入了攻击“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运动”反动思想斗争的行列。这一运动可以说是右翼势力在思想界的所谓政治总决算。通过这一运动，法西斯势力在政治思想上也占据了统治地位。

伦敦裁军会议之后，日本国会就所谓“干犯统帅权”问题进行了讨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得罪了军部，这就埋下了“天皇机关说”问题的伏线。

为了研究歉收问题和对自然灾害的对策，日本政府从1934年12月16日至1935年3月25日连续召集了第66次，第67次临时议会。在1935年2月18日的贵族院全体会议上，右翼议员菊池武夫（公正会，陆军中将）把同院议员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学说即“天皇机关说”提上了议程。他攻击“天皇机关说”是“违反国体”的，还说这一主张是“慢性的谋反，明显的叛逆”。接着，右翼议员三室户敬光（研究会）、井上清纯（公正会，海军大佐）也相继登台，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否定“天皇机关说”。这可以说是右翼势力首次在政府的讲坛上公开亮相，向日本政府发出挑战。

与此同时，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在议院外也遭到了法西斯团体日本社的强烈攻击。特别是1935年1月末，国体拥护联合会发表了由反动学者蓑田胸喜起草的《关于美浓部达吉博士、未弘严太郎博士的国宪紊乱思想》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这里所说的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是指他就《大日本帝国宪法》第4条“天皇是国家元首，依据宪法规定总揽统治权”的条文，基于国家法人说所作的解释。美浓部认为，“统帅权属于作为法人的国家，天皇作为最高国家机关行使统治权”，批驳了主张“统治权属于天皇”的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人的“天皇主权说”，美浓部还主张：“一方面统治权不能是万能的权力，应该受到法律约束；另一方面统治权应以增进国民的幸福为目的。”否定“天皇主权说”的“万能主权论”。并且从这种宪法的解释出发，否定

依赖天皇与国体绝对性的官僚专制政治。他认为，只有以民众政治、责任政治、法制政治为根本的立宪政治，才真正与帝国宪法相适应。

像美浓部达吉这种主张的“天皇机关说”，1910—1920年间在日本学术界曾受到广泛的支持，并被公认为宪法学说。因此，右翼势力特别是法西斯势力想打倒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强调国体的绝对性，建立以军部为核心的天皇制统制体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天皇机关说”的宪法解释，必须坚决加以排除。然而，这种排除不是依靠学术论争，而是给“天皇机关说”加上“反国体”的罪名，开展“国体明征运动”，依靠强权进行批判。这也就是蓑田胸喜、菊池武夫等人率先攻击“天皇机关说”的背景和原因。

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冈田启介首相、松田源治文相等人曾采用“天皇机关说”所说的“机关”用语不恰当、但相信美浓部的国体观念没有错、学说的正确与否应由学者自由讨论的态度。

1935年2月25日，美浓部达吉在贵族院全体会议上为自己辩解，他用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说明“天皇机关说”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第二天，《朝日新闻》报道说：“阐述得有条有理，全场肃然倾听，大约经过了一个小时的雄辩。当他离开讲坛时，贵族院响起了罕见的掌声。”

然而，美浓部达吉的大胆反击，更加引起了右翼势力的仇视。于是，平沼系的江藤源九郎（陆军少将）在2月27日的众议院预算总会上，攻击美浓部学说的“忤逆”思想，并于2月28日向东京地方刑事检察局告发美浓部犯有“不敬罪”。与此同时，菊池武夫、三室户敬光、井上清纯等人也在贵族院内一再攻击“天皇机关说”，要求政府对美浓部加以处分。基于右翼势力的攻击，贵族院在3月20日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要求政府必须明征国体本义”的《关于政教刷新的建议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各地则掀起了“国体明征运动”。

在众议院中，政友会元老、原农相山本梯二郎也特别热衷于对“天皇机关说”的批判。而当时从政权中被排挤出来的政友会则是企图利用这一问题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3月5日，由山本梯二郎发起召开了有志议员会，决定追究“天皇机关说”的责任。3月12日，山本梯二郎在政友会全体会议上向政府施加压力说：“怎么能放任与国体不合的危险的学说不管呢？”在这种形势下，众议院在3月23日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国体的决议案》，要求“政府应该立即对与我国崇高无比的国体不相容的学说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

这时，在黑龙会的提倡下，民间法西斯分子头山满、西田税、蓑田胸喜、江藤源九郎等人于同年3月8日结成了天皇机关说扑灭同盟。3月19日，召开了扑灭天皇机关说有志者大会，叫嚣要彻底消灭“天皇机关说”及其主张者。在扩大反对“天皇机关说”的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还有早年成立的帝国在乡军人会。该会在同年3月12日也发出了所谓通牒，言称“天皇机关说”是有悖日本国体的法学理论，尤其与日本军人的传统观念“是绝对不相容的”。与此同时，该会还印制和散发反对机关说的小册子，并指令全国支部、分会召开反对“天皇机关说”的集会，发表抗议信件和电报等等。

此外，日本各地的“国家主义”、“日本主义”团体也陆续发起对“天皇机关说”的攻击。据统计，在同年3—4月间，起来攻击“天皇机关说”的

[日]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45页。

团体，东京最多时达到 55 个，京都有 7 个，而大阪、神户、爱知县等地也各有 6 个，全国总计多达 151 个。

在“国体明征运动”达到高潮时，曾在议会讨论中公开反对“天皇机关说”的林铣十郎陆相和大角岑生海相，在议会闭幕后的 3 月 29 日内阁会议上，进一步要求“即使是政府也要从速采取明确的处置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同年 4 月 4 日，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向全军发出了“天皇机关说违反国体”的训辞。4 月 7 日，东京地方刑事检察院传唤美浓部达吉，对其进行了长达 14 个小时的“调查”。紧接着，4 月 9 日，日本内务省也对美浓部的著作《逐条宪法精义》、《宪法撮要》以及《日本宪法的基本主义》作出了禁止出售的处分，并命令《现代宪政评论》和《议会政治的研讨》两书的第二版改订。美浓部达吉表示，“愿意协助修改其中的字句，但学说本身一点儿也不能更改。”

然而，右翼势力并不满足于政府对美浓部达吉的上述处分。国体拥护联合会在 4 月 12 日散发了题为《机关说问题是进行昭和维新第二期战斗的天赐良机》的小册子，公开鼓吹“向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的消极旧势力展开昭和维新的圣战”。这个小册子同时还攻击一木喜德郎（枢密院议长）、牧野伸显（内大臣）和西园寺公望（元老）等人。特别是针对一木，因为他早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时曾讲授过机关说的国法学，是美浓部的老师，因而也受到了特别攻击。

当时，企图进行“国家革新”的法西斯势力把“国体明征运动”的高涨看作一次好机会，试图打倒冈田内阁及其背后的宫廷集团。因此，他们在 1935 年 6 月重新组织了国体明征运动达成联盟，7 月 9 日召开有志者大会，并决议倒阁。而国家主义团体和帝国在乡军人会等则进一步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美浓部达吉给予强硬处分。

这样一来，“国体明征运动”变成了包括军部、政党和官僚在内的右翼势力大规模反对政府的行动。在这种压力下，日本政府在 8 月 3 日发表声明，内称：“大日本帝国的统治权，严格地属于天皇，这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执有认为国家统治权不在天皇、天皇是行使权力的机关的想法则是对我国万邦无比的国体本义的亵读。”

但是，国体明征运动达成联盟、陆军大佐小林顺一郎统帅的三六俱乐部、“皇道派”系统的直心道场等团体为首的强硬派，认为政府的声明是欺瞒行为，采取了更为极端的行动。如同年 8 月 27 日，帝国在乡军人会召开全国大会，声明要坚决灭绝机关说，等等。

右翼强硬派提出进一步要求后，政府当局又对美浓部达吉作出了司法处分。检察院在 9 月 14 日再次对美浓部进行“调查”，并在 9 月 18 日发表了对美浓部达吉的处分报告，“认为在美浓部达吉的著作中确实有妨害出版法秩序的内容，且有亵读天皇尊严的嫌疑，因为美浓部达吉的反省，决定对其不加以起诉”。受到处分的美浓部达吉向贵族院提出了敕选议员的辞呈，并声明：“推翻我的学说，让我承认与自己的著作不同的事不成问题，只是我深深感到贵族院今天的空气，使我难以尽到作为议员的职责。”

公布不起诉处分和美浓部的不屈声明使右翼势力更加不满。9 月 19 日，江藤源九郎再次告发美浓部达吉“犯有破坏国体、紊乱国宪罪”。美浓部达吉在 9 月 21 日给法相小原直写信，想取消自己的声明。但右翼势力继续在各地频繁集会，要求对元老、阁僚甚至首相采取强硬措施。这时，以直心道场

为首的右翼势力在县民大会和市民大会上还打出了“弹劾重臣集团，打倒内阁，同时对国体破坏者一木、美浓部处以极刑”的标语。

以此为背景，陆海两相联合发表第二次声明，要求彻底处分机关说的信奉者。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内称：“我国统帅权的主体是天皇，这作为我国国体的本义是帝国臣民绝不动摇的信念。认为统帅权的主体不是天皇、天皇是国家机关的所谓‘天皇机关说’，乃是有悖我国神圣国体的过分的东西，必须坚决芟除。”

这项声明发表后，强硬派还在叫嚣倒阁。后因三六俱乐部、直心道场、在乡军人会等组织在陆军中的影响力有所减弱，攻击“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运动”才接近了尾声。

冈田内阁在这场风浪中虽然没有倒台，但通过“国体明征运动”，其内阁也越来越倾向右翼势力。而得势的陆军右翼势力则在陆军学校内把《为了国体明征、为了政府而应采取的措施》作为军事课附属教材，其中要求“扩充国体研究机关，刷新教育，严禁以国体为题材的著述，强化取缔言论学说的法规，刷新人事”，等等。

“国体明征运动”起到了“无血政变”的作用。通过这一事件，日本天皇制国家一度存在的立宪学说，被歪曲为对天皇制国家现实的叛逆思想（按平沼骐一郎的话说是“乱臣贼子”思想）遭到镇压。此外，这场运动不仅使明治宪法本身绝对化了，而且使天皇大权的解释也绝对化了。这时，“国体思想”亦即所谓“日本精神”，上升为最高的统治思想，立宪思想受到了排斥，对全体国民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束缚力量，并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统制体制的思想基础。

从此以后，右翼势力所掀起的“铲除异端”、即打着天皇的旗号进行思想镇压的活动更加横行无阻，甚至波及宗教领域。1935年2月的“大本教事件”以及1936年2月发生的“人之道教事件”，都是以宗教的不敬罪为由而遭到镇压的事件。这样，30年代的日本，学术思想的自由主义已经荡然无存了。

教育的军国主义化

在进行恐怖活动、加强思想镇压的同时，日益膨胀的法西斯势力的影响也扩展到了教育方面。

早在20年代末，有所抬头的法西斯分子、法西斯组织就把“教育”看作法西斯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不但亲手创办一些教育机构，给青年们灌输各种反动的思想，而且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刷新教育，妄想通过所谓“国家改新”建立一种新的法西斯教育组织，为法西斯主义培育“新人”。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加强了对教育的干预，逐步使教育军国主义化、反动化。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彻底加强了义务教育的军国主义化和对高等教育的“危险思想”的镇压。

在与“九·一八事变”同时开始的军国主义、排外主义运动的狂潮中，日本统治当局首先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用军国主义思想来影响大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他们给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披上“爱国、正义”的华丽外衣，以此来动员学生和青年的“爱国心”。在这种错误的舆论导向之下，青少年学生受到极大的影响。他、她）们盲目地参加募集慰问金活动、送慰问品的

活动，甚至被组织起来到“爱国战争”的“满蒙前线”去慰问和参观。此外，统治当局还采取了种种强制措施，强制儿童和中小学生写慰问信，送慰问袋，让他们欢送出征的士兵和执旗游行等等。进而还向小学校发放天皇照片，在学校内建造供奉天皇照片的奉安殿，把礼拜天皇照片和背诵《教育敕语》作为学生的义务，并利用修身、国语和国史等教材作为培养天皇忠实臣民的工具。

从1933年起，日本政府则在全部国定教科书中添加军国主义内容。对小学教员的思想统制也变得更加严厉，甚至连生活作文和自由教育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教育而加以镇压。如1933年2月长野县便发生了138名小学教员被逮捕的所谓“教员赤化事件”。

在镇压高等教育的“危险思想”方面，日本统治当局制造了“泷川事件”。1933年4月，京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的刑法学著作受到内务省禁止发行的处分。文相鸠山一郎要求京都大学总长让泷川幸辰辞职。实际上，泷川幸辰的刑法学说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只是客观主义的刑法论而已。但是，即便如此，也被视为违反国体的共产主义学说而加以禁止。

文部省要求大学教授辞职，被京都大学的教师认为是侵犯了教授会的自治权。因此，京都大学法学部的全体教授提出了辞呈。京都大学的其他教员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个事件被视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危机。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几所高校的学生也开展了抗议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措施，京都大学法学部的教员开始分化，学生运动也受到了警察的镇压。这次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抗议活动，成为30年代日本教育界拥护自由的最后一场斗争。

在对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抗议活动进行镇压、对泷川幸辰的刑法学说加以禁止的同时，根据同年召开的第64次议会的两院决议，斋藤内阁设置了“思想对策协议委员会”，成员包括内阁书记长、法制局局长、内务、陆军、海军、司法、文部各省次官等。协议委员会从同年4月15日到9月28日共开了21次会，审议了内务省警保局的《思想对策案》、陆军省的《危险思想对策案》、文部省的《有关思想问题的对策案》等提案，特别是对久保义三的《天皇制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小田部雄的《思想对策协议会》提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些提案实际都是为了强化军国主义教育的。例如，陆军省用图表表示的《危险思想对策案》中，不仅言称重视学校教育的“改善”，而且言称要重视社会教育的“革新”。诸如“改良教员”，清理“不良教员”，“宣扬国体观念”等等。

1935年，在右翼势力广泛开展攻击“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运动”的同时，日本文部省还下令对各个大学、中学的宪法和国法学教师进行了所谓“调查”。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又设置了教学刷新评议会，其宗旨首先是“表明天皇制教育的理念”。教育刷新的基本方针是“站在祭政教三位一体的立场上，阐明国体以及日本精神的真义，否定政治和教育分离的原则”等等。

在“改革”教学内容、清理“不良教员”、镇压“危险思想”的同时，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日本政府还加强了学校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并由陆军大臣任命的教练检阅官每年进行检阅。这样，在日益膨胀的日本法

西斯势力的影响下，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中期，日本的教育进一步走向了军国主义化的道路，变成了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服务的工具。

第 25 章

走向战争

统帅权论争

3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进入了最为动荡的“昭和黑暗期”。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国内危机的深化，军部势力迅速抬头，开始采取恐怖手段向政党势力发起强攻，并且逐渐掌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在这一过程中，与民间右翼势力猖獗的同时，军部势力也急速膨胀；并且，以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为发端，爆发了政党政治与军部政治交锋的统帅权论争。

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只是确定了英、美、法、意、日五大海军国主力舰的比例和装备保有量，而对辅助舰则未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华盛顿裁军会议之后，海军军备竞赛从主力舰转移到无条约约束的辅助舰只上。这种竞争，一方面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增加了战争的危险；同时，也成为各国沉重的财政负担。为此，1929年10月7日，英国政府分别向美、法、意、日四国发出邀请，准备在伦敦举行新一轮海军裁军会议。当时日本的滨口内阁接受了这一邀请，表示同意参加这次海军裁军会议。

滨口内阁之所以非常重视这次裁军，是与滨口内阁的经济、外交政策有直接联系的。1929年7月，继政友会田中内阁而成立的民政党滨口内阁，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重振因田中内阁财政失控和实行对华强硬外交而陷入困境的内政和外交。为此，滨口内阁启用井上准之助和币原喜重郎分别出任藏相和外相，并将井上紧缩财政和市原外交（第二次市原外交）作为本届内阁的政治旗帜。为推行紧缩财政，需要削减陆、海军军费，而这次伦敦裁军会议又是“在危机中削减军备”，恰好为滨口内阁实行紧缩财政提供了机会。而推行所谓“市原外交”，主要是不脱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基本轨道，在国际上努力与英、美等国保持协调。所以，参加这次海军裁军会议，成为事关滨口内阁所推行的经济、外交基本政策的重要行动。

为参加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滨口内阁根据海军军令部的意见，在同年11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确定了裁军会议谈判的三大原元：——辅助舰的总吨位保持对美国7成；大型巡洋舰为美国的7成；潜艇保持现有的7.8万吨，以此作为日本参加谈判的基本方针，并且任命前首相若槻礼次郎、海相财部彪大将、驻英大使松平恒雄、驻比大使永井松三为参加裁军会议的代表。

会议于1930年1月21日在伦敦召开。由于美英在会前已经达成协议，所以，会议焦点主要集中在美日舰只的比例上。日本按照既定原则，坚决主张对美保有7成，而美国则坚持日本应为美国的6成，双方互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最后，日美双方提出了妥协案。这个妥协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对美的辅助舰的总比率为69.75%，大型巡洋舰为60.22%，轻型巡洋舰为70%，驱逐舰力70.3%，潜水艇与美相等，为5.27万吨。日方谈判代表经过协商，于3月14日就是否同意这项妥协案向国内政府请示，强调日本已经很难使他国作出让步了，故而请政府妥善处理。

接到请示后，滨口内阁立即就如何复示问题进行研究。在财部彪海相出使期间临时兼任海相的滨口首相，命令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统一海军意见。然而，当时海军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是以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次长未

次信正为首的所谓“舰队派”，另一派是以海军省次官山梨胜之进和军务局长堀悌吉为首的“军政派”。“舰队派”从用兵作战的角度出发，认为美国舰队一旦进攻太平洋，日本必须拥有相当于美国7成的兵力，方可手操胜券，然而，这次日美妥协案对日本并不重视的舰种较为宽松，而对日本海军战略重点的大型巡洋舰和潜艇却限制严格，所以坚决反对这一妥协案。“军政派”则从国际关系和国内的经济、财政状况出发，认为只好暂时接受这一妥协案。次官山梨胜之进在军事参议官冈田启介等海军元老的合作下，设法统一海军内部的意见，最终于3月26日的最高干部会议上统一了认识，认为如从用兵作战的角度考虑应反对妥协案，但是，如果同意的话，则以扩充海军航空兵等补充计划来弥补兵力缺陷。

滨口首相听取海军的意见之后，于4月1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接受妥协案，并上奏天皇获得批准。4月2日复电伦敦海军谈判代表。本来，滨口内阁在将复电提交内阁讨论之前，曾给冈田、加藤、山梨等人看过。当时，加藤军令部长并未积极表示反对。然而，4月2日，加藤却上奏天皇力陈反对意见。但代表团在接到国内复电后，于4月22日与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共同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

海军裁军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滨口内阁推行协调外交和紧缩财政的产物，也是政党内阁开展独立外交的一次努力。但是，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后，日本国内却出现了内阁与军部围绕着军队编制权是否应隶属于统帅权的激烈论争。

1930年4月23日，即伦敦海军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日本众议院第58届特别会议开幕，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在会议上攻击政府无视军令部长的反对，签署伦敦海军条约是侵犯天皇的统帅大权。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反对派也联合起来在议会中对政府进行攻击，指责政府“无视海军军令部的反对意见”，超越了政府不得干预制定国防计划等本应属于统帅权的权限，而这“是关系到统帅权独立之重大问题，不能不使人怀疑是违宪”的行为。而民政党则反驳说：反对派的攻击是“在无视军令部的意见或是违反其意见的这样假定的事实上论述宪法的”，“政府不仅对海军军令部，而且对军部的专门意见都曾充分加以斟酌”，“并没有所谓无视其意见的情况”。这种论争反反复复，从4月一直持续到5月。

国会的论争，使以军令部为中心的条约反对派重新集结力量，再次对政府发难。这时，军令部长海军大将加藤宽治也突然改变态度，在6月20日再次上奏天皇弹劾民政党政府，并直接向天皇提交辞呈。加藤在上奏中言称：“担当辅弼政务大权之任者，胡乱使其政策偏离，专断上奏如变更常备兵额的重大事项，其不仅壅蔽大元帅陛下之统帅大权，而且危及用兵作战之基础，开国防方针常随政变而动摇之端，帷幄统帅之权终将不知所趋。国家之危殆，实无比此更为严重。”他提出“兵力问题是小事，统帅权问题是大事”，并开始公开否定政党政治。加藤军令部长意识到“统帅权独立”是天皇独揽大权的强力支柱，是“明治宪法体制”能否存在的政治基础，因此，为保卫“三千年以来我国体之精华即军政之分离之根本原则”，决定辞职。海军、政友会以及右翼势力相互联合攻击政党内阁，实际是企图阻止伦敦海军条约在枢密院获得通过，并且推翻民政党内阁。但是，滨口内阁采取了坚决态度，并借助各方面的支持，终于在10月1日枢密院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伦敦海军条约，并于次日正式得到批准。

统帅权论争的焦点，集中在明治宪法第 12 条的军队编制大权，是否也应属于第 11 条的统帅权的范畴。按照伊藤博文所著的《宪法义解》关于第 12 条的解释：“本条表明，陆海军之编制与常备兵额亦为天皇亲裁……此虽固然由负责大臣辅翼，亦与帷幄权同样，属至尊之大权，且无须议会之干涉。”这里关于“此虽固然由负责大臣辅翼”与“亦与帷幄权同样”的解释是有矛盾的，可作不同的理解。按照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的论述：陆海军的编制与国家的外交及财政密切相关，因此纯属国务，只有内阁才能当此辅弼之任。这种观点也是许多宪法学者的代表性观点。然而，反对派则认为：军队的编制是应由统帅和国务两方面共同负责辅弼的事项，或则认为编制权与统帅权“相同”都应由统帅方面负责。总之，反对派一致认为无视军令部长之意见而在裁军条约上签字，是侵犯了统帅权。

统帅权的论争实际上暴露了统帅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所造成的政策二元化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独立的统帅权，是军阀势力强行干预国家内政和外交的重要政治武器。滨口内阁虽然使伦敦海军条约获得了批准，暂时成功地压制了反对派的意见，但并没有从政治上解决统帅权独立的问题，相反却为军阀势力否定政党政治提供了借口。政友会为了攻击民政党，不借站在军部势力一边，挑起统帅权论争，不仅打击了民政党，而且也直接削弱了政党政治本身的政治基础。所以有人评价说：政友会把侵犯统帅权问题作为倒阁的手段无异于政党政治的“自杀行为”。

10 月 27 日，在伦敦举行了海军军备条约交换批准书的仪式。美国总统胡佛、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日本首相滨口同时发表广播讲话，庆祝裁军条约正式缔结成功。滨口首相声称：海军条约的签订，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历史的发展已经结束了列强对立的“冒险时代”，进入国际协调与国际和平的“稳定时代”。滨口的祝福或许是一种美好的心愿。就在发表这一庆祝讲话后还不到一个月，即 11 月 14 日，滨口便在东京火车站遭到了右翼恐怖分子佐乡屋留雄的狙击，身负重伤致死。这一事件犹如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昭和动荡的开始。

国家改造运动

继续统帅权之争后，日本又出现了试图以军人政治代替政党政治的“国家改造运动”。

以军人为主体的“国家改造运动”的兴起是有深刻而广泛的国内、国际背景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引起的统帅权论争，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契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出现了两种变化曲线，那就是政党政治的强化与军部势力的相对削弱。1918 年原敬内阁成立，日本出现了第一届强有力的政党内阁。1922 年 2 月，陆军内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元老山县有朋去世，政党政治解除一大政治障碍。同年的第二次护宪运动中，以宪政会（民政党）为中心的护宪三派获胜组阁，从而在日本进一步确立了政党政治，军部势力受到明显削弱。这一时期，军部与政党在内政、外交上发生了严重的对立，成为军人要求国家改造的政治动因。为了重新确立军人对政治的主导权，陆大出身的少壮军官中间逐渐形成一股按照大规模整体战的需要全面改造日本国家、军队和政治的暗流。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的慢性危机，特别是 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国家改造

运动”形成的根本原因。最后，从20年代后半期开始，英、美两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美国于1928年率先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而日本却竭力想把“满蒙”地区变为日本的“生命线”。而在国际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趋于瓦解，列强争夺霸权的阴云再次笼罩了世界，这也为“国家改造运动”提供了萌发的土壤。

1930年10月，日本出现了军人右翼团体樱会。它是个秘密的政治结社，其政治目标是“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如为此需付诸武力，亦在所不惜”，樱会竭力反对政党政治，强烈主张专制独裁，要求实现“真正以天皇为中心的有生气的明朗国政”。樱会成员多数来自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主要为位于陆军中央的佐级幕僚军官，其核心人物是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的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主要成员包括阪田义郎中佐（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军事调查员）、桶口季一郎中佐（21期，东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勇大尉（28期，参谋本部）、二见秋三郎少佐（28期，参谋本部）等人。可以说，樱会实际上是位于陆军中央的特别是在参谋本部拥有相当势力右翼团体。

1930年底参谋本部二部拟定的《1931年形势判断》，明确增加决心改造国家的重大项目，并且将它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先决条件。这表明“国家改造运动”不仅包含对内进行政治改造的内容，而且与准备发动对外战争紧密相连。“国家改造运动”已经通过樱会变成整个陆军的纲领和目标。

为此，1931年初，樱会的部分成员就与右翼分子大川周明一起，制定了一个企图推翻政党政府、建立军人政府、实现国家改造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在军部某些首脑人物的默许下展开的。字垣一成陆相、杉山元次官，二宫重治参谋次长、建川美次部长（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小矶国昭军务局长都在暗中支持政变计划的实施。计划主要是想拥立当时的陆相字垣一成，成立以字垣为首的军人政府。原计划拟定：在3月20日左右，由大川周明组织1万名游行工人包围议会，并在同一时间向政友会、民政党总部、首相官邸发射模拟炮弹，借此调动第1师团的部分部队对议会实施包围，并由小矶国昭中将进入议会，强迫市原代理首相与内阁实行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下诏书命字垣陆相组阁。这就是计划实施的“三月事件”，然而，由于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和冈村宁次大佐、第1师团第3联队长山下奉文大佐认为时机尚早，不同意马上发动政变。实际上，永田铁山反对由字垣组阁。因此，直到政变发动的最后时刻，字垣陆相不得不决定放弃原定的政变计划。

“三月事件”虽然没能实现拥立字垣陆相建立军人内阁的计划，但却成为军人凭直接行动实现国家改造的开端。“三月事件”是以军部首脑为中心展开的军官政变计划，因而，促使更多更激烈更大胆的政变计划的相继出现，特别是它刺激了以“一夕会”为首的先外后内主义派，使其进一步加紧了对外武装侵略的步伐，这便是后来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为首的法西斯军人在中国东北点燃了对外侵略的战火，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此后，围绕着事件的处理，政府与军部之间出现分歧。若槻内阁开始主张“不扩大论”的方针，军部则主张以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而此时的社会舆论开始倒向军部，逐渐趋于强硬，“满蒙生命线”论、“以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等论调，一时间甚嚣尘上，日本政局更为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在“三月事件”中受挫的樱会急进派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等人，再次策划发动军事政变，企图一举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独裁政府，实现国家改造，这就是“十

月事件”。

“十月事件”的策划中心仍在参谋本部，除桥本中佐之外，还有俄国班的日中弥大尉、小原重孝大尉以及参谋本部的马奈木敬信少佐、长勇少佐等人，军部之外则联合了大川周明、北一辉、西田税、井上日召集团等民间右翼团体。另外，海军拔刀队、空军霞浦航空队以及陆军的部分军官也参与了这次政变计划。这次计划拟以东京的百余名军官为主，并且计划调动近卫师团、第1师团所属的步兵联队的部分兵力。政变行动主要包括：袭击首相官邸，杀害除首相以外的所有内阁成员；占领警视厅，包围、控制陆军省、参谋本部，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动用军队袭击、逮捕政党首脑、财界巨头以及天皇周围的奸臣；抢占中央电话局、中央电信局、中央邮政局，掌握国家要害部门；与此同时，由东乡平八郎元帅上奏天皇，迫使天皇和军部承认政变，最后组成军人内阁。

这与“三月事件”仅仅发射一些空炮弹相比，形式更为激烈，手段更为残酷，政变的规模也更大。另外，这次计划提前拟定了以荒木贞夫中将为新的内阁成员的具体名单，首相兼陆相是荒木贞夫中将，内相是桥本欣五郎中佐，外相是建川美次少将，海相是小林省三郎，大藏相是大川周明，警视总监是长勇少佐。这说明这次政变计划得更周密。

但是，“十月事件”与“三月事件”一样，也因为政变者内部派别分立而未能真正实施。但是，这次事件却对当时的日本政局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十月事件”政变计划与“九·一八事变”都是军部政治势力导演的，它们里应外合，遥相呼应，在政治上对以元老和政党为代表的政党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从此，政党势力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军部势力的依赖性。特别是随着关东军侵略的逐步升级，日本在国际上与英、美等国的对立进一步加剧，再加上国内经济危机的长期化，政党政治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十月事件”后，“国家改造运动”出现分化。在“十月事件”中失败的军部幕僚军官因受到降职处理而各奔东西，樱会趋于解体。部分成员开始放弃利用政变手段实现国家改造的策略，转向在明治宪法体制内寻求解决的途径，这些人员后来与“一夕会”成员合流为“统制派”。与此同时，陆海军青年集团、井上日召集团以及以橘孝三郎为中心的爱乡塾等政治派别，则开始与军部幕僚层的国家改造集团相分离，开始了独立的“国家改造运动”，并在运动形式上更为激烈。此后，以下层青年军官为中心的国家改造集团，逐渐成为“国家改造运动”的急先锋。

随着局势的变化和军部政治势力膨胀，政党内部也兴起了“国家改造运动”。1931年11月，若槻内阁的外相安达谦藏勾结民政党中野正刚、富田幸次郎以及政友会的久原房之助和床次竹二郎等人，预谋建立拥护军部的举国一致内阁，这就是所谓“协力内阁”运动。外部的冲击、内部的分化，使昙花一现的日本政党政治正悄然隐向历史舞台的角落；而军国主义势力却大肆抬头，日本开始走向军部独裁的法西斯主义。

面对军部的步步紧逼和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若槻内阁的紧缩财政和协调外交已经成为毫无意义的政治招牌，加之党内分裂，若槻内阁不得不于1931年12月11日实行内阁总辞职。接下来登场的是以犬养毅为首的政友会内阁，犬养毅将陆相的职位留给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期望能够以荒木的威望加强对陆军的控制。

在“十月事件”中受挫的井上集团，1932年初，又与海军青年军官集团

开始酝酿新的行动计划。由于受到“十月事件”失败的影响，井上认为集体行动很难统一意志，所以决定不采取集体袭击的行动计划，改为实行“一人一杀”的单独暗杀计划。2月9日，井上日召集团的小沼正在东京本乡区暗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紧接着，3月5日，菱沼五郎在三井银行门前杀死了三井合股公司的董事长团琢磨，一时间成为轰动整个日本的恐怖事件。但因小沼正和菱沼五郎在行动后随即被捕，所以此后的行动计划被迫取消。

在日后对这次事件的审判中，人们发现以小沼正和菱沼五郎为首包括井上集团的其他成员黑泽大二、黑泽金吉、川崎长光等家庭之间相互都有血缘关系，而且，他们都具有强烈的血缘观念，因而，人们将井上日召集团称为“血盟团”，称这次暗杀事件为“血盟团事件”。

受到“血盟团事件”的刺激，海军中尉古贺志清和中村义雄决心继续采取集体恐怖行动，实现国家改造，他们的行动计划得到以橘孝三郎为首的爱乡塾的支持。这次行动的主要参加者有青年海军军官10人、陆军候补军官11人和以橘孝三郎为首的20个爱乡塾成员。这次计划更接近于樱会成员发动的军事政变，主要企图通过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政友会和三菱银行，以及破坏东京的6个变电所造成整个市区黑暗等手段，制造混乱，引发政府颁布戒严令，以过渡到建立军人政府。5月15日开始了上述行动。一部分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袭击了首相官邸，杀死了正值星期天在家休息的犬养毅首相，但袭击内大臣的行动以及对政友会和三菱银行、警视厅的袭击行动也都遭到失败，爱乡塾成员组成的别动队也没使东京变成黑暗。整个行动还未等到发布戒严令就宣告失败了。主力部队向宪兵队投案自首，别动队逃亡，为这次行动提供武器和资金的大川周明也于6月15日在茨城县火车站附近被捕，橘孝三郎逃亡“满洲”，并于7月24日在哈尔滨向新市街的日本宪兵队自首。

这次所谓的“五·一五事件”，暗杀了犬养首相，并没有能达到建立军人政府的目的。然而，现役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政府首相，确是前所未有的恐怖事件。但是，陆相荒木贞夫却公开对采取恐怖行动的青年军官表示同情，言称“纯真之青年做出如此之举动，若想到其心情，实不能不让人流泪”。荒木这种态度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军部上层的倾向，表明在青年军官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政治势力。

“五·一五事件”的最大政治后果，乃是结束了政党政治。在枪声中倒下的犬养内阁，竟成为大正以来政党内阁的终结。青年军官虽然只是杀害了犬养首相，没能实现建立军人政府的国家改造计划。但是，从滨口首相遇刺开始，“三月事件”、“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等恐怖暗杀、军事政变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恐怖气氛弥漫了整个政界。而军部上层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恐怖事件，为军部干预政治打开了道路。“五·一五事件”后，军部强化了对政治的干预，军部首脑以陆相人选相要挟，公开反对政党单独组阁。迫于军部的政治压力，最后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新内阁。斋藤内阁实际上是军部势力以及和军部密切勾结的新官僚的联合体，在政治上更加倾向于军部。元老西园寺原本想以斋藤内阁为“过渡内阁”，待事态平静后再恢复政党内阁，但没想到这种“过渡内阁”却成了向军部法西斯统治过渡的开端。

军人政治的展开

1933年9月14日，内田康哉以年迈为由辞去外相，斋藤内阁启用前驻苏大使广田弘毅继任外相。10月3—20日，斋藤内阁连续5次召开由首相斋藤、藏相高桥、外相广田，陆相荒木、海相大角参加的五相会议。会议主要是调整外交、国防、财政之间的关系，并制定日本退出国联后新的外交政策大纲。这种“阁内内阁”的制定政策的方式是斋藤内阁首创的。陆、海军大臣参与少数内阁成员制定国家基本政策，可以保证军部的主张反映到国家的基本国策中，这是军部势力对内政、外交影响力强化的表现。

斋藤内阁时期，陆军中枢把持在荒木陆相、柳川平助次官、真崎甚三郎等“皇道派”手中。“皇道派”是狂热的天皇主义者，主张对外强硬论，主张对美苏开战。为此，他们要求在1936年前后做好开战准备，大幅度增强军备，在经济、财政、思想领域全面改革，实现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这种激烈的主张与外相、藏相所主张的稳健论发生对立。因而，荒木陆相称病辞职。但是，荒木陆相的辞职并不意味着军部势力的退却，而是与陆军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权力争夺有关。不久，“统制派”开始替代“皇道派”执掌陆军大权，登上政治舞台。实际上，荒木陆相的隐退正是“皇道派”与“统制派”势力消长的转折点。

1933年8、9月间，海军方面也出现了较大的人事变动。反对伦敦海军条约的“舰队派”核心人物末次信正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舰队派”大量排挤“条约派”，在海军中的势力开始增强。进而又在9月26日修改了海军军令部条令，缩小了海军大臣的权限，从而确立了军令部优越地位的海军新体制。从此，在海军内部“条约派”的军政观点受到压制，而主张废除华盛顿、伦敦海军条约的强硬论占据主导地位，陆海军的对外强硬论相互竞争、相互呼应，对日本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冲击。

1934年7月3日，斋藤内阁因涉嫌“帝人”事件而总辞职，7月8日组成了以“条约派”的海军大将冈田眉介力首的所谓举国一致的内阁，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林銑十郎、海相大角岑生分别留任。

冈田内阁时期，军部对政治的干预更为强硬，军部以林銑十郎留任陆相为条件，要求实现排除外务省的驻满机构一元化的官制改革。日本驻满机构问题是“九·一八事变”前的悬案。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领事馆、关东厅、关东军等机构并列，分别隶属于日本外务省、拓务省，陆军省等系统，行动很难统一。“九·一八事变”后，官制不能统一的问题愈发显得矛盾突出，于是在1932年6月26日，经陆军、外务、拓务、大藏省的四省次官会议，议定了《驻满特派总监府官制案》。但是由于这一方案的官制规模过大没能实施，8月8日采取了由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兼任临时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的临时措施，只是统一了最高领导，而下层机构仍然并立，驻满机构问题仍未解决。1934年8月，陆军发表了自己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1.把现在驻满机构的三位一体改为二位一体即关东军司令和全权大使制；2.全权大使受总理大臣监督，只在有关涉外事项上受外务大臣的指挥；3.在内阁中增设对满事务局，把拓务省所管事项移交该局管理；4.在满洲设置知事，由全权大使统辖等。陆军的这一方案，实际上既排除了外务省又排除了拓务省，而将外交、经济、行政权都集中到军部手中。这一方案遭到外务省和拓务省的强烈反对，各省分别提出自己的方案与陆军抗衡，一时对抗极为激烈。最后，政府还是依照陆军的方案提出了妥协案，决定由陆相林銑十郎兼任首

任总裁。这样，陆军独掌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经营权，排除了外务系统干预，使这一地区成为军部的势力范围。

1934年10月1日，陆军省新闻班发表了《国防的本义和加强国防》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的开篇就赫然写道：“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典型地再现军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书中提出：日本在列强的压迫下政治、经济都将走投无路，面对世界非常时局，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海军军备条约将在1935—1936年期满，世界的危机即将到来，而所谓的“协调外交”只能解决细枝末节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必须树立只有国防才是解决危机的惟一手段的观念。因而，国防建设必须以应付这种世界危机为根本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对构成国防力量的人的要素、自然的要素、经济的、技术的、武力的要素进行全面改善；“必须以真正的举国一致，对经济及贸易断然实行统制政策”，强化对经济的统制，建立起战时的统制经济体制；并且要全面改革政治机构，完善国家战时总动员体制。实际上，这是总体战的国防国家的思想，实际上是军部法西斯式国家的构想，这种思想把国防视作国家发展的最基本手段，并且将军事国防置于国家的最高位置，经济、财政、外交、政治、思想都必须服从国防的最高目的，提出了军政高于国政、军政应指导国政的思想，为军人干预政治提供理论依据。

这个小册子的实际执笔者是军部“统制派”成员、陆军省军事科的池田纯久少佐。用池田少佐的话说，这是“统制派”多年研究的精华。此时，“统制派”已经占据陆军省的重要职务，执掌了陆军的实权，其核心人物就是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永

田少将一面与新官僚、重臣、财界勾结，一面推进与“皇道派”在方式上有所不同的以现存体制为基础的国家改造运动。

“九·一八事变”、“十月事件”之后，日本军部势力加速了总体战体制的构筑，军费开支逐年增加，日本经济迅速朝着以军事经济为中心的轨道转化。1931—1937年的7年间，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从14.77亿日元增加到30.4亿日元，其中军费开支从4.16亿日元增加到14.1亿日元，军费开支从占财政预算的28.98%增长到46.3%。也就是说，1937年财政预算几乎有一半用于军事开支。

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日本的工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与军事领域密切相关的钢铁、煤炭、机械制造、造船、重化学工业等发展迅速，设备投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并且出现了一批与军需生产密切结合的新兴财阀，如鲇川义介的“日本产业株式会社”（日产）、野口尊的“日本窒素（氮素）”（日窒）、森矗昶的“昭和肥料—昭和电工”、大河内正敏的“理研”、中野友礼的“日本曹达（苏打，制碱）”（日曹）、中岛知久平的“中岛飞机”。新兴财阀与老财阀都属于垄断资本家，两者相比略有不同。新兴财阀的创始人大多以技术起家。因而，新兴财阀的投资多为新兴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如重化工、机电等与军需生产紧密相关的新兴领域；与老财阀相比，新财阀在资金、市场占有率、外贸出口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所以，更加依赖于政府的扶植和军需订货，更要求向海外殖民地“拓展”；因而，这些新兴财阀与国家权力和军部势力结合得更为紧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外殖民扩张、军事战争的追随者。

在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老财阀的转向。本来老财阀依据传统经济优势，在政治上与政党势力相结合，在对外关系上

主张实行稳健的与英美妥协的协调外交，在政治上与军部势力的主张略有不同。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长期比以及军人“国家改造运动”的展开，老的垄断财阀也迫切需要队军需生产和海外殖民地经营中获得巨额利润。在多方面力量的驱使下，三井、三菱等老财阀也纷纷将投资转向军事企业，这一现象被称之为“财阀转向”或是“军财抱合”（拥抱、结合）。到1937年，在老财阀的总资本中用于军事企业的投资比例已有明显上升，其中以三菱为最高，占据26%，三井财阀占19%，最低的住友财阀也占14%；而在新兴财阀中，用于军事企业的投资，竟高达其资本总额的50—90%。

新、老财阀与军国主义势力的结合，加速了日本经济的军事化进程，使日本的军事实力大大提高。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接近英美等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坚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决心。财阀与军部势力的结合，实际上是导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和基础。

“二·二六事件”

如上所述，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和恐怖事件，使政党势力节节败退，军部势力不断上升，日本正在军国主义的驱使下不断走向战争。特别是在“统制派”已经执掌陆军主导权的情况下，军部势力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逐步推进战争体制的发展。

1935年春召开的议会中，“天皇机关说”的论争成为政治斗争的一大焦点，最后政府不得不公开发表否定“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证”（明确国体）声明。“天皇机关说”本是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学说。美浓部认为：国家的统治权属于国家法人，天皇只是作为它的最高机关行使其统治权。这种学说是“天皇主权说”的批判，是立宪政治的宪法基础，也是政党政治与军阀政治进行斗争的宪法武器。此时的争论实际上已经完全政治化了，军部和右翼势力主要是为了彻底清除政党政治的思想基础，打击以元老西园寺公望为首的重臣政治势力，借助天皇神权，强化法西斯意识形态。

1935年2月18日，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退役的陆军中将），在议会全体会议上公开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是叛逆思想。以此为开端，军部与右翼势力联合起来对“天皇机关说”发起进攻，政友会也在众议院向议会提出“国体明征决议案”。为此，政府两次发布“国体明证”声明，否定了“天皇机关说”，并且开始禁止美浓部达吉的著作的出版与发行，美浓部达吉本人也被迫辞去了贵族院议员，后来竟受到反对者的开枪袭击，身负重伤。军部势力通过摧毁“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证运动”，以天皇绝对主权为盾牌，根除了政党政治的思想基础，在社会中强化了天皇专制思想，从意识形态上强化了法西斯统治，并且打击了对军部构成制时的政治权利集团，迫使牧野伸显内大臣和法制局长金森德次郎分别在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先后辞职，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军部的政治地位。

在陆军和右翼势力联合围剿“天皇机关说”的同时，“统制派”为独揽陆军大权、推行总体战的战略，加紧了对“皇道派”的排挤和迫害，陆军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和争斗开始不断激化。1934年1月，“皇道派”的首领荒木贞夫被迫辞去陆相，继任的是号称“越境将军”的原驻朝

鲜军总司令林銑十郎。随着荒木陆相的辞职，“皇道派”所推行的急进的“国家改造运动”受到压制，这给“皇道派”青年军官以很大的刺激。荒木辞职后，冈田内阁的林陆相又在1935年7月罢免了深受青年军官推崇的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激起了“皇道派”青年军官的愤怒，8月12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在军务局长室刺杀了“统制派”首领永田铁山中将，“皇道派”认为，罢免真崎教育总监的真正元凶是“统制派”首领永田铁山军务局长，永田是真崎事件的幕后操纵者。至此，两派的对抗达到顶点。“皇道派”与“统制派”的这种对抗既有派系的权力之争，亦有两派各自策略手段的激烈冲突。

1936年2月26日，厚厚的积雪覆盖着整个东京，少有的严寒仿佛将一切都凝固起来了，清晨，野中四郎、安藤辉三大尉以及板井直、香田清贞、河野寿等10余名陆军军官带领步兵第1联队、第3联队的1400名士兵，实枪荷弹，兵分7路，分别秘密前往首相官邸和一些政界要人的住地，开始大规模武装暗杀的“天诛风暴”行动。结果，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刺身亡，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受重伤；而在首相官邸，暴动部队则错将海军预备役大佐松尾传藏误认为是首相冈田启介而杀死，冈田首相才幸免于难，原内大臣牧野伸显则由于及时脱逃，而免得一死。此外，暴动部队还袭击了朝日新闻社，占领了首相官邸、陆军省，参谋本部、警视厅和国会等政治、军事要地，事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震动了整个日本。

领导这次暴动的主要是受到北一辉和西田税等国家改造论思想的影响陆军青年军官，他们采取这次行动主要是想在政治上一举实现由天皇独揽大权，建立起由“皇道派”实际统治的军部独裁政权，实现彻底的国家改造，再一次实现“昭和维新”。

酿成“二·二六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昭和以来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政党内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采取扩大垄断组织、强化资本集中的“产业合理化”政策；结果，是大财阀吞并中、小企业，大批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城市失业大量人口增加，特别是农村危机日益突出。随着危机的加深，广大民众与垄断财阀以及代表垄断财阀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社会动荡日趋激烈，这既是“昭和动荡”形成的基本原因，也是“二·二六事件”爆发的社会起因。与“五·一五事件”相类似，“二·二六事件”同时受到军部上层推动的“国家改造运动”的影响，如“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但是，不同的是，对发动“二·二六事件”的青年军官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农村贫困化问题。日本军队的士兵大多来自农村，士兵家庭的悲惨生活直接冲击着下级军官，使他们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对现实充满危机感，这是“二·二六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此外，促发“二·二六事件”还有一些具体事件，那就是第1师团出征，传说暴动部队所在的第1师团内定将在同年的3月被派遣到中国东北地区，这对日俄战争以来从未出征过的第1师团也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为了不失去最后的机会，所以，才决定在出征前断然采取行动。另外，陆军内部“统制派”与“皇道派”的争斗、“统制派”对“皇道派”的攻击与排挤也是事件爆发的具体原因，特别是“相泽事件”后，双方的对立达到白热化，这对“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大规模行动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二六事件”爆发后，统治阶级乱成一团。面对大规模的暴乱，内

阁束手无策，事件处理的主导权完全集中在军部。围绕对事件的处理，军部内也出现了两种意见。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为首的军事参议官集团，同情、支持青年军官的行动，主张对暴动部队作说服工作，劝其归顺；而在“统制派”执掌大权的参谋本部，主张坚决镇压的占据主流。从事件爆发起，杉山元参谋次长就主张坚决镇压。特别让青年军官产生错觉的是对天皇态度的估计。事件爆发后，天皇对暴杀其“肱骨”臣子的暴动部队极为愤怒，强烈主张坚决镇压，并扬言“要亲率近卫师团征讨叛贼”。这样一来，事态很快就转向镇压的方向。

为了完成镇压，在杉山元次长的提议下，27日上午在东京警备司令部成立了戒严司令部，并于下午1时30分起在东京地区发布了戒严令，并且按照片仓衷少佐于两年前制定的《处理政治性非常事变爆发的对策纲要》中所提出的对策，进一步完善镇压体制。主张对暴动部队坚决镇压的还有石原莞尔大佐，他还具体参与了镇压的指挥，在戒严司令部参谋部担任第二科和第三科科长。但是，陆军内部也有对暴动的青年军官予以同情者，所以镇压行动进展迟缓。后来，在天皇的再三督促下，终于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的第4天，即2月29日，戒严司令部开始出动部队，对暴动部队发出最后通牒。暴动部队终于接受劝说，解除了武装，下级军官和士兵被遣返回原部队，野中四郎大尉自杀，其余指挥军官则为在法庭上阐述自己的意见而同意就擒。就这样，“二·二六事件”在坚持4天之后宣告结束。

事件结束后，在东京设立了临时军法会议，对发动事变的军官进行审判。审判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允许有辩护人，一审定案，不允许上诉。1937年7月5日，一审判决在暴动中起领导作用的17名军官死刑，并对未直接参与暴动的“皇道派”军官管波三郎、大岸赖好等人，以支持暴动为名，判处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军法会议还将北一辉、西田税处以死刑，实际上他们二人并未直接参与事件的具体发动。判决后，首先在7月12日，将除村中孝次、肌部浅一外的15名军官枪决；7月19日，又对村中孝次、肌部浅一与北一辉、西田税4人执行枪决。对“二·二六事件”发动者的审判结果，全部为死刑，这与对“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的处理几乎无法比较，就是与“五·一五事件”相比也是极为严厉的。这次审判，明显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对陆军影响的意图。

震撼整个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对昭和政治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二·二六事件”后，政党势力彻底崩溃，能够与军部势力抗衡的政治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日本开始走入军阀专制的昭和黑暗期。至此，军部已经真正踏上昭和舞台的中央，彻底把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

从3月起，“统制派”对军队内部进行人事“肃整”，将林銑十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阿部信行、川岛义之5名大将从现役转入预备役，将一大批“皇道派”的军官降职、调离的调离，将“皇道派”从陆军的核心部门统统驱逐干净，代之以“统制派”军官占据各部门的重要职位，在陆军内部形成了以陆相寺内寿一为首、外加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教育总监杉山元的新“统制派”领导的军部独裁体系。“二·二六事件”不仅在外彻底击垮了政党势力，而且在陆军内部消除了以往的派系对立。事件后，统制派彻底掌握了陆军实权，确立了对陆军的集中统治。

“二·二六事件”后，陆军立即对组阁强行干涉，凡是被视为自由主义或是协调主义的人物一律被排除于阁僚名单之外。起初拟定的外相吉田茂（牧

野伸显的女婿)，就是由于陆军的反对，而被从阁僚名单上抹去的，广田只得临时兼任外相。同年5月，军部又恢复了1913年废弃的陆军大臣、次官现役武官制，夺回了对护宪运动所作的让步，重新拿起了干预政治的最强武器。此外，7月25日，又在陆军省军务局中建立起与军事科平行的军务科，开辟了以军事战略影响国家政略的具体途径。9月25日，公布了《帝国在乡军人会令》，把在乡军人会变成官方机构，建立起军部向地方统治渗透的组织手段。军部从社会各个层面加强了对政治的影响力。

准战时体制的形成

日本政治实际已经演变为军人政治。从此，政府必须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家的政策大纲和外交方针。如下所述，以军事战略压倒一切的“石原主义”已经成为现实，日本已经被拉入了战争的轨道。

1936年3月9日，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在组阁过程中就受到军部的强力干涉，成立后即成为军部的傀儡政府。充分表明广田内阁这种政治地位的，是《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订。当时，以参谋本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为中心的陆军拟定了《国防政策大纲》，这个文件充分体现了“石原主义”的战略设想。其中主张“首先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的“以苏为主敌论”，“在消除北方威胁之后，再以实力积极推行我国对南洋及中国之国策”，并且准备最后“对美国进行大决战”。这实际是一种“先北后南论”的军事战略。而海军则拟定了《国策纲要》，主张“确保帝国在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发展”，把美国列为主要假想敌国，提出了与陆军“南守北进论”相对立的“北守南进论”。

陆海军相互对立的主张，使得广田内阁的内外政策出现了同样的对立。广田内阁于8月7日在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国策基准》，并在同日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在《国策基准》中，同时把陆军的北进论和海军的南进论作为正式国策加以确认，提出“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之地位之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而在《帝国外交方针》中，又把“粉碎苏联侵犯东亚的企图，特别是要消除军备上的威胁，阻止赤化的发展”作为当前的“外交政策的重点”。这表明陆、海军围绕着新的国防方针的修订出现了对立，而广田内阁根本没有能力统一陆、海军的意见，只得将这种对立原封不动地反映到内政外交政策中。广田内阁兼容陆、海军的意见，制定出南北并进的政策，不仅是政治上对陆、海军的妥协，而且意味着必须承担起同时扩充陆、海军，完成“以美国、俄国为主要目标，并防备中国、英国”的用兵备战计划，承担起庞大的军事预算。这充分表明广田内阁的亲军部性，而后出现的马场财政就是这种亲军部政治的必然产物。

当时担任广田内阁藏相的是马场瑛一。马场藏相原为日本劝业银行的总裁，对财政是个内行；但是，他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很敏感，他清楚意识到此时已经难以抑制军部的扩军要求了。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准备不加改变地接受军部的扩军要求。马场藏相一登台就着手全面改变财政政策，将高桥是清的紧缩财政改为膨胀财政，实行军事通货膨胀。高桥财政为平衡财政预算，主要靠发行公债，而马场财政为满足军部扩军要求，为平衡大幅度增加的财政预算，则主要靠实行通货膨胀、提高税收。马场财政放弃了高桥财政的低税收政策，断然实行税制改革，大幅度增加税收，以增加财政收入。马场藏

相编制的 1937 年财政预算，在 1936 年 11 月通过审议。这是一个包容了陆、海军大规模扩军计划的总额达 30.4 亿日元的庞大预算。1937 年的财政预算较 1936 年的预算增加了 7 亿多日元，预算中包括了陆军扩军计划的一部分以及海军建造“大和”、“武藏”巨型战舰在内的总额达 7.7 亿日元的第三次扩军补充计划。这次预算仅军费支出就有 14.1 亿日元，占总预算额的 43.1%。马场财政的这种扩军经济给产业界以很大的冲击，但它满足了军部的要求，被称为亲军部财政。

日本大幅度增加工业设备的投资，同时，为了应付即将爆发的战争，大量进口、储备了各种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材料；日本的国际贸易出现严重赤字，只得靠回收海外投资来维持外汇平衡。而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难以用常规方法来维持操作，开始使用“准战时”体制的词语了。实际上，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进入准战时体制。

然而，扩充军备仅仅是军部要求的第一步。军部进一步要求的，是在日本建立起符合总体战战争设想的完备的战争体制，这就需要以战争的原则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造。所谓“石原构想”便是在这种形势下军部按战争需要改造国家设想的展开。

石原莞尔大佐是日本陆军的谋略家，有一套系统化的战争理论，他的战争理论观即所谓“石原主义”，对日本陆军影响极大。他曾担任过关东军参谋，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1935 年夏天，他从中国东北回到参谋本部开始担任作战科长。回到参谋本部后，不久就从作战科转到新设立的战争指导科任科长。1937 年 3 月晋升为少将，并开始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作战部长）。1935—1937 年间，石原在日本陆军中央身居要职，负责战略方针、作战计划的拟定以及指导战争等重要任务，“石原构想”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石原构想”是以对苏作战为背景提出的。石原在担任作战科长期间，曾具体考查过对苏备战的情况，通过日俄两军实力对比，得出结论：日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机械化水平上都明显处于劣势，而两军的真正差距是在实力上。所以，石原认为：仅靠增加军费开支已不足克服两军差距，必须全面扩大军需产业的产业规模，加强作为军需工业基础的产业建设，特别是重化学和钢铁、机械工业的建设。石原莞尔从这种认识出发提出了一个发展构想，即：要在 1941 年以前完成对苏作战准备，兵力要达到苏军的 8 成。为此，重点要扩大生产规模，充实经济实力，并且要在日本—满洲—华北这样一个日本实际控制的经济圈内完成经济和政治改造计划。石原莞尔的这一构想，充分体现了“石原主义”的军事战争观点，即战争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必须实现以战养战。

为使“石原构想”具体实施，石原启用了原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宫崎正义，成立了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负责制定具体的实施发展计划。而后这个研究会提出一个题为《1937 年起五年内帝国岁出岁入计划》（附紧急实施国策大纲）的文件。这个文件主要包括经济发展计划和政治机构改革方案两个方面。经济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在五年内，要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整个生产规模至少提高 2 倍，具体包括：汽车要从现产量的 3.7 万台提高到 10 万台，钢材要从 480 万吨提高到 1300 万吨，飞机、军用汽车分别要达到 1 万架、10 万台等等。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机构改革计划，主要是将伪“满洲国”的行政制度移到日本国内，要废除内阁制，创立国务院，仅以少数国务大臣掌握

国家权力，各省（部）设长官受命于国务大臣。进而，宫崎还分别制定出有关日本国内与伪“满洲国”的具体发展计划，关于伪满的计划则作为五年开发计划，从1937年起，交由伪满政府和关东军开始实施。而关于日本国内的计划，则经参谋本部修改提交给陆军省，陆军省将其总结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交付内阁要求实施。宫崎计划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将产业发展圈从日本国内扩大到日本—满洲—华北的范围，这种扩张的经济圈是典型的“石原构想”。此外就是强化统治经济，对物资分配、生产管理、金融控制都实行强制的战时经济统治。

“石原构想”实际是一种发动大规模近代战争的总体战体制的设想，这种总体战设想强调以高度完备的军事工业为战争的基础，并且要将军事置于最高位置，以军事统治经济，以军事统治政治，以军事统治整个国家。“石原构想”的酝酿与展开，进一步标志着日本已经进入准战时体制。

与此同时，日本在国际上建立了与德国法西斯势力的联盟。早在1933年退出国联后，日本就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境地。为摆脱外交上的被动，减缓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防止共产国际运动的扩大，从1935年5月起，日本军部的参谋本部就通过驻德使馆的武官大岛浩与纳粹德国外长级的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开始了关于日德结盟的秘密谈判。这种决定日本外交根本取向的重大谈判，开始时竟然越过了外务省，由参谋本部遥控驻外武官进行。这一方面再次暴露了军部对外交的干涉，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进一步强化。日德谈判直到进入到制定条约具体内容时才移交到外务省，走上正式外交谈判的轨道。1936年11月25日，日德双方共同签署了《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

协定的表面内容是防止共产国际的蔓延与扩散，但是在秘密条款中则明确了以苏联为共同指向的内容，即日德双方一旦有一方与苏联发生战争，另一方不得采取有利于苏联的行动。而且，非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得与苏联缔结政治性的条约。条约签订后，尽管日本外务省曾声明，该条约的缔结并不意味着形成“特殊的国际集团”。然而，日德协定的签订，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已经与德国法西斯结成了国际联盟，况且德国在此之前已经与意大利结成了“柏林—罗马轴心”。至此，日本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已完成了法西斯化而进入了准战时体制。

第六编

全面侵华

第 26 章

惊变卢沟桥

预谋取卢沟

日本帝国主义者怀着灭亡全中国、称霸亚洲及世界的野心，于 30 年代初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首先是一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建立殖民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继而又强占热河、觊觎察哈尔、绥远、河北及北平、天津；最后则孤注一掷，向平津和整个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妄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1937 年 7 月 7 日的“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它是有计划、有准备的预谋事件。

1937 年 3 月上旬，日本参谋本部为扩大侵华战争，特别把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大桥熊雄三人召回东京，听取他们对华北局势的判断。三人一致认为，“日中关系的恶化，不能设想用一般的手段即可调整”，“应在对苏开战前，首先予中国一击，用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在此种情况下，日本须有与苏中两面作战的精神准备”。

不少材料证明，在日军内部早有发动“七·七事变”的阴谋集团。当事者之一、当年日军第一联队（团）副官河野又四郎的遗稿虽然矛盾百出，但还是不得不承认：“日军暗暗想着，只要一有机会就给中国军队一击，埋头于奇袭攻击的准备……”

日本这个阴谋计划尽管策划于密室，保密甚严，但还是慢慢传了出来。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社社长松北治重凭着新闻记者的特殊敏感，闻到了火药味。1937 年 7 月 1 日，松北拜访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询问日军要在 7 月 7 日夜制造一起与“柳条湖事变”（“九·一八事变”）一样的事件的传闻的真伪，桥本群竭力把责任向日本浪人和商人身上推，但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我们日本方面多少有些问题，浪人们和一些企图蹚浑水捞一票的商人们惟恐天下不乱，现在天津是谣言飞舞，甚至有人说在 7 月 7 日就会出事”。

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也承认：

据事后所闻，似乎是由于当时在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当中，私下谈论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这个谣言，惊动了军政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才不约而同地秘密派了视察人员。

日本陆军省军务课政策班班长佐藤贤了在《大东亚战争回顾录》中说他也听到了这一消息，当时东京传播着“第二个柳条湖事件将会于七夕在华北出现。”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作战课长武藤章为此做准备，特别派出其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公平匡武、井本熊男等到华北做战地调查，尤其命其注意卢沟桥地区的局势变化，《大本营陆军部》记载冈本等人

视察卢沟桥时的情况如下：

当时中国官宪曾百般阻挠视察，以致视察时多次感到身临险境。特别是在卢沟桥上视察地形并听取宋哲元的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的说明时，几乎要被中国兵扣留。在卢沟桥附近，日中两军的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7年7月6日，近卫内阁讨论中国局势问题，外相广田弘毅发言说：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与过去无异，但不拟强行对华亲善。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指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对于广田的发言，全体阁僚表示同意。

因此，“七·七事变”虽不像“九·一八事变”那样，日本有制造“柳条湖事变”的具体而周密的阴谋计划，但日本从上至下有一个阴谋集团有计划、有预谋地策划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两摆“鸿门宴”

“七·七事变”前，华北日军特务机关摆了两次“鸿门宴”，中日两国军官进行激烈较量，刀光剑影，紧张异常。

当时，日寇已包围北平，随时准备大举向华北进犯。“七·七事变”时的旅长何基淬、邓哲熙、王式九、戈定远、吴镇棋在回忆录《七·七事变纪实》中，描述了当时剑拔弩张的形势：

在“七·七事变”发生以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军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队伍。仅有北平的西南面，尚为我第29军部队所防守。

当时，北宁铁路沿线既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我军据此，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若为敌人所占，北平则变成一座孤立的死城。所以，卢沟桥这一战略据点，就必然成为敌我必争之地。

日本侵略军的企图，是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四面包围北平，从而加深冀察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桥头堡，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为兵不血刃压中国军队交出卢沟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经精心策划，于1936年6

月6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摆下一次“新鸿门宴”。

日寇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向中国驻军的团以上军官全部发出请帖。为照顾大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率团以上军官于6月6日上午10时进入怀仁堂宴会厅。

宴会厅内杀气腾腾，松室孝良和华北特务机关顾问松岛、樱井带日军连以上军官严阵以待，一个个手扶腰间的日本武士刀，分散坐在六张宴席桌旁。中国军官一到，松室孝良就把中国军官拆开，分散坐在日本军官身旁，自己则和宋哲元、秦德纯和社会名流吴佩孚、张怀芝等坐在一桌。在主座席旁边，又设了两张空桌，做上菜之用。

“联欢会”开始后，先由宋哲元、松室孝良讲话，大意是说中国和日本是近邻又同文同种，应该友好亲善，然后一起照相。松室孝良在每个中国军官身旁安插一个日本军官，形成一对一监视状态。

接着宴会开始，日本军官大杯喝酒，中国军官毫不示弱举杯猛灌，双方比赛酒量，谁都不甘居于下风。

这时，华北特务机关顾问松岛大喝一声，跳到一张准备上菜用的空桌上，张牙舞爪先跳了一通日本舞，又气势汹汹飞舞日本武士刀。霎时间，宴会厅里只见刀光闪烁，不时伴有日本军官们的粗野嚎叫，对中国军官形成巨大压力。

中国军官目睹此情此景，一个个怒发冲冠，义愤填膺，都想与日本军官决一雌雄。只见副军长秦德纯附耳对旅长董升堂说：“事急矣，你是打拳呢，还是耍刀？”

董升堂早按捺不住了，马上表示：“先打拳，后耍刀！”董升堂当即离座，在席位中间打了一套八卦拳，中国军官齐声叫好。旅长李致远在酒席前也打了一套颇有根底的花拳。

一个日本军官取出“倭刀”狂舞，李致远也命令传令兵去取他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

董升堂见“倭刀”狂舞，便从传令兵手里接过大刀片，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在此时，李致远的传令兵坐小汽车从永增厂把刚打好的“柳叶刀”取到。董升堂换上传令兵的布鞋，抡起“柳叶刀”，劈了一趟他最拿手的“滚堂刀”，把日本法西斯军人一下镇住了。

松室孝良见比刀占不了上风，就向两个日本军官示意改换比赛项目。两个日本军官会意，跳上桌子唱起了谁也听不懂的日本歌，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

旅长何基涑不以为然，跳上桌子，亮开大嗓门唱起了充满民族正气的《黄族歌》：

黄族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且莫同种自相残，
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

何基涑一起头，中国军官们齐声相和。霎时间，怀仁堂宴会厅响起了中华民族正气歌，把日本法西斯军官们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

松室孝良又提出比赛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中国军官写一张。日本兵端出文房四宝，松室孝良提笔写了一个“飞”字，却也笔力矫健，出手不凡。这可气坏了吴佩孚。此公一生做了不少坏事，但至死大节不亏。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当众表演醉笔，挥笔写出一行大字，构成一张大条幅，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见写字占不了便宜，又对手下人使个眼色。只见十几个日本军官冲了上来，把宋哲元、秦德纯举了起来，又大声喊着号子，

把两位中国将军用劲抛到空中，再接住高抛，以此向中国军官施加压力。

董升堂、何基沣等中国军官不甘示弱，招呼了十几个中国军官也冲了上去，把松室孝良、松岛、旅团长河边正三等拽出来，如法炮制往空中抛。怀仁堂内形成对抛双方指挥官的奇特场面。

第37师师长、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头脑冷静，担心僵持下去要惹麻烦，忙令部下何基沣、董升堂等放手。松室孝良被吓出一身冷汗，从中国军官手中挣脱后，也命日军军官松手，一场惊心动魄的“角斗”才从高峰降落。

最后，宋哲元、松室孝良又言不由衷他讲了些中日应该亲善和睦的话，这场“鸿门宴”便草草收场。

日寇拉不动中国军官，又去拉中国文官。

1937年3月初，日本华北新任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亲自出马，又摆下一场“鸿门宴”。他下帖请宛平专署专员王冷斋和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等4人，到东交民巷台基厂二条日本特务机关部赴午宴。

王冷斋、洪大中明知松并不怀好意，但在强敌面前不甘示弱，如期前往。只见松井率日驻华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参谋桑岛、辅佐官寺平、秘书斋藤等，早在特务机关部大门庭院列队迎接。

松井把中国官员请入宴席，酒过三巡后便命秘书斋藤拿出强买丰台至卢沟桥间大井村6000亩土地的“协议文书”，把它递到王冷斋手中，又把纸笔送到席上，要王冷斋当场签字。松井阴沉着脸说：“为了日中友好，希望专员阁下给予赞助！”

王冷斋振振有辞反驳说：“松井大佐阁下设宴是为了中日友好，我们前来赴宴也是为了中日友好，我们希望宴席之间只能谈笑言欢，政事留待以后商议。如果硬要现在谈判大井村土地问题，我们那就只有退席，即使因此而失去自由，也在所不惜！”

王冷斋慷慨陈词，力驳强敌，他越说越激动，勃然挥拳击桌而起。中日在场官员怒目相向，一场暴风雨马上即将来临。

突然，松井哈哈大笑：“王专员，好样的，佩服，佩服。写条子，写条子的花姑娘的好！”

日本特务机关长一声令下，立刻有十几个日本艺妓和中国妓女蜂拥而入，一人一个缠住中国官员，日本艺妓唱起软绵绵的日本歌曲，尽力缓和紧张气氛。日本艺妓又殷勤劝酒，王冷斋等无法拒绝，只得接杯干掉；艺妓们还拉王冷斋等人跳舞，企图麻痹中国官员的警戒心。

正在此时，一个中国妓女尖声大叫，说她的钻石戒指掉了，松井命人翻转沙发，挪动桌椅四处乱找，把宴会厅搞得乱七八糟。

王冷斋看穿日本特务机关部有意制造这一幕活剧，作为对中国官员威胁利诱阴谋的遮羞布，便怀着鄙夷的神情，带领洪大中等人向松井太久郎告别。

日本特务机关见两场“鸿门宴”均以可耻失败告终，便更加紧在霸占丰台和购买大井村土地事件上施展阴谋。

肇事抢丰台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咽喉地带，为联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日本为发动“七·七事变”曾制造三次丰台事件。

第一次丰台事件发生在1936年6月26日。此前，日军根据强迫中国签

订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派包括四个步兵连、一个山炮连和一排骑兵在内的加强混成营，进占丰台车站的东端，扼住平汉、平津两条铁路，与中国军队第29军驻守丰台的部队相隔仅400米，两军对垒，气氛十分紧张。

为挑起争端，日军营长经常派日军士兵三五成群，身佩利刃，到丰台车站寻衅闹事。日军士兵故意与中国士兵摩肩撞臂，进而拳打脚踢，逼中国士兵气急还手，造成双方士兵殴斗事件。张华亭营长向日军营长提出抗议，要求他制止日军的挑衅行为。日军营长置之不理，反而指挥士兵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向中国军队驻地摆出冲锋态势，甚至派日军士兵进入中国军队的步哨百米线以内挑衅。

6月26日上午9时，中国第29军第37师一部赴丰台驻防。由于火车突然鸣笛，中国一匹军马受惊，跑入正在修建中的日军丰台营房。中国士兵前去追马，被一群日本士兵围住痛打一通。

次日，日军营长派一个朝鲜籍士兵来到中国兵营，通知张华亭营长说，日军的军马跑到中国兵营里了，应速送回，否则即以武力相对。日本士兵又惹是生非，硬说中国兵营的马厩是他们的，要求中国军队马上退出。遭到严词拒绝后，日本士兵拔出短刀，招来几个日本士兵向中国士兵挑衅，双方发生械斗。

张华亭营长向团长戴守义报告查无此事，请示对策。戴守义团长明确指示说：“丰台是我国神圣国土，车站是交通要点，保卫国土是中国军人的天职，维护交通亦责无旁贷。日军胆敢进犯，坚决回击，务必固守阵地，寸步不让！”

张华亭营长接到命令，即通知驻丰台的日军混成营营长，经调查并无日本军马跑到中国兵营之事，并指出这是日方故意编造借口，无事生非。

日本“中国驻屯军”怎肯善罢甘休，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无理要求第29军道歉、赔款、惩戒当事军官、从丰台撤兵。

迫于日本的压力，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军，只同意换防。这就是第一次丰台事件。

为把中国军队赶出丰台，日军于7月下旬又派一个大队强行进驻丰台。面对日寇增兵，团长戴守义奉命到丰台向张华亭营官兵重申任务：“保国卫民，是我们的天职。敌如来犯，我即反击！”

8月31日，日本浪人森川太郎擅自闯入中国丰台兵营，与中国士兵殴斗后受伤，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丰台，被严词拒绝。

9月18日下午6时，中国丰台驻军第5连连长孙香亭带队由野外演习地返回途中，与一小队日军迎面相遇。日军小队长岩井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之中，双方发生冲突。日军中队长下令包围中国军队，无理扣留前来交涉的孙香亭。

日本侵略者将此作为第二个“九·一八事变”的胜利，大肆庆祝。宋哲元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中孚和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去找日本代表土肥原贤二交涉。土肥原提出：中国军队撤出丰台，向日军赔礼道歉。

宋哲元接到陈中孚、陈觉生的报告，无可奈何他说：“你们再去见土肥原，无论问题是否能马上解决，他要首先把孙连长放回来，把全连军械交还我们。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否则就不必谈了。”

土肥原贤二狡诈异常，对宋哲元提出的条件满口答应，命令日军放回孙

连长并发还枪械，担保日军绝不派兵进驻丰台。一天后，孙香亭果然被释放回来，全连枪械如数发还。宋哲元当即下令孙香亭带全连移驻丰台东北的赵家庄。

谁知中国军队刚撤出丰台，日军就派一个大队进驻丰台的中国军队营房，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这就是日军制造的第二次丰台事件。

1936年10月，日军混成营突然向驻丰台附近的张华亭营发动进攻。日军先以猛烈炮火破坏中方工事，然后发动进攻。双方杀声震天，展开激烈战斗。

为缓和紧张局势，宋哲元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北平东城外交大楼，宴请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和驻丰台混成营长等人；中方有师长冯治安、团长戴守义等。

河边正三蛮横地对戴守义说：“丰台冲突事出误会，不过你们不应该开枪反击，”

戴守义反驳说：“我们驻丰台的部队守土有责，你们部队全面展开，步炮联合向我军猛攻，我军为了自卫和护站，予以还击是正义的！”

另一个日军旅团长虚情假义地说：“我们都是朋友，以后不要再起冲突了。”

中国军官堂堂正正驳斥说：“你们日本人来到中国，应该遵守国际公法，不应该到处驻兵，自由行动，无事生非。如果日军再来侵犯，我军必将猛烈还击，决不退让寸步！”

双方还要激烈争辩，宋哲元赶快起立让席就餐，然后又与日军旅团长进行会谈，最后答应日军要求，派冀北保安旅陈光然团的一个营到丰台接防，而把第37师张华亭营调回西苑，这便是第三次丰台事件。

日军占领丰台，加紧修筑工事，不断派日军士兵和日本浪人假装酒醉，抢夺百姓财产，调戏良家妇女，情节恶劣，令人难以容忍。

当时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在1939年回忆“七·七事变”时说，丰台是“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是平汉、天津、北平各地的铁路交叉点，占据该地是重要的”。当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也承认，侵华日军置兵丰台“最终成为这次（七·七）事变的直接原因”。

侵华特务巨魁、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早就企图在丰台至卢沟桥中间地区修建用于全面侵华战争的机场和兵营。日军强占丰台后，便加紧了行动。

为避免招致中国军民反对，土肥原召见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让他以北宁铁路局名义派出一个测量队，将丰台至卢沟桥之间的土地全部测量一遍，把6000多亩土地画出详细平面图，然后派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桑岛中佐到宛平交涉。

桑岛来到宛平专员公署会见宛平专员兼县长王冷斋，打开大井村地形图，气势汹汹要求中方按图交地，还提出马上圈地打桩。王冷斋当即拒绝说：“本人刚刚到任，前任县长对此没有任何案卷移交，因此需要向上级请示。其次，从图纸看，被圈面积较大，地面上的居民房屋、树木、河流、道路、桥梁等等，涉及问题非常之多，必须通盘研究，才能答复。”

桑岛横眉怒目说：“你们的上级是同意的，来你们这里只是办手续而已！”

王冷斋向桑岛要批文，桑岛拿不出来。王冷斋知道冀察政务委员会不敢得罪日本侵略者，才把球踢到了宛平专署。他打定主意，就让秘书婉言拒绝

说：“叫中国农民出卖祖宗坟地，肯定是办不到的。因为北方农村村外就是坟地，这事我们无权处理。”

其后，日本又派驻华大使馆辅佐官寺平、秘书斋藤等来宛平催促，王冷斋下定决心，决不在他手中出卖祖国一寸土地。

日本特务机关首脑见从正面交涉受阻，就买通当地汉奸地痞谷文富，让谷文富秘密串联，以欺骗手段夺取大井村农民土地。

宛平县政府第二科科长俞二先生警惕性很高，他发现几十户农民都把土地卖给同一个人，卖地的人又都是大井村人，便报告了王冷斋。王冷斋连夜派人到大井村调查，果然发现汉奸谷文富要把土地卖给日本特务机关部，便马上派人到天津把谷文富抓了回来。

审问谷文富时，谷文富仗恃有日本特务机关撑腰，搬出日本人向王冷斋施加压力，王冷斋由此掌握了谷文富盗卖土地的口供，毅然将其正法枪毙。

王冷斋又把陈觉生请来，让他告诉日本特务机关：谷文富盗卖土地，宛平专署已掌握到全部人证物证，需要时可以公布全案内容。

王冷斋还派人向大井村村民宣讲，要爱国爱民族，出卖祖宗庐墓是大逆不道的；与此同时，把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实行联保制，彼此监督，决不出卖祖国一寸土地。

日本特务机关见中国方面戒备森严，暂时不敢轻举妄动，修建飞机场的阴谋诡计宣告破产。

卢沟燃战火

中国绥远抗战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给日本的侵华政策以沉重打击。日本便决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侵华日军频繁在丰台进行军事演习，最初是每月一次，后来改为半个月一次，最后三五天就举行一次大演习。演习方式也由虚弹射击改为实弹射击，由白昼演习改为夜间演习，使华北形势日趋紧张。

在宛平日军演习的激烈枪声中，1937年6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朝鲜总督府、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满洲铁路局等有关方面巨头，在大连举行军事会议。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廉吉在会上声称，3个月即可解决中国问题。

7月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建议，从准备对苏作战考虑，必须立即给中国政府以打击。东条认为，日本“进攻中国的时机业已成熟”。

1937年7月7日下午7时30分，驻丰台的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清水节郎大尉指挥下，于卢沟桥附近的龙王庙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侵华日军的这次“演习”，故意选在中国军队营房附近进行，蓄意挑起战争。

当天晚上，卢沟桥一带晴空万里，万籁俱寂，只是没有月亮，能见度较差，便于日军浑水摸鱼，制造事端。

晚10时30分左右，日军演习场上突然响起连续的机枪声，这本是日军演习中担任假想敌任务的部队发射的，但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却诬称听

到从铁路桥附近堤坝方向和宛平城内方向发射的枪弹声。

当晚 11 时，日军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被中国守军严词拒绝。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向北平市长秦德纯提出交涉。

当晚 12 时，秦德纯给宛平专员王冷斋打电话说：“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向我方提出交涉，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日军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已经我方拒绝。究竟真相如何，迅即查明以便处理。”

王冷斋接到电话，就通知驻宛平营长金振中切实加强戒备，又命保安队加紧搜索，查明中国军队并无开枪之事，每人子弹一粒不缺，也未发现有日军失踪士兵的踪迹，便赶往北平向秦德纯市长汇报。秦德纯指示王冷斋与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部交涉。

王冷斋匆忙赶到日本特务机关部，见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本特务机关顾问樱井都在座。

王冷斋一进来，松井就以特务机关长身分来个下马威说：“刚才接到一木清直大队长电话，失踪士兵已经归队。至于失踪经过，究竟被什么人掠去，要等贵专员来才能知道。”

王冷斋义正词严指出：“贵军所说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我方在这里并无驻军，可知决不是我方所发，就是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不少一枚。你们的士兵失踪后，就硬指为中国人谋害，要地方官员负责任，所幸已经找到，真相就大白于天下，我们都可放心了。”

松井机关长故意挑衅说：“我们不晓得士兵失踪经过，当然要询问王专员。”

王冷斋严肃驳斥说：“你们的士兵失踪，又不是我扣留的，我怎么会知道？问你们的士兵不就清楚了！”

日本特务机关顾问樱井插嘴质问说：“我们的士兵在你的辖区内失踪，不是中国抗日分子绑架，还能是他自己藏起来不成？”

王冷斋冷笑一声说：“话也难说得很，或者效当年南京日领事藏本自行隐匿的故伎，企图做要挟的借口，也未可知！”双方争执不下，日方提出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决定各出 3 人组成联合调查组，中方为王冷斋、林耕宇、周永业，日方为顾问樱井、辅佐官寺平、秘书斋藤。

联合调查小组正要出发，日本特务机关部突然响起电话铃声，松井接电话后说：“刚才接到驻防城外的联队长牟田口电话，因为不知道失踪的日本士兵已经归队，驻丰台一大队约 500 余人并炮 6 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已向卢沟桥出发，事态甚为严重。联队长牟田口约王专员面谈，请王专员同林委员到联队部一谈。”

王冷斋也感到事机紧迫，马上和林耕宇赶到日军联队部，会见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牟田口沉着脸说：“现在事机紧迫，应即迅速处理。阁下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以免事态延误扩大。”

王冷斋一口拒绝说：“刚才在你们特务机关部商定的是先调查后处理，现在我所负的只是调查的使命，还谈不到处理。”牟田口廉也再三要求快速处理，被王冷斋坚决拒绝，日方只得同意先行调查。

中日联合调查小组 6 人当即分乘两辆车前往宛平。

牟田口送走中日联合调查组，即派遣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前往卢沟桥地区指挥挑衅，并将他的阴谋通知大队长一木清直。

一木清直接到通知，感到事关重大，又用电话向联队长牟田口请示说：“如果中国军队再一次向我军射击，对此我方是否也应该予以回击？应当怎样处理才好？”

牟田口明确指示说：“如果受到敌人的射击，就予以回击！”

牟田口担心一木清直不明白主动挑起军事冲突的阴谋，就故意把嘴移开话筒，嘀咕说：“受到敌人攻击怎么办？一个军人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

一木清直害怕由自己承担挑起战争的严重责任，又向他的顶头上司追问说：“那么，开枪射击也没有关系吗？”

牟田口狡猾地不直接回答部属的提问，而用另一方式确认道：“既然如此，由于事关重大，请把时间核对一下。”

一木清直抬眼看表说，“（8日）早晨4时23分。”

一木少佐接受完命令，就带领本部士兵到达沙岗村北小土山展开战斗队形，占领有利地势，将步兵炮对准龙王庙的中国第29军阵地，准备开火挑起战端。

当中日联合调查小组驱车来到宛平城东2华里的沙岗村北时，突然有一名日本军官跑到车前拦住去路。

王冷斋一看，只见公路右侧及铁路涵洞一带都被日军占领，日本士兵荷枪实弹，已做好战斗准备。

日本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请王冷斋下车，掏出一张地图对王冷斋说：“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来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中国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再商量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冷静地拒绝说：“我此来只负调查使命，在你们特务机关部对此点原已议定。适才牟田口联队长要求我负责处理，我已拒绝。你所提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

寺平气势汹汹说：“日军演习要穿城而过，中国军队驻在城内，将会发生冲突，你们非撤出不可！”

王冷斋反唇相讥道：“你们军队的演习已是常事，但是穿城而过尚未有过，阁下怎么忽然提出这种要求？”

寺平无中生有造谣说：“平日我军演习都可穿城而过，何以今日不能进城？”

王冷斋见日本人如此无耻，耐着性子解释说：“你接事的日子不久，或者尚未明了以前情形。我在这里从未允许你们演习部队穿城而过，你所谓先例在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寺平被抢白得面红耳赤，这时一个日本军官横眉怒目为寺平解围说：“我是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现在不是斗口的时候，请你下车看一看！”

森田彻把王冷斋、林耕字领到日军部署好的阵地上，指着黑洞洞的枪口进行武力威胁。王冷斋坚持按原议进行调查，双方争执了十几分钟。森田见威胁不成，只得放王冷斋等人进城调查。为给王冷斋和中国军队施加压力，日军蓄意扩大演习规模。8日凌晨5时，日军第3大队长一木清直向在丰台的牟田口廉也谎报军情称：“3时25分，在龙王庙方面听到3发枪声。根据这种情况，如果不攻击宛平城，以后的交涉就不能圆满进行，所以想果断进

行攻击。”

申田口是个急于扩大侵华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他认为一木的报告可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便声称形势“已到了不得已使用自卫权的地步”，下令一木“立即反击”。

7月8日早晨5时30分，一木清直下令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展开攻击，他率领该大队主力排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龙王庙和铁路桥的中国守军扑去。

这时，中国守军金振中营长早派他手下的排长申仲明带领全排勇士把守龙王庙。金振中虽不知道申仲明早在1935年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暗中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培养了一批抗日勇士，但却知道这是个铁血男儿，是个“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好排长，便把坚守龙王庙的重任交给他，并命令他协助另一排长李毅岑完成战斗任务：“严加防范，如日军来犯，坚决予以回击！”

申仲明站在桥头阻止一木清直率队前进。一木扬言要在中国军队阵地搜索“失踪士兵”，申仲明严词拒绝了侵华日军的无理要求。一木突然下令士兵开枪，子弹击中了申仲明。

申仲明排长的鲜血激怒了第29军的抗日勇士，他们在李毅岑排长指挥下向敌人猛烈射击，又抡起大刀冲入日军队伍中，消灭日军100多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两个排几乎全部牺牲在桥头阵地上，龙王庙和铁路桥东头阵地沦入敌手。

与此同时，另一部日军向宛平县城东门发起进攻，又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墙，炸毁了金振中营的指挥部。

卢沟桥抗战由此开始，这就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为掩盖挑起“七·七事变”的真相，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在其笔记中故作如下记述：

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这里指宛平县城）的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个静悄悄的黑夜。

晚上10时半左右……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和假想敌司令传达了演习中止和集合的命令……

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作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

原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在1947年举行的东京审判法庭上，明确说是日本的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派特务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8日，我由内蒙德化乘飞机到天津。晚间，在芙蓉馆辟室与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

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

“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喽？”他满脸通红地点头承认。

《日中战争史》的作者秦郁彦曾在日本投降后就此事向茂川做调查。茂川1953年10月19日复函回答称，1937年7月12—23日，茂川以特务机关长身分指使日本特务趁夜色在中日两军之间打冷枪、燃放鞭炮，为日军扩大侵略战争制造借口，茂川在日本投降后拍着胸脯承认，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1944年，牟田口廉也已由侵华日军联队长升任日本侵略缅甸的第15军司令官，佩带中将军衔。他毫不含糊地承认：

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

由此可见，日本军部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旅团长河边正三、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队氏一木清直、中队长清水节郎以及天津驻屯军参谋班一伙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并将事态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阴谋的参与者和策划者。

第29军将士旺盛的战斗精神和全国人民空前高涨的抗日热情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一部分高级将领，秦德纯毅然给所部官兵下达战斗命令：“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不准日本的一兵一卒进入，不能放弃一寸国土。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就是我军官兵最光荣最重要的基地。要与城池共存亡！”

第29军司令部也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在宛平城内的专署会客厅，王冷斋见日军公然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当即向樱井等日方人员严词责问，谴责日军首先开枪破坏大局，应负酿成事变的责任。

樱井强词夺理说，“我军开枪或出误会，应当努力于此事的调解，勿使扩大。”

中日双方相互射击一个小时，调查小组的激烈争论仍无结果。突然一个日本传令兵手拿一张名片进入宛平专员公署会客厅，说牟田口联队长、森田彻联队副，邀请王冷斋和团长吉星文出城谈判。

对此，王冷斋以守土有责不能擅离职守拒绝，双方商定由林耕宇和寺平忠雄出城，与日军现地指挥官森田彻当面商量就地停火问题，然后再进行谈判。

这时，宛平城门已经被中国守军用麻袋包阻塞，一时无法打开，林耕宇和寺平攀着粗绳从城墙上缒下去，去见日本现地指挥官。

王冷斋送走林耕宇和寺平，当即向北平高级机关报告日军首先向宛平驻军开枪情况，请向日方交涉制止事态发展。一个小时后，林耕宇来电话向王冷斋报告，他与森田彻谈判没有结果，他已回北平向领导机关汇报会谈经过。

日军见王冷斋不屈服，就向中国守军射击，又用迫击炮轰击宛平城。

为再施加压力，牟田口廉也7月8日下午5时向王冷斋发出最后通牒：（一）限于当日下午8时前，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撤退到永定

[日]儿岛襄，《太平洋战争》（下），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第119页。

河东岸，如果逾期，便用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居民撤至城外；（三）让在城内的日本特务机关顾问樱井等出城。

王冷斋看了冷笑连声，与营长金振中指挥中国部队奋勇还击。战至下午6时左右，金振中和保安大队副孙培武先后负伤，但仍奋力反击，坚守阵地。

枪炮声停止以后，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派人送信来，约王冷斋出城商谈，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城外，否则还要用日军的大炮轰击宛平城。

王冷斋答复河边正三称，“在开战中不便会晤，建议双方先行停火，一切由北平高级机关解决。如果日军不肯停止射击，我军不能坐以待毙，当予以强烈回击！”

当时驻守西宛的何基淬旅见日军进攻该旅吉星文团驻守的宛平城，便从长辛店以北、八宝山以南地区向日军展开反攻，猛扑回龙庙、刘庄两个据点，于7月8日晚9时攻下回龙庙和刘庄。

8日晚，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第38师师长张自忠，分别在北京、天津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交涉停火。

到7月9日凌晨2时，中日双方达成三项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三）宛平由中国保安队接防，人数限300人，定于9日上午9时左右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王冷斋和中国官兵以为停战协定既已成立，战事应该可以休止，岂料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早在前一天晚上9时20分就秘密下令：“旅团将兵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发动攻击。”

9日6时，河边正三背信弃义，下令向宛平城猛烈开炮轰击，发炮70余发。

王冷斋见侵华日军果然又违约发炮进攻，当即用电话向北平报告。

经中国方面严厉谴责，日军回答说：“这次炮击是为了掩护撤兵。”日军虽暂时停止炮击，却埋伏在北平至卢沟桥中间的大井村附近，在前来接防的中国保安队于9日7时50分经过大井村时，突然开枪阻止，打死中国保安队员1人，伤数人，使中国保安队受阻，不能前往宛平接防。

王冷斋当即派人去见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谴责日方背信弃义，但河边正三狡诈诡辩，交涉几小时也毫无结果。

9日12时30分，中方监视委员、冀察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周思靖到达现地，要求日军旅团长实现停战协定。

河边正三有意挑起战争，蛮横地节外生枝，提出三项要求：（一）宛平城内中国军队只留一个小队（排），其余全部撤退到永定河西岸；（二）保安队限定50名，只能携带步枪和30发子弹；（三）为了监视中国军队撤退，由日军旅团长到宛平城内巡视。

中方为避免扩大事态，又作出让步，除第三条外，基本上答应了日方的要求。河边正三这才同意中国保安队到宛平接防。

在中国方面一再催促下，日方监视撤兵委员、日本的北平特务机关顾问中岛才于7月9日下午3时到达宛平。

经中日双方会商，决定分两组监视撤兵：甲组为林耕宇和樱井，前往回龙庙、铁路桥一带；乙组为周思靖和中岛，负责大井村一带的撤兵监督事宜。

甲乙两组分途出发，到下午4时回来报告，两路日军已经撤退。

这时，中国保安队尚未进城，王冷斋请周恩靖和中岛前往大井村与河边正三旅团长接洽。两小时后，周恩靖和中岛带中国保安队员 50 人回到宛平城，交给王冷斋接收。王冷斋指出，在北平商定 300 名保安队员来宛平接防，现在只来 50 个，每人又只有 1 支步枪，与原议不合，不能接收。

半小时后，北平市长秦德纯从北平给王冷斋打电话称，已同驻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商妥，中国保安队可全部进城，但保安队所携带的机枪须送回北平。

9 日下午 7 时，中国保安队才陆续来到宛平，但不到 200 人，据说是由于每挺机枪须由 3 人押运回北平，故人数不足。

这时，河边正三派人来见王冷斋，要求允许他率徒手幕僚进入宛平城慰劳，被王冷斋婉言谢绝。

王冷斋带中国保安队指挥官贾朗义、王挥尘同第 29 军的吉星文团办完宛平防务交接手续，刚从城头下来，就见几个日本人直奔而来。上前一问，原来是河边正三要来慰劳被拒后不甘心，又派顾问笠井、秘书官广濑、翻译官爱泽 3 人，携带香槟酒到宛平慰劳王冷斋，感谢他处理卢沟桥事变的“功劳”。

王冷斋刚打发走 3 个日本“赏劳使者”，就接到报告，说城东北沙岗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退完毕，又有不少日军去而复返，不少于 300 人。

原来，这是河边正三有意挑起争端的预谋行动。他不但不从卢沟桥地区撤军，反而暗中将在通州的日军第 2 大队调到沙岗，企图利用中国军队撤出宛平之机会夺取宛平。

果然，10 日凌晨 3 时 40 分，河边正三命令在沙岗的日军再次攻击宛平，幸而中国保安队早有准备，以枪弹还击，又有尚在宛平的中岛被迫出面交涉，日军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王冷斋见事态紧急，忙用电话向北平市长秦德纯报告日军在沙岗隐藏及袭击宛平情况，请示处置办法。秦德纯命王冷斋与中岛一起赶赴北平，共商善后处理方策。

7 月 10 日上午 7 点，王冷斋偕中岛乘车前往北平，路过铁路涵洞处时，被如临大敌的日本士兵拦住，日军步哨数人对准王冷斋等人的车辆做射击姿势，经中岛出面称奉河边正三旅团长命令去北京开会，才得以通过。

王冷斋一到北平，就到北平市长秦德纯处参加中日联席会议，日方有顾问樱井、中岛、笠井和秘书斋藤与会。

秦德纯首先让王冷斋报告双方会谈经过。王冷斋义正词严指出，“中方已遵照条款撤出军队，但日军在铁路涵洞附近尚未撤尽，而且昨天夜间又向宛平城袭击。日军此等行为显系破坏停战协定，应即迅速撤退，方能保持和平，否则一切后果均当由日方负责！”

斋藤急忙以流利的中国话辩解说：“部分日军未从沙岗撤退，是另有任务，因为有阵亡日兵尸体骸数具尚未觅得，留下这些少数部队以便搜索。”

王冷斋厉声驳斥说：“搜索尸体不须留太多部队，而且也不必携带机关枪、迫击炮，如临大敌！”

斋藤巧言辩解说：“因恐受你方袭击，不得不多留部队以资警戒。”

王冷斋说：“如果真为搜索尸体，我方可以帮同办理。”

冀北保安队旅长程希贤认真地提出意见称：“假若贵方真是为了搜索阵亡士兵尸体，像现在这样的办法也是不行的，必须由中日双方组成徒手搜索

队，到各战地搜索，可以扩大搜索范围。”

斋藤用日语同中岛等人商量，日方表示赞成，于是决定搜索队由6名委员、40名队员组成，中日各出一半，还决定在卢沟桥到沙岗一带搜索，规定限制时间；无论结果如何，日方一定要在限定时间内撤退。

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顾问笠井是个诡计多端的“中国通”，他先对樱井、中岛使个眼色，然后对秦德纯说：“我们三人要到外间会客室打个电话，商量一件事。”

笠井说罢就和樱井、中岛离席而去，半个小时后仍未回来。秦德纯就让斋藤去催，岂知斋藤一去也未见回转。王冷斋出去一看，外间会议室里人影皆无，便回来报告：“日本人不辞而别，溜之乎也！”

冀察绥靖公署高级参谋急忙到门岗查问，才晓得笠井3人根本来到会客室，径直扬长而去；斋藤到会客室一看没人，顿时明白了笠井3人的用心，也匆忙不辞而别。

秦德纯、王冷斋等人从笠井等突然逃席的情况，判断出事态已十分严重。果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消息纷纷传来，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师）、矶谷廉介的第20师团、谷寿夫的第6师团及酒井隆旅团、河边正三旅团、独立第20师团等纷纷大举进关，10万日军由通县、古北口、榆关各处向平津地区开来。丰台地区集结了日军的大批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卢沟桥地区的大井村、五里店等重要据点被日军占领，日军卡断了北平至卢沟桥的公路。

这一切迹象显示，日本帝国主义根据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蓄意扩大了战火。而“七·七事变”就是把局部战争变为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和标志。

第 27 章

武力占华北

凶焰吞平津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欣喜欲狂，立即按照图谋已久的侵略中国计划，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军部主张借“卢沟桥事变”迅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代表人物是陆军大臣杉山元。

杉山元 1880 年生于日本福冈县，1904 年在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后来成为天皇党羽集团老资格成员，为参谋总长闲院宫的亲信。20 年代草创日本陆军航空兵，1931 年成为“九·一八事变”的积极推动者，1934 年擢升为参谋次长，1936 年任陆军教育总监，晋升陆军大将。1937 年 2 月任林銑十郎内阁陆军大臣，在近卫内阁中留任陆军大臣，是陆军内部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的首脑，因态度骄横和表情呆板而有“厕所门”的绰号。

杉山元是以现役陆军大将兼任内阁陆军大臣的，他一辞职内阁就要倒台。优柔寡断的花花公子首相近卫文麿、依靠军阀起家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人，处处以杉山元和军阀意志为外交方针，加之他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法西斯军官抱成一团，构成对华战争“扩大派”，就更加飞扬跋扈，为所欲为。

7 月 8 日早晨，杉山元刚刚起床，日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急急赶来，送上一份特急电报。

杉山元打开一看，原来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发来的急电：“驻丰台附近部队在夜间演习中，遭中国军队射击，当即展开敌对态势，并进行交涉要求道歉。如拒绝道歉，则以实力将敌由附近击退。”

杉山元看罢大喜，忙命人以最快速度印成“号外”，马上撒遍东京街头。不多时，别有用心的“号外”便几乎到了每个东京人手里：

昨日（7 月 7 日），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附近，宋哲元麾下的两个连炮击夜间演习的日本驻军。直到 8 日拂晓，事态突然变化，目前两军正在展开激战。

杉山元被请到东京市谷高地那座令人望而生畏的灰色军部大楼，参加军部紧急对策会议，“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展开激烈辩论。

杉山元急不可耐地说，目前苏联不会干涉日本的行动，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法东顾，美国忙于国内事务也不注意远东，因而“卢沟桥事件”是“千载一逢的良机”。而中国是东亚病夫，不堪一击，日本只要出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中国就会屈服。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激动得要跳起来，高声大嚷：“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的‘生存’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中国因为军备力量脆弱，政治无组织，决不能长期抵抗皇军！”

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人狂妄地宣称，只要“日本一宣布内地动员，大批列车一通过

山海关”，或者“尽最大限度，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

面对杉山元等“扩大派”的强烈主张，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站起来，颇有气势地开始发表意见，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

原来，这石原莞尔是日本军界的著名才子，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又是日本军界主张对苏作战的代表人物，他的“石原构想”赫赫有名。日本少壮派法西斯军人将石原莞尔视为“日本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对他策划的“九·一八事变”推崇备至，把他作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制定的《对苏战争指导计划大纲》奉若神明。

虽然石原莞尔听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喜极而泣，但他深感日本一旦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力难以支撑，后果不堪设想，因而站在战略高度，从掌握战略全局出发，振振有辞地反对陆军大臣杉山元等的主张，说：“帝国现在可以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中国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作战。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驻华部队一举撤退至山海关的满洲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

石原又说：“我主张，帝国陆军必须进行划时代的军备扩充……必须大力开发满洲，通过经济政策获得并利用中国的资源，兴建大工业。为了实现军备扩充，在目前这个时候暂不能进行对外战争！”

战争狂人武藤章嘲讽说：“阁下这纯属杞人忧天，太多虑了！”

石原莞尔不为所动，执著地阐述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如果目前使用武力即扩大战局，一旦导致日华战争，从中国近来的民族意识来看，事态是不易收拾的，而且还将会使日本向无边无际的原野做无限的进军。以日本现有的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的对华战争是有问题的。因此，此时应慎重从事，不可陷于武力纷争。”

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掘场一雄、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头脑还比较冷静，他们支持石原莞尔的主张，认为目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尚不成熟，提出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须具备如下5个条件：

1.同时动员15个师团；2.同时动用军需准备量的一半；3.作战地域为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面；4.作战时间约为半年；5.战费为50亿日元。

石原莞尔将手一挥，颇有气魄地总结自己的主张说：“今日的中国并非昔日的中国，今日的中国是统一的，能够举国一致发挥较强的力量。一旦与中国的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因而必须避免（全面）战争，迅速地、简单地收拾（卢沟桥）事件。”

武藤章横眉怒目反驳说：“这可真奇怪！您不是满洲事件的肇事者吗？我们只不过是效仿您的事业而已！”

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也盛气凌人地指责说：“石原君的看法是错误的。只要我们以少许兵力略施威胁，中国就会屈服，此时再予其一击，（定然能够马到成功）这是贯彻我们方针的最好的策略！”

陆军大臣杉山元以不容置疑的口气下结论说：“事已至此，决心干吧！应当制定攻占南京的计划！”

对此，石原莞尔断然反对。杉山元和石原莞尔争执到参谋总长闲院宫面前，闲院宫调和双方矛盾，确定了“不扩大方针”。闲院宫以参谋总长身分

于7月8日18时42分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发电指示：

临命第400号

指示

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杉山元对闲院宫的这项命令不以为然，于7月8日下午与武藤章、永津佐比重两个课长密商，就紧急派出以3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为骨干的兵力前往中国参战。取得了一致意见。

接着，杉山元又收到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日本朝鲜驻屯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两个大将的请战报告，连声夸奖这两个大将请战电报来得正是时候。

原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8日早晨一接到发生“七·七事变”的报告，就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植田在关东军作战会议上分析形势时，认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植田命令“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及空军部队一部做好立即出动准备”，随时准备听令开赴华北作战。

植田谦吉又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发表对华北局势的声明，表示对“卢沟桥事件”“保持极大关心和坚定决心，严重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植田还派关东军高级参谋田中隆吉和辻信到天津会见日本在天津部队“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要求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联合向日本当局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意见。辻信还专门来到卢沟桥会见牟田口廉也，煽动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干）吧！”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向侵略华北的日本军队煽动一番后，又向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发出要求扩大侵华战争的电报。

植田于7月8日晚8时10分就华北事件发表声明说：“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植田还不放心，又派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和富永恭次大佐、田中隆吉中佐乘飞机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陆军大臣杉山元陈述意见，促使日本中央当局早下决断。

杉山元刚接见完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又接到日本驻朝鲜军队司令官小矶国昭的电报。小矶声称，“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令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强调应该“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

杉山元得到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队司令官的支持，便在7月8日深夜下令，让京都市以西各师团将于7月10日退伍的步兵部队两年兵延期退伍，仅此一举，就使4万名经验丰富的老兵留在日本陆军里，他们几乎全部被派往中国战场作战。

杉山元为尽快扩大侵华战争，指示作战课拟定了充满欺骗之辞的时局处理方案：

力求事变限于平津地区并迅速确保该地区。这是以此谋求其安定的方针。为此，应根据事变不扩大方针行事。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应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必要之兵力，将与我敌对之中国军队逐出平津一带。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即使抗日战争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向华中、华南派兵为原则，但必要时可出兵青岛，

保护我侨民及权益。

7月9日清晨，陆军省开会讨论“华北时局处理方案”时，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提出“彻底”的解决问题意见说：“此时，为了彻底铲除祸根，是否以《梅津—何应钦协定》援用于第29军，或使中国军队撤退到离永定河20华里以外的地区？”

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也同意田中新一的意见，按照已设置冀察、冀东政权的同一想法，再设置邻接伪满洲国的缓冲地带。

杉山元带着这些意见出席7月9日上午8时50分开始的临时重要阁僚会议，他提出强硬意见，要求正式派兵：“要继续交涉，但目前中国军队的真意不明，而且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29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3个师团派遣到现地。”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疑问说：“假若因为日本增兵引起支那全面抵抗，又怎么办？”

杉山元嗤之以鼻说：“支那人向来一盘散沙，南京国民政府势力只能达到沿岸几省，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皆不服中央政府指挥。这批地方政府长官，只求保护自己的地盘，只会口头上空喊，真的打起来，他们才不干呢！”

内务大臣马场玻一抖着花白胡子质问：“既然如此，宋哲元何以不肯与我们合作，偏要向皇军挑衅呢？”

杉山元一下子被问住了，随即以无赖手段胡说：“不是宋哲元不同我们合作，而是我们不要他！”

马场玻一连连摇头追问：“如果支那人全面起来抵抗，又会怎么样？”

杉山元大言不惭吹牛道：“支那人真的敢打，最多3个月就全部解决了！”

大部分阁僚都认为杉山元说话水分太大，现在就从国内派兵的时机还不到。恰在此时，得到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和秦德纯达成协议的消息，杉山元的派兵方案就被暂时搁置起来了。

杉山元并不死心，又在紧接着于11时举行的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上大肆活动，使会议通过了所谓“不扩大方针”，提出“日本政府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道歉以及对今后做出保证”。

于是，日军参谋次长今井清根据内阁会议精神，7月9日夜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华北驻屯军：

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

昭和12年（1937年）7月9日

次长致天津军参谋长为解决卢沟桥事件，此时应避免触及政治问题，大致提出以下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并付诸实施。

- 一、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之驻扎。
- 二、对将来做出必要之保证。
- 三、处罚直接责任者。
- 四、道歉。

对以上四项条件，陆军大臣杉山元认为很不明确，指示武藤章出面活动，

在7月10日由参谋本部第三课和第二部采取歪曲事实、造谣污蔑方式，对华北局势作出如下判断：

中国平津当局及南京政府均在提高国民抗日意志，并进行对日作战准备。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和平解决之努力，由于中国方面轻率挑战之态度，事态大有逐渐恶化之虞。

大规模出兵，原非帝国之所好，但由于中国驻屯军之自卫行动，处于优势之中国军队重围中，恐将陷于不能救援之危险。此外，日侨生命财产也濒临险境。为迅速予以救援，并一扫事态之根源，应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以现有中国驻屯军和前述由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应急派出的兵力似已充分，但估计第29军的总兵力有4个步兵师、3个独立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计75000名。此外，预料将有中央军陆续沿平汉线北上，因此，准备另由国内出动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

以上的判断认为，只要有上述兵力，则不仅平津，即对内蒙、察哈尔的处理亦可用。这是根据武藤课长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要使平津、内蒙成为缓冲地带的企图考虑的。

根据日本外务省指示，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走访中国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声称此次事变的一切责任在于中国方面，并保留提出赔偿一切损失及其他要求的权利，当即受到王宠惠的驳斥。

与此同时，日寇华北驻屯军亦在7月10日向第29军提出4项无理要求：“（一）第29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给肇事者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

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近卫文麿召开有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讨论向华北增兵问题，陆军大臣杉山元以强硬的态度发表意见说：“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即5个师团，目前暂用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完全同意杉山元的意见，声称海军要做全面战争准备，提醒近卫首相“必须考虑到派兵等于全面战争”。

在杉山元、米内光政强硬态度的感染下，五相会议通过了向华北派兵方案，因为“派兵是为达到目的而显示威力”。五相会议还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卢沟桥事变”改称为“华北事变”，把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

在7月11日下午3时20分开始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上，很快通过了五相会议的决定，“议定举国一致处理华北事件”。接着，首相近卫文麿、参谋总长载仁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军令部长先后晋见裕仁天皇，天皇一一批准了他们的奏请，从而标志着“卢沟桥事变”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

7月11日18时24分，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是近卫内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宣言，它以歪曲事件真相的卑鄙手法宣称：

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情，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

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此前，即7月11日16时30分，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以“临参命第56号”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下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飞行集团6个中队、高射炮兵2个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等部队开赴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21时40分，参谋总长闲院宫又发出“临参命第57号”，命驻朝鲜的日军第20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

当天夜里，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向各方面发出了必要的准备命令”。日本军部发布命令，钦命日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赶赴华北，接替病危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

这样，日本陆海空各军兵种都紧急动员起来，转入战时轨道。

7月11日下午，日本军部首脑召见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和专门到东京领受指示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宣布任命香月清司代替重病在床的田代皖一郎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命专田盛寿向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传达东京内阁会议的决定：“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没有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接到专田盛寿传达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明白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刻已经到来，当即召开参谋会议迅速贯彻执行，决定“以此次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桥本群连夜制定了将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华北事件的具体措施：“1.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2.彻底实行《何梅协定》；3.在此期间，逐步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给以彻底打击和扫荡。”

桥本群拟定扩大侵华战争的三条具体措施后，又向陆军中央部提出要求说：“我军为使今后的行动较为容易，应改变态势，示以坚强的决心促进谈判，其结果不得不发动武力。”

桥本群又与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密谋行动方案。

松井太久郎是个具有双重身分的阴谋家，他曾在海参崴和西伯利亚进行秘密活动，后任关东军参谋，1937年2月出任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又是冀察当局顾问，来往于北平、天津，通州间进行阴谋活动。

他认为现在马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有些太匆忙，关东军和从朝鲜调来的军队尚在路上，应该以谈判拖延时间，等援军到达后再开始行动。桥本群对此表示赞同，就让松井太久郎出面与北平市长秦德纯进行谈判。

于是，松井主动与秦德纯谈判停止现地冲突问题，利用宋哲元、秦德纯急于求和、息事宁人的弱点，在7月11日晚8时与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简称《秦一松协定》：

(一)第29军声明向日军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不再惹起类似事件；(二)中国军队和丰台驻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的中国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三)鉴于本次事件孕育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

为掩盖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真实意图，松井太久郎花言巧语向秦德纯灌迷魂汤说：“本机关长与贵市长签订的协定，条件相当宽大，对中国军队的道歉方式也不加以确定，亦没有指定特定的责任人，而由宋哲元将军自行决定。为表示日方的诚意，日本军队将主动撤出卢沟桥。”

宋哲元、秦德纯果然信以为真，上当受骗，为表示诚意，竟把开战几天来抓到的日军俘虏送回丰台，交给日军。

香月清司见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计划顺利进行，便在7月12日乘飞机经朝鲜飞抵天津上任。此人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又经陆军大学深造，曾任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他在日本以研究“步兵战术”小有名气，又在1928年献计制造“济南惨案”有功，被提拔为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后被杉山元和日本陆军首脑选中，作为扩大侵华战争的理想人物被派往天津，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一接受任命就公然叫嚷，“要对伤害大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发起惩罚性讨伐”，“要严惩暴虐的中国人！”

香月清司一上任就马不停蹄地召集司令部作战会议，大讲“参谋本部预料的对华一战的形势正在出现”，说他在陆军中央部门接受任务时就“感到那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内地数个师团的及时动员、山东作战的意图等，完全是全面对华作战的开端”！

香月清司杀气腾腾下达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随着从国内、从朝鲜、从东北增援兵团的到来，华北驻屯军必须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

旅团长河边正三接到华北驻屯军新任司令的命令，为久已盼望的全面侵华时刻的到来兴奋狂叫：“过去的交涉当已失去作用，现在要转移到纯作战行动方面了，今晚就袭击卢沟桥！”

在香月清司催促下，满载着侵华日军官兵、坦克、汽车、弹药的10列火车由山海关陆续西开，800名日军荷枪实弹由通县向北平运动。

香月清司急于扩大战争，陆军大臣杉山元更急，在7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声嘶力竭地鼓吹说：“当前，中国方面在现地执行协定的情况不见进展，依然在进行非法射击，据传中央军也在北上，南京政府的诚意可疑。此外，在现地，宋哲元是否确有和平解决诚意也属疑问，即使宋哲元有诚意，但第29军团长以下中坚军官的抗日情绪日趋强烈，局势完全不容乐观。”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不甘落后，他早已考虑到发动全面战争的细节问题：“保护上海和青岛的日侨都成问题。到那时，希望不撤退侨民，而采取现地保护的方针，妥善处理。海军方面也认为有必要征召预备役，海军机场预定设在旅顺的周水子。”

为执行杉山元、米内光政等中央军部首脑扩大侵华战争的指示，香月清司上任的第二天就写出了《7月13日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报告，作出野心勃勃的扩大战争部署：

一、中国驻屯军连同第一次增加之兵力，应尽快完成必要时在战略上一举消灭第29军之基本配置，并做到随时可以开始作战行动。以上态势预定于7月20日前后完成。

二、在上述准备期间，严密监视中国军队是否破坏协定进入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地区，万一发现不履行协定之情事，即认定第37师为无诚意，要求该部立即向河北省南部地区撤退，如被拒绝，则行使武力，以贯彻要求。在此情况下，第29军其他部队如

与第 37 师采取共同行动时，即使之一并撤退。

香月清司就这样杀气腾腾提出了侵华日军华北作战的设想：先进攻平津，再占领保定，然后向石家庄、德州推进。

香月清司后来承认，这样一来，“其结果要变成全面的战争”。

当天下午，杉山元根据香月清司的扩大战争计划，为把在中国军队包围中面临全军覆没危险的河边旅团“从被歼灭的悲运中救出来”，指使陆军中央军部制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玩弄“不扩大事态”的缓兵之计。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对日本的险恶用心洞若观火，在 7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现阶段，在内阁、军部、外务省、新闻和工商业者之间，对于无论如何也必须制止日本在华北地位的继续衰落，似乎已经有了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但是，中国当时在华北的最高长官宋哲元却误中日本侵略者的缓兵之计，竟下令从 7 月 14 日起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在日军准备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俘的日本官兵，严格禁止与日军发生摩擦。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见状大喜，为获取在卢沟桥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马上派参谋专田盛寿去见宋哲元，气势汹汹地提出 7 项无理要求，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

（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的中央系统各机关；（四）从冀察撤去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和学生与民众的抗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和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市由保安队担任警备，中国军队撤出城外。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战热潮推动下，他在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就通电与侵华日军作战，1933 年率领所部官兵在长城抗击日军的进攻，“卢沟桥事变”中又率部奋起抗战，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和拥护。著名的《大刀进行曲》原来就是唱给宋哲元和第 29 军的：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到来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在蒋介石“固守宛平，就地抵抗”消极作战方针指导下，宋哲元觉得日军提出的 7 项要求苛刻得令中国人难以接受，但又慑于日寇大军压境，在犹

豫、矛盾心理状态下竟表示原则上无异议，只希望延缓执行。

在日寇一再催促下，宋哲元只得派第 38 师师长张自忠、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齐燮元、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与日本方面继续谈判。

齐燮元、陈觉生都是汉奸，明目张胆为日本侵略军说话，张自忠据理力争，日方态度强硬，最后双方达成如下妥协：立即实行撤兵；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抵抗的中国营长；张自忠的第 38 师担负北平城防任务。日军谈判代表提出要宋哲元出面道歉，张自忠尽量讨价还价，改为由秦德纯代表道歉。

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个缓兵之计加紧向华北运兵。7 月 15 日，日本陆军省根据第 58、59 号临参令下达了组成临时航空集团向华北派遣的命令，动员各机种共 18 个中队，派到山海关、锦州、大连地区。

同一天，香月清司命华北驻屯军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决定以第 29 军中抗日意识最强烈的冯治安的第 37 师为主要作战目标，分两期扩大战争：第一期，“在作战行动开始时迅速以武力讨伐当地驻防的第 29 军，首先扫荡北平郊外之敌，将其赶到永定河以南”；“第二期作战，根据情况，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以增加的兵力进入石家庄、德州一线，准备与中央军决战”。

7 月 16 日，奉命增援华北的关东军独立混成第 1 旅团，在旅团长酒井镐次少将率领下，经古北口抵达密云。

日本陆军中央大部分人估计，到 7 月 19 日，侵华日军可以完成作战部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在 7 月 16 日制定了《就地限期谈判作战方案》：

一、规定 7 月 19 日为履行期限，最低限度提出以下要求：

(1) 要宋哲元正式道歉；(2) 处罚责任者，包括罢免冯治安；(3) 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4) 在 7 月 11 日提出解决的条件上，改为宋哲元签字。

二、中国方面在上述期限内对日方要求事项不予履行时，我军即停止现地交涉，讨伐第 29 军。为此，下令动员在规定期限满了时需要的国内部队，并立即派往华北。

杉山元对香月清司上报的《就地限期谈判作战方案》非常满意，7 月 17 日主持军部会议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确定首先动手“击破第 29 军，以解决华北问题”，然后打击中央军，“摧毁中国的中央政权”，通过“全面的战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日中间的问题”。

在其后举行的五相会议上，杉山元声称形势紧迫，催促通过了现地谈判限期的决定，同时决定动员 40 万军队，迅速派往华北。

会后，日本当局命日本驻华使馆参事官日高和日本驻华武官今井分别向中国政府提出通告，实际上发出了最后通牒。

增援部队到达华北后，日本侵略军决定分三路入侵华北：第一路由关东军派铃木、酒井两混成旅团，经热河向北平北侧地区前进；第二路由朝鲜驻屯军派遣川岸之第 20 师团入关，向北平南侧地区前进；第三路以平津驻屯军河边旅团为基干，从北平东侧地区，对北平包围攻击。又命板垣征四郎率第 5 师团，加速经朝鲜入关，会同尸本海军围攻天津，还在天津附近集结 200 架飞机，随时准备参战。

日寇在华北集结 5 个师团、10 万大军之后，便在 7 月 20 日，从通县、丰台等地相继发起挑衅和进攻。日军先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

再派步兵依仗炮火和坦克、铁甲战车，向宛平城猛冲。一发发炮弹射向宛平城楼，一队队日寇蜂拥而上。团长吉星文率领该团士兵奋勇反击。吉星文身先士卒，头部三处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这时，华北日军尚未最后完成集结，又玩弄缓兵之计，诱中方与其进行停战谈判，宋哲元和冀察当局也向日方让步，基本上满足了日军的要求，使日本扩大侵略战争失去了借口。

杉山元不管这一套，7月21日晋见裕仁天皇，要求从日本国内向华北派遣3个师团。裕仁天皇担心师出无名招致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地位，忧心忡忡问道：“现在（华北）事件已经解决，如果对方一切都实行的话，怎么办呢？”

杉山元理屈词穷，只好回答：“如果是那种情况，派兵就没有必要了。”在此情况下，日本内阁通过了暂停动员的命令。

杉山元对日本内阁暂停动员的决定十分不满，暗中与华北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联系，让极端好战的华北派遣军参谋和知鹰二从天津赶回东京，向杉山元和军部首脑反映前线将士狂热的“求战呼声”：“中国驻屯军自军司令至士兵，正为贯彻不扩大方针极力忍耐着。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民中，充满着第29军胜利了的气氛。所以，我第一线的官兵吵嚷说司令部软弱，杀气腾腾。南京中央军已经进入河北省，破坏了《何梅协定》。因此，不要再死抱着不扩大方针，现在已到了必须转换局面的时期！”

杉山元见和知鹰二说出了中央军部首脑的心里话，便马上表示支持说：“虽然要避免惹起全面战争那样的大事件，但根据事实与情况，毅然给以反击，也是必要的吧？”

杉山元和日本军部首脑召唤主张扩大侵华战争的知鹰二回国，就是为了对付东京和华北两地扩大侵略战争的反对者，杉山元借此向和知鹰二授意，“所谓不扩大，就是避免全面战争”，因为在杉山元和日本军部战争狂人口中，华北战争仍是“局部战争”！

果然，在杉山元授意下，和知鹰二回天津不久，就使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在平津地区制造了廊坊和广安门事件。

廊坊是北平和天津之间的重要战略据点，从天津攻北平，必占廊坊。这里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1900年6月八国联军由天津进犯北京时，义和团在清军董福祥部配合下，在这里向外国侵略者发动进攻，八国联军败退天津。

1937年7月25日，满天阴云，天气闷热，从朝鲜派到华北作战的日军第20师团的一个中队，乘火车突然由天津开到廊坊，借口修理天津至北平的电话线，下午4时30分在廊坊车站下车，公然驱逐车站闲杂人员，布置警戒，禁止站外行人进站。

驻守廊坊的第29军113旅旅长刘振三即派226团副官吴明海前去交涉，日军中队长伸手打了吴明海两个耳光，要求中国军队撤出营房，将吴明海逐出车站。刘振三急忙向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李文田请示处置办法，得到绰号“李大麻子”（李文田）的回答却是：“要忍耐，不要扩大事态，这里马上就派员偕同日方人员乘车到廊坊去。”中国军队眼睁睁看着廊坊车站被日军强占。

中国驻军再三交涉，日军拒不退出廊坊，双方发生冲突。香月清司7月26日下令日军进攻廊坊。日军在几十架飞机掩护下猛烈进攻，营房被敌人炸成废墟。中国守备部队奋起还击，后来奉命撤退。日军抢占了廊坊，又向平津地区移动。这就是廊坊事件。

7月26日下午2时，日军华北驻屯军第2联队第2大队长广部带领日军500余人，从天津经廊坊到达丰台，又换乘26辆大卡车开往北平，下午7时抵达广安门，谎称是日本总领事馆车队野外演习归来，横冲直撞要进北平城，被中国守军关闭城门所拒，日军竟摆出攻城架势。

宋哲元忍无可忍，指示中国守军备战迎敌。中国守军为诱敌深入慢慢打开城门，日军蛮横地一拥而入。中国军队上前阻拦，日军轻狂动武，中国守军凭借有利地形猛烈开火射击，歼灭大量敌人。这就是广安门事件。

香月清司利用日军制造的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叫嚷扩大战争的时机已经到来，7月26日晚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定37师于48小时内撤出北平，否则就要进攻北平城。

不等中国方面正式答复，7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便经裕仁天皇批准，下令向中国第29军发动攻击，并下令从日本国内增派3个师团到华北参战。

于是，日军从7月27日3时开始向通县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骑兵也在日本飞机掩护下进攻团河。中国军队奋起应战，但日军炮火猛烈，中国守军节节失利，损失惨重。到当日中午，通县、团河均陷敌手。

7月28日上午8时，香月清司指挥华北日军在航空兵团配合下，分别向驻守北平的北苑、西苑、南苑的中国第29军发动猛烈进攻。

南苑是北平的门户，为通往北平的咽喉要道。日寇企图先控制南苑，借此控制北平南郊，再长驱直入永定门，占领北平，为此制定了“从正面摧垮，一举攻占南苑”的战术，从7月28日开始进攻南苑。

宋哲元派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指挥官，严阵以待。香月清司知道中国指挥官是当年夜袭喜峰口的赵登禹，不敢贸然直接进攻，先派飞机狂轰滥炸，再用炮兵轰击，然后指挥步兵从东面、南面同时向南苑阵地发起进攻，另派一部日军切断南苑至北平的公路交通。霎时间，南苑阵地上硝烟升腾，大火熊熊燃烧，日军步兵趁机攻了上来。赵登禹对日军作战规律了如指掌，指挥部队从战壕中跃出，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敌我相持不下。赵登禹亲自率领一个团的生力军投入战斗，杀退日军，不料大批日寇冲来，赵登禹率部奋战，光荣牺牲。副军长佟麟阁英勇冲杀，光荣殉国。中国守军腹背受敌，奋战突围而出，南苑沦入敌手。

日军攻占南苑后，又分兵进攻长辛店，另一部日寇直扑广安门，展开要攻北平城的态势。

香月清司指挥日军占领了南苑、北苑、西苑、沙河、清河，控制了北平周围要地，便在7月28日下午1时命令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来哲元转达敦促书，声称“为使北平城内免遭战祸，敦劝立即将全部部队撤离北平城”。

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宋哲元当晚派人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告诉松井太久郎，愿意接受日方的“敦劝”，然后偕秦德纯、冯治安，率38师4个团由西直门出城，经三家店奔长辛店，撤往保定。日军7月29日兵不血刃由正阳门开入北平城，中国700年的古都正式陷落。

日军刚占领北平，就接到通州冀东保安队反政的消息。

原来，通州是日军进攻北平的重要据点。在通州建立了以殷汝耕、池宗墨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下辖5个保安总队，装备精良。日本人把通州视为伪冀东政权的大本营，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七·七事变”后，不少日本人到通州避难。岂知保安队的第一、二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7月

28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起义，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击毙日军驻通州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消灭驻通州日军、宪兵、特警等700余人，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与此同时，日军向天津也发起攻击，驻守天津的38师副师长李文田率领该师114旅和市保安队奋勇还击，顺利夺回天津车站，炮击日军司令部，包围天津日军机场，给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向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发出的求救电承认：“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极为危惧的状态。”

香月清司大惊，7月29日责令日军第20师团高木支队迅速增援天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也命原计划向承德进发的堤支队转赴天津。7月30日，大批日军在大沽登陆，分三路包围天津，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中国军队奉令撤退，日军遂于当天占领天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个战役——平津战役遂告结束。

铁蹄踏华北

日本侵略军一举攻占平、津两大都市，华北大门洞开，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恶性膨胀，立即着手武力夺取华北的华北会战。

为此，日本加速建立战争体制。在1937年7月25日至8月7日召开的第71次临时议会上，通过了日本军部提出的33个提案，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开始由准战时体制向战时体制的过渡，很快编成“华北方面军”，由寺内寿一任司令官，其第1军司令官为香月清司，辖第6、第14、第20师团；第2军司令官为西尾寿造，辖第10、第16、第108师团；华北方面军直辖第5、第109师团和中国驻屯军混成旅团、临时航空兵团及其他部队，还成立了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为指挥官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开始大规模向华北进犯。

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后，察哈尔位置变得突出起来。8月9日，日军参谋部为解除中国军队对日军举行保定地区决战的侧后威胁并保障“满洲国的安全”，决定进行察哈尔作战，由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联合实施。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命其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出兵。东条英机1937年8月14日在张北设立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8月17日在多伦开设前方指挥所，将三个旅团的兵力集中在张北地区。

东条英机早就鼓吹进犯华北，接到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命令后，立即率领铃木和本间两个摩托化混成旅团及酒井机械化旅团，带着以汽车牵引的一联队榴弹炮，气势汹汹地由热河驰援张北。一到战场，东条英机就指挥两个步兵联队和数十辆战车，在飞机掩护下，向第29军所属刘汝明师发动进攻。中国官兵奋勇抵抗，但国民党部队动作迟缓、行动不力，未能早取张北，被东条英机攻下张家口，导致南口、怀来腹背受敌。

南口是长城居庸关东南狭谷山口的一个小镇，位于北平西北40余公里处，平绥铁路由此入山，南口和居庸关成为北平西北屏障，“居庸天险列峰连，万里金汤固九边”，明代燕王朱棣曾说：“居庸关路窄而险，北平之咽喉也，百人守之，万夫莫窥，必据此乃无北顾之忧。”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懂得一些汉学，知道南口的军事价值，命坂井德太郎少将率混成第11旅团沿平绥铁路攻击南口，另派坂田支队向南

口西侧地区长城一线助攻。

日军进攻南口的战斗从8月11日起全线展开。混成第11旅团在飞机、大炮、坦克支援下展开猛烈攻击，中国守军奋勇抵抗，但抵挡不住日军机械化部队，南口8月12日被日军攻占，其后日军受到中国部队顽强抵抗，无法前进。坂田支队也受到沉重打击，在长城脚下止步不前。中日双方都伤亡严重。

为打开局面，香月清司命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投入战斗。板垣指挥日军展开攻击，使傅作义的第13军防御阵线处于严重危急状态，蒋介石急命卫立煌率部增援南口。对此，日军把第6师团之第36旅团编成牛岛支队，进入门头沟以西山地堵击中国军队，又命第20师团进入良乡西北山岳地带发起攻击。卫立煌指挥部队奋勇还击，将牛岛支队一部在大村击溃。

8月25日，日军猛攻横岭城和居庸关，双方展开激战。中国军队退守怀来，处于日军包围态势之下，汤恩伯只得下令部队突围，幸有傅作义率1个师又3个旅驰援南口，才使南口局势稍有好转；但东条英机急攻张家口的消息传来，傅作义只得分兵回援张家口，削弱了南口的防御力量，导致南口失陷，使板垣师团先后攻克南口、延庆、怀来等地。

由日军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共同进行的察哈尔作战是华北会战的前哨战，此役攻克南口、张家口等战略重镇，使日军在华北取得了有利的形势。

在此情况下，日军参谋本部指示刚成立不久的华北方面军，“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之敌，以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的机会”。寺内寿一据此组织司令部参谋制定了华北会战计划，规定第1、2军分别实施平汉线作战和津浦线作战。

香月清司指挥第1军主力第14师团从平津地区出发，分三路向保定一带发起攻击，当地守军为国民党第2战区第3集团军，其总司令刘峙临阵畏敌，未率领部队认真抵抗就仓皇南逃，使日军长驱直入攻占河北重镇保定。刘峙事后被免职惩处。

土肥原贤二率领日军第14师团等一举攻克保定，又沿平汉路南下，以机械化兵团对商震第32军的一个师和鲍刚独立旅，日军横冲直撞，先后攻克正定、石家庄。

在津浦线上，西尾寿造指挥第2军所属第16、第109师团从献县出发，接连攻下武强、深县，衡水、束鹿，转攻德州，中国第1集团军在宋哲元指挥下英勇抗击入侵之敌，第485团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日军10月5日攻陷德州。

以石家庄、德州失陷为标志，日军制定的河北省中部作战计划基本完成，击溃了在河北省中部的中国军队主力，抢占了河北大片国土。

为扩大战果，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命川岸文三郎率第20师团夺取井陘，沿正大线向太原推进；命土肥原贤二率第14师团从石家庄南下，攻打元氏、顺德、邯郸、丰乐，准备进攻河南省；命谷寿夫率第6师团从赵县出发，占领内邱一带；命从第2军转属的下元熊弥旅团进攻柏乡、任县、肥乡、邯郸；命矶谷廉介率第10师团从山东平原县向前推进，夺取山东省。到1937年10月，华北方面军基本上完成河北省中部作战任务。

接着，侵华日军发起规模巨大的太原会战。1937年10月初，日本军部正式向华北方面军下达了攻取太原的命令，日军参战兵力14万人，北路指挥官为板垣征四郎，指挥第5师团，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同蒲路，越过

内长城，直取太原。东路指挥官为川岸文三郎，率领第 20 师团主力，由石家庄沿正大线策应第 5 师团，共动用坦克 150 辆、飞机 300 架、各型火炮 350 门。日军企图两路夹攻，征服山西。

日军要打太原，必先攻占大同。日军攻下南口后，酒井旅团即沿平绥线进攻大同。

大同又称平城、云州、两京和风凤城，雄据于雁北大同盆地的西北部，北扼阴山，南控太行和太原，东连上谷，西临黄河，扼晋、冀，蒙交通要冲，堪称北方重镇。那时，贺龙遵照毛泽东关于开赴管涔山脉、展开于大同和太原翼侧、向绥远和大同发展的指示，已率八路军第 120 师于 1937 年 9 月下旬进入晋西北地区。

国民党第 2 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了解日军进攻大同的险恶居心，也集结重兵准备与日军一战，但 61 军军长李服膺接到进援南口的命令后迟迟不前，又擅自放弃天镇，使大同形势更为危急。

板垣征四郎狡诈异常，集中兵力先后攻克阳高、聚乐堡，迫使阎锡山放弃大同。日军继续向晋中进攻，蒋介石急派卫立煌率领三个师星夜赶往晋北布防。

阎锡山和卫立煌召集驻山西部队指挥官会议，众人一致认为战局逆转于 61 军放弃天镇。为提高士气，杀一儆百，阎锡山亲自决定枪毙李服膺，这才稳住阵脚。

兵败平型关

1937 年 9 月 4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根据日本军部侵华计划，决定了该方面军的新作战部署：

方面军的目的在于以主力消灭保定、沧县的敌人，迅速进入易县、定县、霸县、马厂附近准备攻击，同时以第 5 师团迅速进入蔚县附近，准备对保定平原的作战。

9 月 14 日，板垣征四郎指挥第 5 师团主力，不惜战斗减员，不顾军需补充困难，迅速攻下蔚县，进犯保定，另以一部兵力进攻山西北部，迫近内长城线。

这时，阎锡山制定了一个把侵华日军放进平型关以内加以歼灭的决战计划。

平型关是山西省东北部长城的一个关隘，为河北、山西两省的交通要冲，板垣征四郎奉命参加保定会战，由察哈尔经长城一线赶往保定，必须经过平型关前的一条蜿蜒公路。公路道窄沟深，极为险峻，两侧高地较为平坦，便于隐蔽、部署和展开兵力，阎锡山就是利用这一地形特点制定了大胆的决战方针：“诱敌深入至砂河以西地区，从恒山、五台山两方面发动钳击，并截断平型关要隘，歼灭敌军于滹陀河上游盆地里。”

毛泽东对这一仗极为重视，1937 年 9 月 21 日给已经到达山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打电报称：

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砂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

种估计是完会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

就在阎锡山举棋不定之际，日军不战而得中国历史古城大同，板垣更加得意忘形，更以狂傲的追击之态向涞源、灵丘、浑源、怀仁、左云一线进犯，直扑平型关而来。

板垣征四郎为何敢走平型关这一险棋？这是因为他自恃是个“中国通”。他曾以旅行观光的名义，骑着毛驴，带着如花似玉、娇小玲珑的日本艺妓，走遍了繁峙、沙河、大莹、平型关、灵丘、广灵一线，绘下沿途兵要地志。他算定阎锡山会错误估计日军只能沿平绥铁路线进攻，不会冒险钻山沟，因而他大胆出此奇兵攻击平型关，直抄雁门关的后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太原城下。

为坚定阎锡山抵抗强敌的决心，中共中央在派八路军东渡黄河迎敌抗战的同时，又派周恩来三访阎锡山，共商御敌大计。

1937年9月7日凌晨，周恩来偕徐向前在雁门关以西的岭口会见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周恩来首先对阎锡山持“联共”态度及“守土抗战”主张给予积极评价，鼓励他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履行诺言，与八路军并肩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猖狂入侵。周恩来针对阎锡山惧怕赫赫有名的板垣师团的心理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

不久，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在岭口再次会见阎锡山，研究对付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进攻平型关的问题。阎锡山为测试周恩来的军事才能，请周恩来拟定第10战区作战计划。周恩来仅用一天即交卷，阎锡山看罢惊奇地称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果能这样打，中国必胜。”

阎锡山觉得有周恩来和八路军助战，对付板垣师团就有了信心。岂知板垣征四郎攻势凌厉，一路攻下天镇、大同，山西形势危急，阎锡山态度又动摇起来。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第三次会见阎锡山，以八路军深得人民拥护来鼓舞阎锡山的士气。阎锡山感慨万千他说：“说实在的，我的军队一散了就不能收拢，八路军早上被打散了，晚上又能聚拢到一起，这一点我真佩服。如果贵军能在涞源、灵丘一带给敌人的后方一个严重打击，将是共同消灭板垣师团的一大助力。”

周恩来从抗日战争全局出发慨然相允：“那一带尽是高山峡谷，正是容易打击敌人的场所。我们一定在那一带会一会板垣征四郎，争取打出一个好仗来。”

接着，周恩来同阎锡山仔细研究了阎锡山提出的大口袋作战计划，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一线内长城布防六七万兵力，由傅作义指挥的晋绥军守正面，高桂滋的第17军在左翼，第18集团军（即八路军）115师林彪部在右翼，争取在繁峙至沙河之间与日寇决战。

对这个作战计划，周恩来虽有不同意见，却从大局出发表示支持说：“这个计划若能够实现了，那是全国人民都高兴的。八路军一定绕道敌人后方，切断敌人交通，打击敌人，与这一计划紧密配合。120师已经出左方，到达了五寨、神池一带，向山阴、岱岳前进；115师出右方，已经越过五台，向

灵丘、涑源挺进；我们将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办法，抄袭敌人的后方。”

日军从东北打到华北，国民党军队几乎一触即溃，更使板垣征四郎目中无人，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板垣得知阎锡山想把日军主力从天镇、阳高一路引到聚乐堡、大同一带决战，获悉中国军队在雁门关一带有坚固的工事可作依托，就狡猾地离开铁路线，出其不意地从灵丘进攻平型关，再转攻雁门关和太原。

但是，板垣征四郎的大迂回战略，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睛。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向朱德、彭德怀和各师长揭穿板垣的诡计称：

敌人为夺取华北五省，采取了右翼迂回，即首先攻占山西的战略方针，以此姿势威胁河北、山东左侧背，逼迫国民党退出华北平原，最后夺取冀鲁。敌在山西依然是右翼迂回的战法，即以第5师团先行中央突破，然后以大迂回的姿势，包抄恒山南段，迫我绥远西境、恒山南段及五台等处之各军，平汉北段之各军，均不得自由行动。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

毛泽东以惊人的胆识，对板垣师团的猖狂进攻做出如下部署：

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位置，即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起见，120师应进入晋西北，依托管涔山，侧击沿同蒲路南下之敌；115师应以自觉的被动姿势，进入恒山地区，支援晋绥军；129师依情况的变化，决定使用方向。

诚如中方预料，板垣征四郎坐镇蔚县，指挥日军大举向平型关进犯。

原来，板垣征四郎获知中国部队正在平型关一带集结、阻止他前进，便勃然大怒，9月21日令其手下精锐部队——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率第42联队的第2大队、在灵丘的两个大队和一个野炮大队，向西进攻平型关，控制通向太原的通道；又令在浑源的两个步兵大队策应三浦敏事，夹攻平型关。

9月22日，三浦敏事率第21旅团主力从灵丘出发，进犯平型关。当天傍晚，日军步兵在炮兵掩护下向第33军第73师平型关阵地发动猛烈攻击。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才为平型关战役的总指挥官，他认为这不是板垣师团的主力部队，不过是板垣派出的牵制兵力，未予充分重视。9月23日，日军发动更大规模进攻，孙楚才方命高桂滋率第84师出击。在阴雨天中，高桂滋指挥所部官兵与日军展开激战，双方激烈争夺1886高地。阎锡山又命傅作义率领预备队增援，战斗更为紧张。

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5师团是日军中历史最久、装备最精良的师团，板垣又反对只限于平津的作战方案，力主进兵山西，声称根据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要控制华北就必须控制山西，在平型关受阻使他觉得很伤面子，就增兵几千人猛攻平型关正面。傅作义亲自率领第6集团军奋勇抵抗，双方伤亡惨重，日军正面攻击平型关受挫。

板垣征四郎急欲攻下雁门关，进逼太原，便命令三浦敏事绕路前进，却不知不觉进入八路军115师的包围圈。

原来，八路军主力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到达晋北前线后，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固守平型关、雁门关和长城各隘口，贺龙率120师驰援雁门关，林彪率115师向平型关疾进，准备打个漂亮仗。

按照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作战计划，115师9月23日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准备与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

遵照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命令，115师以1个团和骑兵营向灵丘、涑源、广灵之间前进，牵制日军主力。9月24日，以3个团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的公路两侧。

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随着隆隆的马达声，百余辆汽车满载日军和军用物资在公路的狭窄处出现，汽车后面跟着200多辆大车和骡马牵引的炮车，最后面有一大队骑兵压阵。日军骄横狂妄，连尖兵也不派，如入无人之境。

只听一声发令枪响，八路军埋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像猛虎般冲下公路，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响了起来。日军一下子被打惊了，但不一会儿就拿出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双方展开激烈肉搏。

经过一天激战，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汽车80余辆，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光军大衣就够115师每人一件。

平型关战斗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平型关战斗打痛了板垣征四郎，他急忙在蔚县第5师团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对策。日军高级军官吵作一团，最后决定改变作战计划，选定中国方面左翼地区的茹越口为新攻击目标，那里是中央军刘茂恩的第15军与晋军第34军的结合部。

板垣征四郎命令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第2混成旅团长本多政材少将，从大同向西直插雁门关，猛攻茹越口。梁鉴堂率203旅奋勇抗击，梁鉴堂为国阵亡。日军9月28日攻下茹越口，29日夜进占繁峙，平型关左侧受到威胁。阎锡山只得下令长城线上的中国守军于10月1日全线撤退，平型关战役即告结束。

大战忻口攻太原

平型关战斗使板垣征四郎感到有失体面，为显示“大日本皇军权威”，板垣率5万人马，以坦克150辆、火炮250门为掩护，气势汹汹杀奔忻口，向太原进犯。

日本军部对是否攻取太原一直存有激烈争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代表着不同意见。石原莞尔辞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后，日本军部才于1937年10月1日决定攻取太原。当日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以第5师团向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

板垣征四郎接到命令，即率领精锐部队向忻口进发。忻口对他并不陌生，当年他曾骑着毛驴在这一带“观光”，晓得忻口是所谓三山夹两口的军事要地。

三山，就是云中山、五台山、河谷中间的土山；两口，就是土山东西两侧的水道。此处正面甚小，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且从南向北看，忻口呈倒八字形，真是军事要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处，更是太原北面的最后一道防线。攻下忻口，就等于打开了河东根本——太原的大门。板垣的部属在日记中写道：“攻下忻口，再有两天，步行也可以走到太原。”

平型关战斗后，板垣征四郎指挥日军做扇形推进。10月1日一接到陆军中央的命令，就以正面攻击结合迂回的战法，在坦克、飞机和各型陆地火炮的支援下，向崞县、原平发起猛烈攻击。

板垣征四郎首先命令第5师团主力猛攻崞县，第19军军长王靖国率部奋勇阻击。第21师坚守高怀化阵地，从早晨打到中午，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日军集中全力攻击一点，付出极大代价后突破阵地，师长李仙洲亲自率领师直属部队参加战斗，身负重伤；旅长崔振东率领部队一鼓作气击退日军，守住了阵地。

10月13日早晨，日军出动飞机9架、战车20多辆，开动20多辆大炮，掩护几百名日军向板市、下王庄一线阵地前进。第9军军长郝梦龄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旅长王晋指挥两连反战车炮大发威力，击毁日军战车7辆，打退敌人进攻。

接着，双方展开激烈战斗，驻守崞县西关的中国部队独立第7旅马延守部一个团全部为国捐躯，团长刘连相、石焕然阵亡，崞县陷于敌手。

日军10月9日大举进攻原平，196旅在旅长姜玉贞指挥下与日寇在原平大战10天，与敌人苦战肉搏，除500人外全部阵亡。

日军占领原平后，板垣征四郎集中兵力在同蒲路左侧发动猛攻，幸好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领援军到达，命第9军军长郝梦龄指挥中央兵团，刘茂恩、李默庵指挥左、右兵团，与日军展开决战。

在5天的大战中，板垣征四郎集中全力以飞机、重炮，战车掩护步兵猛攻，中国部队奋力苦战，南怀化等阵地反复争夺，几易其手，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光荣阵亡，歼灭日寇2万多人，创华北战场大举歼敌纪录。

与此同时，八路军深入敌后夜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0架，歼灭日军百余人，又袭击日军交通线和后方目标，迫使日寇抽调兵力回守后方，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战役。

正当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准备南北夹击在忻口的板垣师团的时候，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寺内寿一不得不亲自飞到忻口前线督战。他见板垣师团死伤惨重，忻口战役相持不下，只得放弃突破忻口占领太原的计划，改由正太路西进，进攻娘子关。

1937年11月初，日军川岸师团偷偷攻下娘子关的旧关，国民党第38军教导团和第17师等奋力回击，阎锡山却从娘子关附近调走池峰城部，使日军乘机攻下娘子关，从阳泉、寿阳、榆次直逼太原。

太原又称晋阳，左有恒山、太行之险，右有黄河之固，可谓“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自古为重要军事战略要塞城堡，为兵家必争之地。

阎锡山见日寇从东面直逼太原而来，忙命第7集团军司令傅作义回太原组织城防，令第6集团军司令杨爱源去晋南组织防御，又命卫立煌下令部队停止反击，撤离忻口阵地，向太原撤退。

1937年11月6日，日军大举进攻太原，傅作义率军苦战3日，抵挡不住日军攻势，11月8日退出太原，率2000余人向西山突围，日军当晚攻占太原。

以太原失陷为标志，在华北战场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

第 28 章

喋血扬子江

血战大上海

1937 年 8 月，华北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燃起烽烟。

十里洋场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在西方列强大力经营下，成为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号称“冒险家的乐园”，又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通向华中的门户。日本对上海早就垂涎欲滴，认为上海主要是英美的天下，现在该由它来独占了！

阴谋进攻上海的军国主义分子是日本海军第 3 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

长谷川清见陆军在华北发动全面战争为日本侵华立了“头功”，也不甘落后，从 1937 年 7 月中旬开始，以上海形势紧迫为由，请求日本军部批准，向上海逐次秘密派遣特别陆战队，大举增兵上海，企图先占领上海机场，然后发动突然袭击攻占上海，再犯南京。

日本当局在推行“不扩大方针”掩盖下，把长江流域的近 3 万名日侨全部撤到上海，解除了发动华中战役的后顾之忧。

8 月 8 日，长谷川清根据日本军部的指示重新部署兵力，为在上海挑起战争做准备。

8 月 9 日下午 6 时左右，侵华日军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海军中尉带领水兵斋藤要藏，乘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驶向虹口机场，蛮横地要闯进军事重地。机场卫兵过来阻止，要查证件。大山勇夫勃然大怒，掏出手枪打死了卫兵。中国士兵怒火中烧上前干涉，双方发生冲突，大山和斋藤被当场击毙。这就是有名的“虹桥机场事件”。

上海市长俞鸿钧是有名的“和事老”，人称“OK 俞”。他晓得此事非同小可，急忙往访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建议双方合组检查团查明真相，阻止事件扩大。

近卫首相接到上海总领事馆的报告，急忙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早已接到长谷川清的密电报告，蓄意在上海挑起战火，胡说“上海事件绝非偶然发生，而是中国反日分子有计划制造的事件，若不予以严厉膺惩，今后帝国在支那侨民将一无保障”。

米内光政又称，要在上海打仗，只靠海军力量短期很难解决，必须有陆军的协助。陆军大臣杉山元满口答应，声称只要在南北两面施加军事压力，就能攻占上海、南京，迫使南京政府投降，3 个月解决中国问题！

近卫文 犹豫不决，提出上奏裕仁天皇。杉山元便进宫拜见裕仁天皇，保证 2 个月时间攻下上海、南京，陆军派兵方针得到天皇批准。

杉山元出宫后就召开参谋本部首脑会议，决定立即增兵 3 万，由海军舰队火速运往上海。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接到日本政府训今后，为掩护日本向上海运兵，就先找上海市长俞鸿钧谈判，要求中国政府撤退代替中国军队驻守上海的保安部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日本便加速向上海

运兵，动员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日侨“义勇团”备战，又将30多艘作战舰只集中在吴淞一带，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8月12日晚，日军一个师团开到上海。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得到军方通知，便向俞鸿钧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警察及所有武装人员退出上海，把上海交由日军接收，并限定中方在8月13日正午以前给予答复。

俞鸿钧代表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侵华日军不等援军到达，便在八字桥燃起战火。

八字桥是在宝山路与日本海军司令部之间的大水沟上架设的简易通道。日军突然向桥对面的中国军队第88师开枪射击，中国军队奋通还击。日军又沿北四川路、军工路一线发动进攻，日舰更以猛烈排炮轰击中国守军。中国守军早就憋足了气，怀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坚决反击。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自此拉开了战幕。

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将最高指挥部设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开战前就悄悄在虹口集结重兵，据守丰田纱厂，做侧击真如、北新泾的准备，还把一部分兵力隐藏在内外纱厂，企图渡过苏州河，截击麦根路车站，迂回进攻中国军队之后背。

长谷川清坐镇黄浦江中的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命令日本海军陆战队8月13日从横滨桥、天通庵一线发起进攻。

张治中将军率领中国部队主动出击，采取凌厉攻势，打算在日寇援兵未到前一举歼灭在上海的日军，然后再与日本的增援部队展开决战。中国军队士气高昂，给侵略者迎头痛击。

长谷川清见日军初战失利，当即发电请求日本政府火速向上海增兵，请求空军助战，请求日本军部派资深望重的陆军指挥官到上海指挥作战。

日本军部接到长谷川清的求援电，当即指示日本陆军航空兵出动飞机轰炸杭州览桥机场。号称日本飞机驾驶员“四大天王”之首的木更津航空队队长高桥宪一率队出征。

中国空军第4大队长高志航率领阎海文等升空御敌，一交手就打落日本轰炸机4架。中国空军战士越战越勇，又攻击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炸得“出云”号东倒西歪，整个舰队乱作一团。

激战中，阎海文的飞机不幸被日寇高射炮击中，阎海文跳伞时被风吹落在日军阵地上。日军要抓活的，阎海文拒绝投降，打死野川小队队长等8人，然后以最后一颗子弹自击殉职。

8月13—15日，中国空军击落敌机44架，消灭日军木更津、鹿屋两个精锐的航空队。中国陆军也英勇反击，日军节节败退。

8月16日，中国空军再次轰炸日军设在公大纱厂和虹口地区的阵地，陆军从左右两翼缩小了对日寇的包围圈，浦东日军被迫放弃三菱、太仓、日清等公司的仓库和码头。

中国军队乘胜向设在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发动进攻。日军在那里修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的堡垒建筑，易守难攻，使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连攻不克，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长谷川清连续遭受沉重打击，紧急向东京发报求援。陆军大臣杉山元忙与参谋本部次长梅津美治郎商量派兵问题。经裕仁天皇批准，任命松井石根为“中支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为“北支派遣军”司令官，大举增兵，侵华战争全面展开。

8月23日，松井石根率第3、第11师团和第6、第13师团一部，在张华洪、川沙强行登陆。

这几个师团是日军的精锐师团，有很多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战斗力较强。第11师团长山室宗武骄横地叫嚷：“我11师团的大日本皇军，1个兵抵中国兵10个！”

松井石根1878年生于日本名古屋，1904年到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后任关东军司令部副官、步兵旅团长、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当过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驻上海武官、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第11师团长，1932年任驻台湾日军司令官，1933年被编入预备役。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军部报请裕仁天皇批准，他再次被召用，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来参与南京大屠杀，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松井石根上任后，制定了攻占上海的作战计划：

一、实施要领：派遣军以一个精锐师团在浏河镇、川沙河口地区登陆，以主力在吴淞地区登陆，击溃当面之中国军队，占领上海及其以北的重要地带。

二、实施方法：

1. 派遣军以第11师团的主力从浏河地区登陆，以第3师团及派遣军的直属军队在吴淞地区登陆，歼灭上海周围之中国军队。

在吴淞登陆时，海军陆战队将予以掩护。

2. 随着歼灭作战的进展，根据作战情况可派出一部分部队至黄浦江上游地区，切断沪、杭铁路。

3. 击溃当面的中国军队后，应占领上海及其以北的重要地区，以掩护租界。

4. 根据情况，开始时以一部兵力在上海租界内登陆，增援海军陆战队。

5. 登陆后，应迅速占领和修整好上海附近的机场。

松井石根率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人员8月22日乘军舰到达上海以东的马鞍山列岛，把第11师团长山室宗武召来密谋登陆方案。

山室宗武根据松井石根的命令，于8月23日凌晨由大型运输船换乘登陆机动小艇到达川沙河口，占领出发阵地。他一声令下，炮声隆隆，枪声大作，日军突然发起冲击。

中国部队估计到日军有可能在川沙登陆，事前做了一定的部署。对日军的突然进攻，中国将士奋勇抵抗。

罗店是通往宝山、上海市区、嘉定和松江等重要战略据点的几条公路的交叉点和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军要攻占上海，必先夺取罗店。

在松井石根督促下，第11师团长山室宗武、参谋长片村四八亲自向第10旅团长天谷直次郎布置进攻罗店的任务。罗店很快陷入日军手中。

蒋介石在南京下达了夺取并死保罗店的命令，严令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陈诚夺回罗店、川沙，消灭登陆之敌。

于是，中日两军在罗店展开激战。天谷直次郎首先率领第10旅团展开轮番攻击，日军先用步兵重炮轰击中国守军阵地，又开动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第3舰队重炮，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企图摧毁中国守军阵地，掩护步兵进攻。

中国第67师官兵在日寇汹涌而猖狂的攻势面前被打懵了，但他们都满怀

一腔爱国热血，镇定下来后，在师长李树森指挥下拼死反击，顽强地坚守了2天2夜。

日军被打得焦头烂额，师团长山室宗武急电松井石根，要求绕过罗店进攻上海；松井石根强调罗店在上海战役中有重要地位，命令山室宗武率该师团精锐全力争夺罗店，又调藤田师团一部前往增援。

这样，罗店战斗迅速升级，中国部队第11师和第67师坚守罗店5天5夜。日军动用陆海空火力狂轰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守军常常整营整连牺牲在日军的强大而猛烈的炮火之下，但中国部队仍无所畏惧源源而上，冒着密集的炮火将入侵日军团团包围。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气急败坏，又命日军大量增援，将中国援军反包围起来；此时，蒋介石又派援军赶到，再对日军施加包围。于是，形成中日两军阵地犬牙交错、短兵相接的阵势，双方展开你死我活的肉搏战，罗店几易其手。中国官兵前赴后继，愈战愈勇，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称罗店是“血肉磨坊”。

松井石根满以为指挥10万日军精锐部队，可以一举攻克上海，没想到与中国军队打成平手，不由想起1932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时日军被迫三易统帅的往事，害怕重蹈盐泽一郎、植田谦吉、野村吉三郎的覆辙，急忙向东京当局提出增兵要求：“根据上海的敌情及地形，要给南京军以大的打击，最小限度需要5个师团。”

日本军部首脑接到松井石根的求援电报后，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感到吃惊，但对向上海派兵意见不一，陆军大臣杉山元力主增兵，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坚决反对增兵。石原莞尔为使日本避免陷入侵略战争的深渊招致惨败，以向参谋总长闲院宫提出辞职相要挟。闲院宫载仁亲王不愿得罪任何一方，9月16日背着石原莞尔进宫向裕仁天皇启奏：“内定增派第9、第13、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队（用以占领崇明岛飞机场）到上海，再派后备步兵10个大队到上海。”裕仁天皇当即批准实施。

松井石根9月7日前后接到日本军部关于增派重藤支队和3个师团的秘密通知后，腰板顿时硬了起来，当即制定如下作战方针：

以第3、第11及应先到达的第101等3个师团攻击南翔一大场镇一线之敌，其作战方向为经刘家行附近向大场镇方向，消灭上海北侧地区之敌；在此期间，命重藤支队及第11师团主力消灭罗店镇附近之敌，并确保该地以北，掩护军侧背安全。

松井石根得到援兵后大举进攻；中国方面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中央军精锐——薛岳的第19集团军投入战斗，双方激战五六天，罗店镇的“血肉磨坊”杀声震天，死伤累累，双方展开拉锯战。日军虽在猛烈而密集炮火配合下攻下罗店镇，但阵地不久又被中国军队夺回。

松井石根在罗店碰了硬钉子，就狡猾地采取迂回战术，先以主力切断淞沪与罗店的联系，再以2个旅团重兵在30辆战车引导下，猛攻吴淞、狮子林一线。中国守军旅长翁国华抵挡不住日军进攻，丢失阵地后拔枪自殉。日军猖狂进逼宝山城。

宝山是扼守长江和黄浦江出入口的战略咽喉，为交战双方必争之地。

9月6日，松井石根下令所有火力都指向宝山。霎时间，黄浦江的日本军舰都一齐向宝山城开炮，第3师团的地面火炮猛轰不止，日军飞机也发疯

般把钢铁炸弹投向火光冲天的宝山城。宝山真是地动山摇，炮声隆隆，烈焰冲天。

接着，日军第3师团第68联队在联队长鹰森孝之大佐指挥下发起冲击，但被中国守军营长姚子清指挥部队消灭几十人。鹰森孝之被打懵了，忙命令日军炮兵再次猛烈轰击，直炸得天昏地暗，守军阵地大部被毁。鹰森孝之指挥部队多次冲锋，姚子清营500壮士全部战死。日军攻占宝山后，对中国士兵的奋勇战斗精神极为崇敬，将中日两军官兵尸体都整齐地码好，予以安葬。上海《大美西报》载文称颂道：“此次姚营全部殉城，其伟大壮烈，实令人内心震动而肃然起敬。此非仅为中国人之光荣，亦为人类之光荣，其伟绩将永垂史册而不朽！”

日军攻克宝山后，又得到第二批增援部队，妄想一举击溃陈诚集团军主力。但陈诚适时指挥主力部队撤至杨家宅、陆福桥、施相公庙一线，制止住了日军的猖狂进攻。

日本为全面击溃中国守军，攻下上海，于10月1日举行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参加的四相会议，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军事行动之目的，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应采取适当手段使用兵力占据要地”。

为实施四相会议要求，松井石根制定了新的作战方针纲要：

- 一、不是攻占杨漫西岸的敌阵地，而是以主力从左边回旋到南边，从右面以第9、第3、第101师团为第一线，准备对大场附近进行攻击。
- 二、使第11师团进入杨泾一线，回旋掩护右侧面。
- 三、以第13师团作为第二线兵团，保持在军主力的右翼后面。
- 四、以上述部署的兵力攻击大场镇附近的敌人，进入苏州河一线。在此期间，随着华中派遣军主力的南进，第11师团主力尽可能向南面移动，面向西掩护主力的侧面。

10月初，松井石根手下兵力达到20万，拥有重炮300多门、战车200余辆、飞机300余架、大小舰只70余艘。于是他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术，沿沪太路南线，向蕴藻浜全线发起新的攻势。

10月7日，松井石根指挥2个师团的兵力，由蕴藻浜北岸向南岸中国守军侧背展开猛攻，中国守军左翼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连续发动攻势，企图进占大场、南翔，截断防守在闸北、江湾、庙行方面的朱绍良中央方面军的后路。中国守军为摆脱困境，决定实施反击。

10月15日，桂系的第21集团军到达战场，当时正值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开会讨论中日战争问题。蒋介石想打个大胜仗显示中国军队的力量，便接受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建议，命令桂军6个师分三路开始反击。

中国军队发动猛烈攻势，但缺乏与日军作战的经验。日军将桂军大批士兵放到阵地前沿，再用火力封锁他们的后路，然后像围猎一样前打后堵，中国士兵纷纷中弹倒地，场面惨不忍睹；日军又在陆海空炮火支援下大举反扑，3万桂军大部牺牲。

在中国部队顽强抵抗下，日军损失惨重，其进攻也陷于停顿状态。

为制定下一步侵华军事作战方针，裕仁天皇10月20日亲自召开御前会议，研究上海战场形势，决定再以3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兵力组成第10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另从华北战场调中岛今朝吾率第16师团从水路进入长

江，在江苏省常熟县的白茆口登陆；命令这两支部队登陆后迅速向太湖的南岸、北岸接近，切断在上海作战的中国 70 万大军的后方，以策应松井石根率领的上海派遣军的进攻。

日军第 10 军军长柳川平助接受任务后，亲自带人到上海南方的杭州湾北岸侦察，发现这一带海岸线平直，便于部队登陆，近岸水深达 40 米，大船可以开近，可以说是淞沪地区最理想的登陆场所。他还发现，从全公亭到乍浦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只有正规部队两个连和部分地方武装担任守卫任务，暗笑蒋介石和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役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给他提供了从上海的战略后方登陆的良机，决心按 500 年前倭寇进攻华中的老路猖狂进犯！

1937 年 11 月 5 日拂晓，柳川平助迎着嗖嗖的秋风，指挥第 6、第 18、第 114 师团摆好进攻架势。

柳川平助一声令下，3 个师团和日本第 3 舰队的火力一齐开火，向守卫海岸线的中国两个连展开猛烈炮击。

接着，在飞机掩护下，日军 3 个师团分头向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卫、金山嘴、漕径等处猛烈进攻。

中国部队奋勇还击，但装备落后的两个连怎能抵挡住有优势装备的 3 个师团的日本兵？11 月 5 日上午，有 3000 名日本兵从金山卫一带登陆。

中国统帅部得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的报告，急调两个师加一个旅的兵力前往堵截，但都没有及时赶到，使日军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源源登陆。上海战役形势急转直下。

松井石根见日军从中国军队背后登陆成功，命令日军加速向上海推进。于是，第 18 师团一部沿沪杭铁路进攻，该师主力和第 6 师团主力直扑松江而来。

中国部队第 67 军刚到达松江，立刻投入战斗，只因实力相差悬殊，因而一仗下来就溃不成军，松江陷于敌手。接着，日军又向青浦、白鹤港一线发动猛攻，中国部队旅长吴继光督战身亡，这一带防线又被日寇突破。

陆军大臣杉山元闻报大喜，为统一上海方面的作战指挥，通过陆军参谋本部下达命令，将上海派遣军和第 10 军编成华中方面军，任命松井石根为司令官，明确下达作战任务称：“与海军协作，以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得结束战争局势为目的，扫灭上海附近之敌。”

松井石根得意之极，命令柳川平助加紧进攻。日寇很快占领昆山、嘉兴，开始追击沪宁铁路附近的中国部队。

11 月 13 日，日军第 16 师团和重藤支队在上海北方的白茆口附近登陆。从此，日军两路夹攻上海。

为避免腹背受敌，中国统帅部下令全线撤退。日军于 11 月 12 日占领上海，淞沪会战便告结束。

淞沪会战是“七·七事变”后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三个月时间里，日本出动 9 个师团陆军和 2 个海军舰队，参战兵力 20 余万，几乎倾巢出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认真抗战，先后出动 73 个师兵力，竭尽全力，奋勇杀敌，使日寇伤亡 6 万余人，虽因敌我力量悬殊和指挥不当失利，但中国军民用血肉之躯，使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就可解决中国问题”的狂言破产，以鲜血和生命绘出了一幅中华民族誓死抗击外来侵略的壮烈画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在二战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在

淞沪抗战中牺牲的勇士和爱国志士，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密谋攻南京

南京战役是淞沪会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当时首都南京的作战，由于它和淞沪会战后中国军队的大溃退相衔接，历史上常将南京战役作为淞沪会战的一部分看待。

南京自古即为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军事重镇，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横跨长江两岸，西临皖中沿江平原，东与宁镇山脉和富饶的长江三角洲相连，地形复杂，气势雄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早就重视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对南京作出的极高评价：

南京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对南京垂涎欲滴，极想及早攻下中国首都，一举摧垮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现全面占领中国的目的，进而占领亚太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此，在研究进攻上海时，日军参谋本部就在研究进攻南京问题。

当时日本军部决定把侵华战争的主战场转向华中，从东北的关东军和平津地区的华北方面军向华中转调兵力，因而策划在 1937 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决定以 3 个师团组建的 1 个军在长江下游的白茆口登陆，另派以 2 个师团为基干的 1 个军在杭州湾乍浦附近登陆，先攻占杭州、上海，再夺取南京。

日军参谋本部未料到蒋介石亲自指挥中国 70 万大军在上海顽强抵抗，日本投入 5 个精锐师团，动用海空力量予以配合，国内只剩下 2 个师团可调，仍无取胜把握，因而非常头疼，于是逐渐增兵，把华中派遣军的作战地区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以东。

为准备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本当局首先公布临时内阁参议官制，任命日本侵华巨头宇垣一成、荒木贞夫、末次一夫等退休大将和町田忠治、前田米藏、秋田清、乡诚之助、池田成彬、松冈洋右等为内阁参议，参与日本内阁策划进一步侵华的“重要国务”；又将内阁的企划厅和资源局合并设置企划院，统一扩军备战步伐，推行总动员计划。

恰在此时，意大利法西斯于 1937 年 11 月 6 日宣布参加日德防共协定，签署了三国防共协定义定书，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等大受鼓舞，怂恿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他们一起进宫，鼓动裕仁天皇 11 月 17 日以昭和 12 年军令第 1 号公布了大本营令：

朕制定大本营令，命令实行。

大本营令

第一条在天皇大纛设最高统帅部，称为大本营，大本营于战时或事变之际，根据需要设置之。

第二条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为其各自幕僚之首长，运筹军机，策划作战，根据最终目的，谋求陆海军之同心协力互相策应。

第三条大本营编制及工作，另行制定。

大本营成立后，立即收到松井石根和柳川平助的报告，认为“因此次战况好转，对南京方面精神影响极大”，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下村定才命令作战课研究是否需要一齐向苏州、嘉兴一带“进军镇压”。下村定派参谋本部课长河边虎四郎前往现地了解情况，听取侵华日军一线指挥官的意见。

河边回到东京，汇报了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强烈主张向南京追击的意见，参谋总长闲院宫于11月24日作出重大决定，发出撤消限制以苏州、嘉兴一线为作战地区的限制指示。

在杉山元等人极力活动下，11月24日首次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裕仁天皇、参谋总长闲院宫、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陆军省作战部长下村定、海军省作战部长近藤信竹等。

会上，首先由参谋总长闲院宫奏陈日本陆军的作战方针，鼓吹一鼓作气攻克中国首都南京，然后由陆军省作战部长下村定向裕仁天皇说明，日本陆军自“七·七事变”以来，在海军的密切协作下，各方面都给中国部队以重大打击，今后将继续此种强压作战。

下村定在说明下一步进攻南京的作战方案设想时声称：“华中方面军正利用在上海周围取得的战果，及时进行果敢追击。该军的编组，其任务原为扫灭上海附近敌军，且以断绝该地与南京联系而使之孤立为重点。因此，不仅其推进能力有相当限制，而且目前其前线部队的辎重以及炮兵等战列部队尚有不少在遥远的后方，所以并未考虑能一举到达南京。在此情况下，华中方面军拟以其航空部队和海军航空兵力协作，轰炸南京及其他要地，且不断显示进攻气势，用以消磨敌军战意。”

下村定向裕仁天皇深鞠一躬强调说：“统帅部正在考虑，根据今后的情况，命该方面军做好新的准备态势，进攻南京和其他地区。”

经御前会议批准，侵华日军大举向中国南京进犯。

南京外围战

淞沪会战期间，日本军部不敢贸然挥军进攻南京，是有原因的。一是日军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惨重，对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不敢再轻视；二是获悉蒋介石为保卫南京修建了两道坚固的防线。

原来，蒋介石对防守南京早有考虑，远在1934年就开始构筑南京外围防御线：第一条是吴福线，以太湖为中心，北起长江沿岸的福山，经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南至杭州湾的乍浦；第二条为锡澄线，北起长江南岸的江阴要塞，南至太湖北面的无锡。

日军参谋本部情报机构获悉，蒋介石对这两道国防工事线极为重视，指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动用4个师的兵力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大兴土木，用两年半时间修筑起钢筋混凝土工程，1936年建成，自以为固若金汤，称其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吹嘘至少能抵御日本百万大军，坚守南京十年八载。蒋介石还不放心，又指示在镇江以西修建了许多工事和堡垒，1936年秋还亲自指挥搞了一次保卫南京的大规模演习战，这才放下下心来。

这两道防线的失效，完全是蒋介石军事指挥失误的恶果。

从1937年10月25日起，淞沪会战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军队腹背受敌，

为避免全军覆没，不得不做战略上的转移，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抗日英雄谢晋元率领 500 人号称“八百孤军”坚守四行仓库，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热烈赞扬。蒋介石也在 10 月 29 日召开南翔高级指挥官会议，肯定战略转移的做法，并说：“这一回我们淞沪各军经过三个月的抗战，左翼仍能维持原有的阵地，右翼亦按计划只作战略的移动。这种奋勇超绝的战绩表现出来，无论中外人士，对于中国军队，不仅改变了轻视的心理，而且都不能不表示非常的赞叹和钦佩，英美各报且赞扬我军队已因沪战之英勇，与此次有秩序之转移阵地、安全退却，证明中国军队已建立其军事国家基础于从来未有的历史上方。近三个月来，我们虽没有大的胜利，但在我们预定的消耗战和持久战的策略之下，已使敌人受到意外大的打击，在精神上我们已实在打败了举世共弃的倭寇。”

蒋介石这些讲话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日军登陆杭州湾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蒋介石忽然心血来潮，不顾战场上出现的不利形势，一厢情愿想让中国部队硬着头皮抵抗到国联开会完毕，乞求西方列强施加压力逼迫日本从上海撤军，声称如果现在从上海撤兵，造成日本占领上海的既成事实，列强想帮忙也帮不上了。

基于这个错误指导思想，蒋介石命令已开始回撤的部队返回原防地，殊不知军心已乱，不到一天便战线大乱。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情知中国部队已到全军崩溃的最后关头，他再三向蒋介石提出紧急建议，蒋介石才勉强下令让部队后撤，撤至吴福、锡澄一线。

松井石根，柳川平助看到这一有利形势，不等日本军部批准，就擅自下令向南京追击。

在早已发兵向南京进犯后，日军第 10 军军长柳川平助才干 11 月 19 日向日本军部发去如下电报：

- 一、第 10 军于本日正午占领嘉兴，于傍晚大致扫荡完毕；
- 二、第 10 军 19 日晨下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大致部署如下：
 - 国崎部队经湖州（今吴兴）、广德向芜湖追击，断敌退路；
 - 第 18 师团经湖州、广德向南京追击；
 - 第 114 师团经湖州、长兴、溧阳向南京追击；
 - 第 6 师团先向湖州前进……

中国主力部队慌乱中退到赫赫有名的吴福线时，只见这个钢筋混凝土国防工事大锁把门，急忙去找当地军政官员和掌握钥匙的保甲长，这些家伙早已溜得无影无踪。日军追兵又到，中国军队只得就地赶修简易工事防守抵挡，但溃退之兵难抵追赶而来的日军精锐劲旅，一触即溃。

不几天，常熟、英城镇、苏州等相继失陷，蒋介石花数百万金钱、动用 4 个师、用两年多时间修筑的吴福线等于虚设，二战中“马其诺防线”的溃败悲剧提前在中国上演，中国部队被迫撤向锡澄线。

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逃奔惨景，时任第 36 师师长的宋希濂回忆称：

（11 月）9 日这一夜的退却，简直是紊乱极了。因为自沪西经青浦、南翔至昆山一带地区，全是河汉纵横，没有一处可以徒涉，只有一条公路可走，拥塞于途。加以深夜过青浦时，西南方向机关枪声很密，说明日军已逼近青浦……这样大的兵团，既不能

进行有组织的逐次抵抗，以迟滞敌军的行动，又无鲜明的退却目标，造成各部队各自为政，拼命地向西奔窜。战场统帅部对许多部队都不明白其位置，遂使敌军如入无人之境。弄到这种地步，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妄图依赖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与日本进行和谈，以谋求结束战争。

松井石根见中国军队溃败如山倒，因而改变主意，认为“必须而且可能追击到南京”，11月22日向日本军部提出日军华中方面军今后作战意见，声称：“判断结论：为迅速解决事变，华中方面军须乘当前敌之颓势攻取南京。”

11月23日，松井石根不等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即命令侵华日军向锡澄线发起攻击，24日接到大本营御前会议解除作战地域限制的命令后，第10师团突破中国部队升仙市阵地，攻到吴兴城下。

蒋介石眼见吴福线没有起到阻击作用，大发雷霆，命令前方指挥官无论如何必须守住锡澄线。第7军173师副师长夏国璋率一个旅死守吴兴，与柳川平助指挥的第10军隔着城墙鏖战一日，日军尸体遍布护城河外。日军第10军自金山卫登陆，首次遇到顽强抵抗，马上调集援军，出动飞机轰炸，夏国璋率部死战。直到全旅战亡殆尽，夏国璋战死，日军才攻下吴兴。

12月1日，松井石根接到日本参谋本部以大陆命第8号下达的“大命”：“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取敌国首都南京”。

血雨腥风陷金陵

松井石根接到参谋本部命令，亲自与参谋们一起拟定出《向南京追击的作战指导纲要》，上报日本参谋本部，很快得到批准，他正要命参谋长冢本召集主要指挥官会议，忽闻日本天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前来视察，松井石根急忙出来迎接。

本庄繁1876年生于日本兵库县，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曾参加日俄战争，历任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参谋本部中国课氏和部附、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旅团长、日驻华使馆武官、师团长，1931年8月任关东军司令官，积极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指挥关东军侵占整个东北，裕仁天皇授予他金鸚级功勋章和一等旭日大绶章；1932年8月任军事参议官，1933年4月被裕仁天皇看中，担任天皇侍从武官长，6月晋升陆军大将，1935年12月列入华族，授男爵及金鸚一级勋章。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进攻南京后，裕仁天皇和陆军大臣杉山元等对能否顺利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心存疑虑，便亲自召见本庄繁，命他到上海去见松井石根，传达裕仁天皇的御旨，鼓舞日军士气。

松井石根为人狂傲，不把一般日本将佐看在眼里，但知道本庄繁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阿部信行、桥本欣五郎并称日本皇军五员大将，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结拜为异姓兄弟，特别是身为天皇侍从武官长，为裕仁天皇的亲信大臣，松井自然就对本庄繁格外敬重，执礼甚殷。

本庄繁向他传达了杉山元、米内光政等军界首脑要他一举攻克中国首都南京的指示，特别说明裕仁天皇对他的殷切期望，强调裕仁天皇至今未忘松井石根当年夏天叩见天皇时给他的御旨。

松井石根一直将出征前受到裕仁天皇接见视为一生的最大荣耀，此时手

握日本武士指挥刀，转身向墙上挂的裕仁天皇御影深深鞠一大躬，诚惶诚恐地回忆说：“本人永远难忘今年8月17日上午10时，到宫中晋谒陛下，拜受珍贵敕语：‘朕委卿以统帅上海派遣军，宜细察宇内大势，以速勘定敌军，扬皇军威武于内外，以应朕之倚重！’”

本庄繁点点头，轻轻说道：“陛下也至今记得你的奉答之词。”

松井石根说：“当时我再三拜谢，奉答如下：‘臣石根拜领上海派遣军之大命，受赐优渥敕语，不胜感激之至。谨奉戴圣旨，性仁性威，发扬皇军之宗旨，以安宸襟！’”

松井石根意犹未尽，趁此机会大出风头，滔滔不绝地吹嘘道：“当时陛下问我今后采取什么方针能达成派遣军之任务，我当即回答陛下：‘派遣军遂行其任务时，将与我海军密切协同，并密切联络当地我国官宪尤其是列国外交使团及军队，齐心协力，以迅速恢复上海附近之治安。’对我的奉答，陛下亦然欣俯允之！”

本庄繁听后脸上露出笑容，又命随从打开一个绘有日本皇室菊花标志的精致匣子，深鞠一躬后将其放在裕仁天皇御影下面的小案上，小心翼翼打开，取出良子皇后亲手制作的围巾，交给松井石根。

这在日本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礼遇，日本军部以此激发在国外重要将帅的军国主义狂热。松井石根双手接过，交给副官仔细收藏，讲了他誓死攻克南京的部署，本庄繁才高兴地告别松井石根，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本军部首脑复命。

松井石根如醉如痴地在《阵中日志》中写道：

顷接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电告攻克南京之决定。日前会呈报之意见业已奏效，不胜欣喜。若两军之后方联络畅通无阻，命令一下，至迟可于12月5日许下令全军出击。

此日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亲莅司令部慰问，赐优渥之圣旨令旨，又赐皇后陛下亲制之围巾，不胜惶恐之至，谨托奉答并向侍从武官长敬表热忱。

又，向属下转达上述圣旨令旨。

松井石根率领柳川平助的第10军和上海派遣军，兵分三路，气势汹汹杀向南京。

面对日军进犯南京，蒋介石伤透了脑筋，急忙研究南京战守之策，最后决定迁都重庆。12月5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命唐生智挂帅留守。

松井石根获悉蒋介石已离开南京，便于12月7日下达《攻占南京城要略》，命第10军和上海派遣军合力围攻南京。

松井石根命荻洲立兵中将率领第13师团和天谷支队从北路包抄南京。天谷支队攻占镇江，渡过长江，攻陷扬州，切断了江北大运河。第13师团从镇江渡过长江，攻占六合，占领滁县，进逼南京。

松井石根命牛岛贞雄中将指挥第18师团和国崎支队从南路包围南京。国崎支队从广德出发，经郎溪、石臼湖渡过长江，攻占浦口，切断了津浦线。第18师团从泗安出发，攻克宁国、芜湖，直逼南京。

松井石根亲自指挥第6、第9、第16、第114等4个师团从正面进攻南京。守卫江阴要塞的中国部队奋勇还击，面对数路围攻的日军打得英勇顽强，尤其是海军浴血奋战，牺牲惨烈。

12月6日，日军正面进攻的部队已达宣城、秣陵关、淳化镇、龙潭一线

南京外围阵地。从12月7日拂晓开始，松井石根下令向中国主阵地发起总攻，南京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

雨花台至中华门一线是通向南京的主要道路，松井石根特派第6师团担负攻击任务。师团长谷寿夫1882年生于日本福冈县，曾任日本驻印度武官、旅团长，1934年升为中将，任东京湾要塞区司令官，1936年8月率第6师团入侵华北，侵占保定和石家庄，11月在金山卫登陆参加淞沪会战，又由昆山经松江、嘉兴、湖州、广德向南京进犯，与第114师团共同进攻雨花台。

第6师团和第114师团受到中国军队88师两个旅的顽强抵抗。

88师曾参加1932年的“八·一三”上海之战，富有同日军作战的经验。这次参加保卫雨花台的两个旅长朱赤、高致嵩与所部官兵发誓，如雨花台失守决不生还，两旅官兵依托坚固的工事从容迎敌。谷寿夫几次进攻受挫，中国阵地前留下成堆的日军尸首。

谷寿夫见中国部队打仗勇敢，知道只靠步兵断难取胜，就向松井石根要求飞机和炮火支援。松井石根深知谷寿夫打仗凶狠勇猛，一般从不说软话，现在开口请求炮火支援，可能真正遇到了劲敌，当即拨归谷寿夫一部炮兵，并下令出动100架飞机，给谷寿夫助战。

谷寿夫得到支援，又对雨花台发起进攻。日军依仗飞机大炮猛轰，中国军队士兵士气高涨，未被炸死者仍英勇反击。谷寿夫的部属已成惊弓之鸟，被88师打得抱头鼠窜，乱成一团。

谷寿夫狡诈异常，他下令步兵停止进攻，只出动飞机，开动大炮，不停地狂轰乱炸，成吨的钢铁砸在雨花台的中国部队阵地上。谷寿夫的地毯式轰炸终于起了作用，88师两个旅官兵全部为国牺牲，雨花台阵地才告失守。

谷寿夫深知雨花台为中华门的前冲屏障，中华门则为南京的惟一陆路要道，因而攻下雨花台后即马不停蹄猛攻中华门。

担任防守中华门任务的是87师259旅旅长易安华，他曾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富有作战经验。他见日军炮火猛烈，如死守中华门只能束手就擒，主张主动发起反击，经请示南京卫戍副司令罗卓英，即率领一个团进攻莫愁湖的日军阵地。

日军攻下雨花台后认为中国主力已被歼灭，不会再有大的抵抗，突然受到易安华所部官兵反击，顿时慌了手脚，转瞬间丢失莫愁湖附近阵地。

谷寿夫闻报大怒，当即派出飞机和情报人员进行侦察，发现中国部队兵力单薄，就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派十倍于中国部队的日军发动进攻。双方在莫愁湖畔浴血苦战，最后，易安华和所率全团官兵全部殉国。

松井石根又指挥日军猛攻紫金山，中国教导总队官兵奋起反攻，迫使日军一度停止攻击。松井石根闻报亲自赶到现场，调动绝对优势兵力再度发起进攻，中国军队抵挡不住，被迫撤退，紫金山失陷。

谷寿夫见中国部队还在抵抗，命令日本炮兵以猛烈炮火轰击南京城内新街口、中山东路等人烟稠密之处，又用重炮将中华门城墙轰塌多处，命士兵以缆梯攀垣而入。中国军队抵挡不住，南京陷落在即。

唐生智知南京形势不可挽回，急忙发电向蒋介石请示战守之策。蒋介石于12月12日回电：“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唐生智下达撤退命令时，特别用蒋介石的指示来回答主要将领的责难：“南京守城，非守与不守之问题，而是固守的时间问题；在敌军火力优势，

长江得自由航行的情况下，欲期保持，颇属难能，故只可希望较暂时间之防守。既作短时间守城之望，则不必将全部之基干部队全部牺牲，须预为撤退之掩护。”

唐生智在南京城外指挥所用电报向主要指挥官传达完蒋介石的指示，长叹一声，命令一部分部队渡江掩护，大部分部队分头向芜湖、广德地区突围集结。

当时，中国各部队正在南京各地浴血奋战，将士们明知南京必失，但仍奋勇战斗，只希望多坚持一日就能掩护中国军民多撤出去一部分，以尽自己的责任。

在此危急关头，各部队收到唐生智不知从哪里发来的命令，指示相机突围，但从哪里突围、怎样组织掩护全无明确指示，想请示也找不到唐生智。各师长面临无可奈何的局面，打下去没有后方补给，人员、枪械无法补充；不打又向何处退，全无上峰命令。

各部队在混乱中只能按常识行事，纷纷向浦口撤退，明知渡江船只有限，总希望友军能控制住下关通往浦口的江面，齐心协力杀出日军的重重包围。

守城部队、政府官员、逃难百姓在一片混乱中争相夺路，前仆后踩，城门为之堵塞，死者不计其数。松井石根见状大喜，指挥各路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出动飞机轰炸，中国军民死伤无数，只有少数部队突围成功，十多万大军多为日寇凶残屠杀。

12月13日，日寇占领南京。12月17日，华中方面军举行侵占南京的入城仪式，松井石根骑着栗色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进入南京。美国作家戴维·贝尔加米尼生动地描写松井石根“凯旋入城”的情景如下：

12月17日，星期五，早晨，身材矮小的松井将军举行了入城仪式。这期间，浩劫有所缓和。松井因患慢性肺病刚刚发过高烧，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就被日本海军汽艇溯江而上送至南京码头，然后请进小汽车，来到城东疮痍满目的中山门三孔拱桥。

在那里，他骑上一匹英俊的栗色马，马鼻子上长着一一条很窄的表明马种的白色条纹……

响起了嘹亮但吹得走调的军号声，于是，松井便率领着桥本以及朝香宫的随员进入了被征服者的首都。

他面前的大街两旁站满了数万日军士兵。他使马前肢跃起，后肢站立，漂亮地把马转向东北方向遥远的日本皇宫。附近，日本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迅速用柔和而激动的声调对着麦克风说：“松井将军率领将士为天皇陛下三呼万岁。”

……松井骑马沿着精心清理过的路线，穿过大街和成千上万的欢呼的士兵，一直抵达城北部的首都饭店。

在南京首都饭店举行的为庆祝日本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的盛大宴会上，松井石根喝着美酒，拼命用尖嗓门吼叫：“陆军大元帅陛下万岁！”

日本电台技术员对这位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军国主义狂热感到吃惊，对他的尖声狂叫不以为然，赶忙把录音机声量放小，以防声量过大使信号失真。

松井石根意犹未尽，又指挥日寇第10军军长柳川平助、第6师团长谷寿夫等，对手无寸铁的几百万南京军民进行血腥大屠杀，使30多万中国人惨遭杀害，但也很快遭到各国人民的严厉谴责。日本当局为掩人耳目，只得将其

召回东京。日本投降后，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 29 章

南京大屠杀

集体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侵华日军兽性的恶性大发展，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耻大辱。这次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持续时间之长，屠杀规模之大，杀人手段之凶残，受害人数之多，迄今罕见。在当今文明社会的各种字典中，都难以找出一个恰当的词汇，形容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使用了各种残暴手段，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和放下武器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官兵达 30 余万人，是各种酷刑的“集大成者”。1947 年 3 月 13 日，在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上对南京大屠杀罪犯之一谷寿夫进行审判，公布其罪证事实时指出，在谷寿夫部队驻京期间，即从“12 月 12 日至同月 21 日”，“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 19 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 15 万余具。被害总数达 30 万人以上”。1982 年日本出版的《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日本史学家洞富雄，经研究、具体推算和周密调查，指出南京城区被害者不下 20 万人，郊区被害者 10 万人，全部被害 30 万人。

南京大屠杀，早已为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闻知并刻骨铭心，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但是，在日本尚有少数人，不正视历史事实，甚至公然歪曲事实，口出狂言，大放厥词，胡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被安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可以肯定地说，南京大屠杀是没有的事”，完全“是虚构”的，“纯属子虚乌有”。事实胜于雄辩，谎言毕竟是谎言，还是让血写的事实来作证吧！凡是富有正义感的人，在明了事实、闻见幸存者之控诉，便再也没有脸面为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辩护、并掩盖其所犯的暴行了。

12 月 13 日南京城陷落，侵华日军各师团按松井石根《攻占南京要略》的规定，从各门进入南京市内，分窜各区，进行血腥“扫荡”。当时，未及撤退留在城内外的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约 10 万余人，城外还有从淞沪战场退下来的众多病伤散兵。如何处理 10 万之众的俘虏，刚进城的日军部队曾请示过军司令部，得到的回答是“适当处分”。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可以将俘虏任意杀掉。虐杀俘虏的方针，在日军进攻上海时就已经确定了。日本侵略集团把侵华战争看作是对中国的“鹰惩”和讨伐，是“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因此可以使用最残酷和最野蛮的手段，包括杀害俘虏。日本军队在军国主义思想灌输下，视为天皇进行“圣战”为天职，在占领南京后，“皇军”神圣的狂喜几乎到了发疯的地步，以致进入南京城的日军，霸压大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并借搜查散兵为名，大肆捕捉无辜百姓和失去抵抗力的中国官兵。在占领南京的最初 6 周内，进行了野蛮而凶残的集体大屠杀。屠杀地点有：汉中门、鱼雷营、中山码头、大方巷广场、三汉河放生寺、草鞋峡、下关、龙江口、燕子矶、上新河、煤炭港和中华门外花神庙等十几个地方，被杀军民 19 万余人。南京几乎成为杀人屠场。

12 月 13 日，在长江下关、挹江门一带还聚集着很多难民和未来得及撤

走的中国军队。日军第 16 师团第 30 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的部队到达下关后，对聚集在江边的人群用机枪扫射，人群纷纷倒地，横尸江边，鲜血染红了扬子江水。另一支部队在挹江门附近向溃退的中国士兵开火，顿见首身分离、缺肢断臂的尸体横倒竖卧在沙袋堆之间。事后，佐佐木到一在作战记录《南京攻略》中写道：“共打了 1.5 万发子弹。”太平门城门口堆积着 500 余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护城河内尽是尸体。这一天，日本随军记者铃木二郎将见到的极其恐怖、凄惨的大屠杀记述下来：在中华门附近的城墙上，“俘虏们在 25 公尺高的城墙上排成一列，许多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冲着向俘虏们的前胸或腰部刺去，（俘虏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落到城外去了。只见飞溅的血雨喷向半空，阴森的气氛使人汗毛直竖，浑身战栗”。

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大屠杀，从 12 月 15 日开始了。

汉中门外集体大屠杀。12 月 15 日，日军将从安全区司法院难民收容所内搜捕的中国散兵、青壮年男子和警察等 2000 余人，押至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一时未断气的人，再被刺刀捅死，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幸免未死的原南京交通警察伍长德，作为汉中门外大屠杀的见证人，曾出席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揭露日军的屠杀暴行。他说：

12 月 15 日上午 8 点左右，忽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用刺刀把青壮年男子全部赶到外面，并被集中在马路上，共约 2000 人以上，11 点钟左右，我们全体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现胜利电影院）门前时，从队伍后面开来了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士兵和机枪，并由这几辆卡车在我们队伍前面开路，……下午 1 点到达汉中门，要我们这 2000 多人在城门里停下来，并被命令坐下。接着，两个日本兵拿着一根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 100 多人，周围由日本人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到下午 5 点多钟，我本人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我们带到护城河边上，赶到河堤斜坡下面。我见到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神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倒卧着的尸体。我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一扑，扑倒在乱尸堆上。就在我扑倒的同时，机枪响了，……我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了。机枪射击声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等到步枪声停止后，我感到尸堆上像是有人在走动……原来日本兵在尸体堆上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在这以后，我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大约还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熬不住了，就趁着天黑……好不容易逃回难民区。

伍长德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 5 寸多长的伤痕。这一天在汉中门外的秦淮河，还有四五百名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被机枪射死，倒在血泊中。15 日晚，日军用枪押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百姓 9000 余人，朝长江边鱼雷营行进。日军已在鱼雷营置 4 挺机枪，当 9000 余人到达时，4 挺机枪密集扫射，除殷有余等 9 人死里逃生外，余皆惨遭杀害。《纽约时报》记者都亭 12 月 15 日曾三次目睹日军集体屠杀俘虏的暴行。

12 月 16 日的大屠杀。16 日，日军从难民区搜捕万余名平民和散兵，其中数百人押至大方巷难民区附近的水塘边，用机枪射杀，尸体推进水塘，塘里的水被鲜血染成红色。其余全部押至煤炭港，于当天晚上，用绳绑后，用机枪射杀，尸体投入江中，16 日的集体大屠杀还在中山码头进行。这天下午，日军将汇集在华侨招待所及其附近的中国士兵和普通百姓 5000 余人，押至中山码头，令人群沿江边人行道排成一行，有些人双手被反绑着，日军在路中

每数十步放置一挺机枪，枪口对着人群，逼迫跳入江中，日军再用机枪扫射、用手榴弹炸、用刺刀戮，然后在尸体上浇上汽油，纵火焚尸灭迹。中山码头大屠杀的幸存者梁廷芳、白增荣于敌人屠杀时携手投江，幸而脱险。梁廷芳在1946年6月出席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12月16日，日军将难民5000余人押赴南京下关沿江排列，用机枪射杀。”梁廷芳和白增荣2人还在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罪犯谷寿夫时出庭作证。他们还于1946年10月7日联名向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报告，1937年12月16日在中山码头被屠杀5000余人，此报告现收藏在南京市第二档案馆内。

12月17日，在三汊河放生寺的集体大屠杀中，有4500余人丧生。从三汊河至水西门，遍地都是尸体，这一段就有五个万人坑：老虎门附近一个，水西门附近一个，汉中门外黄土山下一个，三汊河高鼓村对面一个，大同面粉厂后门仓库外一个。这五个坑都被尸体填满了。17日这一天，日军在煤炭港用机枪又屠杀3000余人。被屠杀者中还有南京首都电厂的40余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在12月13日以前，原南京首都电厂职工一直坚持发电，至13日南京陷落时才离开电厂，但进城的道路已断绝，几十名职工便躲进英商和记冷藏厂内。当日军搜查和记洋行时，除有证件证明其身分确系洋行职员而未被抓走外，电厂职工49人中，除副总工程师徐士英经洋行友人介绍，为敌人配置汽车电钥，另3人为敌人煮饭，余皆被赶至煤炭港江边，时江边早已聚集3000余名难民。日军从上午开始屠杀，每10人一组，初用机枪射死，直至晚上仍未杀完，后来就用机枪扫射和火烧，3000余名难民几乎全部被害。当年住下关宝塔桥东、日军在煤炭港放火烧房焚毙百姓的目击者说：“……我还看见日本兵把2000多人赶进煤炭港一个大仓库内，在房子上泼上汽油，放一把火，把2000多人都活活烧死了。”战后南京军事法庭经过调查和证人证实，判明17日在煤炭港江边，被拘禁者有3000之众，“初以机枪扫射，继集薪油之类，堆集茅屋四周，放火燃烧”，3000人“全部殉难于役”。

12月18日，日军第13师团103旅旅团长山田旃二按上级“处理掉”之命令，在草鞋峡进行了最大的一场大屠杀，57418人惨遭杀害。草鞋峡位于南京城北幕府山下，临江成狭长地带。南京失陷后，在下关一带长江沿岸聚集着众多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他们被日军驱赶囚禁在幕府山下的一些村落里，不少伤员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难民也因冻饿成疾、缺医少药、生病而丧生。18日，山田支队按“处理掉”之命令，将幕府山下被囚禁的5.7万余军民，用铅丝捆扎，赶至草鞋峡，用机枪集体屠杀，一时未断气的人在血泊中痛苦挣扎着，日军便用刺刀乱戮致死，然后用汽油焚烧尸体，将尸骸投入江中。草鞋峡大屠杀是南京大屠杀中一天在一个地方屠杀人数最多的一次。从山田的作战记录可以看到，因18日“竭尽全力”屠杀5.7万的中国军民，致使19日延期出发，“全体出动收拾”被屠杀的尸体。这一天又将从大方巷难民区搜查出来的4000余人押至下关，用机枪集体屠杀。

鱼雷营宝塔桥也是日军进行屠杀的重要场地。在这里屠杀的大多是无辜百姓，凶残的日军将被杀人群押至这里，或集体枪杀，或逼迫从高崖跳入江中摔死。在1937年12月份，日军先后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残杀军民3万人以上。12月份，在燕子矶江滩被集体杀害的军民达5万余人，这些人中有的从城内逃出来的难民，有的是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他们想在燕子矶渡江，到江北去避难。但日军已封锁江面，把他们围困在燕子矶沙滩上，用机枪扫射，致使5万余人遇害，堆积在江边和漂浮在江面上的尸体，到次年春

夏之交还无人过问，恶臭的气味远传数里之外。12月份，日军还在上新河集体枪杀2.87万余人，在南门外花神庙集体杀害7000余人，在下关九甲汗江边屠杀500余人。在南京有大大小小屠杀场几十个。江东门的旧桥被日机炸断后，用中国人的尸体堆接起来，上面铺上木板，当桥行走。

攻占南京后，日军一次次的集体大屠杀，造成尸堆如山、血流成河的惨景。1989年4月，由江口圭一、芝原拓自编辑整理的《从军日记》一书出版，是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佐证之一。《从军日记》是侵华日军小原孝太郎写的，在日军攻占南京这段时间里，他是第16师团的后勤兵，在进军南京路途中，他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书中在炫耀歌颂日军“胜利”的字里行间，也记下了目睹日军暴行的情景，如12月24日记去南京港领饲料，“我看了一下岸墙下边，在浅水的岸边，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无数具人的尸体，如同海滨的细沙一样安息在那里，足有数百、数千”。南京大屠杀凶犯之一第6师团长谷寿夫，为向上级显示自己的战功，在攻占南京的“军状报告”中写道：“河岸边全被尸体覆盖满了。”由于谷寿夫等日军头目的纵容，12月12—21日，中国被俘军民19万余人被日军集体屠杀了。

分散屠杀

当一批批中国军民被驱至屠杀场所、被集体屠杀时，在南京城内外，分散屠杀无辜者也在疯狂地进行着。在南京失陷的最初6个星期中，日军三五一伙、八九成群，在南京城内外，见民宅就进，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其中最为凶残和暴虐的是谷寿夫指挥的第6师团。

谷寿夫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之一。他性情凶狠残暴，素有“亚述魔王”称号，手下士兵大都凶猛剽悍。淞沪会战中，在金山卫乡就屠杀无辜百姓1050人，还血洗淞江镇，在上海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当12月13日谷寿夫指挥的第6师团占领雨花台，率先从中华门攻入南京后，他公然对部下宣布“解除军纪3天”，唆使部下开始大屠杀。参与大屠杀的还有中岛今朝吾率领的第16师团等。

暴虐成性的日军几乎以虐杀为乐事，以奸淫为快事。其屠杀手段花样翻新，极端野蛮残酷。有枪杀、刺杀、烧死、刀劈、活埋、砍头、溺淹（在水里或粪池中）、挖心、分尸、用锥子锥死、装入麻袋摔死、用军犬撕咬死、剖腹取胎、割生殖器、先奸后杀等等手段，被分散虐杀致死的人数达15万人之多。12月12日，乡妇王徐氏，在中华门外下码头，被日军砍头并焚尸。13日，谷寿夫部下在中华门堆草巷纵火烧屋，乡民魏小山驰往救火，被砍致死。载于1938年2月7日汉口《大公报》的佚名文章《京敌兽行目击记》，真实地记述了日军的暴行，“他们用钉子和针向我们同志身上直刺，直刺成了血人，被难同志有时叫骂怒视，他们会连眼睛也刺上两锥子，最后用刺刀把喉咙冲破，血像泉水一般的涌出来。而兽性大发的日军却在一旁拍手叫好”。一位目睹日军活活烧人惨状的人说：“20日，鬼子在太平路放火，火起后强迫百姓们上前救人，及到该处，鬼子即将百姓捆起丢在火中，活活烧死，鬼子鼓掌大笑。”13—17日，驻中华门外的日军，勒令乡民30余人，进入水塘捞鱼。时值严冬季节，进入水塘捞鱼者冰冻致死，不从者被杀。日军还将一老人捆绑，悬吊树梢，以枪瞄准，当作打靶目标，终至命中，绳断摔死。受害人梅福康说：“日本兵把我们12人一起赶到小土堆旁，要我们围

着土堆脸朝外围成一圈，然后用布条将人与人相互的手和脚捆绑连接起来。待捆好后，日本兵就残酷地向我们这群人圈摔手榴弹。在手榴弹爆炸后，还惟恐我们没有死，又凶恶的跑来用刺刀刺。……我本人耳根周围、颞部和舌根都被炸伤，又被捅了3刀。……在这次受害的12人中，幸存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邻居。我家8口人，7人惨遭炸死。”更为残忍的是，日军叫被杀的人自己挖坑，然后让其站在坑边，当日军开枪后，被打死的人就自己倒进坑里。或让被杀的人站在自己挖的坑内，日军再填上土活埋。小原孝太郎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的：“27班去征集粮草时，在农家的草堆里发现了4名残兵败将，便把他们抓来了，我和×××拔出战刀砍过去，脖子没有被完全斩断。接着，×××的×××也拔刀便砍，脖子还是没有被砍断。这时，××××说了声：‘看我的’。飞刀一砍，脑袋飞到了前边，鲜血随之四处飞溅。他的手腕实在高超。”

还有古之未闻、今之未有以杀人多少比输赢的野蛮之事。杀人比赛的消息于1937年11月30日、12月6日和13日，登载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它以显著的位置炫耀日军在中国的“战绩”和“武功”，称赞两个杀人恶魔为勇士，并将两人手持战刀的合影照登载于报端。此二人是中岛今朝吾的第16师团的两名少尉军官，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岩。从上海出发后，两人相约杀死百人。因此，在向南京进军途中，他们一路挥刀杀人。至汤山时，向井杀了89人，野田杀了78人，两人杀人均未达到百人，比赛因此继续进行。据12月12日英文《大美晚报》登载：“当12月10日进攻紫金山之际，两人的杀人记录居然达到105人和106人。12月10日中午，两人各执已成缺口之刀，相值一处，野田道：‘我已杀了105人，你杀了多少？’向井回答：‘我杀了106人。’两人相互哈哈大笑。向井赢了1人，但未悉何人先杀到100人，两人乃复相约，将比赛目标展至150人。彼等乃复于昨日开始。”从12月12日起，向井与野田的杀人比赛继续进行。杀人比赛出现在中岛今朝吾所率的第16师团，绝非偶然。因为中岛今朝吾为人凶狠，是个“具有虐待狂气质的冷酷的人”，他以“黑色帐篷”为第16师团的部队代号，令其部下对任何人都不宽恕。当他接到松井石根、朝香宫“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后，便大规模屠杀被俘中国军民。1937年，中岛被任命为侵华日军南京警备司令官，以中国军人来自首可以免除惩罚的骗人布告，诱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无辜百姓，其凶狠残忍令人发指。在这种师团长的教唆、纵容下，向井和野田两人的杀人比赛得到称颂和赞扬。谷寿夫的第6师团第45联队中队长田中军吉比野田和向井更加疯狂，他用“助广”军刀，狂杀俘虏和无辜百姓多达300余人，田中军吉杀人的凶器“助广”军刀的照片，收进日本军官山中峰太郎编写的《皇兵》一书中，照片下标明“曾杀300人之队长（田中军吉）爱刀助广”。孰知，为夸耀日军“辉煌战绩”的报道和照片，战后却成了审判日本战犯指挥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最好罪证。

据《谷寿夫战犯判决书》中统计，第6师团进行屠杀的地点就有：雨花台、雨花路、雨花村、宝塔山、扫帚巷、燕翅口、制造局，安德里、安德门、中华门车站、北山门、窑湾街、珠珠巷、黄泥塘、下码头河边、土贵桥、西街、土显庙、见子桥、养回红村、红梅巷、中华门城门口及其内外、小市口、大思古巷、小思古巷、桑树园、长乐路、长乐街、胭脂巷、三元庵、仁义桥、仁厚里、正觉寺、武定门、紫竹园、牵牛巷、菱角市等近100处。同时，攻占光华门的第9师团，攻陷中山门、和平门的第16师团，进入南京后同样对

南京市民进行疯狂屠杀。当时随同日军进城的《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在目击了光华门的情景后作了这样的记述，“我随同攻陷南京的日军一道进城，在城内呆了4天，目击日军无数暴行。……从光华门北上，走向中山东路，在光华门马路两边，看到接连不断的散兵壕，都填满了烧得焦黑的尸体，马路中间横倒的许多木柱子下面，压着的都是尸体，四肢断折飞散，不啻是一幅地狱图画”。我“当时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自己也就是地狱里面面目狰狞的‘狱卒’了”。通济门、中华门、中山门等地带，遭日军屠杀的南京市民，不计其数。通济门外的地区已成无人地带，据住在通济门裘家湾一带的居民说，当年大屠杀时，躲藏在东关头涵洞里的数百名同胞都惨遭日军杀害。这个1937年以前被称为南京的水陆运输码头繁华地区，从12月13日起遭日军血腥大屠杀，其后竟成了无人地带，呈现出一派“尸横遍野”的凄惨景象。《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一书的作者小侯行男在该书中说：“留在市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日军‘一扫而光’。”

日军进入南京后，四出强奸，一逞淫威，往往还奸杀并行，其凶残令人发指。据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统计，12月16—17日两天，遭日军蹂躏者已越2000人。审判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在指控谷寿夫及部下罪行时指出，日军奸淫妇女，其“方式之离奇惨虐，实史乘所未前闻。”如12月13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5号，被日军轮奸后，剖腹焚尸。怀胎9月之孕妇肖徐氏、16岁少女黄桂英、陈二姑娘，及63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污。13—17日，日军在中华门外，于轮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和尚与之行奸，和尚拒不从，口中念着“阿弥陀佛”，日军见了拍掌大笑，说你长的东西失去了作用，当即割掉和尚的生殖器，和尚疼痛致死”。日军强迫儿子强奸母亲，父亲强奸女儿，兄强奸其妹，甚至日军自己强奸，令其丈夫观看，若稍示反抗，当即杀死。这种现代文明社会早已消亡的乱伦丑行，日本兵却强迫中国人去干，以此取乐，一旦中国人不从。便被杀死。逃入安全区之妇女，也常遭闯入安全区日本兽兵之害。对于日军的淫暴行为，在南京的外国人实感震惊。一位外侨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实际上，1/3的强奸是在白天干的。”军医蒋公毅睹日军白日宣淫的兽行，在《陷京三月记》中写道：日军“赤身裸体，公然白天宣淫，迭经外邦人士目睹，当面斥为禽兽。”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小至只有十一二岁的幼女，长至六七十岁的老妇。最常见的手段是轮奸，年幼少女往往被轮奸致死。更为残暴的是，日军奸后把被奸妇女杀死，令其赤裸裸地躺在大街上或田地边，有的被害妇女仰卧地上，小衣撕破，下身肿烂，小腹像鼓一样隆起。有的母亲和血污的胎儿躺在一起。有的妇女被奸之后，日军又用木棍由下部捅向腹部致死，有的奸后又被剖腹，等等。甚至有的以残虐妇女取乐。据一位目击者回忆说：日军“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的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军则在旁拍手大笑”。曾参加血洗南京的一等兵田所耕三讲道：“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部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20人玩弄。在仓库周围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好。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

可以说，在南京大屠杀中，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强奸完就将被害者杀

死。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强奸，若没有上司的同意，是干不成的。在崇善堂收埋的 11.2 万多具尸体中，有女尸 2000 多具，其中多数是奸后被杀的。

践踏六朝古都

具有悠久历史、风景秀美的六朝古都南京，在日军占领后，被阴森恐怖的屠杀、疯狂野蛮的抢掠、丧尽天良的奸淫袭击着，破坏着。一位外侨这样写道：“12月10日那一天，南京依然美丽如昔，还是秩序井然。今天，劫后的南京，满目荒芜，一片焦土，到处是破坏的痕迹……宛如人间地狱。”市内大部分房屋被破坏，商店被抢劫。日军闯入民宅抢劫财物，甚至连妇女身上所戴的饰物也不放过，往往抢后将房子烧掉。田伯烈所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写道：“12月20日，星期一，暴行继续不已。全城大火蔓延。午后5时，我偕史密斯君乘车出外，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在店铺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口眺望，14处火舌，向天空飞腾。”南京最漂亮的建筑物交通部大厦，连同富丽的礼堂，已被火烧了。《大公报》于1938年7月连载李克痕的文章《沦京五月记》，叙述当时南京的凄惨景象：“敌人又到处纵火焚烧房屋，尤以中华路、太平路、夫子庙等处为甚，烧得片瓦无存。往日的繁华街市，今日却变成了一片废墟。”日本《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石川达三，目击了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写了《活着的士兵》，发表在《中央公论》上，书中是这样写的：“坦克开进了城，无数敌军的尸体被压得稀巴烂……南京已成一片火海……大街上还躺着不少尸体，暴晒了好几天，已经发黑了。夜晚，狗和猫争先恐后地来啃尸体。其中有一具尸体（只）剩下骸骨，可是头发却没有拔掉……”“在南京，硝烟、尸臭味、血腥味混杂在一起，横倒竖卧的尸体，身首分离，肠肚满地，南京简直成为人间最可怕的地狱。”

贪婪财物、疯狂抢掠亦为日军暴行之一。到处抢掠的不仅仅是普通日本兵，就连日军上层军官也到富有殷实人家，掠走珍贵文物、字画等中华文化瑰宝，带回日本借以炫耀。南京大屠杀罪魁之一的中岛今朝吾，因名声太臭，被召回东京时，把从南京掠夺的大批赃物也带回国内。国民党的总统府、蒋介石的公馆均遭洗劫。南京市博物馆及收藏许多珍奇矿物标本的南京地质矿产博物馆，均遭破坏。地质博物馆内的贝壳、树叶的化石、珊瑚、古代容器，等等，任何一件都是稀世珍品，瞬间即被毁坏。

安全区内的外侨住宅，也不断受到日军“光顾”。日军寻找到喜爱的东西，便毫不客气地拿走。各国使馆也未逃脱这场浩劫，英、美等国的使馆，甚至日本的盟国德国使馆，也不断受到日军的骚扰和抢劫。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临时代办罗森，在12月8日，与随员为躲避日机轰炸乘船驶入长江。12月18日，罗森等和英、美等国的外交官想返回大使馆，遭日军拒绝。罗森写道：“因为日本人不愿让我们看到恐怖的日本军队对南京市民失去理智的报复行为。”至翌年1月25日，罗森从上海返回南京，看到的是市区商业中心完全毁坏了，市内到处有火光。罗森不仅把看到的日军破坏南京的情况写成报告寄回国内，还把美国传教士麦奇拍摄的胶片内容的记录资料送往柏林。

迟至 1938 年 3 月 4 日，罗森还不断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材料发回德国，称日军是“兽类的集团”。法西斯德国的一个外交官，站在纳粹德国的立场上，认为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残暴行为，“制造了一种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危险气候”，对德、日法西斯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是丧失了“理智”。但他发回柏林的报告，却真实地反映了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和对六朝古都南京的蹂躏，成为日军暴行真实而珍贵的佐证。

不安全的安全区

南京失陷前，在南京的未撤退的各国人士、教会神职人员等，效仿上海沦陷后的做法，自愿组织了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南京市内设立一个安全区，以使南京市民有避难之处。安全区的总负责人是德商雷伯，总办事处设在国民党外交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安全区的范围，南起汉中路，东为中山路，北为山西路及其以北一带，西为西康路。每一条出路口，都以红十字会会旗为标志。安全区内有几个难民收容所。实际上，安全委员会是一个难民救济机构。在南京沦陷前，原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选拔 450 名警察协助维持秩序，还拨米、面、盐等生活必需品和现金，供国际委员会救济难民使用。因此，直到沦陷前，南京难民区内秩序良好，一切井然。当时在难民区避难的男女老幼约 30 余万人，他们怀着在安全区内可以躲避战火的幻想，扶老携幼来到安全区内。国际救济委员会曾向中日双方交涉，要求承认安全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军事机关，不轰炸，使留在安全区内难民可以避难。中国当局完全同意并承认安全区。日本方面表示安全区内不驻扎军队，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袭击”。可以说，日军基本上是同意安全区存在的。

但日军攻城开始后，根本不受任何限制地开炮。12 月 11 日上午，日军炮弹便打中了安全区内法籍人开的福昌饭店，当即炸死 40 余名难民。13 日南京陷落后，未来得及逃出的士兵纷纷跑到安全区内要求保护，据当时在安全区服务的一位外籍人士记述道：“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国际委员会主席亲赴汉中门，与进城的日军说明难民区的情况，并交上一份公函和保护难民的计划，同时也向日方提出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望贵军当局重视人道，保护俘虏”并“避免牵累无辜平民”的要求。

这天上午 11 时，一队凶神恶煞般的日军官兵进入安全区，20 多个难民见后惊慌奔跑，日军举枪便射，奔跑的难民当即毙命。当时，不管在哪儿，“凡遇见日军而奔跑者”，一概格杀勿论。此后，日军按照上级指令，在难民区内大肆搜捕和押走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青壮年男子，甚至一般市民，将其驱至屠杀场所。日军完全违反 1929 年 7 月签订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中有关在战争中对待俘虏的规定，残暴地屠杀俘虏和无辜市民。12 月 16 日是日军在安全区内疯狂搜捕和屠杀的一天。这一天，日军从司法院内难民所中搜捕散兵和青壮年男子、警察 2000 余人，押至汉中门外集体屠杀。晚上，日军又把附近一个难民所中的 1300 余人押走，还从五条巷 4 号难民区内抓走数百人，在中山路法官训练所内抓走 100 多人，从华侨招待所抓走全部中、青壮年男子，他们当中有散兵，但大部分是普通市民。他们被押到大方巷塘边，被机枪射死。在农村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内的 70 多个难民，无辜被拖出枪毙了，任何一个人，只要发现手上有硬茧，日军就认为是当兵的证据，必

杀死无疑。因此，黄包车夫、木匠和其他体力工人，往往被捉去杀死。安全区内，分散被杀的难民尸体横陈街头。

逃入难民区内的妇女并未幸免于难，她们常被闯入的日军奸淫蹂躏，或被掠走，作为日军官兵奸淫行暴的工具。在金陵女子大学避难的妇女，在校内被强奸的有 11 岁的小女孩和 53 岁的老妇。12 月 15 日夜，大批日军闯入金陵大学校舍，当场强奸 30 名妇女，有几名妇女被 6 名日兵轮奸。而金陵大学与日本大使馆近在咫尺，隔街相望，试想一向标榜有严明纪律的“皇军”，若不得最高当局的认可，胆敢在大白天肆无忌惮地行奸施虐？这一天，在难民区内，一昼夜间发生的强奸、抢掠、殴打事件有 100 件以上。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 1000 人，有一位妇女被强奸 17 次之多。一个兽兵在强奸时，旁边一个 5 个月的婴儿哭声不断，兽兵竟活活将婴儿闷死。金陵女子大学内住有数千名妇女，有外国人负责把门看护，使日本兵白天不能闯进去行奸。但每当夜晚，他们便翻墙进去“摸彩”，抓住妇女，即行奸污。失去人性的日军，只要碰见妇女，不分场合和时间，便行奸施暴，竭尽野蛮之行为。1937 年 12 月 20 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指出：“难民区内每天有許多妇女横遭蹂躏，其中有牧师的妻子，有青年会工作人员的妻子，有大学教授的妻子，他们平时都是洁身自爱，清白无暇。”国际委员会先后向日本大使馆交上 428 件《日军暴行报告》，12 月 13 日至年底向日本当局递交 170 件《日军暴行报告》，1938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12 日又交上 17 件《日军暴行报告》，这些报告所述日军暴行都是发生在难民区内。1 月 28 日，侵华日军司令部下令解散难民营，强令难民返回自己住处。因此，1 月 14 日至 2 月 9 日国际委员会提交日军当局的 240 件《日军暴行报告》，大部分是记录难民离开难民区后被杀、被抢、被奸淫的日军暴行。

屠杀新招数

12 月 22 日，驻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公布“签发平民护照”令，在市内张贴布告。布告中说：“自 12 月 24 日起，宪兵司令将签发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倘有老弱病人，须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此令公布后，在南京市内设立多个良民登记处，当时的金陵大学、宁海路、上海路、金陵神学院、金大附中等地均设良民登记点。在难民区内设良民登记点，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 30 余万难民，更主要的是为搜查中国散兵。从满铁株式会社派到南京的“南京特务班”写回的报告，就可以看出日军当局发放“良民证”之真正用意和目的。“南京特务班”是 12 月 24 日进入南京开始工作的，1938 年 1 月 21 日写回的第一次报告中说：“我军认为，由于南京整个被皇军包围，完全没有逃跑余地，因而在这些难民中必然潜伏着很多残败兵、不法分子。因此，直至 1 月 6 日，每天进行严格搜查，努力将其查出。查问全体人员之后，已清除多数残败兵，对其他普通无辜良民发给证明其为良民的‘安居证’，使其安居乐业。”

为了能让当过兵的人自首，在金陵大学登记点，日军采取欺骗手法，以“如自动承认”、可以保全生命、获得工作为诱饵，致使难民区内二三百人

上当受骗，甚至没当过兵的平民，为得到一份工作，也去自首。结果，这二三百人全部被押走杀害了，只有 10 余人死里逃生，逃回难民营中。在宁海路登记点，有数十人承认当过兵，结果全被杀害。一个从虎口逃回的人回忆说：“有一天上午，我记得是个晴天，日本兵在我家一带挨户搜查，已经将许多人集中在宁海路上，查看他们手中有没有老茧，头上有没有帽箍，主要看是不是当兵的。我自料逃不出去，只好躲在家里。吃过中饭以后，大概一两点钟的样子，四五个日本兵到我家搜查，他们发现我手上有打铁留下的硬茧，就硬要把我带走。我母亲哭着说：‘他不是当兵的，是做铁匠的。’并拿出铁匠工具给他们看，他们根本不理睬，还恶狠狠地用枪托把我父母打倒在地，吆喝着把我强行带走。……日本兵把我带到宁海路，那里已经有 200 多个被抓来的人……我们被赶到一个凹地上，旁边有一个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临下架起机枪……日军军官一声令下，机枪一齐向我们射击，一颗子弹从我头上擦过，鲜血直流，我只觉得头上挨了一闷棍，顿时倒下去。……当我醒来时，已是深夜，日本兵早已走了。我从死尸堆里慢慢爬出来，满身是血污，顺着原路摸回了家。”由此例可以看出，日军当局发放良民证是继续屠杀的新招数。当年曾参加过攻占南京的一个日本兵冈本健三战后说：“本人曾经在现场亲眼看到，日本军占领南京之后，对于谁是良民，谁是便衣队，是分辨不出来的。因此，日本军队就制发一种良民证，我隶属的部队每天都在办理登记，叫他们填写出生年月、性别、职业等项目。可是，会写字的中国人很少，对于不会写字的人，就以口头说明，由于语言不通，能讲得清楚的，算他运气不坏，如果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的，就认为他可疑，把他搁在一边，解决掉了事。当枪声响起的时候，场内哭声大作，争先奔逃。可是，四面八方都喷出机关枪火焰，结果都是死路一条。那一次大概解决了四五百人。”在良民登记骗局中，有多少人被杀，已无法统计出精确的数字，但我们从“南京特务班”写回的第二份报告中，可以知道，“自去年（1937 年）12 月 22 日至本年（1938 年）1 月 5 日，协助中岛兵团进行的盘查活动，清出了大约 4000 名的残败兵和抗日分子。1 月 6 日到 2 月 25 日间，特务机关得到天谷警备支队的协助，又在城内外继续进行盘查，清出约 500 名”。由此看出，从 1937 年 12 月 22 日至 1938 年 2 月 25 日之间，仅“南京特务班”参与的“良民”登记，就将 4500 人屠杀了。“南京特务班”的第三份报告中说，在南京沦陷前，留在南京的人口是 38 万，截止到 1938 年 3 月末，登记领取良民证的只有 23.5 万余人，分散住在市内 5 个区内。当时，登记工作还没完全完成，但 38 万人与 23 万人之间的人数差额之去向，该报告并未说明。其实也用不着说明，他们之中的多数被屠杀了。

日军最初 6 周的大规模屠杀、奸淫、烧抢等暴行，世界各国均有报道，并遭到国际社会舆论的抗议和谴责。但日军当局我行我素，屠杀几乎持续了 3 个月。究其原因，是日本统治集团制定的对华方针造成的。1937 年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就发表声明，“为鹰惩中国军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今已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已经表明日本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对待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率军进犯南京时，就曾充满杀气地说：“降魔的利刃现在已经出鞘，要发挥它的神威！”正是日军实行的“大体上采取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以及参谋长下达的“杀掉俘虏”的命令，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30 余万中国骨肉同胞被残杀了。

销尸灭迹

侵华日军为掩盖大屠杀的罪证，在血腥屠杀的同时，就进行销尸灭迹的工作。曾在12月17—19日参加屠杀燕子矶被俘军民并处理被害者尸体的日军第13师团山田旅团第65联队的一名下士说：“为了对尸山进行善后处理，特别动员了别的部队。在善后处理阶段，用整桶的汽油把尸体全部烧掉了。这是因为把枪杀、刺杀的尸体原封不动地扔进江里，总会留下某些形迹，所以必须尽可能地把尸体‘换换装’再抛入长江。”曾为南京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部员太田寿男被俘后供称：他于16—18日奉命处理尸体。碇泊场司令部拨出运输兵800名，专门进行运输和处理尸体。太田寿男与另一名军官安达少佐各率400名。经太田寿男直接处理的尸体有1.9万具，经安达处理的尸体有8.1万具，估计其他部队投入江中的尸体有5万具，以上合计处理的尸体共有15万具。以上是日军开始大屠杀不久集中处理的中国军民尸体。但由于侵华日军在最初6周内疯狂大屠杀，致使城内城外、农舍民宅、街道田野、江边沟旁被杀中国军民的尸体比比皆是，尸堆如山，日军销尸灭迹的工作，难以单独完成，不得已才允许一些慈善团体和个人参加收尸埋尸的工作。参加收尸埋尸工作的团体有红卍会、崇善堂、南京红十字会分会、同善堂、回民掩埋队等，还有一些个人及伪职人员。

“南京特务班”进入南京后，曾协助1月5日刚成立的伪自治委员会的收尸埋尸工作，他们写给满铁株式会社的第二份报告，称赞红卍会收尸埋尸工作成绩显著。报告中说：“红卍会的尸体埋葬队（队员约600人），1月上旬以来，在特务机关指挥下，连日涉足城内外掩埋死尸，截止到2月末，埋葬的尸体约达5000具。”在第三份报告中又说：“至3月15日为止，已把城内1793具、城外29998具、共计31791具尸体收容在城外下关地区及上新河地区的指定地点。”但仍有不少尸体需要收埋，“现在每天需要卡车5—6辆，民工200—300名”。直到5月份，红卍会共收埋43123具尸体。

崇善堂共收埋113267具尸体，其中男尸109363具、女尸3091具，孩尸813具。红十字会收埋13722具尸体。回民掩埋队专门负责收埋被害回民的尸体，在3个多月中，共收埋回民尸体400余具。南京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在雨花台、花神庙等处，组织难民掩埋7000余具尸体。伪南京市政公署令卫生局将灵谷寺、马群一带无人认领之尸骨3000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碑”。碑文云：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余奉命董京市，惟时去南京事变将及一载，城闾丛莽、山巅、水埃有遗骨焉，余既收残骸于城上，得二十有六，而瘞之。越二月，村民来告茆山、马群、马鞍、灵谷寺诸地遗尸尤多，乞尽瘞之。乃下其事于卫生局，选夫治具悉收残骨得三千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深埋以远狐兔，厚封以识其处。立无主孤魂之碑，且使执事夏元芝以豚蹄只鸡酒饭奠之。俾妥幽魂。呜乎！诸军遭时丧乱膏血肉于荒原，寄骸骨于丘陇。为军为民为男为妇为老为稚，有后无后举莫能知。人生僭痛，莫大于生无所养，死无所丧。

况暴骨无依如诸君者。虽然死生有命，修短有数，洵如达人之论，彭殇可齐。随化俱尽。盖人之所争者，不在久暂之岁月，而在不朽之德业与精神也。余既怜而瘞诸君，又以为诸君告。二十八年一月，督办南京市政高冠吾记。

收埋尸体的工作至 1938 年 5 月才告结束。经慈善机关收埋的尸体有 15 万具之多，连同被侵华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的 19 万余人，在南京大屠杀中，受害者总数达 30 万人以上。

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受到世界各国舆论的谴责。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召回松井石根及其部下柳川平助、中岛今朝吾等将校 80 余人。他们回国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受到奖励。松井石根被任命为内阁参议，日本政府为他叙勋。1944 年，松井又担任了“大东亚开发公司”总裁，参与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柳川平助被召回东京后，裕仁天皇还亲自接见了她，奖给他一对雕有皇家菊花纹章的银花瓶。松井石根的参谋长武藤章亲自指挥了南京大屠杀，召回东京后被东条英机重用，提升为第 14 方面军参谋长，协助东条英机偷袭珍珠港。但历史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及帮凶武藤章，受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被判处死刑，送上了绞刑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南京大屠杀罪犯谷寿夫，进行杀人比赛的凶手向井敏明和野田岩，还有用军刀杀死 300 人的田中军吉，战后经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判以死刑，1947 年 4 月 26 日被押至雨花台，实行枪决。

南京大屠杀是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是侵华日军最凶残的血腥暴行之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院内 13 块小型碑雕，记载着南京各处大屠杀地点的情况，它们与馆内收藏的大量真实史料、图片及血泪控诉书，及尸骨陈列室内的累累白骨，是对日军血腥暴行的永久控诉。

第 30 章

华中大会战

对华“新政策”

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军部法西斯分子头脑更加狂热，磨刀霍霍，企图一举灭亡中国。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是个花花公子，一味追随日本军部扩大侵华战争，他口吐狂言说：“南京已经攻克，看来蒋介石政权已陷入真正的困境，只要我们再推他一下，就会垮台！”

南京沦陷的第二天，即 1937 年 12 月 14 日，近卫文麿召开内阁会议，重新研究与中国的和谈条件。内务大臣末次一夫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叫嚷说：“进攻南京，乃因中国方面无视日方寻求重返日华提携大道所致。松井军司令官最后劝降之目的，也在于此，但中国方面毫无反省之意，日本方面也有改变观点的必要！别无他法。”

陆军大臣杉山元、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认为，原来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太低了”，当时只要求取消《塘沽协定》、《梅津一何应钦协定》、《土肥原一秦德纯协定》，取消冀察、冀东两政府，设立包括卢沟桥在内的河北省非武装地带，“太便宜”中国人了，要求提出更苛刻的条件。

广田弘毅说：“在帝国付出大量牺牲的今日，以如此轻微的条件同蒋介石会谈，实在难以同意！”

杉山元说：“中国事变乃东亚之一悲剧，但为使悲剧不再重演，日本此际不能回避彻底手术。就此意义而言，攻占南京只是中国问题之序幕，真正的持久战则自今日始，始终不能放松鹰惩抗日政权！”

近卫文麿见大部分内阁成员都同意杉山元等人的意见，就不顾参谋本部一些人的反对意见，12 月 21 日操纵内阁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日华和平谈判问题，对驻日德国大使的复文》：

鉴于最近战局的迅速发展，事态已有重大转变，帝国政府拟提出以下基本条件。中方如全部承认以此为讲和原则，并有向帝国政府表示乞和之态度，则帝国亦准备按此开始日华直接谈判。上述原则如不被接受，虽属遗憾，但帝国将不得不以不同既往之全新观点处理事变，此意希予谅解。

基本条件如下：

（一）中国须放弃容共、抗日满政策，并与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合作；（二）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建立特殊机构；（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缔结经济密切合作之协定；（四）中国偿付帝国所要求之赔偿。

1937 年 12 月 26 日，陶德曼将日本逼迫中国投降的四项条件交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催中国在年内做出答复。蒋介石听了汇报即命外交部长王宠惠询问日本所提四项条件的具体内容。陶德曼于 1938 年元旦到武汉会见王宠惠催逼。

蒋介石看了日本提出的条件，感到断难接受，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

绝作答。”

于是，蒋介石以重庆为战时首都，把军事统帅部移至武汉，摆出与日军决战架势，向全国发出响亮的抗战号召：“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做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主！”

接着，蒋介石命外交部虚与陶德曼周旋以稳住日本，抓紧机会改组政府机构，枪毙了丢失济南等地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3战区司令韩复榘。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为此大出风头，成了世界著名的抗日伉俪。西方记者宣传说：“宋美龄在世界舆论的心目中差不多是一位能从日本鬼子侵略下救国的圣者。”

近卫文麿见蒋介石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就向蒋介石提交强硬照会施加压力：

中国关于谈判的答复，已经推迟了好几次……最后收到中国的答复时，我们发觉仅仅是一个敷衍的答复。我们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日本提出的基本条件来谋求和平的意念，日本帝国现在决定放弃承阁下的政府竭诚帮助而进行的和平谈判，并且从一个完全新的立场来处理目前的事件！

对日本施加的压力，蒋介石命外交部长王宠惠、新任行政院长孔祥熙以让日本详细解释四项条件为由拖延时间。对此，1938年1月15日，裕仁天皇亲自召集御前会议，展开激烈争论。

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头脑比较冷静，他强调说，绝对不能不等中国方面的最后明确答复，在日本举国一致的决心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即转入前途暗淡的长期战。

杉山元反驳多田骏的意见说：“限期已到，中国未来回电，证明他们无和平诚意，我主张应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在其屈服以前继续作战！”

广田弘毅与杉山元狼狈为奸，以外交家身分蛊惑人心说：“根据长期外交生活的经验，我认为，中国方面的应对姿态，显然并无和平的诚意，参谋次长是否不相信我这个外交大臣？”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更以辞职来威胁：“政府是相信外务大臣的，而统帅部不相信外务大臣，亦即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只有辞职！”

多田骏有一些战略头脑，他看到了日本硬打下去的危险性，声泪俱下说：“明治大帝曾有仰勿辞职的圣谕，值此国家重大时期，所谓政府辞职，成何体统！”

杉山元指着多田骏的鼻子大骂，声称陆军大臣可以行使人事权，断然更换陆军统帅部首脑。陆军省军务局长町尻等人也向多田骏施加压力说：“今日的问题，多田骏次长若不谅解，致使内阁总辞职，则对国内外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在陆海军大臣等的压力下，多田骏回到参谋本部，与总务部长中岛、情报部长本间雅晴、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等人商量，由于“不能忍受因中国方面的态度致使日本内阁崩溃”，因而“决定在当夜会议重开时做出让步”，编造理由声称：“大本营陆军部本不能同意，但考虑内阁崩溃的不利，决定予以默认，不再提出反对。”

于是，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同中国停止交

涉。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府声明》称：

（日本）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竟策动抗战，内不体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全局之和平。

因此，今后帝国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杉山元等认为此声明太软弱了，近卫只得又于1月18日发表补充声明称：

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即可达到目的，但因未至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时期，故于此次开国际法上之新例，而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虽流传宣战之说，但帝国并非敌视无辜之中国民众，又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方针，故亦无需宣战。

这就是日本以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投降而采取的“对华新政策”。为贯彻此政策，日本在1938年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对华长期战争体制：

首先是在中国占领区建立伪政权：在东北和察北，主要是巩固“蒙疆联合委员会”。此前，日寇在张家口建立了以杜运宇、于品卿为首的伪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了以夏恭为首的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了以云王、德王为首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然后将三个伪政权合并为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内地成立的第一个大傀儡政权。在华北，炮制出以江朝宗为首的“北平临时治安维持会”，以高凌尉为头子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还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王克敏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在上海浦东区成立“上海市大道政府”，在南京组织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在杭州炮制出伪杭州治安维持会。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日本又在策划建立由梁鸿志任行政院长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加速建立全国性的傀儡政权。

与此同时，日本军部推动近卫内阁完善国家总动员体制，操纵议会通过了超过80亿日元的军费预算，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电力管理法》、《飞机制造业法》等80多个法西斯法令。日本军部制定出《昭和13年（1938年）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自昭和13年2月至同年夏季，中国事变帝国陆军作战指导纲要》，都规定“运用政略和战略，迅速结束对华战争”。

为便于统一指挥日本侵略华中的军队，日本陆军于1938年2月18日取消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司令部，设立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命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

畑俊六1879年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在日本驻德国、瑞士使馆任过副武官，其后任陆军大学教官、陆军参谋本部作战班班长、第四部长、第一部长，当过师团长、航空本部部长、驻台湾日军司令官、陆军教育总监。

在日本军界，许多人认为畑俊六是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将军，特别是在任侵台日军司令官期间，疯狂镇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更受到杉山元

等日本军部首脑的赏识。杉山元等人认为，要打破“中国事变”（即“七·七事变”）的僵局，必须拿下长江中游的咽喉要地——武汉三镇，此重任非畑俊六莫属。

畑俊六走马上任，率领华中日军进犯武汉，首先打响了徐州会战。

兵败台儿庄

畑俊六自吹懂汉学而以儒帅自诩，他从两句古诗中早就盯准了徐州：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

九里山下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

畑俊六认为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之交，为连接中国南北的必经之地，素有“五省通衢”、“军事重镇”之称。他认为，要攻取武汉必先占领徐州。日本大本营也指望在徐州一带发动会战，以期歼灭徐州附近 50 个师的中国主力部队，将其作为占领武汉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徐州会战在畑俊六走马上任之前就已经打响。

早在 1937 年 12 月中旬攻克南京之后，日军为沟通南北战场，就想打通津浦铁路，进而击破陇海铁路沿线的中国部队防线，使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南北并进，会师武汉。攻占徐州必然成为首要战略目标。

历时 5 个月的徐州会战可分为津浦路沿线的初期保卫战、台儿庄会战和徐州突围等三个阶段。

徐州会战的第一阶段为津浦路沿线保卫战。从 1937 年 12 月中旬起，日军从津浦路南北两端夹攻徐州。

畑俊六大将亲自率领 8 万日军作为主攻部队，从津浦路南段的镇江、南京、芜湖等地渡江北上。获州立兵中将指挥第 13 师团主力连续攻陷滁县、来安、六合，全椒后，1938 年 1 月中旬继续北进，在明光、池河镇一带，被中国部队韦云淞所部第 31 军堵截，双方展开激战，你争我夺不分胜负。畑俊六急忙从南京增调援军和重武器前来助战。中国第 4 兵团司令官李品仙使命韦云淞率第 31 军主力让开津浦路正面，与于学忠的第 51 军在淮河北岸布防，阻止日军越过淮河北进。到 1938 年 2 月初，虽然定远、临淮关、蚌埠等地被日军攻占，但中国主力部队损失不大。

这时，第 5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张自忠的第 59 军、第 21 集团军之第 7 军增援。张自忠在“卢沟桥事变”后一度被人们骂为卖国贼，现在终于有了同日军决一死战的机会，因而率领部队英勇作战，从日军侧背发起攻击，迫使日军退回淮河以南。张自忠、张淦指挥第 59、第 7 军乘机反击，夺回淮河北岸阵地，与日军在津浦铁路南段形成隔河对峙之势。

在津浦路北段，由于韩复榘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蒋介石处死韩复榘，任命孙桐萱继任第 3 集团军总司令后，孙桐萱率领部队东渡运河，一度攻入济宁、汶上城内，与日军短兵相接，激战数日，虽被迫退回运河西岸，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第 22 集团军由临城（今薛城镇）地区向邹县之日军发起攻击，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在此期间，板垣征四郎指挥的华北方面军第 5 师团配属于华中方面军，1938 年 1 月沿胶济铁路东进，占领山东潍县、青岛，尔后南下攻取沂水、莒

县、日照、蒙阴等地；板垣又以所属第 21 旅团为骨干组成坂本支队，猖狂地向汤头镇、临沂方向进攻。中国军队退守临沂以北防线与日军对峙，战局暂时趋于稳定状态。

从 1938 年 3 月起，徐州会战进入第二阶段，即台儿庄会战时期。

台儿庄是山东峰县的一个小镇，位于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及台（儿庄）潍（坊）公路的交汇点，扼运河的咽喉，是进攻徐州的必经之道，被称为徐州的门户。

蒋介石在汉口最高统帅部和幕僚们围着军用地图研究徐州会战的方策，突然，蒋介石以手直指台儿庄冷笑道：“娘希屁，他们败定了！”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他首先看到蒋介石抓住了一个良好的战机，幕僚们也顿时恍然大悟，一齐称赞蒋介石“神机妙算”。

这倒不是蒋介石的部下胡乱奉迎拍马，这次的确有些道理。

原来，为打破津浦战线的对峙状态，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多次向大本营申请“增加兵力”，“追剿眼前之敌”，很快得到大本营批准。西尾寿造中将当即命令矶谷廉介中将、板垣征四郎分别率领第 10、第 5 师团南北夹攻徐州，以打通津浦线，然后沿陇海线西进，取道郑州南下，攻取武汉三镇。

蒋介石抓住了日军第 5、第 10 两个师团孤军深入的机会，命令第 5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迎头痛击，务求必胜。蒋介石还亲自赶到台儿庄前线督战，下达严格命令称：“部队必须死守台儿庄；若有闪失，军委会将严惩战区司令官及所有旅以上军官！”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为使华北与华中方面军连成一片，命令第 10 师团向徐州北面最前线的据点滕县发动进攻。

矶谷廉介指挥的第 10 师团为日军精锐师团，平日训练又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科目。矶谷廉介接到命令后，即以所属第 33 旅团为骨干组成濑谷支队，从 1938 年 3 月 14 日开始，由邹县以南的两下店沿津浦路南下，当天攻下界河，又迂回到中国守军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代总司令孙震）之侧背。李宗仁立即调第 20 军团一部增援，并令第 3 集团军侧击兖州。

3 月 16 日晨，板垣征四郎指挥第 5 师团在飞机、重炮配合下，向滕县发起攻击。川军第 122 师在师长王铭章指挥下奋勇还击，誓死防守界河，打退板垣师团的几次进攻。板垣征四郎老奸巨猾，见正面进攻受阻，就采取迂回战术猛攻右翼，终于突破川军阵地，王铭章率部退回滕县县城防守。板垣师团猛攻滕县 5 日，该县城尽成焦土，王铭章为国捐躯，日军才攻下滕县县城。

板垣气势汹汹扑向临沂，企图攻占临沂，从背后攻击中国部队，再由微山湖从西面进攻徐州，使徐州陷入两翼包围之中。

临沂是鲁南名城，城宽池深。据守临沂的第 40 军军长庞炳勋是西北军有名战将。他冒着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防守临沂，与板垣征四郎的第 5 师团形成胶着状态。

第 5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深知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 5 师团凶猛异常，担心庞炳勋抵挡不住，打算予以紧急增援，但惟一可以调动的第 59 军尚在 200 华里之外，而庞炳勋最多还能坚持 24 个小时，情况十分严重。

第 59 军军长张自忠接到命令，当即率领西北军以每小时 18 华里的速度跑步前进，12 个小时就率部赶到临沂，休息 1 个小时后，就漫山遍野向日军扑去。官兵们甩手榴弹、拼刺刀，个个怀着报仇雪恨念头同日本鬼子拼命，

惟恐失去报国机会。

板垣征四郎以为再有半天就能攻取鲁南重镇临沂，没想到一下子被张自忠的第 59 军冲乱了阵脚，不到半天整个师团便全线动摇。庞炳勋见状大喜，打开临沂城门，率领将士冲杀而出。

庞炳勋、张自忠率领所部官兵对板垣师团合力夹攻，直杀得板垣师团尸横遍地，狼狈逃回滕县。庞炳勋、张自忠胜利会师，两人抱头痛哭，多年来在军阀混战中形成的隔阂霎时间一扫而光。

临沂战斗的胜利增强了全中国军民战胜日寇的信心，庞炳勋、张自忠作为抗日英雄名声大振。

临沂之战打痛了板垣师团，日本内阁受到巨大冲击，吵作一团。陆军大臣杉山元决心继续打通津浦铁路，但担心军事失利后遭受攻击，便把他关于打通津浦铁路线的计划提交日本内阁会议讨论，但受到内务大臣马场瑛一的嘲笑反对。杉山元只得以打不通津浦路就辞职的条件，换取了日本内阁对他的支持。

经裕仁天皇批准，日本军部命令华中方面军向台儿庄挺进。3 月 23 日，板垣征四郎接到命令，挥军冒险向台儿庄推进。他估计不用费太大力气就可占领台儿庄，激烈的战斗大概会发生在徐州附近。

蒋介石和李宗仁早就看上了台儿庄这个有 3300 余户的大村镇，命令中国部队加固石头城墙，修筑碉堡 70 余座，决心利用这个理想的打歼灭战的场所，在台儿庄附近布好阵势，歼灭猖狂前进的日军主力。蒋介石和李宗仁命以孙连仲的第 2 集团军的 3 个师（黄樵松的第 27 师、张金照的第 30 师、池峰城的第 31 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而以汤恩伯的关麟征和王仲廉的第 52 军和第 81 军诱敌深入，然后南北夹击日军，消灭日军主力于台儿庄一带。

1938 年 3 月 23 日，蒋介石、李宗仁担心日军不向台儿庄已布好的阵势里钻，便催促池峰城诱敌深入。

池峰城接到命令，即率领王郁彬的 185 团北上诱敌深入。这时，日军矶谷师团正从峄县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猖狂进犯，双方在泥沟发生遭遇战。池峰城率军奋战一天，又调骑兵生力军助战，歼灭大量日军。池峰城想到诱敌深入的任务，便佯装失败，撤退到小村北洛。

矶谷廉介不知是计，指挥第 10 师团主力快速追击。池峰城又退兵南洛，设下伏兵痛歼猛追之敌。为打得更逼真，李宗仁指挥孙连仲集团军部队，在台儿庄外围村落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

矶谷廉介为人残暴刚愎，没想到中国军队竟如此顽强抵抗，就摆开大战架势，利用炮火优势展开猛攻，有时一天发射六七千发炮弹，不少村庄被轰为平地。

池峰城见诱敌深入的任务已经完成，就率领 185 团退回台儿庄；日寇冲过刘南湖、三里庄，直逼台儿庄石头城下，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正式展开。

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台儿庄内，师长池峰城率军奋战，立下大功。

3 月 24 日傍晚，矶谷师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发动猛攻，突破台儿庄城墙的东北角，从突破口窜入 200 多名日军。池峰城急命该师 186 团奋勇反击，一举将 200 名日军全部歼灭。

矶谷廉介不肯善罢甘休，3 月 27 日又指挥一部日军攻破台儿庄北门；池峰城有了第一次反击经验，便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拉锯战。矶谷廉介命濑谷

旅团第 63 联队 4000 人，火速从峯县增援台儿庄。该联队第二天夜晚攻入台儿庄西北角，另一部冲入台儿庄内，直奔台儿庄西门，企图截断池峰城师部与台儿庄内联络的惟一通道，使台儿庄形势十分危急。

在危急关头，池峰城满怀一腔报国之心率军顽强抵抗，先用强大炮火压制日军攻势，再选派几十名爱国士兵组成敢死队，穿上日军军服，发一声喊冲入日军阵地，趁日军没有反应过来之时，用刺刀、手榴弹展开近战夜战，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

3 月 30 日，矶谷廉介派兵由台儿庄北面攻入庄内，占据碉堡后逐步向前推进，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池峰城虽率部奋战，仍不能将其消灭，就向孙连仲联系请求增援。孙连仲即派两个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到，将入侵庄内之敌消灭，稳定了台儿庄形势。

矶谷廉介见中国军队正从外面向台儿庄攻来，怕汤恩伯率军赶到被包围歼灭，就赶在汤恩伯集团军合围台儿庄之前，于 3 月 31 日再次攻入台儿庄北部，在文昌阁建立指挥部，向台儿庄内进攻。池峰城率领第 31 师与日军展开巷战，双方都伤亡很大，处于对峙状态。

这时，台儿庄外围据点只剩下沅上村一处，池峰城便派人命令沅上两连守军从背后偷袭日军。这一着果然有效，将文昌阁内的几十名日军全部歼灭，缴获了一批日军文件，可惜兵力太弱，未能将 500 名日军全部消灭。

矶谷廉介在台儿庄站稳了脚跟，4 月 2 日以该师团主力部队在台儿庄东面展开大规模攻势，日军凭借强大火力连连得手。4 月 3 日，日军赤柴旅团第 10 联队攻陷台儿庄南门外黄庄、边庄、孟庄等地；福荣第 36 联队攻下台儿庄东南门，同时投掷催泪瓦斯弹，中国守军牺牲十之七八，退守西关，只剩下台儿庄西北一角，形势十分危急。

为挫败日军猖狂进攻，台儿庄外的汤恩伯、张自忠两支部队奋勇作战，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才使形势有所变化。

3 月底，板垣征四郎认为汤恩伯集团军是他扫清台儿庄外围障碍的主要敌手，就派他的王牌部队——仙岛联队沿潍台公路进攻兰陵、洪山两地的汤恩伯部队，妄图拊汤恩伯集团主力之背。

汤恩伯晓得板垣征四郎这一着极为毒辣，急忙将集团军主力后撤，回师解洪山、兰陵之围，两军外围部队展开一场决战板垣征四郎利用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抢占有利地形，汤恩伯部队行动缓慢，其指挥机关大都处在仙岛联队大炮的射程之内，形势十分不利。

汤恩伯与第 53 军军长王仲廉、第 54 军军长关麟征紧急研究对策，认为只有迅速发动攻势才能解救危急局势，便突然发动猛烈攻势，使 3000 名日军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汤恩伯集团军先以大炮机枪猛轰，接着派敢死队冲上去展开白刃肉搏，再辅以火攻，打得日军人仰马翻，叫苦连天。仙岛联队几次拼死突围，都被中国部队击退，刘庄的 500 名日军被全部歼灭，中国部队夺得日军战马 50 匹。围攻兰陵的板垣师团仙岛联队受到内外夹击，狼狈地向板垣师团的后方向城逃走。汤恩伯哪里肯放日军逃跑，跟在后面紧追不舍，在向城又歼敌一部，遂将板垣师团的仙岛联队基本歼灭。

板垣征四郎得到其仙岛联队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大发雷霆，急派坂本旅团前往解救仙岛联队残部。坂本旅团受命，急速向爱曲、向城一线进犯，袭击关麟征的第 54 军。汤恩伯不敢大意，忙命王仲廉的第 85 军和周晷的第 75 军增援，很快在台儿庄以东的底阁杨楼对日军形成包围态势。

中国部队断定这里是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坂本旅团的后方勤务机关所在地。此地的日军 3000 人由板垣和矶谷两师团人员组成，只要能将这两个师团混合在一起的敌人消灭，进攻台儿庄方面的矶谷师团主力将不战而退。

汤恩伯集团军将士军心大振，抓住难得的时机发动猛烈进攻，双方几度肉搏冲杀，阵地几易其手，中国部队越战越勇，毙敌 1300 多人。

日军旅团长坂本感到情势严重，再恋战即有全部被歼之虞，就下决心以坦克开路拼命突围。中国部队指挥官料到日军要逃跑，早已下令以密集炮火组成强大火力网，封锁住日军逃跑的通道。日军坦克车一到，就开动平射炮击毁坦克，再集中火力消灭步兵，最后冲上去展开肉搏战，终于把企图突围的日军全部消灭。

坂本看突围不成，只好横下决心，依托碉堡固守待援。汤恩伯调动平射炮将日军碉堡全部轰塌，又挑选敢死队冲入敌人阵地，逐条街道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兵力又占绝对优势，经 2 昼夜浴血奋战，坂本旅团被消灭一半，被俘 100 多人，坂本旅团长带领残兵败将仓皇而逃。

矶谷廉介得知坂本旅团在底阁杨楼被消灭大半，当即决定下令后撤，匆忙之中坦克汽油用尽，又抛弃坦克乱放空炮，掩护师团主力后撤。汤恩伯集团军分路发动进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收复台儿庄周围被日军占领的大片乡村，解除了日军对台儿庄的威胁。

在台儿庄内，池峰城率领全师官兵执行蒋介石亲自制定的“磁性战术”，以巨大的伤亡诱敌深入，在台儿庄与矶谷师团激战 7 昼夜，打得相当艰苦。

在关键时刻，接到汤恩伯、张自忠在外围连连告捷的喜讯，池峰城在 4 月 5 日夜间率领敢死队向日军据点发动攻击，经 3 小时夜战，将台儿庄内的 700 名日军层层包围。

日军旅团长濑谷见已成瓮中之鳖，官兵又丧失斗志，便下令余部从台儿庄内外抽身撤退。

1938 年 4 月 6 日晚，中国部队在台儿庄战场发动全面反攻：汤恩伯军团从外线包围进攻，孙连仲集团从正面进行内线扫荡，两路大军夹攻，不到 2 小时，便把台儿庄内外的日军全部歼灭。

4 月 7 日凌晨，中国部队冲出台儿庄向北追击，矶谷廉介还算明智，认为再投入日军也无济于事，下令北撤。中国部队追至红瓦屋又歼灭日军几百人，日军坂本、濑谷两支队狼狈逃窜。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

台儿庄之战，中国军队摧毁日军第 5、第 10 两个师团，歼灭日军 2 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装备，为中国取得平型关大捷之后的第二次大胜仗，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取得的最重大胜利。

第 5 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满怀豪情向蒋介石报告喜讯：“台儿庄之役在委座亲自指挥下以胜利告终。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在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曙光！”

蒋介石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喜形于色，虽“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所有宣传应努力报道事实，慎勿夸张”，但他却过高地估计了台儿庄战役的作用，错误地认为日军已失去决战能力，便向徐州附近调集 60 万重兵，决心扩大台儿庄战役的成果。日军一直在捕捉中国部队主力，这下找到了目标，就调集华北、华中派遣军，气势汹汹向徐州扑来，徐州会战进入第三阶段。

损兵占空城

日军在台儿庄大败的消息传回东京，日本内阁和军部受到巨大冲击。

在内阁会议上，内务相马场瑛一对陆军大臣杉山元等大肆攻击，硬要全体内阁成员为2万被消灭的日本侵华官兵鞠躬默哀，还提出要与杉山元一起辞职，以此向日本军部施加巨大压力。

杉山元竭力为自己辩护，声称日本大本营在台儿庄战役中有重大发现，那就是发现中国在徐州地区集结有四五十万重兵，尤其是汤恩伯率领的中央军第20集团军不可轻视，现在好不容易抓住了中国军主力，应坚决放弃“战局不扩大方针”，下决心集中日军主力部队，在徐州地区歼灭中国部队主力，打通津浦铁路，使华北、华中占领区和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伪政权连成一片，根本上改变日本侵华局势，彻底打败中国军队。

杉山元和日本军部首脑的意见得到日本近卫内阁的同意，1938年4月7日下达了大本营陆军部的命令。

大陆命第84号

命令

一、大本营企图击破徐州附近之敌。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以有力之一部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之地区。

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占据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之前项徐州（不含）以南津浦线及庐州（合肥）附近。

四、详细事项由参谋总长指示。

日本内阁通过进行徐州决战的方针后，杉山元伙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提出以海军大将末次信正代替马场瑛一出任内务大臣，近卫文磨不敢反对，又拉他的好朋友、内大臣木户幸一进入内阁出任文部大臣，共同策划徐州会战方策。

在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杉山元提出要从中苏边境调关东军进关参加徐州会战，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坚决反对：“无论战争打到什么程度，满苏边境的国防军绝对调动不得，万一苏俄发动进攻怎么办？谁要这样做就是帝国的罪人！”

杉山元强调侵华日军不够使用，必须动用赫赫有名的关东军。石原莞尔不以为然，指出当时山西战场沉寂，华北方面军可抽调部分兵力；华中方面也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南京附近的日军可以调出，不必调动关东军。

大本营会议同意石原莞尔的意见，决定由寺内寿一大将统一指挥进攻徐州。

寺内寿一1878年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曾在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历任参谋本部部员、步兵联队长，师团参谋长、驻朝鲜军参谋长、侵台（湾）日军司令官，1935年升任陆军大将，1936年任广田内阁陆军大臣，1937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此人是日本已故首相寺内正毅的长子，自幼受寺内正毅和日本元老和军阀们的刻意培养，很快青云直上，军国主义情绪高涨。

寺内寿一被任命为徐州会战的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后，急电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两个师团长飞赴天津，商议进攻徐州方策。两个台儿庄之战的败军之将本以为要受申斥，却受到寺内寿一以礼相待，板垣和矶谷都表示要打个大胜仗以报知遇之恩。

在商议进攻徐州的战略战术时，寺内寿一提出再增加一个师团仍由台儿庄进攻徐州，板垣征四郎提出采取大迂回战略，即先不攻徐州，而是出兵截断中国部队西退之路，然后再逐以击破、歼灭。矶谷廉介也赞成板垣征四郎的意见，提出自蚌埠向北发动攻势，以钳形攻势包围徐州，全歼中国部队主力。

这时，寺内寿一接到了日本大本营制定的作战方案：

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草案

昭和十三年（1938）4月7日

大本营陆军部

第一，方针

以华北方面军有力之一部及与之相策应之华中派遣军之一部击破苏州附近之敌，并占领津浦线及庐州附近。作战开始预定为4月下旬。

第二，要领

一、华北方面军以约4个师团向陇海沿线采取攻势击破敌军。为此，以主力由北方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并以约1个师团由兰封东北附近向归德方面敌之退路进攻。

二、华中派遣军以约2个师团（一部担当后方警备）由南方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为此，沿津浦线地区进击，尤须尽力断敌之退路。

三、华北方面军占领徐州以北津浦线并击破放军后，即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

四、华中派遣军在击破敌军后，即占领徐州（不含）以南津浦线及庐州附近。

五、两军应密切配合作战。

六、本作战结束后，华北方面军应将约3个师团配置于黄河以南；华中派遣军将约2个师团配于徐州（不含）以南津浦线及庐州附近。

不久，杉山元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等幕僚组成“大本营派遣班”前往徐州战场，负责大本营与寺内寿一之间的联络事宜，对会战进行必要的现地指导。

寺内寿一和桥本群、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制定了以黄口为总目标，四路大军南北夹击徐州的作战方案：南路以蚌埠为起点，沿涡河西进攻蒙城，再渡涡河北上，经永城县直攻黄口；北路由微山湖经济宁、金乡、鱼台迂回黄口；又安排两路佯攻，即南路由蚌埠攻宿县，东路由淮阴进攻徐州以东的陇海线，迫使中国部队四面设防，掩护日军主力部队在西部发动进攻。

这样，为报台儿庄之仇，日军从北平、天津、山西、绥远、江苏，湖北各战场，增调30万大军，配备各种重武器，从4月中旬开始，分多路对徐州实施大包围，企图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地区。

这时，蒋介石为台儿庄局部战争的胜利所陶醉，一心想扩大台儿庄的战果，打算再制造几个“台儿庄大捷”，也从各战场调集部队，使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部队达40多万人。

从1938年4月中旬开始，日军北路军指挥官羽源田之助首先从鲁南发起

攻击。为戴罪立功，日军第 10 师团长矶谷廉介从兖州抵达枣庄，策划进攻战术，命令坂本、长濑两个支队从郭里集附近出发，濑谷支队从峰县发起进攻，与中国部队发生激战。4 月 19 日，日军国崎支队猛攻临沂，张自忠、庞炳勋运用与日军作战的经验率部奋勇抵抗，以伤亡 1300 余人的代价，歼敌 2180 人。国崎支队遭张自忠、庞炳勋痛击后，在马头镇又被关麟征部包围，伤亡惨重。板垣征四郎见国崎支队陷入困境，急调片桐支队等部前往增援，又遭中国部队沉重打击，仅日军第 41、42 两个联队即被歼 1400 多人。

与此同时，日军北路军指挥官命吉住良辅率第 9 师团及井关机械化部队由蚌埠出发，沿涡河西上直犯蒙城，广西部队第 31 军 131 师副师长周元率部凌云上团去解蒙城之危。

周元率部刚到蒙城，吉住良辅即率机械化部队赶到，马不停蹄对蒙城发动猛攻，又派飞机狂轰滥炸，霎时间轰倒蒙城城墙，日军步兵一涌而上。周元和全团官兵几乎全部阵亡，团长凌云上只带 9 人突出重围。日军 5 月 9 日攻占蒙城，5 月 12 日占领永城，主力北上直扑黄口车站。

在津浦路北段，日军第 2 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命第 102、第 107、第 119 师团合成一股，沿津浦铁路北攻宿县。防守宿县的中国第 21 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抵挡不住，寄希望于第 11 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率部增援，但李品仙部在合肥被日军牵制不能增援宿县，廖磊难以抵挡，自行撤出宿县，使徐州南面门户洞开。

此时，鲁西北方面也频频告急，日军第 111 师团由济宁攻克郓城，进抵鲁西南重镇菏泽，李必蕃率领 23 师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日军第 16、114 师团也发动进攻，徐州周围阵地至此全部丢失。

蒋介石为避免全军覆没，保存有生力量，命令李宗仁从 1938 年 5 月 15 日起，分五路向豫皖地区突围。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为从心理上击垮日军，掩护徐州大部队撤退，蒋介石决定派飞机奔袭东京，播撒抗日传单。中国空军第 14 航空队队长徐焕升率队驾驶 2 架飞机，于 5 月 20 日凌晨 2 点 45 分飞到九州上空，向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四国等地投下 20 万张传单，然后安全返回中国。日本军部得知此事，认为这是中国给他们的奇耻大辱，定被世界各国所耻笑，命令侵华日军加紧进攻徐州予以报复。

发现中国军队从徐州突围的企图后，日军徐州会战最高指挥官寺内寿一急命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缩小包围圈，但仍然无法阻挡中国部队的大规模撤退。

等日军攻到徐州城下，却发现中国 50 个精锐师已巧妙地跳出日军几十万大军的围困，到了安全地带，城内中国守军不足千人，又且战且走，退出徐州。日军进入徐州后未见过一个中国兵，只剩下平民和商人。日军恼羞成怒，就拿屠杀百姓泄恨，大杀两日才命令全军封刀，徐州市民被屠杀一半。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无可奈何地向裕仁天皇禀报称：“我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了中国部队的退路，将徐州地区铁桶般包围起来，但总计约 50 个师的中国军队，于 5 月中旬突然从西南方向跳出我军重围，战果之微出乎意料……”

日军攻占徐州后，大本营又决定“扩大徐州会战战果”，进行追击作战。

寺内寿一指挥日军分兵数路，沿陇海线两侧向西追击，徐州会战便告结束。

徐州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会战，双方都投入几十万兵力，力争消灭对方主力部队。日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发动徐州战役，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包围战斗中，损兵折将 3 万余人，最后占领的竟是一座空城。

在徐州会战中，中国军民特别是抗日官兵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歼灭了数以万计的日军，特别是台儿庄会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与日寇周旋，取得巨大胜利。徐州大撤退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不利条件下做出的一个大胆而明智的决定，它使侵华日军消灭中国主力部队的企图再次破灭，为后来的武汉会战保存了实力，赢得了时间，使中国军事当局有较充分的时间部署武汉会战。

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捷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正面战场上一个杰作，对全国军民坚持持久抗战和粉碎日寇“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都有重要意义。

紧锣密鼓攻武汉

中国军队从徐州大撤退使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伤透了脑筋。在内阁会议上，近卫文磨联合文部大臣木户幸一等人，把责怨的矛头对准陆军大臣杉山元和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要求惩办日军进攻徐州的最高指挥官寺内寿一。

杉山元和广田弘毅极力为寺内寿一辩护称，徐州会战“只能说未达到预期目的，不能认为是失败”，主张立即增兵，进攻武汉。

近卫文磨和木户幸一密商，为改变近卫内阁的“战争内阁”形象，主张把杉山元和广田弘毅赶出内阁，用板垣征四郎和宇垣一成取而代之，利用这两个人主张同国民党政府交涉的言论，掩盖进行武汉会战的准备，借此机会修订对华政策，寻找新的完成侵华战争的途径。

为减少阻力，近卫文磨和木户幸一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和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密商，决定以近卫内阁总辞职的方式，在被天皇再次指定近卫文磨组阁时更换杉山元和广田弘毅。

在军部首脑支持下，近卫改组内阁后于 6 月 10 日召开五相会议，研究新的侵华政策。6 月 15 日，日本御前会议确定了进行武汉作战的方针。6 月 18 日，日本大本营以大陆命第 119 号下达了实施汉口作战的如下命令：

- 一、大本营企图于秋初攻占汉口。
- 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于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向前方占据前进阵地，准备以后之作战。
- 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继续执行关于确保占据区域安定之现行任务，尤须尽力扫荡该地区内之残敌。

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当日以大陆指第 161 号电向侵华日军发出指示：

- 一、华中派遣军应利用安庆作战之战果，协同海军伺机占领黄梅、九江一线。
- 二、华北方面军占领地区内（含开封）确保安定之要领，在于尽量使残敌归顺，无可能时则扫荡敌之主力。
- 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就策应华中派遣军向汉口作战，研究并准备以一部兵力向郑州方面前进牵制敌军的作战。

为掩护进攻武汉的部队进行调动，日本当局施放和谈烟幕，战争贩子宇垣一成念起了“和平经”。

宇垣一成 1868 年生于冈山县，陆军大学毕业后曾任日本驻德国武官、陆军大学校长、师团长、陆军省次官，其后 5 次出任内阁陆军大臣，1931 年发动“三月政变”未遂被贬入预备役，转任朝鲜总督，1937 年曾受命组阁，却因与军部有矛盾而中途流产，1938 年 5 月出于玩弄和谈阴谋的需要，被日本军部重新推出，取代声名太臭的广田弘毅，出任近卫第一届内阁的外务大臣。

此人身材粗短，活像水桶，他入阁前提出的重要条件就是要求首相近卫改变关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进行对华交涉。这正是日本军部和近卫等日本政客策划已久的阴谋，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在 1938 年 7 月 8 日召开五相会议，决定在诱使国民党政府屈服的情况下，按照日本“帝国（1938 年 1 月 11 日）御前会议决定的方针，把它作为一个政权，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近卫文磨和宇垣一成确定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屈服的四个标志：一是如同意归并，必须参加建立新的中央（伪）政权；二是在上述情况下，旧国民政府改换名称或改组；三是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取亲日、防共政策；四是蒋介石下野。

近卫和宇垣一成决定，在蒋介石不屈服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迫使国民政府崩溃或屈服。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宇垣一成利用他和蒋介石、张群的私交关系，邀请张群赴日访问。在张群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安排下，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在香港进行了两次会谈。日方提出要蒋介石下台等条件，遭到中方拒绝。

在和谈烟幕掩护下，日本侵略军开始向武汉进犯。日军大本营把攻占武汉、控制中原要地作为迫使蒋介石投降的最大机会。

7 月中旬，日军大本营宣布撤消华中方面军辖上海派遣军、第 10 军的战斗序列，下达了华中派遣军新战斗序列：由畑俊六大将任司令官，统一指挥第 2 军和第 11 军、直辖兵团、航空兵团。

畑俊六根据日本大本营命令，重新调集了 35 万人马，做出攻取武汉的军事部署：

东久迩宫稔彦中将任第 2 军司令官，辖第 3、第 10、第 13、第 16 师团等 4 个师团，主力集结于合肥附近，负责进攻六安、霍山，再向大别山进犯，直趋信阳，切断平汉线，迂回至武汉之北，转攻武汉。

冈村宁次中将任第 11 军司令官，辖第 6、第 9、第 27、第 101、第 106 等 5 个师团和波田支队，在九江附近集结，先攻占黄梅、九江，再于瑞昌、德安一线依次集中兵力，切断粤汉线，迂回武汉之南，从正面进攻武汉。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直辖第 15、第 17、第 18、第 22 等 4 个师团，负责上海、南京等湖口下游占领区的守卫。

德川好敏中将任航空集团司令官，以 3 个飞行团为基干，协同陆军作战；海军和第 3 舰队溯长江而上，掩护并配合陆军攻取沿江要塞，最后攻取武汉。

蒋介石深知素称“九省通衢”的武汉，为纵贯南北的平汉路、粤汉线和横穿东西的扬子江的交通枢纽，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当时又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实际上为中国的抗战中心。6 月中旬，他就主

持制定了武汉保卫战计划，调集 120 多个师，约 110 万人，动用看家血本，指挥精锐之师，要与日军决一死战。

抗战以来战线最长、投入兵力最多的武汉会战开始了！

惊心动魄外围战

武汉会战的序幕是由日本侵华巨魁土肥原贤二在河南拉开的。

1938 年 5 月中旬，土肥原中将率领第 14 师团 2 万人马，凭借优势装备和“武士道精神”，连续攻克内黄、仪封、野鸡岗等要地，兵临兰封（今兰考）城下。

兰封是郑州和开封的东大门，兰封的得失关系到豫东会战的成败。蒋介石急忙从武汉赶到郑州亲自指挥，又命桂永清率第 28 军、邱清泉率铁甲第 200 师前往增援。桂永清、邱清泉两人求胜心切，在兰封城外冲散日军一支 100 余人的搜索部队，便自吹为“兰封大捷”，沾沾自喜，麻痹大意，反被土肥原派一个旅团实施突袭打得措手不及，丢失兰封城。蒋介石闻报大怒，限桂永清 3 日内攻克兰封，否则军法从事，桂永清吓得 3 天不敢接电话，虽不惜代价拿下兰封，但 15 万大军竟未能围歼土肥原所部 2 万日军。

接着，日军在河南大举进攻，连续攻克兰封、商丘、开封，直逼郑州。蒋介石惊慌失措，6 月 9 日命人从花园口炸开黄河，汹涌的黄河水造成 400 多公里的黄泛区，在军事上给日军西进平汉线造成一定困难，日军第 14、第 16 两个师团的几千人在中牟、朱仙镇、尉氏等地被洪水围困，中国部队乘机发动进攻，消灭日军一部，使日军自北而南进攻武汉的计划受阻，只得艰难地向合肥地区绕行，推迟了进攻武汉的时间，但却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滔天大难。在黄泛区艰难行进的日军这样向大本营报告：“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前进，6 月上旬在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溢出，采取了水淹战术，形成了经由中牟、尉氏、周家口、颍州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由于新黄河的泛滥，情况严重，看来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武汉似有困难。”

日本军部绝不就此止步，又向中国增兵 40 余万，增拨作战费用 32.5 亿日元，还请裕仁天皇亲自出马给畑俊六和侵华日军打气：“朕在东京等待你们胜利的消息！”

畑俊六耀武扬威坐镇南京，划分南北两个战场，在长江两侧展开大规模攻势。

6 月 2 日，日军第 6 师团长稻叶四郎命坂井支队 1 万余人从合肥南下侧击安庆。

安庆古称皖城，位于安徽西南部的长江北岸，“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于是乎在”，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

畑俊六也深知安庆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中国自古视其为“江介之要冲”、“金陵之门户”，是通向武汉的第一道大门。他担心坂井支队不能顺利攻克安庆，又专门从台湾调来波田支队作为溯江攻城的先锋。

波田支队为驻台湾的日军精锐之师，素有“悍师”之称，兵强马壮，气焰嚣张，受命从台湾乘坐 20 余艘海军舰艇，于 6 月 11 日夜到达安庆江面。恰逢天降大雨，支队长波田连夜选择登陆地点，翌日清晨在大雨滂沱中登陆突袭。中国部队第 26 集团军一部猝不及防，抵挡不住日军的强烈攻击。波田

支队迅速占领安庆城郊飞机场，略事休整又向安庆守军杨森第 27 军第 146 师发动进攻，杨森部队纪律松弛，装备太差，未经力战就轻易丢失安庆。

波田支队又从安庆沿江西上，进攻马挡要塞。

马挡位于皖赣两省接壤之长江之滨，江面不到 1 华里，水流湍急，形势险要，为日军西上进攻武汉的必经通道，堪称武汉的第一道屏障。国民党政府 1937 年冬成立长江阻塞委员会，在江心修起一道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只留可行一船的缺口，情况紧急时马上可以阻塞。令人费解的是如此重要的军事要塞，蒋介石只配备了一个营的兵力防守。

1938 年 6 月 23 日，日寇第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波田支队对马挡要塞展开猛攻；中国军队各级军官却在为庆祝所谓“抗日军政大学”结业而大吃大喝，下级军官找不到守备司令，各自为战奋勇还击。马挡要塞总队长鲍长义带领 500 官兵英勇坚守 3 天，屡次打退日军进攻，最后几乎全部战死，日军才于 6 月 26 日攻陷马挡要塞。

冈村宁次指挥波田支队沿江快速推进，7 月 2 日猛烈进攻湖口要塞。冈村宁次派飞机轮番轰炸，又命步兵进攻。要塞司令彭位仁率领部队拼死反击，打退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7 月 3 日，彭位仁所部官兵全部阵亡，中国将军刘雨卿率领第 26 师及时赶到，与日军昼夜苦战，大部分官兵亦为国捐躯，日军于 7 月 4 日攻陷湖口要塞。

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猖狂西进，7 月 23 日冒着倾盆大雨，进攻九江附近的姑塘。

九江古称浔阳、江州，东临鄱阳湖，南傍庐山，北濒长江，自古就是“西挹武昌、东引皖口、襟带中流”的军事重镇。

为保住九江，中国部队第 9 战区第 2 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奉蒋介石之命，亲自到九江坐镇指挥，督促预备第 11 师竭力抵抗波田支队对姑塘的进攻，激战 3 小时，击沉日寇汽艇 10 余艘，最后难抵日寇猛烈攻势，被敌人登陆成功。张发奎急调 2 个师增援，也未能夺回姑塘。这时，日军松浦淳六郎率第 106 师团赶到，与波田支队合兵一处进攻九江，李玉堂、欧震率领第 8 军和第 4 军奋勇抵抗，与蜂拥而入的日军展开激烈巷战，但仍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只得被迫撤离九江，使日军冲开了武汉外围主阵地的大门。

中共力荐持久战

就在武汉会战国民党军队连失外围数城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派周恩来到武汉面见蒋介石，协商武汉会战的防卫大计。

周恩来当时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特殊经历和崇高爱国精神赢得了许多国民党将领的崇敬，蒋介石也许不忘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救命之恩，对周恩来格外器重。

日本人松本一男在所著《周恩来之路》一书中，这样分析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三人之间在抗日问题上的微妙关系：

周恩来继续在蒋介石身上下工夫。同年（1938 年）6 月，创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各党各派讨论国政的场所。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 7 人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参政员。

当时在汉口的共产党员中，以王明排名第一，但他的人格、理论、识见低劣，而

且有点轻浮，不够气魄代表中共，蒋介石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周恩来自然而然地被拟定为中共的发言人，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这样希望。

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等人的嘱托，制止王明的言行举止，同时向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姿态，挺身推动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而且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份内的工作处理得尽善尽美。作为共产党的发言人，他在批判国民党的反动性时是一针见血，得理不饶人，但平常则尊重国共合作的精神，对国民党及其领袖采取低姿态。他在汉口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文称赞：

“蒋介石总统根据其革命的经验，是能将我们全体民族导向胜利惟一且最正当的人物。”

蒋介石会觉得高兴，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他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对共产党做了许多的让步。在这层意义上，周恩来可以说是共产党独一无二、忠实能干的外交官。

周恩来告诉蒋介石，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非常关心武汉会战，希望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他明确向蒋介石建议调整武汉会战的战略部署：“明朝覆亡的教训之一就是节节抵抗，节节溃退，把兵力都用在了第一线，没有在敌后留下一定数目的部队以牵制、袭扰敌人。我国既然准备持久作战，就不应该动用所有兵力进行这次会战。”

周恩来建议只用 1/3 部队与日军正面对峙，而使大部分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或开到大后方备最后决战之用。蒋介石非常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召开军委会决定只以原计划 60% 的兵力投入武汉作战，保留 40% 的兵力作为持久战的基础。

周恩来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白崇禧将其概括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极为欣赏，命令将此作为中国对日作战的最高战略方针，将《论持久战》油印成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军队参考。毛泽东还亲自致信蒋介石呼吁团结抗战：

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惟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抗日热潮推动下，国民党军队又打了一个胜仗。第 9 战区第 1 兵团总司令薛岳在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沿线的山岳丛林地带巧摆“反八字阵”，诱使日寇第 106 师团进入包围圈中。薛岳指挥部队奋勇进攻，展开激烈的拉锯战，第 106 师团的两个联队长被击毙，中小队长伤亡大半。薛岳所部在庐山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全歼日军第 145 联队。

与此同时，日军第 6 师团和第 2、第 3 师团向大别山南麓的淮海、广济一带大举进攻。李品仙兵团重创敌军，但未能阻止日军西犯。

接着，稻叶四郎率第 6 师团进攻田家镇。他知道田家镇地势险要，星罗棋布的湖泊形成天然屏障，从正面进攻很难奏效，就绕道从侧面攻击。李延年率领全军奋勇坚守，竟然用迫击炮打下日军飞机 1 架。中国部队坚守田家

镇近半个月，歼敌六七千人后，武汉最后的坚固屏障田家镇才被日军撞开。

“东方马德里”之战

武汉被西方称为“东方的马德里”，和西班牙的著名抗战名城齐名，当时是世界反法西斯各国注意的焦点。

武汉古称江夏，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由呈鼎足之势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它自古控长江天堑，扼南北交通咽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8月22日17时，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根据日本大本营命令，向35万日军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命令：

（一）第11军在海军配合下，沿长江两岸攻占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从咸宁、贺胜桥地区切断粤汉铁路，由南方迂回武汉；另一路向德安、永修攻击前进，相机攻占南昌；

（二）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麓，经六安、固始、潢川、罗山攻占信阳，然后沿平汉铁路及其以西地区南下，从北面、西北迂回包围武汉；另一路从商城南下，横越大别山到达蒙城，由东北方向策应协同沿江的部队，进攻武汉。

（三）航空兵团以主力协助第11军，一部协助第2军作战。

（四）作战开始时间，为8月27日。

同一天，日本大本营再次发布命令，“攻占汉口附近地区”，“把蒋政权逐出中原！”

8月27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命第2军由合肥出发，分左右两路向武汉发动进攻。

左路的日军第10、第13、第16师团约5万人，奉命沿大别山北麓经商城直插武汉。8月28日，日军兵分三路，冒着大雨向皖西门户六安、霍山进犯，中国名将于学忠率第51军奋勇反击，与彼冢义男指挥的日军第10师激战两天一夜，双方均损失巨大。中国第5战区左兵团指挥官孙连仲才命于学忠率第51军退出六安。日寇得以占领六安，又向固始、黎集等地猖狂进犯。

与此同时，获洲立兵率第13师团进攻霍山，冯治安率第37师顶住日军猛烈炮火攻势，坚守两天一夜。日军又调大批炮兵助攻，孙连仲才同意第37师撤出霍山。

9月初，获洲立兵率领日军第13师团渡淝河进攻富金山，碰上了强硬对手宋希濂。宋希濂巧妙利用扇形地势布置兵力，居高临下，痛击日军的猖狂进攻，10天激战消灭大批敌人。获洲立兵的精锐师团伤亡惨重，无可奈何向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报告：“我军遇到强手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仍然毫无进展，我军对富金山之敌束手无策！”

冈村宁次没想到宋希濂的部队如此顽强，抽调第10师团的一个大队，偷偷迂回到富金山侧背，妄想打掉第71军指挥机关，干掉军长宋希濂。但其阴谋早被中国部队第88师侦察人员发现，马上报告了钟师长，该师长立即派一个团在预定阵地设下埋伏，一举歼灭偷袭之敌500余人，余者狼狈逃回。冈村宁次把担任向导的100多名汉奸全部杀掉犹怒气难平。

蒋介石对富金山之捷给予极高的评价：“是则宋军陈师之壮绩，已获到

超出之代价，尤其精神上足使敌确认我愈战愈强，抗战精神，历久弥增，令其气短……查陈师此次抗战之壮烈，于敌重创，全在官兵一体，同抱牺牲决心，誓洒热血于最后5分钟，歼敌之精神有以致之，殊足矜式。”

宋希濂率领第71军与日寇激战一周，给敌人沉重打击，9月11日奉命将部队转移到沙涡、小界岭一带防守。

烟俊六深知这是进攻武汉的关键一仗。日军如能通过小界岭翻过大别山，便可沿公路西进直扑武汉，于是命令第16师团长藤江惠辅去啃宋希濂这块硬骨头。

藤江惠辅知道宋希濂不好惹，便请求烟俊六调拨飞机、大炮支援，督促日军士兵对沙涡阵地发动轮番攻击。蒋介石怕宋希濂独木难支，就加派田镇南率第30军支援宋希濂。

宋希濂和田镇南在小界岭附近的白果树设立了两个军的联合指挥所，密切协同打退日军一次次进攻。日军第16师团疯狂冲击一个多月，也没有突破中国部队阵地。烟俊六狡猾异常，指示日军转而进攻潢川，张自忠的第59军、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宋希濂的第71军奋勇还击，给日军迎头痛击。

日军第2军攻占潢川、罗山，又马不停蹄立即进攻信阳，信阳古称义阳，位于河南省南部大别山、桐柏山结合部的北麓，攻下信阳，日军就能一马平川直逼武汉。

烟俊六亲自为第2军制定了进攻信阳的作战计划：

一、以第3师团主力由罗山以北的淮河南岸西进，击溃守军之防御，经高店、洋河，占领平汉铁路上彭家湾车站之附近地区；另以骑兵第3联队，在师团主力之北侧，攻向明港以南之三官庙东站一带，阻止中央军沿平汉线南进，然后从北面迂回进攻信阳。

二、以冈田资的第8旅团，率步兵第40联队和坦克、炮兵部队，沿罗山至信阳的公路，从正面进攻信阳。

三、以第10师团主力，从罗山以南之蟒张、子路，攻向西南之青山、涩港，占领平汉铁路上之柳林车站，阻止中央军沿平汉线北进，从南面迂回进攻信阳。

四、开始向信阳进攻之时间为9月30日。

9月底，胡宗南率领第17集团军与日军第10师团在信阳以东激战，歼灭日军5000余人，延缓了日军从北面进犯武汉的时间。

这时，藤田进率日军第3师团赶来增援。胡宗南率部迎敌，但他却以伤亡过重为由，只留一个团守信阳，其余部队退向南阳，致使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

日军第2军用伤亡2000人的代价攻下信阳，又以洪水下山之势沿平汉线南下，攻克武胜关，平靖关，直逼汉口之北。另一路日军攻占商城，与溯江西上的日军呼应进攻武汉。

在长江南岸的第9战区，薛岳兵团在星子方面与日军第101师团、第106师团激战3个多月，第101师团被薛岳二摆“反八字阵”，整个师团消耗殆尽，中国国民党部队创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范例；日军第106师团伤亡8000余人，除千余人逃脱外，其第123木岛联队、第145池田联队等1万余人被消灭，300多名日本士兵被俘。这一仗致使敌我双方呈胶着状态。

为摆脱困境，吉住良辅通过侦察获悉，中国军队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在南浔路之马回岭部署未定，立足未稳，他当即率第9师团沿瑞德公路向马回

岭发动进攻。中国名将黄维奉命率第 18 军、俞济时率第 74 军奋勇截击，歼敌获胜，打破了日军南下德安的企图。

日军第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见吉住良辅的第 9 师团进攻德安受挫，便命本间雅晴中将率第 27 师团几千人沿瑞安公路向西进犯，企图以占领武宁来威胁德安。薛岳兵团抽调欧震的第 4 军、俞济时的第 74 军、叶肇的第 66 军在万家岭一带协同作战，对日军第 106 师团形成包围态势。

日军第 106 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为率部冲出重围，以一个旅团兵力向第 74 军的第 58 师阵地拼命冲击。第 58 师在师长冯圣法将军率领下，以极大的伤亡代价打退日军的多次猖狂进攻。

这时，日军另一部队从庐山方向赶来增援，中国部队第 58 师腹背受敌，情况危急，匆忙向军长俞济时求援。俞济时手头无兵可调，只好把两个警卫连派去增援。第 74 军将士高唱田汉作词、任光作曲的《七十四军军歌》，奋勇杀敌：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
他，强占我们国土，
残杀妇女儿童。
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
南浔线，显精忠，
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在高昂的军歌声中，第 58 师将士以血肉之躯堵上了日军撕开的裂口，将日军第 27 师团几千人包围在万家岭一带，再发动猛烈攻势，歼敌 4 个联队，本间雅晴率领残兵败将逃回瑞昌。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得悉日军在南浔路进犯受阻，急命本间雅晴、吉住良辅率第 27、第 9 师团主力增援九江。为避免再遭痛击，畑俊六调出十几架飞机、40 余艘海军舰只，先向长江沿江要塞码头镇、富池口狂轰滥炸，再驱赶步兵冲击。汤恩伯率第 31 集团军誓死抵抗，杀伤日寇两师团大量人员。本间雅晴兽性大发，施放大量毒气。

本间雅晴外号“红鼻子语言学家”，曾任日本同英国陆军联系的情报联络军官 7 年，又给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当过 6 年侍从官，1932 年曾在一日一夜之间为裕仁天皇讲解并摘录 400 页的李顿致国联的报告书，1941 年作为日本入侵菲律宾司令官制造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残害大批盟军俘虏，1946 年被盟军总部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正是这个罪大恶极的本间雅晴，1938 年秋天在溯长江而上向汉口发动进攻的战斗中，丧心病狂地在马头镇一带大量施放毒气。汤恩伯率领第 31 集团军冒着日寇施放的毒气勇猛抵抗，打退日军的几次进攻，消灭本间雅晴、吉住良辅所部日军几乎半数，使日军也半步前进不得。最后因日军毒气战发挥作用，中国部队火力不济，汤恩伯才撤出马头镇、富池口。

本间雅晴得手后猖狂西进。汤恩伯率部在富水河南岸与日军苦战，张发奎也率领第 2 兵团在阳新、大冶、半壁山、黄石港等地给西犯之敌以沉重打

击。

侧击占广州

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中国军民在武汉外围同日军浴血奋战近 3 个月，毙伤日寇 20 多万人，仍将武汉牢牢控制在中国人手中。

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接到日军进攻武汉处处受挫的报告，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又受到近卫文麿首相等人的责难，处境极为狼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

华中派遣军攻击汉口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曾有一度陷于焦虑时期，即第 101 师团由 1938 年 9 月下旬至 10 月下旬在庐山、德安附近进行苦战，第 2 军突破大别山前进意外受阻的时期。日本陆军中央部也无增援的余力，至 10 月 11 日才勉强由华北方面军派骑兵第 4 旅团前往增援，而且弹药特别是炮弹消耗量极大，为其补充煞费苦心。

板垣征四郎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协商武汉会战的作战方案。多田骏认为，日本要攻取武汉，仅在武汉动手不行，必须在广东发动进攻，在武汉背后捅蒋介石一刀。

日本海军对进攻广东最为积极，日本陆军首脑怕海军抢功，态度较为消极。但现在日本陆军在武汉被打得焦头烂额，只得让日本海军插手广东作战，但又担心兵力仍不够使用。

多田骏是条老狐狸，他这才告诉板垣征四郎，他早已在台湾预备好一支部队，古庄干郎的第 21 军已在台湾澎湖集结待命，300 余艘作战舰只也久候多时。

板垣征四郎仍觉得只用古庄干郎的 3 个师团没有取胜把握，多田骏却胸有成竹，打开军用地图仔细分析中国对广东的防守阵势：中国在广州原有第 4 战区余汉谋部 13 个师 11 万人马，但蒋介石缺乏军事远见，调走 4 个师支援武汉会战，使广州地区防守较为空虚。蒋介石认为日本当时不敢轻易进攻广州，没有做认真准备，给了日本突然进攻广州的一个“天赐良机”。板垣征四郎这才被说服。

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立即将突袭广州的作战计划提交有裕仁天皇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海军首脑提出进攻广州的同时进攻海南岛，陆军首脑认为不能分散使用兵力，予以反对，海军部首脑也作出让步，在作战方案最后附加一句“海南岛方面正考虑将来进行的情形”，陆海军才取得一致意见。

于是，日本大本营 1938 年 9 月 19 日下达了第 21 军的动员令，发布了该军的战斗序列，重新任命以前曾准备任命为华南（平海）作战司令官的原日本驻台湾军司令官古庄于郎中将为第 21 军司令官，下达进攻广州的“大命”如下：

大陆命第 201 号

命令

一、大本营企图与进攻汉口互为先后，夺取华南敌之重要根据地，并为切断其主

要对外联络补给路线，占据广州附近要域。

二、第 21 军司令官应协同海军攻占广州附近要地。

三、台湾军司令官应对第 21 军之兵站给予援助。

同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以大陆指第 273 号发出指示，命第 21 军主力于大亚湾登陆，随后以一部兵力由珠江方面策应攻占广州。

1938 年 10 月 11 日夜，美丽的大亚湾月光皎洁，风平浪静，古庄干郎秘密遣兵调将，命登陆部队分乘 60 万吨的两个输送船队在大亚湾占领攻击阵位，中国守备部队竟毫无觉察。古庄干郎大喜，命令日军士兵偷偷登陆。中国部队猝不及防，又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之准备。指挥这一地区作战的第 2 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仓皇后撤。广东省主席吴铁成闻讯出走，广州遂沦于敌手，当时有“余汉无谋、吴铁失城”之谣。

武汉大撤退

蒋介石在武汉得到广州失守的消息，大吃一惊，觉得武汉对外通路已被堵塞，武汉失去死守价值。他不停地在室内疾走，俄顷走到写字台前，提笔在日记中分析形势：

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之目的：一、表示其非达到使中国屈服不可；二、对英国示威，欲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三、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四、至于截断我广九铁路之目的尚在其次。

蒋介石对丢失广州极为烦恼，忙召集文武心腹商量武汉战和之策，都苦无良策，只有夫人宋美龄对形势的分析使蒋介石耳目一新，宋美龄分析说：“10 月 6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抗议日本侵犯华中，违反‘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政策，损害美国商人与企业利益，要求对日本采取有效行动。广州失陷，英美态度会更加强硬！”

蒋介石觉得宋美龄说得很有道理，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对武汉会战又有新的考虑，提笔在日记中写道：

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对于敌军心理，若其果求和平，则我军自动放弃，反能促其觉悟，并可表示我抗战之决心，与毫无所求，且亦所不惜，使其不敢有所要挟。否则，如我军冀其停止进攻，则彼更将奇货可居矣！故决心放弃武汉。

于是，蒋介石召集主要将领会议，作出撤出武汉的军事部署：江北的主力部队撤至平汉路以西的汉水沿岸和大洪山区，廖磊的第 21 集团军留在大别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薛岳的第 1 兵团留在九江以南抗击敌人；张发奎的第 2 兵团依托幕阜山，掩护西面的粤汉铁路；罗卓英指挥武昌以南金牛方面的作战，掩护各军撤退，整个武汉只留一个旅的正规军做象征性的抵抗。这样，武汉大撤退全面开始。

武汉大撤退部署完毕后，蒋介石特别向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强调说：“武

汉的厂矿、机关、团体、学校、难民等等都已按计划撤退完毕，这里只是一座空城，我军战略企图已达到，而且日军突然在广州登陆，威胁我华南后方。因此，武汉的战略地位已失重要性。如我军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938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队放弃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同日接见中外记者指出，中国抗战方针为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之得失，亦不在一时之进退，数月以来消耗敌人的目的已达到，掩护后方之任务已毕，武汉已失重要性，因此决定转移兵力，与敌周旋。

各路日军乘国民党军队全面撤退之机，逼近武汉。

10月24日，侵华日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武汉。

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看中国部队有秩序地全面撤退，才放心大胆来到设在九江的华中派遣军前方指挥所，想到不几天就可耀武扬威进入“东方的马德里”，担心日军进入武汉后再发生类似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事情，使日本再度受到世界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同时也为了利用武汉三镇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发动侵华战争和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基地，10月24日向所属华中派遣军下达了日军进占武汉三镇及入城后的注意事项，特别是对军纪风纪做出明确规定：

- 一、中国军队已开始全面退却；
- 二、第二十一军已于10月21日攻占了广州；
- 三、华中派遣军所属进攻武汉之部队，应迅速、果断地进行攻击，以占领武汉三镇；
- ……
- 七、维护外国在武汉的权益，防止发生涉外事件；
- 八、各军对其所属地域内的外国使馆，应配置步哨；
- 九、进入第三区的部队，如与英国陆战队发生冲突，听候派遣军司令官之指示；
- 十、部队宿营地区，避免设于市内，应选在郊外大建筑物内，以便于维持军纪、风纪；
- 十一、须保护汉口、汉阳、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陈列馆（见附表所列）；
- 十二、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正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常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

……

畑俊六一声令下，几十万日军饿狼一般冲向武汉三镇。武汉到了最后陷落的时刻。守卫武汉的一旅中国官兵仍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掩护中国大部队有计划撤退。

在撤离武汉的最后关头，蒋介石欲表现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硬是要同坚守武汉的一旅将士“风雨同舟”。手下大将陈诚等和宋美龄一再“苦谏”，蒋介石才在10月24日夜偕同宋美龄离开被日本飞机轰炸成断垣残壁的武昌军事委员会，乘飞机飞往湖南省衡阳市北面的南岳。岂知飞机迷航，燃油即将用尽，蒋介石只得命飞机重返武汉机场。10月25日凌晨，获悉日军离汉口城外仅15公里路程时，蒋介石才换乘飞机飞往南岳。

在南岳驻军司令部，蒋介石对守卫武汉三镇的一旅将士如何对付日本侵略者作出指示：“对敌行动，切不可留有余地；对敌态度，亦不可稍有消极缓和之意；必须坚定、简单、明白，而示我对和战一定之限度则几矣！否则，无异示弱，则败亡矣！”

为保卫大武汉，年轻的中国海空军在苏联空军英雄支持下，以血肉之躯，以灵与肉谱写了壮丽的诗歌，留下了丰功伟绩。

在武汉保卫战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对陆军和海军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可谓战功卓著。为阻止日本舰船输送日寇进攻武汉，他们驾着银鹰日夜巡航在长江上空，炸沉敌舰 12 艘，击伤 29 艘。特别是中国空军大队长沈崇海轰炸敌舰时不幸中弹，飞机油箱着火，他放弃跳伞逃生的机会，毅然驾驶飞机冲向敌舰，与日军战舰同归于尽，表现了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忠勇爱国的精神。

在武汉会战中，更可称道的是中国海军将士。中国仅有的 11 艘战舰和几十艘快艇几乎全被击毁。中国海军司令陈绍宽亲自率领“中山”号等军舰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撤出武汉担任运输任务，遭到日军飞机围攻轰炸。陈绍宽带领将士与日机殊死搏斗，却无法冲出重围。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1922 年 6 月陈炯明发动叛乱使孙中山蒙难时，舰长萨师俊赶去营救。孙中山脱险后将“永丰”舰改为“中山”舰。

10 月 24 日上午 9 时，日本侦察飞机发现“中山”舰位于武昌江面，就回去引来 9 架作战飞机分两路向“中山”舰轮番攻击，劈头盖脑一阵扫射，使“中山”舰创伤累累。一刻钟后，又窜来 6 架日机，成一字形向“中山”舰轮番投弹。舰长萨师俊指挥海军官兵用全舰火力集中还击。日本飞行员改变战术，采用急速下降俯冲投弹攻击，使“中山”舰上的高射火炮因飞机速度很快而不易击中目标。日机此法奏效，对“中山”舰展开更猛烈攻击，终于击中“中山”舰的船尾左舷，遂使舵机转动不灵。接着，“中山”舰的锅炉舱又被击中，江水大量灌进舱内。萨师俊急忙带人抢救，但为时已晚，不到 3 分钟江水就达到齐腰深，顿时水淹炉火，机器停转，全舰失去控制力，舰体偏向左倾。日机又发动攻击，炸中舰首。萨师俊正在炮台上指挥作战，一发炮弹打中他的腿，顿时鲜血涌出，腿被炸断，手臂也受重伤，人跌倒在血泊之中。炮台上的官兵也被炸得血肉横飞，无一幸免。

萨师俊神志尚清，从血泊中用一条腿支撑着坐起来，顽强地指挥舰上幸存人员奋勇作战，向日机开炮还击。敌机发疯般向“中山”舰开炮施虐，使“中山”舰受伤更重，缓缓向江中沉没。全舰官兵站在深水中各自为战，开动手中武器对敌射击。最后，萨师俊舰长率全舰官兵，连同“中山”舰一起沉入滔滔的江水之中。其余炮艇，有的被日本飞机、舰艇击沉，有的羞于被日寇俘获而自沉江底，没有一艘投降日军。中国海军将士以鲜血和生命为保卫武汉谱写出壮丽篇章！

10 月 25 日中午，日军中将吉住良辅率第 6 师团自江北方面攻陷黄陂，其佐野支队的第 23 联队通过滠口，到达汉口北郊的戴家山，当夜占领汉口市街的一角，26 日占领汉口。

10 月 26 日凌晨 5 时，波田支队（台湾旅团）沿长江南岸直逼武昌城下，波田重一率领他的旅团从宾阳门窜入武昌城，得意忘形地在武昌城门插上了太阳旗。

10 月 27 日，日军第 116、第 6 师团各一部攻占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全

部陷于敌手。

接着，日军第9师团侵入贺胜桥地区，突破粤汉线之后继续进攻，11月11日侵占岳阳；第27师团、第10师团等相继攻占武汉外围地区。中国部队有计划地陆续撤退，没有发生激烈战斗。

10月31日，蒋介石为安定人心，在重庆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大讲武汉会战对全国抗战之重大意义：

保卫武汉之军事作战，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

蒋介石煞费苦心回答对他的责难说：

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5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是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认为战争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

武汉被日军占领的消息传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又狂欢一场，在日本各地和占领下的台湾、朝鲜、东三省举行大规模祝捷会。裕仁天皇也于10月28日上午11时在日本皇宫召见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对日军攻陷武汉赐予如下敕语：

我陆海军诸部队之紧密密切协力，克服长途几多困难，终于击摧众敌达成攻占武汉之目的，朕对此深感欣慰。望将此旨传告众将士。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高兴得太早了。实际上，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于纵横千里的疆场上与日军激战4个半月，歼灭日军20万人，消耗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的狂妄野心，日军的战略进攻至此已达顶点，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